

477/1

中國基督教史綱

中日學術研究所藏

治心自署



青年叢書第二集

第六種

中國基督教史綱

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藏

中華民國卅五年九月九日 收到

序

中華民族的心理尚實際，重經驗，講倫理，長記憶，所以各時代經過的事蹟都有很詳細的記載，而歷史的方式有編年，有傳志，有紀事本末，真可說是體大思精，起自軒轅以至近代，馳聘古今，上下數千載間，爲人類保存一個相傳不斷最爲悠久的歷史。最近英人編著印度史，多取材於中國的史料如法顯玄奘和義淨等的遊記，這足見吾國人對於歷史的專長。可是在中國文化的各方面，如宗教、政治、學術等，作有系統的敘述，可說是最近幾年纔有的。如中國文學史，我最早看見的是英人祁士（Giles）用英文寫的中國文學史大綱（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謝無量胡適之馮友蘭以前，首先編著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恐怕是日本 Suzuki。我所見的也是英文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An Outlin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至於佛教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雖有高僧傳燈錄刊行於世，可是中國哲學史的編輯，也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

文學、哲學、宗教雖說是文化中一部分，其實也就是民族的一種特殊的活動，一種內部的生活，爲民族精神所寄託或由之以表現，並且是民族思想的結晶，文化最要的成分。我國人既長於歷史的記載，何以對於民族特殊的活動，不加以特殊的注意呢？這個原因或許是因爲數千年中國史家所注意的只有帝王和貴冑的事略，而民衆的活動則多疏忽。同時中國人缺少論理的和系統的概念，所以能夠用科學的方

法來編著各種特殊活動的歷史，真是鳳毛麟角不可多見。

基督教東漸和其他的宗教傳入中國的歷史稍有不同，比如佛教在中國，雖有盛衰興廢的時期，但是自初傳以至於現在幾兩千年，其歷史是繼續不斷，其範圍雖廣，材料雖多，敘述起來還不算困難；基督教則不然，中間有的斷絕數百載，幾至於湮沒，後來雖死灰復燃，而名目變更，使人不得認識唐山真相，如唐之景教，元之也里可溫，明清之天主教，還有和基督教類似或相關的宗教的傳入，如麻尼教，一賜樂業教，以至明教，回教吾國史籍的記載，多混雜不清，若非經一番整理，索隱鈞玄，真是無法究詰。

基督教說是自唐代至於現今，至少也有千餘年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人爲他編一個很完備很翔實的歷史。我少時讀過謝洪寶的中國耶穌教佈道小史，後來又讀陳揆菴的一賜樂業教元也里可溫考，以及其他關於中國基督教的考據，同時又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得見法國學者關於天主教傳入中國的著作，因爲我自己學力與時間的不足，總希望有人能夠把這些的材料搜集在一起，博考羣書，提綱挈領，源源本本，作一個有系統的敘述。這種希望與私衷的禱祝，已有數年，最近見到王治心先生所著的中國基督教史綱，閱讀一遍，深得我心，數年來的禱祝與希望，現在已成爲事實了。王先生對於中國的國故極有研究，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又極純粹，他編著中國基督教史是以中國宗教思想爲背景，和一般專事撿拾西人牙慧，隔靴搔癢，與中國文化和生活漠不相關的編著，實不可同日語。

數年前王先生著有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由中華書局出版，早已膾炙人口，風行海內。現在的中國基

《基督教史綱》出版後要「洛陽紙貴」，這是可不必說的。但是我要讀者知道，中國基督教史綱和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是有連帶的關係。許多西方學者，以為中國人宗教思想非常淡薄，甚至說中國是無宗教的國家，中國學者也有引着此語以自豪。殊不知中國在上古時代就有「祝官」和「史官」之設，「祝官」掌天事，「史官」掌人事，一是關於宗教，一是關於歷史，所以在中國的古代，宗教和歷史是相提並重。並且一切偉大的宗教都產生於東方，而這些的宗教，除婆羅門教外，如佛教、明教、回教、猶太教，以至於基督教都會在中國下了種子，而中國也成了肥沃的宗教園地，除一二萎謝不振外，其餘都已婆娑合抱，茂盛蕃滋。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欲多贅，只要你們翻開王先生的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就可明白了。不過還有人以為基督教不能迎合國人的心理，一是因為中國人宗教思想淡薄，一是因為基督教義和中國文化抵觸。頭一個問題王先生已經在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答覆了。第二個問題，他在這本書裏也給了我們一個很愷切詳明的答覆。我在這本書裏面得了一個感想，就是我們不應該再把基督教看為一種洋教了，因為它已經在我們中國文化園地裏生了根，而且已是根深蒂固，雖在風雨飄搖之秋，遭受不少摧殘，還能挺然獨秀，好像老菊凌霜，青松抱雪。

中國基督教信徒現在約有四百萬，中間二百七十二萬左右是天主教信徒，一百萬多是改正教信徒，為中國人口百分之一，換言之，一百人中有一個基督徒。數量雖然不多而其影響之大，散佈之廣，這些事實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之社會、政治、文學、藝術，以至於整個的生活，無不直接間接與之發生關係。至於全國通

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有福音使者的足跡，散下種子，結成生命之花。基督教已漸漸地和中國民衆生活，織錦似的打成一片，這一點王先生在書中也給了我們一種的暗示。

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却也有它的特性。比方佛教把哲學、科學、宗教合在一起，基督教雖也提倡科學，研究哲學，却把哲學、科學、宗教分開。基督教不是哲學、科學，它是宗教，它是生活之道，是真理，是生命。假使我們要在基督教裏求科學與哲學，那真是『緣木求魚』，自然要失望。有的宗教，經典之多，浩如汪海，而基督教則統一於新舊約兩經，但是裏面的道理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不在於典籍之多寡，却在於影響社會和人生的能力是怎樣，基督教在中國慢慢地發展，富有生力，這一點在這一本書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基督教在中國至少有三次受過極大的打擊：第一次是庚子義和團的排斥洋教，那不過是物質上和肉體上的打擊，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反基運動，那是精神上的打擊，物質上却沒有受到多少的損失。每次受過打擊之後，起來，發展的力量則突飛猛進；可是這兩次所受的苦痛是爲着基督教而受，而且是基督教自身單獨蒙受。第三次是在這大時代，基督教的精神和物質都受了極嚴重的威嚇，因爲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中國基督徒不在此時要盡其救亡圖存的職責，而且也要與國人同生死，同患難，同艱苦，同奮鬥。基督教不特要受水的洗禮，火的洗禮，更要受血的洗禮，那應不特骷髏荒冢，白骨復甦，即基督教自身在這次大戰之後，灰燼之餘，將要亭亭毒毒，繼長增高，湧現一朵新的生命樹，奇葩怒

放，異香散發。佛教對於中國文化有過極大的貢獻，而中國文化又能發揚光大之，將來對於基督教自然也能夠使之特放異彩，光芒萬丈。那末中國基督教將來的歷史有更偉大更光榮的一頁，而王先生這一本書也要成爲將來中國基督教史的前奏了。

末了，編史不是容易的事，古之良史如司馬遷尚有是非頗繆，先黃老後六經之誚；班固也有排死節，否正直，不敍殺身成仁之譏；王先生說他急急忙忙寫成這本書，「實在談不上『備』與『信』的條件。」我們不能求「備」於王先生，但是王先生所收集的材料都很慎重很正確，我以爲至少已達到「信」的條件了。我拜讀之餘，有感於心，聊綴數語以爲序。

陳文淵於香港旅次

廿九，二，廿七日

中國基督教史綱目錄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中國的宗教背景	七
第三章	基督教教義與中國	一七
第四章	基督教始入中國的傳疑	二五
第五章	基督教在唐朝的傳佈	三一
第六章	元代基督教的傳佈	四七
第七章	明代基督教的輸入	六一
第八章	利瑪竇與其他教士	七一
第九章	南京教難的始末	八七
第十章	天主教在文化上的貢獻	一〇一
第十一章	第二次教難前後	一一五
第十二章	禮儀問題的爭端與其影響	一三一
第十三章	更正教輸入中國的預備時期	一四五

第十四章	太平天國與基督教	一六三
第十五章	道光以後天主教的復興	一七七
第十六章	道光以後更正教各宗派的活動	一九一
第十七章	庚子的教難	二二一
第十八章	庚子後基督教的新趨勢	二三七
第十九章	基督教與國民革命	二四七
第二十章	非基同盟與本色運動	二五七
第二十一章	基督教的事工	二七五
第二十二章	結論	三五九

第一章 導言

在最近百年中，從海禁既開以後，有一種不可遏止的潮流，湧進到中國來，使中國蹈常習故的固有制度與思想，根本地動搖起來。正如胡適所說：「一個有過光榮歷史及固有文明的民族，當着被生活需要的壓迫，而必須接受外來的文化時，一定要很自然地很合理地發生起疑懼的心理。」（見先秦名學史序）這種新舊文化的搏鬥現象，在今日更為顯著。而推究牠的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民主主義（Democracy）與科學思想（Science）在推動。陳獨秀這樣說過：「要擁護那德先生（民主主義），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科學思想），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見新青年八年一月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他那樣站在全盤承受西洋文化方面的理論，把中國固有的一切，盡情地加以破壞，這種態度，我們不能給以百分之百的同情。果然不能否認中國固有文化，必須加以改造，使一切不良成份歸於淘汰，以合於現代的潮流，但是我們決不可以不問青紅皂白，一棍子把固有的一切打倒，全盤承受西洋文化來替代。正如耶穌所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馬太五章十七節）耶穌的態度，不是極端的無理由的破壞，而是存善汰惡的成全，對於希伯來舊有的文化是如此，對於其他民族的文化亦莫不然。

民主主義本是基督教的產物，基督教帶來了這顆種子，下種在中國的文化田裏，使中國固有的階級

制度與傳統思想，發生了莫大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至於科學雖不是基督教的東西，而基督教却負了介紹的責任。在自明至清的教士們中，看他們如何努力譯著的工作，可見一斑。所以基督教雖不是文化搏鬥中的主力，却無庸否認是把麵酵放在麵粉中的婦人。耶穌說過這個比喻：『天國好像麵酵，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麵粉中，直到全團都發起來。』（馬太十三章三十三節）果然，現在已到了全團發酵的時候了，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一部分的表现，他如最近的新生活運動，國民革命的成分裏，都有這麵酵的作用。

從現實方面看一看，我們無論到那一個城市，總可以見到許多基督教的事業，有禮拜堂，有醫院，有學校，已經十分普遍地建立着。比較名聞全國的，如上海徐家匯的天主教堂，即遠在吳淞口外已可瞭見雙雙樹立的塔尖。其他各大都市中，莫不有巍峨高聳的天主教會或耶穌教禮拜堂，尤莫不有規模宏偉的教會醫院，最著名如北平的『協和』，長沙的『湘雅』等，幾乎為國人所共知。特別是學校的設立，大中小學的總數，有千餘所之多，就學的學生，不下五十萬人，最著名的大學，如天主教的『震旦』，『輔仁』，如基督教的『燕京』，『嶺南』，『齊魯』，『約翰』，『滬江』……等等。即窮鄉僻壤之間，亦必有一教會設立的小學，與簡單的禮拜場所。再從與基督教有相關的事業觀之，則各大城市及各學校中設立的男女青年會，對於一般社會亦發生了密切的聯繫。凡此種種，莫不予人們以深刻的印象，亦可以證明基督教在中國發酵的一斑。

再從歷史講來，基督教與中國發生關係，原不是新近之事體，已經有過很長久的時期了，許多傳疑的

說素，不去管牠，而確實可以考證的，從唐朝的景教算起，一直到現在，亦有一千三百年或斷或續的活動。雖然還沒有人把這種活動加以系統的敘述，至少我們可以承認有過四個時期：即（一）唐代的景教，（二）元代的也里可溫教，（三）明代的天主教，（四）近代的更正教，在這樣長時期的活動中，當然的，在中國文化生活上，不能沒有相當的影響。

既然在空間上已經普遍到全國，在時間上亦佔千百年的長期，照理應該是人所共知的了，但却是不幸的，還有許多人不能明瞭牠的內容與經過，會引起許多誤會，而認為是「用夷變夏」，「文化侵略」的。在新文化運動的秩序中，有非基同盟的一幕。「吃飯忘記種田人」，所以我們便有一種說明的必要。

我們所要說明的，有下列的幾點：（一）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固有的宗教習慣，是融和的還是衝突的？（二）基督教輸入後，其經過的情形在中國文化上發了生什麼影響？（三）過去基督教的發展與所引起的變動，究竟是有功還是有過？（四）基督教在中國所經營的事業與工作，於新中國的建設究竟有什麼關係？沒有總之：我們在這裏要對於過去的加以檢討，為未來工作上的參考。根據着這個意見，來做一個嘗試。

這個嘗試，歐美學者中已經有過若干的著作，而在中國人却是一個破天荒，覺得有相當的困難。記得在十五年以前，我個人曾經有個嘗試的宏願，利用編輯金陵神學誌的機會，想收集近代基督教各宗派的史料，於是分別函請各宗派領袖，記述他們自己一宗派的經過，但是結果並不圓滿，在一百三十多派別中，祇得到少數較大宗派的報告。因此，深深地感覺到材料的不易收集。在基督教方面尚感到這種困難，對於

比較隔膜的天主教，豈不更屬不易麼？

因為我們知道編歷史最重要的條件，至少要做到『備』與『信』兩個字。什麼叫做『備』？就是要沒有掛漏；什麼叫做『信』？就是要非常正確。要達到『備』與『信』的條件，關鍵全在收集材料的一點上。若從基督教在中國所經過的四時期講：第一、第二兩時期，祇有幾塊殘碑做根據，而加以一種合理的推斷，不過推斷是最容易陷入主觀的錯誤的，只要一看清代金石學家的考證，如王昶、錢大昕、杭世駿……等的景教考證、洪鈞、俞樾……等的也里可溫教解說，都不免有許多錯誤。至於第三、第四兩時期，根本要從天主教與基督教散漫的文獻中去整理出系統來，宗派既分歧，工作又各自為謀，雖協進會等曾出有綜合的年鑑，也祇限於一部分與近十年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做到『備』與『信』的條件，實在是不可能的。

現在全國青年協會編輯部主任吳耀宗先生，突然向我提到這問題，要我繼續十五年前所未成的工作，因過去經驗上感到收集材料不易的緣故，覺得非常躊躇，不敢貿然地答應下來，況且在相當忙碌的教課生活下，要從事於此，困難可以想見。十五年來已死的灰，本來沒有使牠復燃的希望，但是吳先生好像不容我逃避，決意要把這死灰復燃起來，我也只好寫信給幾個朋友與機關，徵求材料，最得着幫助的，如燕大 洪煥達教授，協大圖書館金雲銘主任，以及天主教圖書館、協進會圖書館……等等，得了些中西文的書籍雜誌，由我的大女兒雅子把英文書裏的大意繙譯出來，還有我的兒子女兒們或檢查，或謄清，全體動員，幫助我在暑假兩個多月裏，急急忙忙地把他寫成，實在談不上『備』與『信』的條件。本來想寫成以後，就

正於范子美先生，却不料在九月十日那一天他竟與世長辭了！三十多年來商量學問的老友，一旦永別，不禁悲從中來，就把這一本不完全的書來表示對他的紀念！

第二章 中國的宗教背景

中華民族在宗教上向來沒有固執的成見，信仰有絕對的自由。不獨在固有的宗教上很少爭端，即對於外來的宗教，亦莫不宏量的容納。這一點，在我們將述說宗教背景之前，應先鄭重的提出。

有人說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雖號稱有儒釋道三教，釋教是外來的，姑且除外，儒道二教，都算不得宗教，梁任公說過『儒教之教乃教育之教，非宗教之教也』，儒家所崇奉的孔子，本是個教育家，他的學說，只限於現實的人生，絕少討論到天道與神明，而且他的天道觀念，正是修正了古代遺傳下來的神權思想。至於所稱的道教，創始於漢代的張道陵，依托老子之名的。老子本是個哲學家，而不是宗教家，從他所遺下的五千言道德經中，知道他認宇宙的本體為道，道的性質是自然，並不是一個意志的神明。張道陵借托老子之名用符籙來愚民，做黃冠逐食的法門。佛敎雖是外來的宗教，但佛敎中的學者，也有不承認其為宗教的，歐陽竟無曾有『佛法非宗教，亦非哲學』的理論。他以為宗教上所必具的四條件，（一）崇拜教主，（二）信從聖經，（三）謹守信條，（四）宗教儀式，佛敎中是沒有的，所以佛敎算不得宗教。上面這些理論，是不是正確？只要一看一般社會的生活，便可以了解的。

我們無論走到那一處城市，便可以見到許多孔廟，菴院，寺觀，即數十戶集居之小村落中，亦必有一混合式的廟宇，供着觀音，關帝，財神，閻王……等等塑像，尤其在普通家庭之中，莫不有土地神，竈神，門神及祖

先等神牌，按時按節的焚香燒楮，頂禮膜拜；這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豈不是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麼？我們不能根據少數學者的理想，就把這種事實根本抹去的。

不過這種多神宗教的形成，當然有他的種種因素，本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現在要略略地加以說明，便不能不從原始的自然崇拜說起。原始人民，對於種種不可解說的自然現象，起了驚奇而怕懼的心理，便視之爲神明而崇拜牠，那不只中國原始人民是如此，也可以說是世界一切宗教的起源。在中國的古書中，關於這類自然崇拜的紀錄，真是多不勝舉。我們從禮記的祭義中，得知古代有崇拜日月星辰的禮節，如所謂「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尚書堯典所稱「禋於六宗」，六宗是什麼？賈逵說：「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周禮春官亦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古稱爲三光的，「二」卽古「上」字，「川」卽「三垂」，表明日月星三光。可見三光崇拜，在中國是很早而且很普遍的。此外如崇拜風雨，崇拜寒暑，崇拜山川，崇拜社稷……等等，在尚書禮記周禮中都可考見。特別是社稷的祭祀，在古代看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所謂「春祈豐年，秋祀報賽」，「右社稷，左宗廟」，尤其是周代要典，所以後來所謂「變置社稷」，成爲國家滅亡的代名。我們只要一讀禮記祭法中的一段話，就可以知道古代多神崇拜的情形：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總之：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古代自然崇拜的事實，原始的三光崇拜，遊牧時代的庶物崇拜，進而至於農業社會的山川社稷崇拜，再進而至於封建社會的天祖崇拜，這種崇拜的演變，都由於生活的關係，不能不說是一種多神崇拜的自然宗教。後來雖然因着社會的進步，而有不少的變遷，但是直到現在，還有許多遺傳，在一般人民生活中可以見到。從儒釋道三教中考察，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可以看見這種古代宗教的遺傳。現在把牠分開來說一說：

儒教本不是宗教，誠如梁任公所說，但是後來却的確變成爲宗教了，不但如此，在無形中竟成爲國教。孔子自身，果然有反對古代宗教的意味，把古代的天祖崇拜，從宗教的而變爲倫理的了。從前以「天」爲有意志的神明，「祖」爲有知覺的精靈的觀念，到孔子身上却大大地不同。孔子觀念中的天，已不是有意志的神明，而是一種流行不息的定理，所以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從「四時行，百物生」的變化上說明天道，是爲哲學上的現象論。他又曾明白的說到禱告的態度，在子路請禱——禱爾於上下神祇——的時候，明明表示出禱告是不能愈病的，而有「丘之禱久矣」的拒絕。照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之義，子路之請，不能說是沒有理由的，而孔子爲什麼這樣嚴予拒絕呢？我們只要看他所說的「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句話，就可以知道。如果天是個有意志的神明，難道就不可以用感情去挽回的

麼？這可以證明孔子所承認的天，已經不是古代宗教上有意志的天了。再看他對於祖宗的觀念，也是從求福降祥的宗教意味，變成爲報本返始的紀念了。他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個「如」字，明明表出所祭的對象是假設的而不是實有的。因爲他根本不承認死人是具有知覺的，他回答子貢「死人有知無知之問」，很明白地說：

『吾欲言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祀也；則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爲晚也。』（說苑）

在這樣模稜的答語中，很可以看出他是不信死人有知覺的，死人既沒有知覺，何必祭祀祖宗呢？所以墨子曾經批評他是「無鬼而學祭禮」的虛僞，而孔子却認爲是維持倫理的一種方法，叫人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去從事祭祀。後來傳他學說的孟子荀子，都是把原始宗教性的天變作了人本化的天。這可證梁任公的話是對的。但是後來的儒教，確實成爲宗教了，從漢朝尊孔以後，孔子的地位，變成宗教的教主，他所手訂的六藝，變爲宗教的經典，他所提倡的孝道，也變爲宗教的教義，儒釋道三教同源之說，便爲一般人所承認。從此歷代行政元首的帝王，莫不用宗教的儀式，代表全體人民負起祀孔的責任，各處莊嚴的孔廟，普遍地建立起來，這樣，儒教的「教」字，決不是僅僅教育的意味，而是有宗教的意味了。我們研究這中間的因果，不能不承認是受了陰陽家的影響。從董仲舒揉合陰陽五行的思想來說，春秋把孔子看得有點神祕起來，陰陽家原來保存不少古代的迷信，這種迷信就變成了東漢所盛行的讖緯之學。讖是一種預言，

因此孔子也是未卜先知的神化人了。緯是一種迷信，竟承認是孔子所作。再加上三綱五常的提倡，儒教更爲歷代帝王所利用的護符，而由國家的功令來提倡尊孔。後來宋代的朱熹，繼續完成這宗教化的禮教，統制着千餘年來人民的生活。質言之，儒教的成爲宗教，實創始於漢儒，完成於宋學者。

說到道教，也是創立於漢代，一方面附會着老子的學說，一方面摹倣佛教的組織，而有所謂五斗米道的產生。表面是以老子爲教祖，實際上是陰陽家方士派思想所凝成，迎合人民的低級信仰，以治病驅邪長生神仙之說相號召。硬把宗教家的冠冕，加在哲學家的老子頭了。讀過老子道德經的人，誰都可以了解老子是個唯物的機械論者，他所說的道，不是個有意志的神明——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而是一個空無所有的抽象的自然。繼續發揮老子思想的莊子，他雖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的懷疑，究竟還是個「未始夫未始有始」的玄學者，而不是宗教家。所以認老莊爲道教領袖，實是漢以後的事。從張道陵以後，有魏伯陽葛洪的鍊養服食，有陶弘景寇謙之的經典科教，於是符籙，丹鼎，經懺等派的道教，次第產生，而普遍起來，這與佛教的輸入，不無相互的因果關係，宋代朱熹所說：

「二氏固互相倣效」

的話，是有理由的。雖然他那比較地說到：

「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只偷得佛教不好處。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爲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見於科教者，道家爲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

這一番話，未必正確，但是道佛旨趣相同，互相倣效，自是一種事實。

在六朝老佛同重的結果，道教遂駕凌儒教之上，後來唐代以國姓之故而崇老，再以崇老之故而名道家書爲經，宋代又集天下道書爲道藏，道教更見發達，與儒釋並行而支配了整個民族的生活。從此道佛二教，支配着水平線以下的低級社會，儒教則在水平線以上的高級社會中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總之：無論在儒釋道三教之中，都隱藏着許多古代多神崇拜的質素。說到這點，不能不提墨子，墨子的學說，實在是很近於宗教的，他的天鬼信仰，原是古代自然宗教的信仰，以天志爲實行兼愛的根據，正與基督教以上帝爲愛的根源一樣。在春秋戰國獨有他是極端的保守古代宗教的，奇怪的，根本不是宗教的儒與道，倒成爲宗教，很近宗教的墨子，反而無形地消滅了。但是照我的觀察，墨子的宗教精神，並沒有消滅，儒釋道三教中，都有他的影響在內，我們不能因爲墨子學派的形式沒有人繼續下去，便把他保存古代自然宗教的精神也抹煞了，前面說過中國人民的宗教生活中，很有許多古代多神崇拜的遺傳，這種遺傳，與墨子學派實在有密切關係，戰國以後，那種天鬼多神的信仰，影響到一般平民的生活中，正與當時陰陽家思想的影響有同樣的潛在力，這在大多數人們所不甚解了的；這裏我們應該補充的說明。

現在要說到佛教，佛教本是從印度輸入的，但是不久便成爲中國的宗教，與原來的形式有很顯著的不同。輸入之初，因爲種族的關係，不免有種種的爭端，先有道佛之爭，後有儒佛之爭。關於前者如古今佛道論衡中所記五嶽十八山觀道士褚善信等上表反對，與在白馬寺內道佛鬥法的事，這些果然不足憑信，但

後來在佛教歷史中所說的「三武一宗」之厄，却大半由於道士所發動的。後魏太武帝因聽信道士寇謙之與宰相崔浩的話，以及北周武帝聽信道士張賓之，唐武宗聽信道士趙歸真等，乃有坑殺僧尼，毀滅佛寺的慘劇。推究這種爭端的原因，由於道教的嫉妒，而不是兩教教義的衝突，與民間的宗教信仰，未嘗發生任何影響；反之，一般人民因佛教頻受推殘之故，而擁護更力。究竟道佛二教的旨趣相同，仍舊異常融洽，所以像顧歡夷夏論中所謂

「釋道二教，在形而上之道則同，在形而下之器則異，……道即佛，佛即道，在名則實，在實則合。」等議論，却可以代表道教中的一般見解。

關於後者，儒家中也不免有很多反對的理論，如六朝時代的范縝，發表他所著的神滅論，予佛教以致命的打擊，然因帝王的提倡，仍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唐宋學者的攻擊佛教，如傅奕、韓愈、歐陽修以及宋代理學家等，除了張橫渠從研究楞嚴經的結果而從教義上立論外，其他都不過是形式上的攻擊，柳子厚所以說韓昌黎的關佛，不過是罪其跡，「知石而不知韞玉」，這實是對一般關佛者的確評。但是在擁護與信仰方面，有學者，有帝王，有大多數的人民，如漢末牟子的理惑論，六朝時代三教調和的主張，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都是有力的論證。尤其大多數帝王的提倡，與佛教徒宣揚的努力，不但使佛二教漸形融洽，更是使佛教日趨發達的重要因素。於是「三教同源」便成爲一般社會的信仰。

說到帝王對佛教的提倡，從漢明帝遣使求佛以後，孫權爲康僧會建寺江南，石勒的敬禮佛圖澄，苻堅

的迎取鳩摩羅什，以及南北朝的帝王，無一不信佛的，尤以梁武帝爲最，親手受戒於惠約，迎達摩於廣州，三幸同泰寺，寺院多至幾千所，可謂佛教全盛時代。此後歷唐宋元明大多數帝王，都予佛教推行上以無窮力量，所謂上行下效，其影響於人民的信仰，自是很大。再從僧徒宣傳方面觀之，在譯著事業與求法精神二點，可以見得大概：

譯著工作，根據宋贊寧和尚在高僧傳所說：

「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是有差違；後則顯親往，奘空兩通，印印皆同，聲聲不別。」

之言，可以分爲三個時期。從東漢至西晉，爲第一時期，大概是西僧主政的，著名的譯者有安世高支婁迦讖等人。從東晉至南北朝爲第二時期，是西僧與華人合作的，著名的譯者有鳩摩羅什登賢真諦等人。唐朝至貞元爲第三時期，是完全由華人自任的，著名的譯者有玄奘義淨等人。佛教經典，經過這些名人的譯著，不獨介紹，抑多發揮，當時學者既厭倦於注疏詞章之空疏，又懾於名僧之學問德業，遂易歧視而爲歡迎，變容納而爲皈依。又加以一般高僧之歷盡艱辛，西行求法，佛教文化，遂與中國文化相融合，不獨中國學術思想中含有不少佛教思想，如宋明理學然，即佛教本身，亦不再是印度之舊，而成爲中國的佛教了。尤其從上行下效的原因，使佛教「轉迷啓悟，離苦得樂」之本旨，影響大多數的平民，因爲從兵燹戰爭中所遭受的痛苦生活，要尋求精神安慰與希望，更容易使「三世因果，善惡輪迴」等小乘說素，普遍於民間。於是大多數

信佛之人，都本着自私的來生希望，去焚香拜佛，而藉以爲生活的和尙緇流，迎合這種心理。寺院廟宇，遍滿了全國，既本佛教固有的地獄天堂，又混合着中國古代遺傳的多神崇拜，佛教便佔着中國宗教上的第一位。雖然也有不少悟道的和尙，與智信的居士，而大多數信仰的民衆，不能不說是一種多神崇拜的迷信，這種迷信，支配着中國千餘年來的人民生活，一直到現在還是具有很大的勢力。

這樣說來，怎能說中國是沒有宗教的呢？一方面看，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民，都有他混合式的宗教信仰，信天，信鬼，信萬物都有神明。從壞的一方面說，這種信仰程度是很低的，不合時代的，應加以改正。從好的一方面說，中國人民都有承認精神生活的重要。而且對精神修養方面，更有很豐富的經驗，古聖賢人對於這方面有過不少有價值的理論，這也是中國文化上最優越的一點。

第三章 基督教教義與中國

上章已經把中國宗教背景略加說明，這裏應當與基督教教義互為比較。不過詳細地比較，已有中國基督教學者如吳雷川徐寶謙諸先生著成了專書，如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類，用不着在這裏嚼。在這裏只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提出幾點重要的道理，來研究到基督教在中國宗教的思想與習慣上有無融通的。可能。現在先從思想方面說起：

(一) 基督教的一神崇拜，與中國固有的對天觀念，本沒有多少衝突。在中國的對天觀念中，雖不免有多神崇拜的傾向，然而認羣天之中，有一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執掌着統治全世界的大權，與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是一個創造宇宙管轄萬有的主宰，初無若何分別。且看中國古人怎樣解釋這個「天」字。說文：「天，顛也，」含有至高無上的意義，詩經一類的古書裏，有不少「上帝臨汝」、「赫赫上帝」等句子，可以證明古代人民具有認天為主宰的信仰。到了春秋時代學者思想中，才有一部分人從哲學的疇範中，把主宰的天變成爲義理的天了。如孔子的天行思想，老子的自然主義，莊子的天鈞天倪，孟子的天與人歸：等等，確已修改了對天神的觀念。但是孔孟並不把天神崇拜根本推翻，還承認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的主宰。即機械主義的老莊，猶有「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其有真君存焉」一類的話。特別是那個保存古代信仰的墨子，他的天志篇裏所表現出來的天，不獨是一個賞善罰善的主宰，直是一個愛人利人的父

親。那種思想，影響於後來的學者與一般的人民，實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且看漢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宋儒張橫渠的「乾稱父，坤稱母」……等等理論，何莫非不是古信仰的遺傳？雖然也有不少唯物思想的意見，像荀子的天行有常，像王充的天道自然，范縝的神隨形滅等等，不承認有精神界的存在，但却沒有影響到大多數的民衆信仰，所以一般社會，還是認天爲人類的根源，上帝是宇宙的主宰，在森羅萬象之中，有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具體的神明。

(二)基督教的教義，包括在一個「愛」字裏，從基督的犧牲，章顯了上帝的愛。上帝是愛，這個道理，在約翰的三封書信裏，講得最明白了，他說：「上帝是愛。」「上帝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爲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上帝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可以說把基督教的根本道理說得很透澈，全部的新約聖經，都不過是闡明這個道理罷了。一方面講明上帝怎樣愛人，一方面講明人應該怎樣愛上帝，上帝看不見，愛弟兄就是愛上帝，所以說「不愛看得見的弟兄，怎能愛看不見的上帝？」但是怎樣愛弟兄呢？約翰又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爲和誠實上。」這是根據耶穌自己的話：「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渴了，你們給我喝，我們作客旅，你們留住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實際地憐憫人的困乏，是愛的表現。但這猶不足包括愛的全體，約翰又說：「主爲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爲愛，我們也當爲弟兄捨命。」耶穌說：「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

咒詛你們的要爲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爲他禱告。」可見在基督教愛的道理裏，不單是賙濟貧乏，還有兩點重要的意義，就是（一）爲弟兄捨命，（二）愛仇敵。保羅在哥前十三章闡明愛的意義中，更包括着自我的道德，在消極方面，他說：

「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歡喜不義。」在積極方面，又說：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又可見愛不單是對人，也是對己的。在自己沒有完備的道德，如何能真實的愛人？所以說：「愛不可虛假，要恨惡愛善。」能真實愛人，便是愛上帝，也便是「用心靈誠實拜上帝。」這種道理，在中國古聖賢的教訓裏，也有許多相同的說法，孔子所主張的「唯仁」的道德中，也有「仁者愛人」的說明，張西銘「凡天下疲癯殘疾，悖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的思想，不即是基督教濟困扶危的愛麼？尤其是墨子的兼愛主義，他所說的「兼相愛」，必須從「交相利」上去實行，也有「退賭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等與耶穌相同的話。孔孟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不即是基督教犧牲的愛麼？老子的「以德報怨」不即是基督教愛仇的道理麼？從理論上講來，原無多大的分別，即從歷史上講，也有不少真正「殺身成仁」「以德報怨」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的事實，而一般民族精神，尤都認「樂善好施」爲高尚的美德的。

(三)基督教的道德主張，首先叫人明白人生的價值，不是在物質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耶穌說過：

「人若得着了全世界，失去了靈魂，有什麼益處呢？」

「人活着不是單靠餅，乃是靠上帝口裏的一切話。」

見得精神生活比物質生活更重要，同時，也並不叫人看輕肉身生活，保羅很明白地要人知道：

「身體是上帝的殿，若有人毀壞上帝的殿，上帝也要毀壞他。」

可見身體是何等的寶貴，必須保全自我的身體，來做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基督教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是奮鬥的，是樂觀的。憑着這積極的奮鬥的樂觀的人生觀，改造自我，改造世界，努力實現天國主義，達到世界大同。從個人的改造到世界的改造，這見得基督教的道德，並不是「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而是「兼善天下」的世界主義。

但是如何改造自我？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悔改，在祈禱的含義裏，最重要的成分，是檢查自己，叫人覺悟已往的錯誤，立定一個未來的新志願。然後努力向上，追求到完全的地步，「你們要完全，像上帝的完全一樣。」以個人完全的道德為建立天國的基礎。總之：從對己方面言之，愛人如己為道德的標準，悔改信仰為建德的力量，祈禱默念為修養的工夫。從這點上說到中國，注重精神生活，注重道德修養，與基督教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視富貴如浮雲，求精神之逸樂，幾乎是大多數人的人生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非功利態度，也可以說是數千年來所共守的準則。儒家所主張的「反身而誠」「慎獨克

己，』正無異於基督教之所禱懺悔。儒家之人格階梯，包括於『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三語，聖人是人格上的完人，而聖人却是法天的。尤其是道家墨家，更明白地以道以天為道德根源，這又與基督教以上帝為道德標準無異。要建立完美的道德，先須從自我起頭，所謂忠恕，所謂絜矩，莫不是正己而後正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個人而及於社會，可見中國在道德上的主張，也不是自私的個人主義，而是利人的大同思想。現在且進而研究到這一點，看看兩方面的主張怎樣？

基督教是要建立起地上的天國，沒有國家的界限，沒有人種的區分，是一個絕對平等的世界主義。這是基督教的特點，也是中國人所服膺的教訓，我們看孔子的大同思想，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與墨子的『視人國若其國，視人家若其家』等等主張，何莫非『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世界主義，這正與基督教若合符節。

我們從上述的三點說來，無論在信仰方面，道德方面，不能否認有互相融通的可能。然而在基督教輸入中國的歷史上，為什麼有若干衝突的現象呢？這在我的觀察，覺得這種衝突，大都發生於表面上的習慣，決不是根本上的不相容。第一，中國有祖宗崇拜的習慣，在宗法社會家族制度的原則上，祭祖實是一件維繫『以家族為單位』的良法，且為一般人所視為極重要的問題。從基督教看來，實與『除上帝外不得崇拜別神』的信條不合，所以基督教乃排斥祭祖為迷信，而中國人却以反對祭祖為忘本，由此而發生了誤會。第二，中國自信文化之高，視中國以外的民族，其文化水準皆甚低，所以有『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的

自尊。這不但對基督教有此態度，即前此反對佛教的理由，亦大都出發於「戎狄是膺」的這一點。尤其是近百年來，在國際上所受到的侵略，往往與教案有多少關係，所以一般人便懷疑到基督教乃是帝國主義的先鋒，引起了許多誤會。第三，中國人民浸潤於儒佛教義，歷時已久，一以綱常禮教爲倫理的中心，一以三世因果爲社會的信仰，而基督教所主張的自由平等，予儒教以打擊，所主張的現世生活，予佛教以難堪，其抨擊偶像反對迷信諸端，皆足以動搖兩教的地位，因此遂有不可避免的齟齬。第四，中國鄉村生活中，每以迎神賽會爲唯一的娛樂與團結，且亦認此爲公民對社會的責任，而信奉基督教的人，反對參加此種舉動，便被認爲破壞團體生活的不良份子，乃至羣起而加以攻擊。第五，中國倫理，以孝順父母爲中心，養生喪死，實子女的惟一任務，基督教攜來的西方小家庭制度，每發生兒子與父母分居的事，父母死後又不舉行追薦祭祀等儀式，以爲大有背於孝道，至斥爲名教罪人。第六，中國人對於宗教信仰，向抱宏量態度，一個人往往可以信仰幾種不同的宗教，既信儒，又信佛道，本無足怪的，而佛教又能迎合固有的儒教，而變更其性質。基督教爲保持其獨特的本質，不肯有絲毫遷就，對於中國固有的宗教習慣，予以排斥，乃至被視爲固有宗教的破壞者。第七，基督教自身，亦有予以懷疑之點。除上述第二點國際關係之外，莫如宗派的分歧，而且各派之中，往往有互相攻擊的情形，不獨有所謂希臘的羅馬的天主教，又有傳自英美德法等不同的國別，乃至被認爲含有政治背景。此外如初期教徒的藉教行私，引起教案，尤給人們以不良印象。至於傳教方式，如常衆宣講，男女雜沓之類，非中國人民所素習。而且負宣教之責者，又爲社會上不甚重視之人。凡此種種，爲

過去基督教在中國發生衝突的因素降至今日基督教教義已漸漸爲人們所瞭解此種衝突似若不復存在。例如第一點，宗法制度，已漸崩潰。第二點，排外態度，已漸改變。第三點，社會迷信，已漸破除。第四點，團結民衆，已更方式。第五點，道德價值，已經重估。第六點，各教思想，已漸融和。第七點，基督教自身的缺陷，業亦逐漸改進。尤其是基督教所舉辦的社會事業，如學校，如醫院，如青年會，如各種慈善團體，本其犧牲博愛服務精神，予國家社會以新生的力量，一般社會人士，類能表示同情，誤會日漸消釋，感情日趨融洽，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當有無窮的希望。惟有一點，爲基督教人所當特別注意的，即基督教中心教義中的復活與永生問題，在中國的固有習慣中所不甚熟悉的。雖曾有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格言，究與基督教復活永生的意義不甚相同。所以今後基督教在繼續其已往的社會服務工作而加倍努力以外，尤當注意此種教義的發揮。

第四章 基督教始入中國的傳疑

基督教何時傳入中國？這個問題，很難有肯定的答案，雖然有過不少的考據，但是這些考據，大都是後來才發生的，算不得是有力的憑證，我們只能以傳疑態度敘述之。

在印度的傳說中，當保羅傳教於小亞細亞的時候，有多馬與巴多羅買傳教到東方，說多馬到了印度，巴多羅買到了中國（見中國基督教四大危急時期）。也有人說多馬傳教到中國，在馬拉巴主教所著迦勒底史中有：

「天國福音，散徧各處，竟至中國……中國人與埃及阿伯人得信真理，皆出於聖多馬之力。」

其時正值中國東漢明帝在位，羅馬尼祿王虐殺基督徒的時候，所以燕京開教，略這樣說：

「主後六十五年尼祿虐殺基督徒，六十九年耶路撒冷被滅，基督徒逃難東來，正值佛教輸入中國的時候。」

李文彬中國史略（一五七——一五八頁）這樣說：

「在東漢時代，曾有兩個敘利亞教士到過中國，他們到中國來，表面上是爲了要學得養蠶治絲的方法，把蠶子帶回歐洲起見，可是他們的本意，乃是傳教。」

又一二八二年，由雪馬羅勃（Symolob）教堂派出的教士恩維斯（Envoys）到了北京，聽到一個關於基督

教傳入中國的有趣故事，說：

『漢明帝派人到西方去尋求所夢見的金人，據中國歷史的記載，求得來的是兩個佛教的僧徒，其實並不是什麼夢，乃是聽說中亞細亞有一個新興的宗教，所以所帶到中國來的並不是佛教徒，而是聖多馬的兩個門徒。』

這是元朝基督教的傳說，當然沒有可信的根據。不過當時印度與中亞細亞在交通上已有很密切的往來，為一般研究世界史者所承認，所以這新興的宗教，與印度宗教有互受影響的可能。而當時所輸入的，究竟是佛教抑是基督教？自然無從證實。但是我們相信，最初中國的基督教，往往借用佛教形式，這在唐朝景教碑文中所採用的佛教名稱與術語，就可以知道的。而且當時中國對於西方宗教的分別，不無隔膜，所以一律以佛教視之，這或者也是可能的。

明朝劉子高詩集，與李九功慎思錄，均載明洪武年間，江西廬陵地方，掘得大鐵十字架一座，上鑄赤烏年月，按赤烏係三國孫吳年號，子高因作鐵十字架歌，以誌其奇。又鐵十字上鑄有對聯一副云：

『四海慶安瀾，鐵柱寶光留十字；
萬民懷大澤，金爐香篆蕩千秋。』

下聯『萬民懷大澤』不是指耶穌受難救世而何？這也是漢末已有基督教的一個說頭。還有在明朝又掘得過三個古十字石碑；一是在福建省南安縣掘出的，其形甚古，據考證當是四五世紀時——晉朝南北朝

——的東西。一是在泉州府東山寺旁掘出。一是在泉州水陸寺旁掘出。上說的二寺都是唐初建造的。則寺旁所掘得之石碑，亦必是同時之物。這些都證明唐以前已有基督教。

基督教的輸入，與賽露治絲的問題，有沒有直接關係？也是不容易肯定，不過歐洲人知道中國是個發明蠶絲的國家，所以稱中國為「蠶絲國」，從希臘人稱蠶為「賽爾」(Ser)的名詞，使歐洲人稱中國為「賽爾斯」(Seres)却是很普通的了。在三〇三至三〇五年 阿諾比斯(Arnobius)的 *Adversus Gentes* 一書中說：

「『賽爾斯』為許多福音已傳到的國家中的一國。」
這也可以證明李文彬氏所說的一斑。

關於這傳說的材料，德禮賢氏(Caschali M. DeHa)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中，收集得相當的完備，我們沒有什麼新發現的論證，在這裏只能根據他的材料，加以簡單的介紹。

他舉出產生這種傳說的方面，有一六一三至一六一五年間金尼各氏(Trigante)所譯在印度傳教的耶穌會士約翰剛保利氏(John Maria Compore)的彼利亞作品。有一六〇九年高伐氏(de Gourvea)所著的東方史。有茹斯巴克羅自氏(Gaspar da Cruz)所著中國志中關於亞美尼亞人的傳說。以及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農諾大公哈(Nuno da Cunha) 埃伯耶穌(Eb. de Jesus) 阿羅斯(Arruas)等都說到亞美尼亞人及印度人的傳說，大概承認中國基督教的輸入，與多馬有相當的關係。

而在另一方面，不承認這種傳說的，也有許多人。如一三〇五年元代總主教蒙高味諾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從中國寄信到歐洲，說：

『宗徒們，或宗徒的子弟們，從不會到過這個地方。』

一五五五年白來篤 (Melchior Nunez Barreto) 在澳門的記載說：

『中國從來沒有聽到過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

這竟不承認在元代以前有過基督教在中國，更談不到多馬來華的傳說。至於絕對否認多馬來華的，在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耶穌信友 (Th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一書中，這樣的斷定說：

『大概人看來，這聖多馬宗徒來華的故事，不消說得，是出於晚近的來源，這個故事怎樣產生，也就不難猜測。』

利瑪竇對於中國古代信徒的搜求，非常努力，但他並沒有提到多馬的故事。這可以反證這傳說的模糊影響了。究竟把耶穌的福音傳到中國的第一人，是不是多馬，或多馬的門徒？便成了我們永遠不能確實知道的謎了。不過我們相信當初一定有一位教士，遠在唐朝以前曾經到中國傳過道，這一位教士，是不是與多馬有直接的關係？絕對地加以否定，也不是正當的態度。上面那些否認元朝以前在中國有過基督教的話，現在看來，當然不能成立，至少我們從明朝所發現的景教碑，除非證明牠是偽造的，那便不能否認唐朝基督教傳布的事實。而且唐以前中國與基督教發生關係，也有好些議論，例如上述第三世紀阿諾比斯 (Ananias)

nobis) 在所著的 *Adversus Gentes* 中，提到賽爾司 (Seres) 已有傳教工作一層，我們考查那時在亞美尼亞與波斯已有教堂，中國與中亞細亞亦有往來，基督教因而傳入中國，也許可能的。再看五一一年有教士從東方帶些蠶種到君士坦丁，學者都相信是從中國西部波斯或錫蘭或土耳其得來的。先是四一一至四一五年間塞琉細亞 (Seleucia) 的主教阿奇亞 (Achaues) 劃定教區的時候，已經把中國和印度包括在內。蘭白氏 (M. Labbe) 在基督教中國傳道史 (Christianity in China History) 裏這樣說：

『自四一一至四一五年，塞琉細亞大主教阿奇亞做了加爾地 (Chaldean) 正宗基督徒的領袖；自五〇〇至五二〇年，西拉 (Silas) 做聶斯脫里教的主教；自七一四至七二八年撒利巴 (Saliba Zabda) 做了聶斯脫里教的主教。所以，如果我們違反從來許多人的意見，承認中國的主教教區，是撒利巴所設立的，那末，越發可以證實華人皈依基督教，遠在這位聶斯脫里教父之前了。實在的，如果在一個國家中，基督教沒有很大的進步，沒有幾處可以監督的教區，怎會有總主教及教區的設立？設立總主教原是管轄已經建立的教會的。假定埃伯耶穌所說的中國總主教教區是阿奇亞在將近四一一年時所設立的，那末，基督教在使徒時代傳入中國的傳說，很可以使我們相信了。阿舍馬尼 (Assemani) 在他的著作中引塞琉細亞的主教名單，把中國教區與印度教區相提並論，所以，我們可以推測這兩處教區是同時設立的。』

這是一篇很有理由的推測，假定四一一年時在中國已設立主教，已有教區。又可以推想在四一一年前基

基督教已經傳入中國了；決不是第七世紀的唐朝才開始的。

第五章 基督教在唐朝的傳佈

沒有說到唐朝基督教以前，先須說到唐朝的政治背景與宗教情形。從南北朝以來，經過了大約二百年——四二〇—六二〇——的紛紜擾攘與政治分裂，至此才告統一，唐高祖開創基業以後，有太宗的英明守成，規復了漢朝承平的舊觀，史稱爲貞觀之治，發揮其偉大的政治力量，不但在內治方面臻于全盛，而且四夷賓服，滿蒙朝鮮新疆西藏安南北印諸地，盡隸版圖，國富民安，實爲中國歷史上最光明的時代。又與中亞細亞的波斯米索布達米以及印度等國，有水陸交通，往來貿易，東西各邦外人的來華觀光、朝貢、遊學者，頗不乏人。由是西方宗教徒，亦得挾其宗教經典，東漸宣傳，如火祇、摩尼、回回等教，在中國創立起不少寺宇，尤其是佛教徒，往來頻繁，爲中國佛教最發達的時期。那末，在中央亞細亞最活動的景教，乘此向東發展，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一 景教碑的發現

說到景教，當時並沒有人知道是基督教，在唐會要、唐書等典籍中，只有波斯僧、大秦穆護祆、彌尸訶教等名稱，一般人都看她是佛教一類的東西，而且在唐武宗毀滅佛教以後，與景教碑未發現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在九百年前，有過這長時期傳佈的景教；因爲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什麼顯著的記錄。及至明朝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年——陝西西安西郊土中無意中掘得了一塊大石碑，上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

碑頌」等字樣，方始引起了許多學者及教士們的注意，而加以考證。在學者之中，那些研究金石文字的，如清代有錢謙益的金石跋尾（見潛研堂集卷七）王昶的金石萃編（卷一〇二）等等，他們的考證，往往有許多附會錯誤的地方。惟有仁和的李之藻的讀景教碑書後一文與葡萄牙教士陽瑪諾的唐景教碑頌正，一書以及後來意大利教士艾儒略所著西學凡中附錄大秦寺碑一篇，比較正確。李之藻得岐陽張廣拓寄碑文云：

「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卽利氏西秦所傳聖教乎？余讀之良然。」

纔知道這所謂大秦景教，就是現在所盛行的基督教。並且繼續在清光緒庚子時，從燉煌石室中發現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世尊布施論、序總述詩、所經（由日本羽田亨氏譯出共一百七十條）與李盛鐸氏所藏志元安樂經、宣天至本經二種，以及日人所收藏的一神論、一天論等，更足以證明景教之卽基督教無疑。再根據這些材料，考證到前此的西溪叢話、僧史略、釋門正統、斥偽志、唐會要、冊府元龜、貞元釋教錄、新舊唐書一類的古籍，更知道景教在唐朝的流行，確是一樁實事，並沒有絲毫的假借。當時雖有人懷疑到埋沒土中七、八十年之久，碑文未嘗剝蝕的緣故，認為近代教士所偽造，究竟無法否認其實事。

這塊石碑上刻着「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字樣。建中是唐德宗的年號，建立後經六十四年因唐武宗毀滅佛教及大秦教的緣故，或由教士們自動把這石碑埋入土中，直到

明朝末葉重行發現。碑的形式是這樣的：上端刻着十字架，兩旁有蓮花雲霓；碑高長四尺七寸半，廣三尺五寸，除上下款碑題及其名外，文長凡一千六百九十五字。碑文之後與左右兩旁，具人名及職名，每一人名有敘利亞文、漢文並列，並敘利亞文之職務，如大主教、中國教父、長老、鄉主教、修士、牧師、博士等分別。人名之上皆題一「僧」字，撰碑文者具名為「大秦寺僧景淨述」，後有「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句。（意即寧恕爲當時的大主教）書寫碑文的，具名為「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有人懷疑到呂秀巖就是呂洞賓，我以爲是穿鑿的）。

從碑文中寫着：

「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使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

等語，知道景教傳入中國，乃在唐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首來中國的教士，名阿羅本。我們從基督教歷史中知道四三一年的時候，在以弗所第三次會議中，聶斯脫里派與亞力山大派起了衝突。聶斯脫里是第五世紀中一個教會領袖，他當過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具有虔敬的信心與辦事的熱忱的。因爲神學上有他自己的主張，注重耶穌爲人之道，而與亞派注重耶穌爲神之道不同。故亞派領袖西里爾（Cyril）認聶派於東羅馬帝及教皇，結果，判定聶派爲異端而開除教籍。聶派便流竄到阿拉伯及埃及，後來他的學說爲波斯學者所歡迎，遂得由波斯漸布及於印度中國等處，阿羅本奉其教而來中國，可知此所謂景教者，即

聶斯脫里派的基督教。

二 景教教義與基督教

現在且把景教教義與基督教互相比較，可以確實承認景教之即基督教，李之藻亦曾從景教碑加以比較，略舉如下：

景教碑文

先先而无元後後而妙有

三一妙身

无元真主阿羅訶

判十字以定四方

匠成萬物然立初人

娑憐施妄

三一分身

景尊彌施訶

室女誕聖

三常

基督教義

上帝無始無終

三位一體

上帝耶和華

十字架

上帝創造天地又造人

魔鬼撒但

耶穌爲上帝化身

基督彌賽亞

童貞女馬利亞生耶穌

信望愛

八福

魔妄悉摧

亭午昇真

經留廿七部

七日一薦

三威蒙度讚

慈父阿羅訶

蒙聖慈光救離魔

彌施訶普尊大聖子

慈喜羔

聖子端任父右座

三身同歸一體

瑜罕難

盧伽

寶路

八福

耶穌曠野勝魔

復活升天

新約廿七卷

七日禮拜

基督教義

天父耶和華

上帝是真光救人脫離罪惡

彌賽亞聖子耶穌

上帝的羔羊

耶穌升天坐上帝之右

三位一體

約翰

路加

保羅

摩薩吉思

摩西

賀薩耶

何西阿

伊利耶

以利亞

這些經名或人名，都是譯音的，略舉幾條以概其餘，若再從世尊、布施、論加以研究，更爲明了。所云：

「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覺。」與馬太六章三節同。

「有財物不須放置地上，……有盜賊將去，財物皆須向天堂上，必竟不壞不失。」與馬太六章十九節同。

「唯看飛鳥，亦不種不刈，亦無倉塹可守。」與馬太六章廿六節同。

「梁柱着自己眼裏，倒向餘人說言汝眼裏有物。」與馬太七章四節同。

「汝等於父邊索餅，即得，若從索石，恐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魚亦可，若索蛇，恐螫汝，爲此不與。」與馬太七章九節同。

從這幾條，已可見兩種經義完全相同，惟譯文稍有分別耳。此可證景教之卽基督教毫無疑義。

三 景教的盛況

根據碑文所載，我們便可以推測景教在當時的經過情形。碑云：

「貞觀十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

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於京師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這一個詔諭，在唐會要中亦有相同記錄：

「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見唐會要卷四十九）

其不同之點，卽一稱波斯，一稱大秦，宋敏求長安志卷十有云：

「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其原注「義寧坊本名熙光坊。」波斯胡寺下注云：「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

阿羅斯當卽是阿羅本之誤。先是唐韋述兩京新記中亦有：

「義寧坊十字街之東北波斯胡寺」的話。

起初原皆稱波斯寺，後來因爲要與火祆教有所分別，乃改稱爲大秦。唐會要卷四十九有詔改寺名之事，云：「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之者，亦準此。」

碑文又說：

「高宗大帝，克恭續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可見太宗爲建景寺於義寧坊後，高宗又繼續建立景寺於各州，乃至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唐分全國爲十道，故所謂十道即全國之意。）碑文又云：「聖曆年釋子（和尚）用壯（疑卽玄奘）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道士）大笑，誦謗於西鑄。」東周卽洛陽，西鑄乃長安，又可見長安洛陽皆設立景寺，引起佛教與道教的反對，景教處此道佛交攻的情形下，得以繼續維持於不墮，當然是因爲當時帝王的優遇，而景教教士的繼來，聲望毅力，其功亦有足多。故碑文有云：「有若僧首羅舍，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羅舍及烈，當是繼阿羅本之後而來的教士，及烈之名，亦曾兩見於册府元龜：「開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朝貢。」「開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來朝。」及烈原是武后時景教的領袖，這裏所說在玄宗時來華，據近人考證，當時曾經回國而復來的。但在玄宗後期，又有許多教士來華，據碑文云：

「三載（卽天寶三年）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間化，望日期尊，詔僧羅舍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僧和於興慶宮修功德。」

肅宗時命景僧伊斯，參郭子儀戎事，碑云：

「伊斯和而好惠，開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初總戎於朔方

也。肅宗俾之從選，雖親見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

亦見教士中，於修德傳教之外，竟有參與戎幕的人。西來教士，見於碑文中的，雖僅二十餘人，一爲推測，必不止此數。從碑末具名之人數計之，有七十六人之多。長安大約爲景教教會之總機關，列名於碑上的，當爲總機關中的職員。而當時教會已推及全國，所謂「法流十道，寺滿百城」，雖屬形容之詞，但教會日漸擴展，傳道人數，更不止碑文所載數十人而已。

碑文中的話，難近於誇大，但當時取得帝王及大臣的贊助，不是絕對無因的。因爲唐朝對各種外來宗教的優容，不獨于景教是如此。碑中所舉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莫不予景教以好感；如太宗命宰臣房玄齡、賈迎、阿羅本，又把皇帝肖像，畫在景教寺牆壁之上，碑云：「旋命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高宗又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玄宗命寧國五王，親到景寺中設立壇場，並且把五代祖宗遺像，陳列寺中，碑云：「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肅宗又重建景寺，碑云：「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則於耶穌聖誕時送香賜饌，以表慶祝，碑云：「代宗文武皇帝，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象。」至於德宗登極的第二年，即爲立碑紀念之時，其於景教的優容，亦以可見。德宗以後，情形如何，我們不得而知，而從此至武宗，尚有六十多年經過，單從武宗毀廢佛寺的詔令中，與李德裕的德音表觀之，亦可以反證當時景教的隆盛，與佛教相伯仲。當時大臣如房玄齡、高力士、郭子儀等皆奉命招待，與景教發生密切關係，後人疑房郭爲

景教徒，雖無佐證，也有可能。

四 景教的傳教方法

景教的傳教方法，我們在景教碑裏，可以看出有兩種：一爲翻譯經典，一爲醫治疾病。當唐太宗寶迎阿羅本時，即令他『翻經書殿』。後來那個撰碑的景淨，確是景教中的一個著作家，諸經目錄中會說他譯經三十部卷，大約當時景教經典，經他翻譯的，一定不少。從燉煌石室中所獲得的三威蒙度讚等等（見上述），是不是這三十部卷中的東西？却不能斷定，但他確曾努力譯著，是可信的。我們從貞元釋教錄，知道他曾與般若共同翻譯佛經，其文如下：

『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密經譯成七卷，時爲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球，圖竊虛名，匪爲福利，錄表聞奏，意望流行。聖上濟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昧詞疎。且夫釋氏伽南，大秦僧寺，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尸訶教，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濫涉，正邪異類，涇渭殊流。』

查六波羅密經，原有兩譯本，一爲十卷本，一爲七卷本，十卷本現存藏中，題爲唐闍賓沙門般若譯，而七卷本今已無存，當即般若景淨合譯，德宗評其『理昧詞疎』，乃至廢棄。然所謂理昧詞疎，大約是譯文中有許多牽強之處，基督徒而翻譯佛經，所用名詞，或多附會，看景教碑與三威蒙度讚等文中，有許多佛教名詞，如『妙身』、『慈航』、『真寂』、『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度』、『世

尊」等類，便可以知道了。

傳教之士，往往有精通醫術的人，以醫藥爲傳教方法，爲歷來基督教所看重。唐朝景教教士中，亦必有不少醫生在內。舊唐書記睿宗之子玄宗之弟讓皇帝憲有病，經景僧崇一爲他醫治。讓皇帝憲傳裏這樣記着：

「開元二十八年冬，憲寢疾，上令中使送醫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見舊唐書卷九十五）

崇一這個名字，含有「崇奉一神」的意思，景教徒中以「一」爲名的，如景教碑所列的人名中有「元一」「守一」「明一」，以「崇」爲名的，也有「崇敬」「崇德」等類，可知「崇一」是個景教教士，而不是和尚。並且所賜的「緋袍魚袋」，據唐書輿服志，緋袍是紅色的品官服飾。

「四品服深緋色，五品服淺緋色。」

魚袋也是唐朝一種大官所用的東西，上面刻着官姓名，隨身懸佩，都不是和尚所用的，故可以斷定這崇一是景教徒之明醫的。又杜環經行記說：

「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足證西醫已於此時隨景教以輸入，而爲傳教的一種工作了。

五 景教的滅亡

景教傳到了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年——遭受着很大的打擊，因為武宗聽信了道士趙歸真的話，發出一道嚴厲的滅佛詔諭，從經濟的立場，以為僧尼穆護，都是坐食分利，飭令還俗。在詔諭中有這樣的話：

「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唐書卷八十）

當時宰相李德裕十分贊成，所以上一道慶賀武宗毀佛寺德音表，也這樣說：

「遂使土木興妖，山林增構，一巖之秀，必極雕鑿，一川之腴，已布高利，耗蠶生靈，侵滅征稅。」（見李衛公文集卷二十）

資治通鑑記着：

「會昌五年秋七月，上惡僧民耗蠶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還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

這裏說「道士趙歸真復勸之」，究竟他是勸武宗毀滅佛教呢？還是勸武宗存留都城的佛寺呢？很難知道。

若以『耗盡天下』爲滅佛理由，當時道教也非常興盛，何以在這大案中，別的宗教都牽連在內，獨不及於道教，難道道教不是耗盡天下麼？那可以知道趙歸真之勸，與唐武宗之惡，並不單是經濟方面的耗盡天下，我們再看他詔諭中所說：

『是逢季時，傳此異俗……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

一則曰『異俗』，再則曰『西方之教』，便可了然於武宗此舉，是出發於排外思想，佛教是印度來的，景教是大秦來的，其餘波及的一切宗教，都是外國教，所以他毀滅了一切宗教，而獨不及道教，究竟當時毀滅的宗教有多少呢？唐書貨志云：

『武宗卽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招提梵語，漢譯爲四方僧物，蘭若亦梵語，漢譯爲空淨閒靜之處。）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卽景教回教祆教信徒。）

唐會要有相同的記載：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資牒上田四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明顯外國之教，勸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見唐會要卷四十九）

而李德裕德音表中所舉數目略有不同：

「拆寺闢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并奴婢爲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數千頃，其僧尼令屬主客戶。大秦穆護祿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見李衛公文集卷二十）

這裏所說的二十餘人，或爲二千餘人之誤。數目雖有不同，毀滅佛教及一切外來宗教的事實，是可信的。所以在唐朝二百年傳布的景教，遭着這一次空前的教難，是非常不幸的。觀會昌五年七月申書門下條奏所云：「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知道外國教士都被驅逐回國，中國信徒均須納稅爲民（當時宗教徒是免納國稅的）。景教在中國，似乎告一段落，但却依舊沒有絕跡。因爲下一年武宗就死了，繼他的王位的是宣宗，是武宗的叔父，他即位之始，便貶斥李德裕，一反武宗所爲，收回滅教的成命，重建寺院。有「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未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能禁止。」這一番勸諭，佛教便恢復起來，景教有沒有恢復呢？這却無從知道，不過從此三十多年以後，據一個阿拉伯作家的述說，黃巢作亂時，曾經在廣府燬滅了十二萬回，猶太波斯和信奉景教的人，事在八八〇年左右，廣府在何處？有說是廣州，有說是杭州，至難考定，不過在武宗以後，景教仍舊在傳布，可以想見的。經過黃巢的大屠殺以後，中國又入於紛亂之局，西北土地，淪陷於吐蕃，西域來華之路，於是被塞，又經八姓十三君的五代大亂，景教便陷於無法繼續的情形之下了。一部分教士退入到蒙古境內，待機恢復。斐化行在所著的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中這樣說：

「景教直到一四〇五年，在外蒙古一帶，還有他們的蹤跡。又有一個親眼見過他們的人記載說：那些聶斯脫里教人，彷彿是從坊裏走出來的鐵匠一樣。直到現在，還時常在黃河套左近發現些古時崇拜十字架的人們的遺跡，有人會想在當時那些人們所信奉的許是景教。」（見該書32 33頁）

似乎景教在中國已經滅絕，只活動在蒙古境內；其實不然。我們從馬可保羅的遊記中，看見他跟着他父親到中國來的時候，經過梁州府，寧夏，歸化等處，多遇到景教的人。後來他另一次旅行，經河間府，見該處有景教徒，也有教堂。南行經運河到揚州，記載在該處及鎮江有景教教堂，杭州亦有景教堂一所，這可見唐朝以後，景教在中國內地未嘗絕跡，惟其勢力不若唐時之盛而已。容於下文再為詳敘。

第六章 元代基督教的傳佈

當十三世紀的時候，在東方崛起了一個民族，憑着他們舉世聞名的武功，東征西討，建立成橫跨歐亞兩洲的大帝國，這便是中國的元朝。元朝開始於一二〇六年的成吉思汗鐵木真，他帶領了蒙古軍隊，從中國的西北部出發，平定了西遼及花刺子模，滅西夏，雄震亞細亞。他的兒子窩闊台，就是元太宗，繼承遺志，聯宋滅金，併合了中國北部及高麗，復侵入歐洲，進軍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此後歷定宗憲宗而至世祖忽必烈，他在一二六〇年即位，至一二七八年滅宋而一統中國，定都燕京，又東征日本，南征緬甸安南占城爪哇等國，其領土之廣，包括東歐及亞洲大部，實爲前此所未有。

蒙古帝國既憑藉其武力，統治了中國，他的國際貿易，不但推行到中亞細亞，更及到了歐洲，海道陸路的交通，遠至歐洲的意大利等國，聽到「中國」這個名字，亦相率東來。蒙古的長官，對於外來的商人和教士，具有極優容的態度。處處予他們以各方面的便利。在宗教方面，允許人民有信仰的自由，蒙古人所崇奉的宗教，本來是多神的，所以朝廷在那時候，對於各種宗教是兼收並蓄，來者不拒，天主教也好，景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什麼都歡迎，什麼都附和。凡屬教徒，都可以不納租賦，不完捐稅，並免除其他任何國民的義務。藉着這漫無限制的機會，於是潛伏在蒙古與內地的景教，既可以捲土重來，即流行於羅馬的天主教，亦得乘時東漸，這兩派基督教，使沈寂已歷四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從新復活起來。現在且分說之：

一 元代的景教

聶斯脫里派景教在唐朝以後，不但在美索不達米亞、中亞細亞及蒙古境內，沒有絕跡，甚至連中國疆域以內的景教團體還有存在，已見上述。最近麥克納中國基督教四大危急時期的演說中，在敘述景教之後，又說：

『基督教在中國本部，未及推廣，其在中亞，則繼續傳布，在十三世紀中葉世祖時，東方基督教日漸來華，重整旗鼓。』

相傳成吉思汗爲他的兒子娶了開爾脫 (Kerand) 部的公主爲妻，這公主是個景教徒，所以在他的營內也有個景教寺。開爾脫的景教徒，都佔有相當的權勢，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住在黃河北面河套的地方，所以在忽必烈入主中國時，景教在中國復興起來，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景教這個名稱，在元朝的歷史中，却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叫做「也里可溫」。『也里可溫』是蒙古語的譯音，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緣人，或即「奉福音的人」。多桑謂蒙古人呼基督徒爲 Arcaun，唐朝傳景教之大德阿羅本，或即「也里可溫」的古音。多桑譯著旭烈兀傳：

『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爲「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刺伯文回紇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溫」即「也里可溫」。』

但也里可溫究竟是那一派的基督教呢？是聶斯脫里派的景教呢？還是佛蘭西斯可派的天主教呢？清洪鈞

元史譯文證補中元世各教名考，曾經這樣說：

「也里可溫之爲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溫，當即景教之遺緒。」

洪鈞他分不清楚也里可溫是天主教，抑是景教，是很難怪的，因爲那時候所稱的也里可溫，正象現在人稱基督教一樣普通，變爲任何派別不同的總名稱。其實在鎮江等地的也里可溫，還是景教的一派。從至順鎮江志考證，知道有一位也里可溫教徒叫馬薛里吉思，他做了鎮江的副達魯花赤，在一二七八至一二八二年間，在城內外興建了景教寺院六所，又在杭州建寺一所，其熱心宗教的情形，可以從梁相記中見之：

「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聞其所謂教者……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爲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偈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爲準……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極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教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云：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爲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於鐵壘門捨宅建八世忽木刺大興國寺，次得西津豎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刺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刺聚明寺，二寺之下，瓶爲也里可溫義阡。又於丹徒開沙，建打雷忽木刺四瀆安寺，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刺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於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於寺耳。完澤丞相謂

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糧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爲七寺常住。公住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於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爲也里可溫。」（見大興國寺記）

我們在這一段文中，不但可以知道鎮江也里可溫的剏始，與馬薛里吉思的捨宅建寺情形，而且知道當時的也里可溫就是唐朝的景教。在馬氏興建七寺的時候，正元世祖入主中國之始，僅僅鎮江一地，已有那樣偉大的建設，其他亦可想而知。關於鎮江一隅的事實，後來在馬可保羅的遊記中，亦曾提到：

「鎮江府有景教禮拜堂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馬薛里吉思者爲其地長官。寺卽其所建。」

這明明說鎮江的教堂，乃是景教寺院，清朝俞曲園序楊文杰東城記餘說道：

「余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也里可溫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師麻也里牙之靈跡，上下四方以是爲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相同。」（見春在堂雜文）

當時景教在中國的復興，不下於唐朝，幾乎瀰漫到各地，固不獨在鎮江杭州之有景教寺院；一般人所以只提到鎮江杭州，乃因鎮江大興國寺碑文獨得保存在至順鎮江志中的緣故。假若我們看一看元朝的官制，根據元通制條格僧道詞訟門的一條記載：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爲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等，開讀了聖旨的上頭，奉聖旨教俺與御史台集賢院宣政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御史台集賢院崇福司來

省裏一處商量來崇福司官說楊暗普奏也里可溫教崇福司管時分我聽得道來這勾當不曾與省台一處商量，省台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溫犯的勾當多有，便有一百個官人，也管不得，這事斷難行。」

宣政院是管釋教的，集賢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乃是管也里可溫的。當時楊暗普做江南釋教總統，崇福司就根據他的奏章提出這番意見，以為也里可溫所犯的勾當既這樣多，就是有一百個官員，也管不了許多，可見也里可溫人數之多了。再從順鎮江志戶口調查，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之中，有也里可溫二十三戶，一萬零五百五十五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溫一百零六人，二千九百四十八單身人之中，有也里可溫一百零九人。從鎮江一區而論，平均一百六十七戶中，有一戶是也里可溫，六十三人中，有一個也里可溫人，無怪這個崇福司官要着急了，若再從元史職官列傳去看，有許多職官寫着也里可溫字樣的。北方如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直隸……等省，南方如廣東、雲南、浙江……等地，皆有也里可溫散居着。有也里可溫駐居的地方，當然有禮拜寺及崇福司官在管理。元史順帝紀，說到別吉太后之喪，有下列的話：

「後至元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 甘州 十字寺，奉安 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云云。」

甘州 有十字寺，馬可保羅 也提及過：

「甘州 者……其地基督教徒，於城中建大禮拜寺二所。」

別吉太后 是個基督徒，所以奉安 在甘州 十字寺中，文苑記 也有「命也里可溫於顯懿莊聖皇后神御

殿作佛事」的話。這不獨可以知道別吉太后是基督徒，更足以證明也里可溫教的普遍全國了。在元史中所稱爲也里可溫人者，有不少是達官，是孝子，是良醫，是學者，是義士；而且他們的名氏，又多與古基督徒相同。當時著名的文學家馬祖常（見元史卷一四三本）是聶斯脫里望族，他的祖宗都是歷代的大官，他曾爲他的曾祖月合乃做神道碑（見元史卷一三四），可以看出他們是元代大族，並且都是信也里可溫的。黃潛曾著馬氏世譜，余闕合、肥修城、記馬氏政績，都有也里可溫字樣。

後來更有從地下掘出許多景教的遺跡，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塊有十字的石碑，都是這時的遺物。泉州是中國中古時代的通商海口，等於後來的廈門，是唐朝以來一切阿剌伯人及其他外國商人教士們進出的地方，到現在還有許多關於佛教回教基督教的遺跡。又在蒙古、柱子、梁找得了好幾個有十字的墓石，大約也是十二三世紀的遺物。一九一九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裏，又發現了兩塊刻花的石碑，碑頭上都有十字，與泉州出土的石碑相似。此外在新疆、蒙古等處，有幾個義塚裏有十字形的墓碑，大都刻着三十四世紀的年代。凡此皆足以證明元代景教的發達了。

二 元代的天主教

當蒙古侵入中國的時候，也正是歐洲發生大變動的時候，自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偉大的新時代產生了，文化的改進，商業的繁榮，影響及於東方，於是商人們歡喜到中國來，引起了羅馬教徒傳教東方的熱忱，便在中亞細亞設立了傳道總機關。當時有二個新興的宗派：一名方濟各派（Franciscans）一名多明我派

(Dominicus) 聖方濟各，他是死在二二六年的，他曾經傳道給埃及人，並且到過聖地多明，我很想聯合全世界傳教工作，使羅馬各教派都隸屬於正宗天主教。當蒙古軍隊快速度發展的時候，歐洲人很受到他的威脅，教皇依諾增德四世 (Innocent IV) 派遣專使，赴蒙古講和，這個專使，就是方濟各派的修士，名叫喬伏尼比亞諾賈比內 (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o)，他是意大利人，是方濟各的弟子，在一二四五年由里昂 (Lyons) 出發，次年七月才到蒙古都城喀拉庫倫 (Karakorum)，朝見新君定宗貴由，呈遞教皇文書，十一月間得了定宗回書回歐，於一二四七年到了法國，報告教皇。

一二四八年因法王得到蒙古長官阿爾及吉台 (Aji-gai) 所差來兩個景教徒的報告，知道定宗皇帝和他的母親，都信了天主教。就派遣多明我派的法國人，名叫安德肋龍汝模 (Andre de Longjumeau)，帶了另外兩個多明我派修士，於一二四九年從西濱魯斯 (Cyprus) 動身，次年到了蒙古，可惜定宗已於上一年去世了，僅取得皇后兀立海迷失 (Oguz-Quimis) 的回書。此後教廷與蒙古間的使節往還，固非一次，而從這些使者的報告中，得知有許多聶派的景教徒改信了天主教，並且知道天主教在東方一天發達一天。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馬可保羅的父親和叔父回去向教皇要求派科學家和宗教師一百人來中國，結果因着戰爭的阻礙，那將來中國的多明我派教士，中途折回，只賸馬可保羅父子二人回到中國。馬可保羅在中國住了多年，幫助了忽必烈許多事體，他也曾遊歷過中國許多地方，著成世界聞名的一部遊記（已經譯成中文），引起了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

在這個時期裏，與天主教在中國工作上關係最大的人，莫如那個約翰蒙高末諾 (John of Montecorvino)。他是方濟各派的意籍教士，在一二九四年奉教皇派遣，來到中國的京都北平，得着新皇帝元成宗鐵木耳的歡迎，他就開始在中國做傳教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他勸化了一個景教徒高唐王闕里吉思信教，這位高唐王爲了紀念教士的緣故，替他自己的兒子題名叫約翰。他在景教徒的反對情形之下，創建三座教堂於北平，——從一二九八至一三一八年間——當一三〇五那一年，替六百人施洗。又曾招收了一百五十個外教人家的男孩，——七歲至十一歲——給他們施洗，教他們學習拉丁文和教會禮節，把他們組織成一個唱經班和歌咏隊，用蒙古文譯出許多經文和歌詞，一部分學習成功的，便在禮拜時幫助崇拜的儀式，每逢禮拜，甚至在皇帝宮裏也聽到他們的歌唱聲音。那個高唐王，也在教堂裏擔任些職務。高唐王闕里吉思更領導了他的人民信奉天主教。他死之後，他的兄弟把這些人民帶回到綏遠東南部自己的封地，所以約翰常常去看他們，因此對於那地方的語言文字，都很熟悉了，把新約與詩篇譯成這種文字，他的工作範圍便日愈擴大了。

約翰雖只有五十八歲的人，但他的形狀却已經很老了。因爲有十二年之久，沒有得到一些教皇的消息。十年以來，只有他獨個兒主持這樣的繁劇，到一三〇三年方有一位德國教士亞諾爾德各洛尼 (Arnold of Cologne) 來和他同工，但也只有大約兩年工夫。

他在一三〇六年所建造的第二座教堂，離開皇宮很近，皇宮裏的人，早晚都能聽見歌唱。這個教室的

地基，是一個名叫彼得的送他的，建造的經費，是向各慈善家捐來的。禮堂可容二百人，另外有辦公室，規模雖不甚大，也可見得他獨力經營的不易了。他鑒於事業一天天的擴大，自己覺得孤立無援，曾經寫信給同會的弟兄，又託一位在亞洲多年傳道的教士叫多倫底諾 (Tolentino) 帶信給教皇，結果，約翰被委為北平總主教，管理東方全境教會，並且又派來七個副主教，從一三〇七年啓程，其中有三位，都在印度死了，又有一位做了得利斯帶 (Trigote) 主教，只有三位於一三一三年到了中國，一名安德肋貝魯日亞 (Andrea da Perugia) 一名日辣多阿布意尼 (Gerardo Aburni) 一名貝來格理諾加斯歹勞 (Peregrino da Castello)。那個日辣多他做了新教區泉州的第一任主教，在泉州建造起一座教堂。其餘的二位，留在北平幫助總主教辦事。除了在泉州新教區以外，並且分派修士們到浙江的杭州，江蘇的揚州去開教。

一三二二年，有一位意籍方濟各派教士名和德理 (Friar Odora of Pardonone) 到了中國，在泉州登陸，後來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揚州、臨津、濟甯，沿着黃河，到了北平，一路上考察各該地教會情形，在北平耽擱大約有三年之久——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八——勸化了許多人信奉天主教。一三二八年才由西北經陝西、四川、西藏、巴大格、山波斯、亞美尼亞回到意大利，原期請求教皇派遣五十個教士，同來中國傳教，不意到到達意大利的次年——一三三一年——即逝世了。

一三一八年，泉州主教日辣多逝世，由貝來格理諾繼任，五年後又逝世了；再由安德肋繼任，在他的任內，又建造起一座教堂與一座較大的修道院，建築剛完成，他也在一三二六年病故，便沒有人繼續他的職

位。一三二八年北平總主教也去世了，他在中國做了三十多年工作，在中國的首都建立起天主教的事業，他那種勇敢有毅力的精神，實在給予當時的影響不小，可以算得元朝天主教中的偉人，可是他死了以後，得不到一個相當繼任的人，教皇曾派遣了巴黎大學神學教授尼哥拉司（Nicholas），不幸中途死了，沒有到任。所以蒙古皇帝曾派了大使和十五個教會代表，去請求教皇派遣繼任的人，信裏面寫着這樣懇切的話：

『自約翰死後，中國教會缺少了一個精神上的領袖，需要派一個繼續的人。』

結果，教皇派來了一個名叫馬利諾利（John of Marignoli）於一三四二年來到中國北平，他穿着很莊嚴的祭服，在盛大的儀式中朝覲中國皇帝元順帝，並且把教皇所贈送的戰馬和禮物書信獻上，頗得皇帝的歡喜。但他鑑於中國那時的政潮險惡，逆料元朝的命運不久，大亂即將發生，於是於一三四五年決計回歐，雖經元帝懇切挽留，亦置之不顧。他取道馬刺甲錫蘭耶路撒冷等地，於一三五二年到達亞味濃（Avignon），向教皇陳說有繼續派遣教士至中國的必要，雖然後來曾經先後派過三個人——一名多默（Thomas），一名伯拉多（Brato），一三七〇年，一名加布阿（Cappua）一四二六年，都沒有到任，所以天主教在中國便無形的停頓了。

三 元朝基督教的滅亡

元朝藉武力所造成的國家，不到一百年，便被中國人把他們驅回蒙古去。同時，在中亞細亞等地也被

回教所佔領，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着阻礙。不但元朝的國運從此告終，即將近百年慘淡經營的基督教，也受了致命的打擊。

原來羅馬教皇很想把中國天主教的工作，繼續地保存下去，他在一三七〇年以後派了許多主教，像考斯米薩來亞 (Cosme Sarai) 沒有到任；威廉伯拉多 (William of Prato) 帶着許多同伴，也不知下落；佛蘭西斯波多 (Francis of Pedito) 帶了十二個同伴，也失了踪。還有十個北京主教的名字，最後的一個，在一四七五年被土耳其人捉去，監禁了七年，釋出後不久也就死了。其他那些有北京主教的頭銜的，大都是有名而無實，因為那些人根本沒有到中國任職。所以天主教在這時候，便無法繼續。關於這一代天主教在中國的成绩，也很難加以考證，根據一部分不很確實的報告，說歸化天主教的有三萬人，不過這些人，不都是漢族人，以阿蘭人及蒙古人居多。見得當時民衆，對於天主教，沒有受到重大影響。模勒氏 (A. C. Mohr) 在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耶穌信友一書中這樣說：

「古代和中古時代，中國信徒們的故事，並不是天主教的教會在中國開始成立的故事，却多少在名義上或是在實際上，是信奉耶穌的外國人，在中國久居，或是暫居的記載。」

他又根據古經上題着的文字，都是拉丁波斯及回文，而沒有中國字，斷定德主教約翰所付洗的外教人，都是中亞細亞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漢人。那些方濟各派的教士，他們留下來的遺跡，可以做我們考證的却是很少。祇有現在保存在意大利弗勞倫斯老楞佐圖書館中的一本拉丁文聖經，這本聖經，是由於耶

蘇會修士古柏理(Complish)在江蘇常州地方一個外教人家裏得着的，據說這是他家的祖先從元朝傳下來的。最近德禮賢氏(M. D. Klein)尋獲一隻十四世紀的天主教聖爵。

記：在景教方面，我們從元朝文告中，見到一件重大的故事，就是也里可溫同佛道的爭端。至元辨僞錄所

『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層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見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八十七所引)

『彌失訶』指景教，『達失蠻』指回教，這一番話，出於佛教徒排斥他教的口吻，也可以見得當時各教互爭地位的情形。我們又從元典章裏見有一道咨文，大致是說：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及行將法籙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於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班立於先生之上，動致爭競；將先生人等毆打，深爲不便，申訖轉呈上司禁約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領，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因隨路有一等規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戶計，遂於各處再設衙門，又將道教法籙先生侵奪管領，實爲不應，呈乞照驗。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議得即日隨朝慶賀班次，和尙先生祝讚之後，方至也里可溫人等，擬合依例照會外，據擅自招收戶

計，並提管法錄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嚴加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照驗，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屬並僧錄司也里可溫掌教司，依上施行。」（見元典章卷三十三）

這道教呈控裏的重要理由，一爲也里可溫將法錄先生誘化，所謂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認爲是侵奪管領之權。一爲祝聖祈禱時的班次，列在佛道之前，甚至將法錄先生毆打。這可以想見當時也里可溫的興盛，乃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擠。實際上當時景教徒的行爲，的確也有許多可以非議的地方，在蘭多辣 (Landon) 著中國基督教史裏這樣說：

「景教徒不是可以稱爲基督徒的，是很難說。有一個名威廉羅伯萊克 (William of Rubruck) 的，在中國邊境遇到幾個景教徒，他們念起經來，果然同歐洲的僧侶一樣，但是他們大都是醉漢，多妻的，盤剝重利的人。」

這末始不可以說是景教內部的腐化，足以招致外來的排擠。再看鎮江的十字寺，被佛教沒收改作金山下院的一次交涉，也里可溫實遭受一次很大的打擊。原來這寺本來是由佛教金山寺改建的，金山寺是晉朝建武時建立的，初名澤心，後來梁天監在這寺內舉行水陸道場，宋大中祥符時改名龍游，到元朝至元十六年，馬薛里吉思做鎮江副達魯花赤，始改建爲十字寺，到二十八年，復被收爲金山寺下院，歸佛教所有，這是根據趙孟頫的按語。趙孟頫曾爲該寺撰碑，其碑文有云：

「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於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溫，倚勢修蓋十字寺，既除拆

所塑，其重作佛像，繪畫寺壁，永以爲金山寺院，命臣趙孟頫爲文，立碑金山，傳示無極云云。」（見鎮江志卷十）

同時，潘昂霄也奉旨撰碑，有大旨相同的話。鎮江景教受此打擊以後，其勢力日就衰微，而漸至於滅亡。所以總景教滅亡之原因，除了受着異教的壓迫以外，還有自身內部的問題，在四大危急時期中說：

「中國景教徒爲數頗衆，大半係蒙古人，非中國人，威廉伯羅魯克來華，卽在中亞傳道，與中亞景教接觸，評其缺乏知識……設此兩派耶教，均以基督爲法，互相敬愛，則耶教在亞之發展，必無限量也。總主教約翰初居北京，寧夏時，景教徒極力反對，是以兩方互仇，不能協力同心。」

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兩派基督教互相傾軋，使佛道二教坐收漁人之利，是不足爲怪的。

末了：我們要問爲什麼元朝基督教會和唐朝景教一樣，爲什麼他們對於中國人的影響會這樣小？實在的原因如何？我們不能知道；但是元朝比唐朝的情形，更覺得困難，是無可否認的。元朝是挾帶了蒙古民族習慣來統治中國，處處與漢人顯得異樣，也許漢族人民的民族思想，對於蒙古民族有些歧視，所以蒙古皇帝與長官所熱烈提倡的基督教，漢人對之，格外冷淡。尤其在唐朝與元朝的兩時期中，基督教的活動，都在君王與貴族之間，與普通的平民階級沒有發生什麼關係，君王的勢力一倒，基督教也隨着消滅。等到漢族人起來推翻蒙古人的統治，把他們驅逐出長城以外，盛極一時的基督教，也就沒有立足之處了。本來與基督教站在對立地位的儒釋道三教，彷彿得了一個報復的機會，也在這種變動之中發展其排擠的一部分力量了。

第七章 明代基督教的輸入

蒙古人在中國政權傾覆以後，基督教的工作也就沈寂了，但這沈寂却是暫時的現象，不久，歐洲的天主教徒，受着文藝復興的鼓動，隨着商人的足跡，圖謀向外發展。十五世紀可以說是世界地理上的新發現時期，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繞好望角而到達印度，并及於遠東的日本與中國，與哥倫布向西航行發現新大陸有同樣的意味。葡萄牙商人既覓得了這個新市場，紛紛東來，天主教的教士們，他抱着傳道的熱忱，在千辛萬苦的情形下：想做一番開關的工作；他們曾經到印度、馬刺甲、日本、安南、暹羅以及中國。澳門做了他們的根據地，繼踵而來的西班牙人，也必經澳門而集中於菲列濱羣島，所以中國官場爲了要把兩種人加以分別，稱前者爲馬刺甲佛郎機，稱後者爲呂宋佛郎機（佛郎機乃回民加於歐洲天主教徒的名稱。）而葡西兩國人，可謂十六世紀東方傳教事業的先鋒，來扣嚴扃着的中國之門的，等到意大利人來，纔把這門扣開。這種扣門工作的艱難困苦，實有非我人所可想像者，初期的教士們，莫不感到無門可入的痛苦，中國官府，嚴禁外人入境，因此，教士們有的被捕入獄，有的遇險喪命，也有至死而未能足履中國地界。范禮安（Valignano）因不能入中國境內，乃至對中國界石發出沈痛的嘆息，說道：

「磐石呀！磐石呀！什麼時候可以裂開呢？」

可見當時欲傳教入中國的不易了。但是教士們抱着前仆後繼的精神，雖遭失敗，未嘗爲之氣餒，茲舉其可

資紀念者數人於下：

其一爲耶穌會士沙勿略(Xavier)，地在一五四二年到達了印度的科亞(Coimbatore)城，因爲聽說到中國去經商的人很多，也就到了馬刺甲，從一個日本人叫雅吉洛的信教關係，會到了日本，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的文化，是淵源於中國的，所以他以爲對於在日本最好的傳教方法，莫如先到中國。他希望從日本國王得到一張護照，能把他送到中國皇帝那裏，但是欲得到護照，必須請求諸侯們蓋印，而那時日本的諸侯們，非常專橫，所以無法取得。只是他到中國來的心志，仍未稍殺，於是他終於離開了日本，在一五五一年到了中國沿海的一個小島——上川——那時正是倭寇騷擾中國海岸，在閩粵海岸亦充斥海盜，沿海居民，航海商旅，往往慘遭劫掠，或遭監禁，或被殺戮，尤其是歐洲人士，危險性更大，而沙氏竟冒險往返，倖獲安全。他曾經這樣說過：

『一點不要信託自己，要完全依靠天主，這樣，我們既然有了強大的保護者，不要有絲毫害怕的意思，一定能得最後的勝利。』

他本着這樣的信心，安然地到了上川島。既到這島，只知道中國是遠東的樞紐，却不知道從那條路可以進入中國，有一次，他到了一個三洲島上，想法與那些中國商人聯絡，希望他們能夠把他帶到廣東，費了不少力氣和他們商量，都被他們所拒絕。後來他費了二百塊錢雇用一隻小船，想秘密進入廣東，許多同伴都勸阻他，以爲這樣辦法，有兩種極大的危險：第一，船上人爲避免官廳耳目，有把他扔在荒島的危險。第二，

廣東官長，有把他送進監獄的危險；因為那時凡不得皇帝許可的人，一概不准入境的，他記起耶穌的話：『在今世愛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掉；凡爲我喪失生命的，倒得保全。』因此，他那上中國這塊禁地的心，仍舊像火一般地燃燒着。但是事實上却都使他失望。後來，他想變更一個計劃，將跟隨暹羅公使，冒充公使館人員，一同上北京去。他那種偉大的計劃，不料在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晚上，竟跟着他的身體一同消逝，而死在上川島上了。他那樣平凡的死去，得不到當時人的注意，但是他那種傳道的熱忱，却激發了許多後來要向中國傳道者的勇氣。不但是同會的耶穌會士接踵而來，就是那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和奧斯定會的教士們，也都聞風興起，在此後的三十年間，秉着他那種精神，繼續不斷地來叩中國之門。

印度各傳教會，得着了沙勿略的死耗，都感到極度的悲哀。繼任沙氏職位之貝而斯 (Beres)，也是很想到中國傳教的，可惜他於次年十月間逝世了。繼貝氏任傳教會會長的，是一個耶穌會士名叫巴來多 (Pato)，也是葡萄牙人，就任以後，就接到從日本來的請求書，得着同會的叫平托 (Pinto) 的懲惠，他們便出發到日本去，剛到中國海岸，得着教皇禁止印度省會長離開職位的命令，便中止遠征，想藉此機會一履中國地界，但是未能成功，只好重返印度。當時，另有一位和巴來多同來東方的多明我會士名叫克盧斯 (Cruz)，聽說在廣州的中國門戶已經開放，便和巴來多一同離開印度，來到中國的門口，到達了上川島，在沙勿略墓上舉行彌撒。但是他們仍舊不能進入廣州，結果，巴氏乃上日本去，克氏却回返印度。這時，中葡間的商業，一步步地走上繁榮之途，葡人又會助廣州當局消弭海盜，取得官廳好感，他們便從上川等小島自動移到

澳門，澳門是一個極小的半島，面積不過四百八十公頃，在香山縣境，直接屬廣東省肇慶府管轄。起初是個極卑陋的地方，後來竟變成世界著名的商埠，那不能不歸功於一個傳教士名叫公使勒（Consilieu）的。他是最早受馬刺甲司鐸的委派，到那裏去傳教，那便成爲澳門的開闢者。巴來多克盧斯等既到了澳門，便有了到廣州的機會，可是中國官廳的限制，仍舊很嚴，所以克盧斯曾經這樣說：

「官家佈置一些哨兵，把守廣州，凡是沒有得到許可的，決難渡過門禁森嚴的城垣……爲了這個緣故，不論是我或是別的司鐸，已經爲傳教事業試辦過好幾次，都未能在中國得到結果。」

雖然還是困難，却比已往接近得多，所以一般談論中國傳教問題的，都是抱着樂觀，認爲中國人并不固執的拒絕外來宗教，不過對於一種新的宗教，沒有得到長官及皇帝的允許，不敢冒險的接受。所以有人主張由葡王派遣公使團，向中國皇帝進貢，藉此取得皇帝許可的根本辦法。後來巴來多被調往別處，克盧斯回返葡國，只有公使勒一人仍舊留在澳門工作。一五六三年的時候，在澳門至少有八位耶穌會士，外來人民增至五千上下，內中有九百個是葡萄牙人，在這些葡人中間，有很多人計劃進中國傳道，像貝勒茲（Beliz）上書於廣東布政司，結果，因不懂得中國話，致被拒絕。像阿樂迦拉（Alcarr）拉彌來（Ramirez）在中途遭風死於非命。此外如利培拉（Ribera）黎野辣（Ribera）發拉（Volla）雖然屢經險阻，仍請求澳門當局准許他們到廣州去，均未成功。利培拉乃有改換中國服裝，託一個舟子把他帶到廣州江岸的計劃，同伴皆以爲此舉太屬危險，設法阻止。不久，此三人皆被召回歐洲，他們所有的計劃，都成了空虛的幻夢，有人以爲中國門

戶的開放，較前進步，其實在沙勿略死後，所有的情形，更覺令人失望；不論是葡王的公使，不論是英勇的傳教士，都不能衝過中國的重圍。試用的方法，幾乎已經用盡，但一點也不發生什麼效力。所以一般激進的人，以為用和平的方法傳教，既然不行，用武力干涉或外交壓迫，當可以有保障。傳教士的善意既被拒絕，不如採用武力以克服抵抗。利培拉曾有這樣的意見，若是不用戰爭，不借兵力，是沒有使他們歸化的希望的。原來中國人民是極易勸化的，只是他們在嚴格的管治之下，而不敢嘗試罷了。嫩耶斯（Nunes）也有這樣的意見，他在的一封信裏說：

「歐洲各王侯，與其自相爭鬥，自相殘殺，何若設法擴大基督的國，而迫令中國皇帝允許教士在國內傳教，中國民衆極易勸化，因為我們的風俗文化是他們所喜悅的。」

這種意見，正是表示他們極端的反動，是在計窮力盡時所想出的最後辦法。這辦法簡直要把傳教工作，變成征服屬地的工作，不擇手段，求達目的。幸虧這方法沒有實現，給後來一班有遠見的教士們，加以糾正，認為此種思想，非常危險，惟一的辦法，只有用長期的忍耐，來取得事業的成功。因為他們並沒有失掉了希望，博而日亞（Borgia）聽到代宰拉的樂觀主義，說道：

「我對於他所具有的進中國的希望，覺得很是快樂，我也是這樣希望着。」

所以那些希望傳道到中國的教士們，都抱着忍耐的心，集中在澳門，那時的澳門，已經成爲非正式的居留地，他們既然不能進中國，只好在澳門經營着宗教事業，所以到一五六五年，已經有五千以上的信友，在公

匪勒的領導之下，建立起會所及教堂。卡內羅（Carvalho）奉了教皇的命令，於一五六八年來到澳門，稱作第一任中國主教，那已經在澳門經營教務有十一年之久的公匪勒，被馬刺甲主教召到摩鹿加去了。而卡內羅頗得修士們的歡喜，爲了請求中國官廳允許在廣州成立會所，曾經到過廣州兩次。然而中國人總是懷疑着那些葡萄牙人有佔領土地的野心，始終未予允許。他們既無法向中國內地進行，只好在澳門勸化人信教，並且改善葡萄牙人自己的風俗。卡內羅曾經這樣說：

『當我來到稱爲「天主聖名」的商埠澳門時，第一件工作，是不令本處教友供給外教人看輕基督的機會，並禁止我們有錢有勢的商人，有不好的行爲。』

並且開設一座醫院，不分教外教內人一律收容，可以說他是把西藥傳入中國的第一人。他又注重慈善事業，自己的生活，非常刻苦，注意於教會內容的充實，等候着將來對中國新局面的展開。當時澳門教會的使命：一爲預備向中國內地傳教的根據地，一成爲遠東教士們旅居之所。他們最大的目的，還是在前一點。當科斯塔（Costa）到廣州請求官廳准許教士居住廣州的時候，事雖未成，却得着一個青年慕道的和尚，跟着他回到澳門。卡內羅主教見這個有爲的青年，很想使他受點高深教育，並且送他到日本去求學，在聖誕節給他受洗，聖名保祿。想不到爲了這個青年，却引起極大的風波，那些和尚們散播許多謠言，鼓動民衆示威。聲言欲搗毀澳門商埠，沒收商人貨品，當局亦發出扣留葡國商船的命令。葡國乃化了許多運動費，允許找回這青年和尚。澳門教會經過長期討論，無法兩全，而那青年自己不欲使大衆受累，自願回返廣州。卡內羅

不得已，只好伴他前往，一到官廳，那青年便被捕去，遭受毒打，判了流徙之刑，卡內羅也無計可施，這青年可以說是中國爲基督受苦難的第一人。廣州市內便有傳教人拐騙小孩的誹謗，教士們要想傳教內地的困難，亦愈加增，彷彿在關閉着的中國之門上加了一把鎖一樣。

在葡萄牙人積極扣門的時候，西班牙挾其戰勝荷蘭叛變的餘威，開始向摩鹿加羣島菲律賓羣島及太平洋東部進行。而那些奧斯定教士，對於擁有豐富利源與繁庶民衆而又具有優良文化的中國，當然被看作良好的傳道區域。所以他們以全力從事於國外傳教之餘，單注意到中國，以菲律賓羣島爲根據地，成立中國奧斯定會傳教省，或稱爲駐在菲律賓的中國傳教省，時常準備到中國傳佈福音。起初有巴斯克 (Basque)馬丁拉達 (Martin de Rada) 和雷迦斯畢 (Izaguirre)，在該島上經營教育與設建事業，一面又很熱烈地預備進入中國，先期學習中國語言。到一五七五年有一個進入中國機會，適中國統兵王望高爲征討海盜林鳳的緣故，到了馬尼刺，馬尼刺當局，便把傳教士欲到中國的事，與之商量，結果，便有奧斯定會士拉達 (P. de Rada)馬林 (Martin) 隨着王望高到福建泉州，並至福州謁見總督，要求居住在中國傳教，未得允許，在中國仍舊不能立足，只得回返呂宋。第二次那位拉達，與同伴阿爾部開爾克 (Albuquerque) 又附王望高的軍艦來到中國，竟爲王望高所賣，把他們拋棄在桑提阿哥 (Santiago) 海岸沙灘上，他們的翻譯員及僕役皆遭殺死，而這兩位教士，也已奄奄一息了。但奧斯定會並不因此沮喪，依舊不斷的努力。不過西班牙人的這種努力，却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嫉妒，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深恐西班牙人的勢力膨脹之後，自己要

受到害處，祕密和羅馬教庭商議，抑制西班牙勢力的辦法，把中國、日本及附近各島，盡歸澳門管理。因此西班牙人受了許多限制。及至一五七三年范禮安被任爲遠東視察員，攜帶四十多名新會士，內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人都有，特別西班牙人最多，於是國籍的分別，漸漸消除。

范禮安是意大利人，一五六二年在羅馬加入耶穌會，他帶了四十餘人視察澳門教會，可以說是一種劃時代的工作，因爲從他手裏領導了兩個開創這一時期教會的偉人，就是羅明堅與利瑪竇，他自己雖往來於印度及中國海上垂三十二年之久，沒有達到他開啓中國這磐石的願望，而他那不倦的精神，實在做了建設中國教會的磐石。同時，他結束了當時國籍上的傾軋，使一切負傳教使命的人。只在耶穌十字旗幟下盡責，忘記了國別，這是他承前啓後的大貢獻。他也到過日本，在日本勸化過馬郡藩主一家信教，也建立了起幾所修道院。他以爲預備入中國傳教，首要條件，必須熟悉華語，於是函請印度區長物色一個這樣的人，當其選者卽爲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於一五七八年偕同巴範濟 (Francois Pasio) 利瑪竇 (Matthion Ricci) 同來澳門。羅明堅遂從一中國畫師，學習中國文字，范禮安曾譽爲我所喜愛之一人。說：

『他用謙遜堅忍，把中國關得很緊的大門打開，因爲他是第一個用中國語言文字，將耶穌救世的道理，在中國傳佈，更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瑪竇領入中國。』

時葡萄牙人與中國貿易，每年有一定時期，在廣州附郭舉行，日入後，葡萄牙人必須歸舟，不許逗留中國境

內，羅明堅利用這種情況，呈請許其居留陸上。中國官吏認其請求正當，且喜其善華語，乃許居於暹羅貢使之驛館中。後又得兩廣總督之邀，與巴範濟同至肇慶，時在一五八二年，得居於東關某佛寺中，這佛寺便成爲中國內地之耶穌會第一會所。當時總督黜職，二人被迫回返澳門，巴氏遂改道赴日本，羅氏於次年請命於新總督郭某，乃偕利瑪竇重赴肇慶。一日在城牆下見一病者，昇入寓所爲之診治，病愈，令受洗入教，此實爲中國第一受洗之人，惜不知其姓氏。同時，有一學生研究教理，亦受洗入教，其人姓氏有寫作因日尼尼，或寫作Chu Ni-Co，其受洗之名稱若望（Uean）。此消息傳之澳門，范禮安欣喜異常。後來郭總督升遷他官，乃攜羅氏至其故鄉紹興，總督之父因此接受洗禮。此羅明堅氏始入中國工作之大概情形，謂爲明朝中國內地傳教之開創者，亦無不可。

第八章 利瑪竇與其他教士

開創第三期中國基督教事工的，當然要算到利瑪竇，在他以前許多冒險而努力的人，都不過是他的開路先鋒。前人種，後人收，前人之功固不可沒，而利氏的苦心孤詣，亦足以垂萬世而不朽，其生平事蹟，見之於一般記述者甚多，茲且據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蹟略述如次：

利瑪竇，字西秦，（明代天主教士，依照中國習慣，往往於姓名之外，特題字號。）生於一五五二年意大利馬知拉打（Macerata）地方，這一年便是沙勿略去世的一年，他的父親，曾經做過高官，也希望他的兒子能步其後塵，所以叫他到羅馬京城去肄習法政，但在他年十九的時候，有志修道，不願婚娶，屏除名利，入耶穌會，有傳道四方之志。他把這意思寫信告訴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極端反對，欲親往羅馬去勸阻他，正欲動身，忽然得病，病愈欲行，又病而回，這樣有三次，乃翻然覺悟，以為這或者是天主的意思，便寫了一封回信給他，慰勉一番。他便在研習文理科學識之外，進聖安德修道院研究神學，在院立志傳道印度，於一五七七年附舟歷數國轉輾至印度，一五八〇年受司鐸之職，次年得范禮安之召，乃至澳門。這時澳門已經中國政府允許作葡萄牙人居留地，耶穌會士創立了會所一座，並且成立為主教區。利氏到了澳門之後，范禮安便命他學習華語，因為范氏鑑於前此諸教士工作的未獲成效，乃由於不懂華語之故，於是命羅明堅利瑪竇等努力學習。後來，因為他們能操華語之故，獲得總督嘉許，使耶穌會得由廣州而入肇慶，立定了傳道的基礎。

先是廣東總督名叫陳瑞，起初到任的時候，便藉口調查澳門葡僑之名，乃傳令召澳門首領門多薩（Antoz Gonjaloi de Mendoiia）及新近登岸的薩阿主教（Don Leonardo de Sa）到肇慶總督府質問，其實他別有用意。這消息傳到澳門之後，一般僑商，咸爲之不安，恐怕有什麼不幸的來臨。不得已選派兩個能說華語的人員，代替前往，於是令檢查官巴乃拉（Barra）代替門多薩，羅明堅代替薩阿主教，來到肇慶，向總督從容陳辭，並呈獻所帶布疋、絲絨、水晶鏡等約價二千餘銀兩之物，總督遂變其傲慢態度，款待禮遇，留居府內十五天之久，又以羅明堅酷好文學，贈給他許多中國書籍。羅明堅見時機可乘，便向總督請求駐所，以便留此學習中國文字，雖未得允許，却彼此十分投契。此後羅明堅得幾次謁見總督，在肇慶建立了根基。二年以後，羅明堅乃帶了利瑪竇（一五八三年）到肇慶謁見新任總督郭公。肇慶是當時廣東省的省城，風景非常美麗，他們到了那裏，首先謁見知府王公，按照中國習俗，行跪拜禮，知府對於這幾位外來的朋友，十分殷勤，他們向知府唯一的要求，希望得到一塊遠離市廛的空地，可以爲建築教堂及寓所之用，知府立即派人帶他們到西門外江邊觀看地方，離這裏不遠正在建築一丸層高的八角塔，他們覺得這地方非常合宜，乃在附近擇定一角。羅明堅便回澳門計劃建築經費，利瑪竇一人留在肇慶，因爲他學習中國話還不過二年工夫，對於各種事務的處理，自感非常困難，官廳雖然允許他們建築，而民衆們却異常反對，於是引起了騷動，謠言蜂起，幾乎釀成大獄，幸虧那個知府加意保護，張貼告示，說明教士來華理由，經過六個月的口舌風潮，方始和緩。所建造的房屋，完全是歐式的，下層一共五間，中層暫作教堂的一間客廳，上層爲教士們住室，前

而有一個陽台，從遠處看來，式樣非常美觀；而且與旁邊的九層高塔互相輝映，人民少見多怪，哄動全城。利氏因而常住肇慶，他本是長於數學及地理的研究，於是把一張世界地圖，放大尺寸，改繪成中國字的地圖，將中國本部十五省，繪在中央，雖然與事實不符，但却投合中國人自大的心理。他把這地圖與渾天儀、地球考、時晷、報時鐘等物，贈於當道，他們都覺得非常新奇，並且佩服他的學問，而得到一般學者的尊敬。羅明堅既然跟着卸任的總督到紹興去了，利瑪竇便獨當一面的進行着他的工作，他不但是用學問使人佩服，並且用道德去感召人，橫逆之來，都能忍受，有一次，他的傭人捉住一個從後面牆上進來偷柴的人，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給他，說他是爲了貧窮的緣故，不必和他計較，那個人覺得很慚愧。自然這樣的事情便傳佈開來，他的名字，也一天天受人稱贊。他住在肇慶，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苦心學習中國語言，並且研究中國文字，對於中國的五經、子史，都能明曉其意義，據此著書立說，發明教義，欲實現古人保羅所說的：「在什麼樣人中成什麼人」的教訓，他要「在中國成中國人」，於是他也像羅明堅一樣在飲食起居儀節生活上都完全中國化，穿着和尚的服裝，而改變歐洲的習慣。後來遇到瞿太素，才勸他改穿儒服，廢除僧名。那時有因愛慕其學問，而來跟從他的，如鍾銘仁、黃明沙等人，亦有因邪魔作祟而來請求祈禳的，於是在肇慶便有許多人信奉天主教了。到一五八九年一個新任總督叫劉節齋的，他羨慕利氏等的住宅，想要把他奪去，逼迫那些教士退到澳門，但却不願居一個惡名，所以仍舊叫教士回到肇慶，願償還其房價，利氏等力辭不受，祇望能在別一城中居住，總督遂指定韶州南華寺爲其居所。韶州接近江西，傳教工作，遂因此而向北推進。

一步。利氏既到韶州，便請在城西首官地建造堂宇，鑑於前次的糾紛，不復用歐洲式樣，建成華式的住宅及禮拜堂各一所。時在一五八九年。在韶州遇到瞿太素（按：太素乃文懿公常熟景淳長子，文懿公有數子，曰汝璽，曰汝稷，曰汝說，後來殉國的瞿式耜是汝說的兒子，也是個熱忱的基督徒，可見太素之接受基督教影響於其後來的家庭。）他本來認識利氏於肇慶，適過韶州，談論甚契，願奉爲師。本來他想從利氏學得仙丹，却不料所學的乃是宗教真理，與數理幾何等學問，歷時不久，頗有心得，所以後來在一六〇五年受洗入教了。利氏曾問太素有何祈求？太素答以行年四十有三，尚未有子，能爲我祈天主乎？是年，太素果生一子，名曰式穀。太素本是一個著名的學者，得其揄揚於縉紳之間，利氏之名遂大噪。

利瑪竇曾乘暇遊南雄，遇見王玉沙在南雄做官，深想契合，遂得在南雄暫住，爲若干人授洗。時同伴麥安東（Antoine d'Almeida）石方西（François de Peris）相繼逝世，利氏遂感到孤單，適郭居靜（Lujare Cataneo）至韶州（一五九四年）遂共商赴北京計畫，次年跟隨起復之大吏石的少司馬同行，想藉此以至北京。逾梅嶺後，溯贛江而上，要經過十八灘，波濤險惡，所乘之船觸灘沈沒，全船之人皆落水，隨行的青年名Jean Baradas者慘遭溺斃。利氏自己既沒水中，不諳游泳，度無生望，忽手觸一繩，乃得脫險。不意該大吏忽然變計，深恐攜一外人入境而獲咎，欲把利氏遣回廣州，幾經力請，始許帶至南京，而該大吏本人則陸行北上了。既至南京，不爲官吏所容，復還江西，至南昌，心頗懊喪，適有醫士王繼樓者，本相識於韶州，至是見利氏至，殷勤款待，稱其見容得識城中士人。時江西巡撫陸仲鶴，邀見甚喜，利氏以其所著書並三稜鏡獻

之，遂得留居於南昌。由此，得謁見建安王，王甚歡迎之，握手而言曰：

『凡有德行之人，吾未嘗不交且敬之，西邦爲道義之鄉，願聞其交友之道。』

利氏便著成交友論一卷獻之。時適同會蘇若望 (Jean Soudé) 帶了些金錢來，遂租得小屋同居於此。從此利氏之名愈著，過訪者戶限爲穿，有見其太煩而勸其託詞不在以謝客，利氏答曰：

『天主不容我作僞言，甯願過客倍增，不願言行背道。』因此，人家愈加看重其人格與其教道，利氏身居南昌，心常不忘北上，一五九八年適有舊相識王忠銘，新授南京禮部尚書，將入京覲見路過韶州，原欲攜帶利氏入京，繼知利氏在南昌，遂偕郭居靜至南昌，將與利氏同至北京。

先是利氏在肇慶時，繪有地圖一幅，爲趙心堂所得，時趙公方將開府姑蘇，適王忠銘帶利氏到南京，趙公餽送禮物中有此地圖，王公甚奇，以示利氏，方知此圖本爲利氏所作，乃作書以告趙公，趙公喜出望外，具車以邀利氏，相得甚歡。利氏並出天主像，趙公懸之於日常拜天之所，稽首敬禮，並遍請當道諸公，同爲瞻仰，暢談十餘日，時王忠銘已先北上了，趙公乃命人護送入京，時正因中國與日本因朝鮮事發生戰爭，流言外國人爲日本間諜，爲避嫌計，不得已使郭居靜逕返南京，自己則往蘇州訪瞿太素，太素勸其在蘇州建一住所，然以利氏久病新愈，甯赴鎮江休養，至一五九九年仍還南京。時王忠銘已就南京新職，介紹許多官吏與之訂交，一般士大夫，咸以與利氏訂交爲榮，郭居靜亦由山東來會，商量建築住所，戶部劉斗墟曾於洪武間建有住宅一所，因常爲魔擾，願讓給利氏，視之極爲滿意，卽奉天主神像於其中，夜與郭居靜鍾念江遷入同

居，安然無異，次日諸相相過訪，咸以爲邪不勝正，始知堪輿擇日之俱屬妄誕，有太史王順庵者，博學多聞，常有志於度數曆法之學，知利氏精此學，乃令張養默先就利氏受業，習之既久，於渾儀度數，始有所得，乃喟然嘆曰：「彼釋氏之言天地也，但聞一須彌山而日月繞其前後，日在前爲晝，在背爲夜，其言日月之蝕也，則云羅漢以右手掩日而日蝕，左手掩月而月蝕，言地在須彌山四面，分四大部州，而中國居其南，天地之可形像測者，尙創爲不經之談，况不可測度者，其空幻虛謬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明者測驗可據，毫髮不爽，卽其粗可知其細，聖教之與釋氏，孰正孰邪，必有辨之者矣。」名士吳左海李卓吾亦皆訂交利氏，賦詩爲贈。又嘗折服道家李公，高僧三槐，其學識爲當時人所驚服者類此。諸大夫中首先奉教的，乃一七十歲之武官，洗名爲保祿，後其子及全家皆受洗。斯時奉教之人日多，就其新住的禮拜堂中公開禮拜，郭居靜將此情形赴澳門報告，並請派輔助之人，不久，郭氏偕龐迪我 (Didace de Pantoja) 同來，留郭氏主持南京教務，利氏則偕龐氏作北京之行，時在一六〇〇年，所帶貢物，有大小白鳴鐘各一，油畫三幅，內聖母像一，耶穌偕約翰像一，救世主像一，鏡數面，三稜玻璃柱兩面，聖課日曆書一册，手琴一具，萬國輿圖等。被內臣馬堂截奪貢物，自行上奏，奉旨便殿召見，命內臣習學西琴，並問西洋曲意，利氏乃譯西琴八曲以進，帝尤愛自鳴鐘，命此二外國人留居京師，並賜月俸。向例外臣貢物，必由禮部呈進，今因利氏逕由內官直達，禮部大臣認爲越級，頗示不滿，後經利氏說明馬堂強奪邀功之事，方釋嫌怨。利氏雖留京師，却居夷館之中，乃具疏請命，冀能於南京或吳越，得一居所，未蒙報可，後經禮部趙邦靖周旋其間，始得在北京僦屋以居。後趙公因事去官，利氏獨住

暗慰，趙公感激相知，歸而研究利氏天學寶義一書，頗多領悟。利氏住京師凡十年，時與名公巨卿論學，賓客過訪，絡繹不絕，每接見賓客時，輒言天主教理，一有賓客，則倒屣出迎，雖在抱病呻吟之時，亦必欣然出接，忘其所苦，客去則呻吟如故。無分貧富貴賤，一視同仁，因此，交遊日廣，人多樂以相親，受其感召者，大不乏人。名公巨卿，翰苑聞人，頗多受洗入教，徐光啓之瀛卽其中之一。時北京奉教者已有二百餘人，徐光啓本於一六〇三年領洗於南京羅如望（Jean de Rocha），次年爲翰林，至一六三二年入閣爲尚書，爲當時華人信道中最有貢獻的一人。李之藻從利氏學西學，深佩利氏器識，適患重病，以獨居京師，乏人照料，利氏朝夕於牀第之間，爲之調護，及病篤時，乃勸其立志奉教，遂爲施洗，而病亦漸痊，後爲基督教多所著述。

一六〇九年利氏曾創立信徒團體，名曰天主母會，在會之人，相約以德行範世，贍養窮人爲務，按月聚會，互相策勵。其日常工作，除爲志願受洗之人講說教理外，又嘗努力學問，於中國文學，造詣甚深，四書五經，都能熟讀，故其在應對周旋之時，往往引經據典，闡明教義，深得當時儒者的欽佩。本其於中國學問的素養，從事著述，一書之出，莫不受人稱譽。教內外人士，致書請問的，日有多起，輒手自裁答，雖縷縷長言，亦不憚煩。又嘗就北京建築大禮拜堂，親自督理工程。以一身任此繁劇，勞苦不辭，乃至促其年壽，於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臥疾不起，年僅五十七歲。遺命以龍華民（Lombardi）繼其後任，龐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請葬地，乃以藉沒楊內官私創二里溝佛寺及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賜爲利氏葬地，卽今北京城外教士公葬之所。在京與南京南昌韶州諸士大夫都來參加葬禮，京兆玉沙王公撰文立石以資紀念。內臣中有以爲外

臣賜葬，向無此例爲言，宰相葉向高乃曰：『遼論利氏之道德學問，卽就其所譯幾何原本一書，亦足當葬地之賜。』此利氏之死，實予基督教在中國以莫大影響，當利氏臨終之前，曾致書於其同僚，有云：『我思在中國傳播基督教之良法，莫如我死。』果然，他那不平凡的死，成爲基督教歷史上的偉績。其生平所著漢文書籍甚多，當於下文另述。

總利瑪竇逝世時的教會情形，從上述的一篇傳記裏，可以知道當時已開設教會的，有下列的幾處：

(一)肇慶府。於一五八三年建一住宅。

(二)韶州府。於一五八九年建立教堂與住宅。郭居靜於一五九四年到此工作。到一六〇六年已有教友八百人。

(三)南昌府。於一五九五年，以六十金買一小屋作教堂；一六〇七年李瑪諾又以百金買一較大之屋立堂。一六〇九年時有教友約三四百人。

(四)南京。於一五九九年建造堂宇。

(五)北京。於一六〇五年以五百金購一屋建立聖堂，卽爲南堂。

(六)上海。於一六〇八年由徐光啓、郭居靜開教，建立堂宇，二年中付洗有二百人。

(七)杭州。於一六一一年由李之藻、郭居靜開教。

當時奉教人中有名望的，如(一)翟太素，江蘇常熟人，太宗伯文懿公長子，一六〇四年領洗於羅如望。

之手，聖名依納爵。(二)徐光啓，上海人，官至禮部尚書，一六〇三年領洗於羅如望，聖名保祿。(三)李之藻，杭州人，一六一〇年病篤時在北京領洗於利瑪竇。(四)楊廷筠，杭州人，一六一一年在本地郭居靜手領洗入教。(五)馮應京，安徽盱眙人，讀天主寶義而受感。(六)李天經，河間吳橋人，以進士仕京師，由徐光啓勸導而入教。(七)張燾，李之藻門人，與其師同受洗於利瑪竇。聖名彌額爾。(八)孫元化，嘉定人，在北京受徐光啓感化，於一六二一年領洗，聖名依納爵。(九)王徵，陝西涇陽人，官至布政司，聖名斐伯理。(十)韓霖，山西絳州人，在北京與徐光啓善，聖名多默。(十一)段袞，山西絳州人，亦在北京做官時奉教。(十二)金聲，安徽休甯人，崇禎進士，與徐光啓善而奉教，其女守貞不嫁，亦奉教。(十三)瞿式耜，爲瞿太素之姪，萬曆進士，後殉國。(十四)張廌，福建晉邑人。

與利瑪竇同時同工的人，除上述羅明堅爲其先進外，如麥安東，是葡萄牙人，他的號叫立修，在一五八五年偕孟三德到澳門，協助羅明堅利瑪竇傳教內地工作，曾隨羅氏至紹興，並與利氏共事於肇慶韶州，一五八九年病歿。

孟三德 (Donard de Sante) 也是葡萄牙人，號叫雷賓。一五七二年至印度，奉范禮安之命，輔助羅利工作於澳門，後經羅氏帶往肇慶，總督會面詢其會否思家，乃答曰：「永與華人處，是我願也。」後因肇慶教士爲總督所逐，相率至韶州，勸導青年華人入教，不久，孟氏遣返澳門。一六〇〇年病歿。

石方西 (Francois de Petra) 意大利人，號叫鎮宇，一五九〇年奉范禮安之召，來至澳門，以麥安東病

歿，赴韶州，繼其職，抵韶不久，有盜夜劫其室，被盜斫傷其頭，並傷僕役三人，官捕得盜，判處死刑，石氏等請寬其罪，僅杖二十釋之。助利氏傳佈教道，體魄雖健，然預知不壽，未三年果病終。

郭居靜 (Juarez Catarino) 亦意大利人，字曰仰鳳，石方函病歿，利氏獨居韶州，乃召郭氏來助。利氏第一次赴南京時，留韶管理教務。後偕利氏同赴北京，及還南京，被遣歸澳門報告旅行經過。事畢遂攜盧迪我 (Jaques de Parvoja) 至南京，利氏最後離開南京時，郭氏留居南京，管理南京南昌韶州等處教務。後來范禮安卒，郭氏遂繼其視察之職，留居澳門，會荷蘭人因嫉葡萄牙遠征得利，乃遣海盜擾沿海島嶼，並欲謀據台灣，進取澳門，於是葡人設防以備。華人見之，遂有外國人謀據中國，推郭氏為帝之流言。且有不良教徒，以教士們不相庇其訟事，懷恨於心，又從而煽動，釀成焚燒教堂的暴動。流言既熾，教士等處境甚危，兩廣總督派人調查，召見郭氏，欲觀其武庫，郭氏導之人圖書室，乃指其藏書曰：『此我所持以謀據中國之武器也。』又導之入學校，而指其學生曰：『此我將率以侵據中國之兵卒也。』流言之不實，至是始為之釋然。這件事體是在一六〇六年。後帶熊三拔 (Go Uris) 來中國，及至南昌，三拔則赴北京，郭氏則止南京。時徐光啓因父喪回上海，道經南京，邀郭氏同往開教（一六〇八年）。時上海因商業興盛，已成重要城市，居民約四萬戶，人口約三十萬人。以徐光啓位高望重之故，易以號召，得建一華麗教堂，郭氏居上海二年，受洗者有二百人。復奉新會督龍華民 (Nicolas Longobardi) 之命，偕同金尼閣 (N. Trigault)、鍾巴相赴杭州開教。李之藻是杭州人，已在北京受洗，時亦因丁憂在籍，力助開教事業，並勸其友楊廷筠入教，徐李楊三人，實為當時開

創教會之三大柱石。杭州亦建堂施洗，日臻興盛，兩地教會，皆由郭氏主持，居杭州約三十年，至一六四〇年逝世，年已八十。

葡華民意大利人，號曰精華，一五九七年到中國，先在韶州傳道，遭受甚多困難，仇教的民衆和尙，屢加侮陷。一六〇三年在韶州靖村建立教堂，此實爲中國首先建立之教堂，以其尙在利氏所建之北京教堂以前。一六〇九年被召至北京，任中國全國會督，其第一工作，卽爲編纂沈禮州語，其意見與利氏不同，所以爲引起後來禮儀問題討論的導火線。一六一六年南京教案起，在華教士，盡被驅逐，及至一六二二年熹宗帝以與滿洲戰事，乃召回諸教士，謀軍事上的幫助，龍氏得與陽瑪諾 (Manuel Diaz Junior) 同至北京，仍做傳教工作，並常至山東泰安傳教，勸化受洗者甚多。年九十五因跌傷而去世，時已爲清朝，順治帝賜葬銀並致祭。

羅如望 (Jean de Rocha) 葡萄牙人，號曰懷中，一五九八年被派至韶州，後來復被派至南京，曾爲羅大素及徐光啓施洗。南京教案起，偕一中國修士邱良厚避難建昌，在建昌也曾爲一名翰林萬瑪竇全家施洗。後來從建昌至福建漳州開教，又至江蘇嘉定傳教，並建築教室一所。當南京教案時，曾與徐光啓起草奏疏，辨明沈澗之誣。熹宗召回北京，並任會督，次年(一六二三年)去世，葬杭州方井南。徐光啓聞訃，全家持服如遭父喪。

龐迪我 (Dinacio de Pantoja) 西班牙人，號順陽，一五九九年至澳門，范禮安遣往南京與利氏同工，

氏第二次入京，攜以同往。得其助力不少。曾赴近郊各村莊傳教，領洗者數十人。利氏死後，爲之奏請葬地，奉朝命改正曆書，被暴徒毆擊，幾類於死。南京教案起，卒被驅逐，甫至澳門，得疾而死。時爲一六一七年。

熊三拔 (Sabatini de Utra) 意大利人，號曰有綱。一六〇六年被派至北京，利氏令其精研中國語言。時因中國欽天監推算差錯，朝命龐迪我與熊氏共同修曆，著書推算經緯度數與日蝕結果。雖遭官吏嫉恨，却得萬曆帝的歡心，及至南京教案起，熊龐二氏同被驅至澳門。一六二〇年病歿。

李瑪諾 (Fmanuel Diaz Senior) 號曰海嶽。一五八五年至印度，一五九六年任澳門會團長，並視察韶州、南昌、南京教務。一六〇四年至北京，偕郭居靜南下，次年攜中國修士邱良厚返南昌傳教，受洗者有二百餘人，並勸化一明朝宗王全家受洗。四年後重返澳門任團長職，後又奉命視察各處教會。一六三七年會上書主教，自言居東方五十一年，任佈道長或諮議逾四十九年云云。一六三九年病歿於澳門。

費奇規 (Gaspard Ferreira) 葡萄牙人，號曰揆一。曾至北京協助利氏工作，做培植教友工作，自任講授之職，因而受洗入教者有一百四十人之多。後與陽瑪諾共管韶州教務，曾在建昌建一教堂，清兵入關，乃退還廣州傳道。

上述諸西教士，皆與利瑪竇有直接關係同時工作的人，尚有若干中國人士，在當時傳教工作上有所貢獻的，除上述之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外，如：

鍾巴相，一名銘仁，是第一個人入耶穌會的中國人，他的號叫念江，廣東新會人，諳西方語，曾任利氏舌人，

從行數年。時華人信教頗易，遭意外困難，在韶州曾受刑負枷，被驅逐後，又在杭州受杖而幽禁，隨利氏至北京後，復受第三次的禁錮，皆因其宣傳福音之故。在南京教案中受苦最多。一六二二年歿於杭州，入教凡三十二年。

黃明沙，偕鍾巴相同入耶穌會，偕傳教師入內地傳教，在南京曾說羅素入教，曾至南昌傳教，曾奉視察員之召至廣州，時正流言葡萄牙人謀反甚盛，為新入教之背教人誣告於總督，謂其為郭居靜之間諜，捕以入獄，備受苦刑，問無實據，本可釋放，不意被告詰者，復以私藏火藥，乃被囚禁，受重笞，體無完膚，次日復遭刑訊，抵獄即死，年僅三十三歲，時在一六〇六年。

游文輝字含樸，澳門人，一五九八年隨利郭二教士在南京傳道，一六〇五年得范禮安之許可，入耶穌會為修士。後隨利氏至北京，當利氏臨終時，彼曾在側。一六三〇年歿於杭州。

雷安東也是澳門人，在北京入耶穌會，常偕龐迪我傳道，近畿各村莊雖體弱多病，仍能不辭勞苦。為費奇規伴侶，迨至韶州休養，後又由韶州赴澳門，歿於舟中，時在一六一一年。

邱良厚字永修，也是澳門人，父母皆基督徒，故自幼即入教，後為副教師，偕羅如望居南昌建昌數年。一六二一年隨畢方濟 (F. Sambiasi) 至北京，為龍華民之勤勞伴侶，受其勸化而受洗者甚多，其中有會經龍氏施洗之太監龐天壽，亦為邱氏勸化之功。一六四〇年歿於北京。

鍾鳴禮，字若翰，與其父念山其兄鳴仁同在澳門入教，當其兄隨利氏赴北京時，他留居在江西南昌，後

從王豐肅於南京，遂入耶穌會，利氏既死，曾往北京會葬，在南京教案中被刑殘廢，幾瀕於死，其爲道受難如此，不意在一六二二年，被會中除名。

石宏基，亦澳門人，字厚齋，一六一二年隨郭居靜至杭州，次年隨林斐理至處州，又曾在南京絳州建昌等處傳道。

邱良稟，字完初，生於澳門，或爲邱良厚的兄弟，一六一〇年入耶穌會，在韶州修院肄業時，被拘入獄，備受苦刑，後被釋出，曾派往安南南圻，長於口才，勸化多人入教。

倪雅各，字一誠，生於日本，范禮安遣回中國工作，一六〇四年隨李瑪諾至北京，入耶穌會爲修士，居北京多年。

凡此諸人，乃利瑪竇前後中西同工中的幾個重要人物，在創造這一時期中國基督教的有力分子。此後在明末清初之間，尚有幾個重要西國教士，像葡萄牙人陽瑪諾，是在一六一一年與費奇規同至韶州。法蘭西人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一六一〇年至澳門，次年被派至南京，又工作於杭州北京等處。以及意大利人艾儒略（Jules Aleni）一六一三年被派往北京，曾至開封訪求猶太教經典，後勸化揚州某大吏信教，教名伯多祿（Preuro），因伯多祿任職陝西之故，隨赴陝西，後由陝西至山西，勸化若干人信教，赴常熟爲瞿大素之姪進士式相施洗，名公巨卿與之往還者甚多。畢方濟（Francois Sarrasin）亦意大利人，一六一三年被召至北京，南京教案起，被逐南還，山東巡撫孫元化留之居嘉定，後仇教事息，潛入北京匿居徐光啓

宅。後至上海松江開封南京各處傳教，頗爲明末隆武永曆諸帝盡力，冀挽頹運。葡萄牙人傅汛際（Fruncois Furlado Heurtado）一六一八年隨金尼閣來中國，初在嘉定，後至杭州與李之藻相隨，李之藻死後，便至陝西西安，在該處建立教堂一所。與艾儒略分主南北兩教區，南區包南京福建湖廣浙江江西兩廣，由艾氏管轄，北區包京畿山西山東陝西河南四川，由傅氏管轄。日耳曼人鄒玉函，亦與金尼閣同來，被召至北京，助熊三拔等修歷，因南京仇教事起，乃南歸，迨事平，復召西士修曆，時在北京者，僅龍華氏與鄒氏二人，乃命鄒氏主其事，迨鄒氏於一六三〇年卒，湯若望羅雅各繼續其未成之業。說到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也是日耳曼人，對於中國教會，在歐洲教士中佔重要地位；當鄒玉函卒後，朝廷召湯氏入京繼其修曆之任。中國曆官頗嫉恨之，得徐光啓以閣老地位加以庇護，故未遭意外。光啓將死，曾託其他信教大臣爲之保護。當時湯氏曾爲若干太監施洗，其中以若瑟與龐天壽爲最著名，若瑟在宮庭內傳道，宮內婦女太監及后妃因而信教者有二百餘人。滿清入關，順治帝亦甚寵眷湯氏，呼之曰瑪法（Mofa，滿洲語父也。）曾致書歐洲母會，請派會士來華，因已得皇帝自由傳教之許可。自一六五〇至一六六四年間，受洗者逾十萬人。後以楊光先反教之故，與當時同工神甫南懷仁利賴思安文思入獄，幾喪性命。其生平事蹟，可與利瑪竇相比。同時在上海經營教務的，如意大利人潘國光，後來爲南京主教的則爲南懷仁，皆天主教中的有名教師，其他不及詳舉。

在此，我們應當補述明末皇室與教會的關係。自滿清侵入北京，崇禎殉國，福王稱帝於南京，迨南京失

守，唐王稱帝於福建，號曰隆武。隆武被執，丁魁楚、瞿式耜、王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曆。永曆是萬曆之孫，在位十五年，端賴奉教，大臣 瞿式耜、龐天壽、焦璉等之力，支此殘局。永曆太后及皇后皆受洗進教，太后聖名赫肋納，皇后聖名亞納，太子亦因病受洗，聖名公斯當定。同時，宮中領洗的有五十人。太后曾遣使至澳門獻祭，並欲遣使至羅馬謁教皇，龐天壽本願自往，太后以其年高，乃改派卜彌格神父前往，於永曆四年起程，持國書二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穌會長，信中請求為中國祈禱太平，並多派教師來中國傳教。龐天壽亦備上教皇書帶往。神父在途歷二年始達羅馬，適教皇因諾增爵故世，乃謁新教皇亞立山大第七，得教皇回書，及回中國，太后已死。永曆帝卒不能復興明室，與太子共殉國於雲南，其皇后及宮女等均送至北京，居於別宮，不能得見神父，只有幾個女教友，時常去安慰她們罷了！

第九章 南京教難的始末

佛教歷史上言佛教在中國遭遇的教難，共有四次，即所謂「三武一宗」之厄。而基督教在中國所遭到的教難，也有四次：第一次爲一六一六年的南京教案，是由南京禮部侍郎沈灌所主動的；第二次爲一六五九年的欽天監教案，是由北京欽天監楊光先所主動的；第三次則爲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役，是由剛毅、賢等所主動的；第四次則爲一九二二年的非教同盟，是由學生們主動的。前三者出發於排外思想，演成流血慘劇；後者出發於科學思想，旨在破除迷信。茲爲便於敘述起見，依時代的先後，述說於后。

查基督教自輸入中國以來，所遭受的教難，固不是一六一六年纔有的。一般傳教士受着當地人民的排擊，甚至爲衆毆辱或搗毀寓所，時有所聞。亦有爲官廳拘捕，囚禁或驅逐出境，尤屬不一而足。單從明朝講，據曾德昭（Alvarez de Somoedo）神甫的調查說：

「傳教師等所經危難之多，幾出人意料之外。我曾調查南京仇教以前教案之數，共有五十四案。要以傳教初年發生於廣東者爲多。」

不過這些教案，大概屬於地方事件，由於少數捕風捉影的流言而起，一經說明，即告平息。教士們原本耶穌犧牲精神，固求息事寧人，雅不欲使事端擴大，稀結惡感，雖曾受物質損失，身體痛苦，亦惟抱「犯而不校」精神，泰然處之而已。但是後來往往有因一教士之犧牲，造成國際上不良結果的，實非教會本意，乃出

於政治力量的借端擴張，教會本身亦屬無可如何的。不過教會既來自西方，負主持和宣傳之責的，又爲歐洲人士，習慣不同，種族不同，在稟有數千年特殊優越文化的中華民族眼中，自難免有杆格歧視之處。『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中國儒者幾千年來傳統的態度。所以當時用文字來攻擊基督教的，不一而足，最有力量，莫如黃真的不忍不言，破邪集，請開天主教書，以及王朝式的罪言，鍾始聲的天學初微，再微，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啓陸的誅夷論，許大受的聖朝，佐開，李生光的儒教正，陳侯光的辯學芻言……等等。黃真是一個儒家而信佛的，他自稱爲天香居士，白衣弟子，他的非教理由，以佛教爲立場，他說：

『佛道至高，以攝九十六外道之法攝之，免其惑世誣民，毋以十字刑枷，置祖宗神祇之上。』

他上書給他的老師顏茂猷舉天主教的可患可憤者五條，請他著論闢之。在他的破邪集中，收羅了許多非教的文章，如張廣瀟的證妄後說，中間有『西人誣妄先師』的話，鄒維璉的開邪管見錄，中間有『許多非教，左道惑人』的話，還有個和尚叫普潤的誅左集，緣起中間有『斬祖先之祀，亂乘藉之倫，於是集編素之文，以誅左道』的話，因爲他也收集了許多文章，編成誅左集，原欲鼓起佛教徒的聯合陣線，向基督教進攻，所以引出許多和尚的作品，除普潤自己的作品外，有密雲的辨天三說，樓宏的天說，圓悟的辯天說，通容的原道關邪說，如純的天學初關……等等。總他們這些文字的大意，大概以破壞中國倫常爲骨幹，以陰謀不軌爲罪狀，所以會引起許多同情的人。但是這些攻擊，還不過是筆墨上的空論，不足以影響到基督教的進行，信仰或贊同基督教的，還是大有其人，像葉向高，李卓吾，李日華，池顯方，沈光裕等名相學者，往往見

之於詩文葉向高踞西國諸子詩盛稱其教理的宏深中有

「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游，冷然得深旨。」

沈光裕聽湯若望講經，賦詩誌感。又有錢路加的贈湯道末先生長詩，與趙懷玉的遊天主堂卽事長詩，皆贊羨教士的道德與教道的精微。不過從反對而見之於行動的，要算一六一六年的南京仇教案。這時距利瑪竇之死，只有六年，當利氏在世之時，深得朝廷歡心，鑑於教會勢力的日愈擴大，反對的人，雖懷仇恨，奈無可乘機會。至是則認爲領袖既逝，教會瓦解，不難一網打盡，於是有沈灌的奏參，引起大獄。沈灌是浙江吳興人，以禮部侍郎署南京禮部尚書之職，據說他與基督教徒有宿怨，這時又受了和尚的賄，決意要驅逐傳教士，所以在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八月及十二月連上三張奏疏，參劾教士，他的奏參標題，是說：

「遠夷闖入都門，暗傷王化。」

他所說的王化，就是儒教文化，從他所說的：

「職聞帝王之御世也，本儒術以定紀綱，持紀綱以明賞罰，使民日改惡勸善，而不爲異物所遷焉。」

說：就可以知道他是以儒教爲立場，而加以排斥的。所舉出的重要理由：一爲治曆問題，一爲祭祖問題。他這樣

「從來治曆，必本於言天。言天者必有定體，堯典敬授人時，始於寅賓黃儀……月之晦朔弦望，視日之遠近，而星之東南西北，與日之短永中相應。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解之者以天體之運有恆，而七

政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則未聞有七政而可各自爲一天者。今彼夷立說，乃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爲一天。……其爲誕妄不經，惑世誣民甚矣。」

這樣駁斥教士們治曆之謬，還是從學識方面加以攻擊，欲推翻朝廷對教士治曆的信任。當然的，以尙書堯典舜典爲根據；現在看來，是毫無學理上的價值的。至於對祭祀祖宗問題，當時很可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意，因爲中國幾千年祭祖的習慣，認爲是儒家教孝的要道，一般反對基督教的理論中，都以這點爲重要理由。所以他的奏疏中有：

「臣又聞其誑惑小民，輒曰：祖宗不必祭祀，……今彼直勸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由前言之，是率天下而無君臣，由後言之，是率天下而無父子。何物醜類，造此矯誣！蓋儒術之大賊，聖世所必誅。」

在他看來，這種破壞中國儒家文化的大罪狀，是決不可以容忍的。但這理由是尙不足定教士們不赦之罪，所以他又舉出一個莫須有的理由，說他們有圖謀不軌之意，在第一疏中，還說得比較隱約，只說：

「聞其廣有賈財，量人而與，是以貪愚之徒，有所利而信之，此其心懷巨測……」

「現今兩京各省有幾處屯聚，既稱去中國八萬里，其賈財源源而來，是何人爲之津送。」

他又引歷史故事，以證天主教之施與，實爲收買人心，若不早爲之防，恐貽將來莫大之禍。這一層最易聳動朝廷，然而疏上之後，毫無影響。只是因爲他的奏疏中有「卽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等語，便引出徐光啓的答辯，在七月間亦上了一張辨學章疏，開端卽說：

「臣見邸報，南京禮部參西洋陪臣龐迪我等，內言其說浸淫人心，卽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一云妄爲星官之言，士人亦墮其雲霧。曰士君子，曰士人，部臣恐根株連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信向之者臣也，與言星官者臣也，諸陪臣果應得罪，臣豈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

他這樣勇敢地承認自己是基督教信徒，並且證明這些教士，都是有德有學的人，他們到中國來無非是勸人爲善，絕無陰謀。進一層說到他們所傳之道，不但高出佛道二教，而且與儒教道德相符合，希望朝廷能本容納佛回之例，容納他們。末則舉試驗之法三，處置之法三，以斷其是非。所謂試驗之法：一將該教經典譯出，是否是邪說左道？二召集有名僧道，互相辯駁，定其是非。三將該教已譯諸書及其教中大意，略述成書，以供參證。所謂處置之法：一供其費用，不必收取外國捐款。二令本地人士聯保具結，以察其有無不端行爲。三調查信教者有無過犯。這張奏章，得到御批「知道了」三字，把沈淮的奏章攔了起來。但是沈淮怎肯從此干休，一方面他便逮捕信教的華人，一方面又上第二疏，再從「陰謀不軌」的一層，說得格外懇切。說道：

「裔夷窺伺，潛住兩京，則國家之隱憂當杜也。」

所舉理由：一曰：「豐肅神姦，公然潛住正陽門裏，洪武岡之西，起蓋無樑殿。」二曰：「城內住房既據洪武岡，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園一所，正在孝陵衛之前，狡夷伏藏於此，意欲何爲？」三曰：「從其教者，每人與銀三兩，盡寫其家人口生年月日，云有咒術，後有呼召，不約而至。」四曰：「每月自朔望外，又有房虛星昂四日爲會期，每會少則五十人，多則二百人。」尤有一要點，說：「七月初纔有邸報，而彼夷卽於七月初旬具揭，及二

十一日已有番書訂寄揭稿在王豐肅處矣。橫弄線索於其間，神速若此，又將何爲乎？這明明把反叛的罪名，加在教士身上，所以說「一朝竊發，患豈及闔。」請求朝廷，速即處分。一面他已迫不及待，逮捕了十三人，說：「同居徒衆，妄稱天主教，煽惑人民，現在本所搜獲者，一十三名，一面行提鞫審。」疏上之後，仍無影響，故又於十二月上第三疏，重申第二疏中的意義，說「伏戎於莽，爲患巨測。」且以開闢海士之言，說他們曾借天主教名義，襲奪呂宋國土爲證，一面陳說已捕鍾鳴禮等的審詢情形。當時萬曆皇帝雖不相信他的話，但經不起那些仇教人的一再陳訴，結果，便有放逐教士出國的明諭。時王豐肅（後改名爲高一志）與謝務祿（Comedo，後改名爲曾德昭）雖明知其事，並不害怕逃避，仍舊守在居宅之中，等待吏役的來臨。果然吏役來了，把持他們的門，清查他們的財產，將他們逮捕，只因謝務祿正在患病，所以把他關閉在一間房中，單將王豐肅昇至沈淮地方，囚諸獄中，後來經過幾次鞫訊，受着許多痛苦。據王氏後來自述，當審訊之時，「有足踢者，有拳擊者，有批頰者，其勢之來，有同暴風雨；有椎擊者，近類波浪；有唾吾人之面者，有拔吾人之毛髮者；挫辱至甚，未能畢書。」並且受杖，惟謝氏因病得免杖責。最後把他們押解出境，房屋器具書籍，均被沒收。我們一讀當時南京禮部會審記錄，可以見得當時兩教士的受苦情形。

「會審得王豐肅面紅白，眉白長，眼深，鼻尖，鬚鬚黃色。供稱年五十，大西洋人，幼讀夷書，繇文考理考道考得中多耳篤（Doctor，即今稱博士）即中國進士也，不願爲官，只願結會，與林斐理（Pelicion de Silva）等講明天主教。約年三十歲時，奉會長格老的惡（Claude Aquaviva）之命，同林斐理陽瑪諾

三人用大海船在海中行走二年四個月，於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七月內前到廣東廣州府香山縣香山澳中，約有五月，比陽瑪諾留住澳中，是豐肅同林斐理前至韶州住幾日，又到江西南昌府住四月，於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內前到南京西營街居住。先十年前利瑪竇要得進京貢獻，寄書澳中，到王豐肅處，索取方物進獻，是豐肅攜自鳴鐘、玻璃鏡等物前來，此時利瑪竇先已進京，隨將方物等件寄進京貢獻。此時羅儒望將傢伙交與王豐肅，遂在此建立天主堂，聚徒講教，約二百餘人。每遇房虛昴星日一會，寅聚辰散，月以爲常，並未他往。其林斐理於四十一年六月內病故，其屍棺現停天主堂內。其陽瑪諾向住澳中，亦於先年移住南雄府，約有幾月，前到南京，與豐肅同住兩年，又往北京，三年仍復回南住，於四十三年十二月內，又往南雄居住，並未回還本國。一向豐肅所用錢糧，自西洋國商船帶至澳中，約有六百兩，若欲蓋房，便增至千金，每年一次，是各處分教龐迪我等分用等語。」

這一段記錄，正可以當作王豐肅教士傳教的歷史看，繼着又記審訊謝務祿情形。將他們移解到都察院，有「轉行巡城衙門，遵旨速差員役，遞送至廣東巡撫衙門，督令西歸。」這是萬曆四十五年二月裏的事，再從其移都察院咨文裏，又可以看見二種情形，第一，他們所認爲王豐肅的罪狀，大旨與沈淮參奏中相同，說：

「豐肅數年以來，深居簡出，寡交游，未足啓人之疑，邇來則大謬大然，私置花園於孝陵衛，廣集徒衆於洪武岡……迫人盡去家堂之神，令人惟懸天主之像……」

其次，則見得當時參奏的人，固不僅沈淮一人，但是廷旨却遲遲不下，其言曰：

「今又有倡爲天主教，若北有龐迪我等，南有王豐肅等，其似附於儒，其說實異乎正。以故南北禮卿參之，北科道參之，而兩卿寺等巡視等衙門，各有論疏也；今一概留中而不下……南禮臣特疏參之而不報，南府部臺省合疏參之而不報，北科道諸臣暨本部參之亦不報，故南科臣晏文輝又有速賜處分之請也。」

直至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日本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何宗彥等具題，二十八日奉聖旨：「這奏內遠夷王豐肅等，立教惑衆，蓄謀巨測，爾部移咨南京禮部行文，各該衙門速差員投遞送廣東撫按，督令西歸以靜地方。其龐迪我等，去歲爾等各言曉知曆法，請與各官推演七政，且係向化來京，亦令歸還本國。」

遞送教士出國的朝旨下來以後，沈淮等仇教派便佔了上風。在華西教士與中國信徒，大有風聲鶴唳，到處荆棘的情形，西教士中，有些被解到澳門，有些避匿在內地教友家中，教會財產，都被沒收，傳教工作，不能公開活動。王豐肅會述說他當時遞解的痛苦：

「將我輩囚置於一狹小之木籠中，項手帶鍊，髮長，衣服不整，視我輩爲外來蠻夷。一六一七年四月三十日如是囚置，從獄中提至法堂，加貼封條。三桌前導，上陳上諭，禁止一切華人與我輩交通。如是離南京，囚處木籠三十日，抵於廣東省之第一城，數日後抵澳門。書籍儀器之具皆被沒收，教堂居室皆被拆

毀，而以材料供其他建築之用。」

先是中國信徒的被捕審訊，備受痛苦的，從南宮署中看見有會審鍾鳴禮與鍾鳴仁兩案。鍾鳴仁號叫念江，鍾鳴禮號叫若翰，是同胞兄弟，父親名叫念山，廣東新會人，父子同在澳門進教，鳴仁跟隨利瑪竇進入內地，充翻譯之職，在韶州會遭官廳逮捕，並驅逐出境。後在杭州又遭士人告發，杖而囚禁，賴利氏營救得釋。遂隨利氏至北京，以其傳佈福音之故，又遭禁錮。一六一五半在南京被捕，幾次審訊，受種種苦刑與侮辱。經刑部定罪，罰往關外爲奴。據說當時有一康姓基督徒名 Mathhion Cham 的，願意代他出關受罪，卒因朝中一新入教的大官援救，乃得免罪。鍾鳴仁後在一六二二年病死於杭州。在禮部審查的供詞中有：

「……已亥年隨利瑪竇進貢，在北京七八年，方來南京住三年，又往浙江一年。舊歲五月間，仍來天堂中，爲王豐肅招引徒衆。若婦人從教者，不便登堂，令仁竟詣本家，與婦淋水宣呪；大約淋過婦女十五六名。」

從此見得他也受傳教之職，可以爲婦女們施洗。他的兄弟鍾鳴禮，自入教後，即在澳門教會中服務，後來也跟着西教士進入內地。當其兄跟利氏到北京去的時候，他便留居在南昌。一六〇五年從王豐肅於南京，一六一〇年利氏去世，便與其兄會葬北京，葬事既畢，仍回南京，幫助傳教事務，爲有志入教的人，講解教義。會往杭州與郭居靜會談，得知王謝二教士與兄俱被拘捕，即回南京，見天主堂已封，即往訪教友王甫，余成元，知王甫亦已被捕，只余成元在家，見張案，持着北京寄來揭帖一封，即雇得刻字匠潘明潘華等刻印，將徧送

各機關，以圖解救被拘的人。方在裝訂之時，即遭拘捕。兩次受杖，囚入獄中，後經沈淮提訊，又遭毒打，受創甚重。後罰在南京執掌船役，經同教人醜金贖他出來，但他的身體已經殘廢了。當他被捕時，曾說：「平日受天主大恩，無以報答，今日就拿也不怕。」可見他的犧牲精神。

在沈淮的第二奏疏中，說「搜獲者十三人」，但在這兩案審訊的記錄，鍾鳴禮案則有八人，鍾鳴仁案則成年十一人，幼童五人。可見當時逮捕的人，必不止僅僅審訊案中的十餘人，其中有非基督徒而牽連在內的。這些被捕的人中，都能守道不變，忍受痛苦。結果，有定罪而流徙的，也有被釋的，本來照明朝法律，左道惑眾，為首的要處絞刑，從犯須杖一百，流三千里。他們以為這班教徒，不單是有上述的罪狀，又加以勾結夷人，通敵嫌疑，都應當處以死罪。但他們還以為是法外施仁，從輕發落，沒有一個判定死刑的。茲將被難人名表列於下：

南京教難人名表一

姓名	年歲	籍貫	職業	進教緣由	判案結果
鍾鳴禮	三四	廣東新會	修士	其父入教	送法司定罪
張案	二二	山西曲沃	推水	因同鄉稱說	同上
余成元	二九	南京衛 原籍江西	種園	因表叔曹秀勸	同上

南京教難人名表二

王甫	三一	浙江烏程	看園	因余成元勸	遞解回籍
蔡思命	二一	廣東新會	書童	投王豐肅家	同上
游祿	五三	江西南昌	髡頭	因羅儒望勸	同上
姚如望	六一	福建莆田	挑脚		同上
曹秀	四〇	江西南昌	結帽	因妻疾祈福	同上
鍾鳴仁	五五	廣東新會	修士	其父入教	送刑部定罪
姓名	年歲	籍貫	職業	進教緣由	判案結果
吳南	二四	羽林衛	印刷	未入教	同上
周用	六八	江西東鄉	印刷	因王豐肅勸	釋放
夏玉	三三	南京衛	賣糕	因曹秀勸	同上
湯洪	三二	上元	未詳	其兄弟皆入教	同上
方政	三二	安徽歙縣	描金	其叔入教	同上

張元	三二	江西瑞州	結帽	因仰慕王豐肅	發縣看管
王文	三〇	江西湖口	補網	因姐夫曹秀勸	釋放
劉二	三九	江西都康	木匠	因王豐肅勸	同上
周可斗	二七	江西湖口	結帽		同上
王玉明	二九	福建邵武	煮飯		同上
三部	一五	上海	孤兒	由祖父送入天主堂	遞解回籍
仁兒	一四	直隸保定		由父賣與龐迪我	發僧錄收養
龍兒	一四	直隸漆水	孤兒	由伯父賣與龐迪我	同上
本多	一四	廣東東莞	父當軍		交伊父領回
熊良	一四	江西南昌	父木匠		同上

據 *Semedo, Histoire* 裏，記着當時基督徒在教難中的精神，並有若干死難的人，他這樣地記着：

「當此時間，諸教徒之表示，皆無愧於其神甫，無謀自救或輕其縲絏而自辯無罪者。有數人且欣然受拷訊，惟願為信仰而受苦刑，惟恐不能殉教而死……中有二人被瘦死。1名 *Pierre Hila*，南京人，年

二十二歲，人教已五年，德行素著。是爲宗教而死於獄中之第一人。次名 *Guillaume Vom*，已婚，服役於神甫所，死時較後。又有一教徒名姚如望，好學深思，曾製四旗，上書其姓名籍貫職業，以一旗插頭上，被捕後，口稱願爲天主死。尚有軍官二人：一名 *Jeanee Tsan*，一名 *Lue Tchang*；鐵工一人，名 *Anore Hior*；教授諸神甫華語者一人，名 *Philippe Sin*。其人因此被奪功名。（*頁一八至三三頁*）

可惜這裏所記的幾個人，沒有中文姓名，只有姚如望與上表中所有姚如望，或者就是一個人。關於這一次教難的材料，雖不十分充分，但是這次對教會的壓迫，我們可以由此知道相當的利害，教會便因此而陷於停頓了。

第十章 天主教在文化上的貢獻

誰都承認中國固有的文化，向來專注重在形而上方面的；初期天主教教士們，他們在宣揚基督教道之外，並介紹西洋的科學進來，基督教便做了中西文化接觸的介紹人。很顯然的事實，自中西文化接觸以後，不但使固有的倫理思想，發生了變化，同時也感覺到物質文明的落後，有迎頭接受科學的必要。安當習素的中國，將一變而為革命進取的中國，推本溯源，天主教教士的介紹功勳，是不容抹煞的。現在先把那些耶穌會士的著述，作一個概括的介紹，然後來看一看從他們的著作所發生的影響。

在清初的時候，曾有韓霖、張廣著過聖教信證一書，其附錄則歷敘當時教士們的著作。繼有費賴之（Louis Pfister）以十餘年的收集，編纂耶穌會士之傳記及書錄一書，自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五年撰成於上海。其自序中有云：

「吾人現在刊行之書，並非完全新作。先有進士韓霖、張廣二人，曾用漢文撰有聖教信證。序題順治丁亥，適當西曆之一六四七年。其書之旨趣，乃在證明基督教之真實，而傳教者之離其祖國，並非為欺騙華人而來也。……吾人之目的，即在盡吾人之所能，補足此種缺陷，遺者補之，闕者續之，止於舊耶穌會最後會士之死，而於各人之傳記書錄，務求完備。」

其書中所輯錄的教士傳記，約有五百人，中有華籍者七十人，篇帙之巨大，殆數倍於韓張氏所作。茲經

馮承鈞氏節譯爲漢文；當時比較著名的教士，其著作與重要事跡，略具梗概。

費書原序中，把當時諸傳教士的事業，分爲三個時代：

『第一時代，始一五八〇年，終一六七二年，約一世紀間，爲不少漢文著述撰刻之時代。在此開始時代，必須駁斥偶像崇拜，說明真正教旨……願欲得君主之保護，須用學術方法而獲取之。由是最初傳教師撰有數學，天文，物理之書甚多，與所撰關於宗教及辯論之書相等，或且過之。』

『第二時代，始一六七二年，終雍正（一七三〇）初年，是爲北京及諸行省法國傳教會產生發展之時代。中國禮儀問題在是時辯爭甚烈，時常超過限度，後在本篤十四世（Benoit XIV）時始完全解決。此種刺激問題曾發生有不少文字；傳教信札即在此時代開始刊布……科學在是時仍在培植。』

此後則爲第三時代，這時代教會在蒙難犧牲之中，而非撰述的時代了。換言之，即在一五八〇年至一七三六年之間，大約一百五十年，天主教教士大都努力於著述，此種著述的影響中國文化，實在非常之大，且略舉之：

開著述之先的，要算羅明堅，他在一五八四年所著成的聖教實錄，是歐洲人以華文寫成的第一部，敘述基督教的綱要。

著述更多的，便是利瑪竇，有二十餘種，大半都用華文寫成的。如（一）天主實義，一名天學實義，共二卷。一五九五年初刻於南昌，一六〇一年重刻於北京，又重刻於杭州，一六三〇年後屢有刻本，有若干刻本前

有李之藻徐光啓馮應京等序文(二)交友論一卷一五九五年刻於南昌一五九九年刻於南京一六〇三年刻於北京前有馮應京序文(三)西國記法一卷一五九五年刻於南昌(四)二十五言一卷一六〇四年刻於北京前有馮應京徐光啓序文(五)畸人十篇二卷一六〇八年刻於北京一六〇九年刻於南京及南昌一八四七年上海有重刻本。是書設爲問答，大抵駁釋氏之說。(六)辯學遺牘一卷一六〇九年刻於北京，有李之藻跋。因畸人十篇引起杭州僧人德因作論以攻天主教，利氏復作說闢之而成此書。一九一五年天津大公報有活字版本，一九一九年有莫斂之刻本，前有陳垣馬相伯序。(七)西琴八曲一卷，以利氏獻品中有小琴，應迪我善音樂，以授中官，乃成此書，附刻於畸人十篇之後。(八)齋旨一卷，後附司鐸化人九要一篇。(九)畸人十規，是利氏在一五八四年刻於肇慶的第一部教義綱領。(十)奏疏，是爲一六〇一年利氏入教進貢物品請許留居北京的奏章。(十一)幾何原本六卷，徐光啓筆述，是譯自歐几里得(Euclid)的西文的，一六〇五年刻於北京，前有利徐二氏序文。康熙帝命轉譯爲滿文，同治四年兩江總督曾國藩重刻於南京並作序。歐几里得原書凡十五卷，利氏僅譯前六卷，後由偉烈亞力與李善蘭合譯後九卷，一八五七年刻於松江，板在太平天國時焚燬，後重刻於南京。(十二)同文指算十一卷，李之藻筆述，是應用的算術，一六一四年刻於北京，著錄於四庫全書之中。(十三)測量法義一卷，是應用的幾何，又測量異同一卷，皆是徐光啓所筆述。(十四)勾股義一卷。(十五)圓容較義一卷，李之藻筆述，一六一四年刻於北京。(十六)渾蓋通憲圖說二卷，李之藻筆述，一六〇七年刻於北京。經天該一卷，爲星經之類，亦李之藻筆述，一六〇一年刻於北京。

一八〇〇年有重刻本(十七)。萬國輿圖，一五八四年作於肇慶，一五九八年重刻於南京。一六〇九年帝命仿繪八幅。按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亞傳云：「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輿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十八) 西字奇跡一卷，一六〇五年北京刻本(十九)。乾坤體義二卷，著錄於四庫全書之中。此外尚有許多信札，經後人輯錄而成書的，又有好幾種。

郭居靜曾與利瑪竇合撰普韻字典，並自著有靈性詣主與悔罪要旨各一卷。

蘇如望著有天主教約言，一六〇一年初刻於韶州，並撰十誠一書。

龍華民遺著有聖教日課，死說，念珠默想規程各一卷，聖人禱文，聖母德敍禱文，急救事宜，聖若瑟法行實，地震解，靈魂道體說等。又有答客難十條一卷，乃與儒士辯駁天堂地獄童貞等問題，一六四二年刻於定州。此外有若干稟帖信札，經後人輯錄而成的幾種。

羅如望著有天主教啓蒙，天主聖像略說二書。

龐迪我遺著有七克大全七卷，一六一四年刻於北京，收入四庫全書。人類原始，天神魔鬼說，受難始末各一卷，龐子遺證二卷，又有實義續編一卷，乃利瑪竇的天主實義而作。辨揭一卷，乃對於仇教時所上的辯論。又曾爲中國皇帝繪四大洲地圖，每洲一幅，附以說明。

高一志（即王豐肅）著有：（一）聖教解略二卷，一六二六年初刻於絳州。一九一四年重刻於土山灣。（二）聖母行實三卷，一六三一年刻於絳州。（三）天主聖教聖人行實七卷，一六二九年刻於絳州，後在一八八八年土山灣重刻第一卷，題曰宗徒列傳，編入道原精粹第七冊中而成爲八冊。（四）末論四卷。（五）終末之記甚利於精修，凡六頁，一六七五年刻於北京。（六）則聖十篇一卷，一六二六年後刻於福州。（七）十慰一卷，刻於絳州。（八）勵學古言一卷。（九）西學修身十卷，一六三〇年刻於絳州。（十）西學治平四卷，一名治西學。（十一）西學齊家五卷。（十二）童幼教育二卷。（十三）寰宇始末二卷。（十四）斐錄彙答二卷。（斐錄即 *Philosophy* 今稱哲學）（十五）醫學醫語二卷。（十六）神鬼正紀四卷。（十七）空際格致二卷。（十八）達道紀言一卷。別有推驗正道論一卷，未置撰人名，馮承鈞謂屬高一志著。尚有若干信札，記述南京教案情形。

熊三拔遺作有泰西水法六卷，前五卷言水法，第六卷爲諸器之圖式，一六一二年初刻於北京。後一六四〇年徐光啓奉敕撰農政全書六十卷，曾將此本採入。簡平儀說一卷，一六一一年刻於北京，前有徐光啓序。表度說一卷。三書皆收入四庫全書。據白篤利（*Bates*）神父說熊氏曾與徐光啓、李之藻共譯關於行星說書籍數種。又據畢嘉（*Garland*）神父謂熊氏曾撰有上帝說，寫以漢文，題年一六一四，撰於北京；熊氏以爲上帝之稱不足代表眞主，立說與龍華民相同。

陽瑪諾著有：（一）聖經直解，一六三六年北京刻本十四卷，一六四二年一七九〇年北京刻本八卷，一八六六年土山灣重刻本八卷，一九一五年刻本二卷。十九世紀初寧波亦有刻本。別有官話節譯本，題曰聖

經淺解。(二)天主聖教十誡直詮二卷。(三)代疑編一卷，一六二二年北京刻本，似出楊廷筠手筆，楊氏並撰有代疑續編。(四)景教碑註一卷。(五)聖若瑟行實一卷。(六)聖若瑟禱文。(七)天主禱文。(八)輕世全書二卷。(九)默想書考。(十)避罪指南一卷。(十一)天門略一卷，尚有天學舉要與補珍日課及受難記諸書。

金尼閣著有推曆年曆禮法一卷，西儒耳目資三卷，况義一卷，及基督教遠被中國記，宗徒禱文等書。

畢方濟著有靈言靈勺二卷，睡答，畫答等書。

艾儒略著有(一)天主降生言行記略八卷，一六四二年北京刻本，後幾次重刻。(二)聖像經解一卷，即前書初刻本的附圖。(三)天主降生引義二卷。(四)彌撒祭義二卷。(五)懺罪正規四卷。(六)悔罪要旨一卷。(七)萬有真原一卷。(八)三山論學記一卷，與葉向高論學之篇，初刻於福州，一九二三年土山灣重刻本，前有蘇茂相段斐二序，段序有三山論學書，艾先生既刻於閩，余何爲又刻于絳，從余兄九章命也等語。(按九章名袁絳州人，尚有弟名辰，皆奉天主教)。(九)聖夢歌亦題性靈篇一卷。(十)利瑪竇行實亦題大西利先生行跡一卷。(十一)張彌克遺跡一卷。彌克，張廣子，名識字見伯。(十二)楊淇園行略一卷。(淇園乃楊廷筠別號)。(十三)熙朝崇正集四卷，編輯天主教之文字，若章疏序跋之類，福州刻本。(十四)五十言一卷，卷首有張廣序，題作五十言餘，刻於福州。(十五)聖體要理一卷。(十六)耶穌聖體禱文。(十七)四字經一卷。(十八)性學簡述八卷。(十九)玫瑰十五端圖像。(廿)景教碑頌註解。(廿一)西學凡一卷。(廿二)幾何要法四卷。(廿三)西方答問二卷。(廿四)職方外紀六卷，前有李之藻、楊廷筠、瞿式穀等序文，先是利瑪竇進萬國圖，龐

迪我熊三拔奉命撰爲圖說，迪我卒，艾氏增補以成此書。此外有一六一二年十一月八日日蝕之觀測等書。

鄧玉函著有：(一)崇禎曆書一百卷，康熙時乃改名西洋曆法新書，四庫全書總目改題曰新法算書，而以屬徐光啓李之藻李天經龍華民鄧玉函羅雅各湯若望等，阮元疇人傳，以屬湯若望，其實諸人皆與其事。全書分三編：首西洋天文學理，次行星，恆星，日月蝕諸說，與夫測算之方法，次便利測算諸表。(二)人身說概二卷，首有東萊畢拱辰序，稱譯於武林李太僕家。李太僕卽之藻，是玉函此書之作，當在居杭州時。(三)奇器圖說三卷，玉函口授，王徵筆述。一六二七年北京刻本。(四)大測二卷。(五)測天約說二卷。(六)正球升度表一卷。(七)黃赤距度表一卷。(八)渾蓋通憲圖說三卷。

傅汎際著有：寶有詮六卷，名理探十卷（卽論理學），二書皆爲李之藻所筆述，刻於杭州。

費樂德著有：聖教源流四卷，總讀念經二卷，念經勸一卷。

湯若望著有：(一)進呈書像，是篇乃進呈天主事蹟圖與慕閣王朝親像的說明書。(二)主制羣徵二卷，一六二九年初刻於絳州。(三)主教緣起四卷，一六四三年刻於北京。(四)真福訓證一卷，解釋聖經八福之義。(五)渾天儀說五卷。(六)古今交食考一卷，一六三三年刻於北京。(七)西洋測日曆一卷，一六四五年奉阿瑪王所修之日曆，清廷得之甚喜，以之頒行全國。(八)學曆小辯一卷。(九)民曆補註解惑一卷，一六八三年南懷仁刻於北京。(十)新曆曉惑一卷。(十一)大測二卷。(十二)遠鏡說一卷，一六三〇年刻於北京。(十三)星圖。(十四)恆星曆指四卷。(十五)恆星出沒二卷。(十六)恆星表五卷。(十七)交食曆指七卷。(十八)

交食表(十九)測食說二卷(廿)共譯各圖八線表(廿一)測天約說二卷(廿二)奏疏四卷(廿三)新法曆引一卷(廿四)新法表異二卷(廿五)曆法西傳(廿六)赤道南北兩動星圖(廿七)西洋新法曆書三十六卷與徐光啓羅雅各等合撰。其子目有日躔表、月離表、交食表、五緯表、原鏡目、五緯表等。此外有崇一堂日記、隨筆、艾儒略四字經要略、則克錄以及其他書札。

伏若望著有助善終經、苦難禱天、五傷經規等書。

羅雅各著有齋克二卷、哀矜行誼二卷、聖記百言一卷、天主經解、聖母經解一卷、求說一卷、同歲警言一卷、測量全義十卷、比例規解一卷、五緯表十卷、五緯曆指九卷、月離曆指四卷、月離表四卷、日躔曆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黃赤正球一卷、籌算一卷、曆引一卷、日躔考、晝夜刻分等書。

郭納爵著有老人妙處、教要、原染虧益、上下二卷、身後編、上下二卷等書。

孟儒望著有辯敬錄、照迷鏡、天學略義等書。

利類思著有超性學要四卷、天神五卷、六日工一卷、萬物原始一卷、天主體性六卷、三位一體三卷、靈魂一卷、首人受造四卷、主教要旨、不得已辨、昭事經典、司鐸典要、七聖事禮典、司鐸課典、聖教簡要、正教約、徽獅子說、進呈騰論等書。

潘國光著有聖禮規儀、十誠勸論、天神會課、聖教四規、未來辯論、天階等書。
衛匡國著有靈性理證、逮友論。

植應理著有百問答，永年曆禮單，聖玻而日亞行實，四末真論，聖若瑟禱文，周歲聖人行路，魯日滿著有問世編，聖教要理。

殷鐸澤著有耶穌會例，西文四書直解三卷。

南懷仁著有儀像志四卷，儀像圖二卷，測驗紀略一卷，驗氣說，坤輿圖說二卷，熙朝定案二卷，曆法不得已辨一卷，坤輿全圖，教要序論一卷，康熙永年曆法三十二卷，告解原義一卷，聖體答疑一卷，赤道南北星圖，簡平規，總星圖等書。

陸安德著有真福直指，聖教略說，聖教問答，萬民四末圖，默想大全，聖教撮言，聖教西理，默想規矩，善生福終正路等書。

上列根據韓霖、張廣所輯聖教信證附錄，與費賴之耶穌會士列傳，舉其重要者略為介紹，以證初期天主教教士努力於著述，六七十年間，數量不可謂不多，半為發明教義，半為介紹科學。於中國人民的生活習慣思想觀念上，不無重大的影響。最顯著的，如破除迷信，排斥偶像，足以引起中國人民生活習慣上的不安，間接影響到固有的倫理思想。尤其在科學方面，至少放大了中國人對世界的眼光，從萬國地圖知道世界之大，與向來所想像者不同。影響最大的，莫如在天文曆算方面，從利瑪竇譯著幾何原本，同文指算，勾股義等以後，要以龍華民、熊三拔、艾儒略、鄧玉函、湯若望、羅雅各等的貢獻為最大，他們對於這方面都有若干著作，足以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得參與修曆的工作。

自南京教難發生之後，一時教士們本不能在中國內地立足，只因精通曆算之故，方得重回中國，恢復其地位。先是在崇禎時欽天監因推算日月食，屢有錯誤，乃受皇帝的譴責。徐光啓李之藻便乘機進言：

「本朝欽天監，惟依舊法推算，舊法疎闊，元朝時已屢屢錯誤，無怪今日之失驗。惟西法精密，悉合天象，歷試不爽。昔年天學臣利瑪竇最稱博洽，其學未傳，邊嬰疾棄世，至今士論惜之。今尙有其徒鄧玉函、龍華民等，居住賜宇，精通曆法天文，宜及時召用，飭令修改。」

皇帝照准，命徐光啓爲監督，李之藻爲副，設曆局於京師。『首善書院』又召西洋教士湯若望、羅雅各、偕同、鄧玉函、龍華民等譯書修曆，從此教士們又得寄居京師，其他散居各省之傳教士，亦得所庇蔭。後來徐光啓因病疏請辭職，乃薦李天經代管曆局。徐光啓既去世，湯若望獨得皇帝寵眷。因聞湯若望不但精通天文，且長於製造，並令鑄炮製械。先鑄成銅炮二十尊，帝派大臣驗放，果然精利可用，令更鑄大炮五十尊，並賜『欽褒天學』匾額，懸掛天主堂中。於是湯羅龍三教士得出入禁中，與太監等往來，乘機宣傳教道，漸感化太監龐天壽、薄樂德以及嬪妃宮女等進教者數十人，禁內設立教堂二所，屢次舉行彌撒，十餘年中，禁中信教者達五百四十人之多。湯若望又會上疏勸皇帝信教，事雖未成，而崇禎帝鑑於國家多難，常默禱上帝，並毀宮中金銀佛像以充軍餉，可見崇禎帝對於救道，亦頗具信仰，惜乎爲時不久，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攻入京師，崇禎自縊。吳三桂借兵滿州，清兵遂得入關。當此劇變之時，教會未遭大害，端賴湯若望等維持，但清兵既入北京，飭內城一切人士，限三日內遷至外城，以內城將專爲旗人所居的緣故。湯若望乃具

呈攝政王，請求仍留內城，得蒙允許。

湯若望本奉崇禎命修曆，成曆書百餘卷，清攝政王知其能，爰命進呈。順治二年曆書，書面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字，乃招舊曆官的妒忌。湯書算得順治元年八月初一日「日食」，明年正月十五日「月食」，詳載虧蝕時刻分秒。攝政王欲折服舊監官之心，叫他們照樣推算；至期，派大臣登臺驗看，驗得舊法不符，新法密合不差，遂命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湯氏固辭不獲，不得已遂就職。從此西人之任欽天監官職者，直至道光中葉為止；中間教會雖屢遭反對，終未被消滅，端賴湯若望能取得朝廷信任。順治對於湯氏治曆之功，深加褒獎，在十四年御製天主堂碑記中，有曰：

「與稽在昔，伏羲制干支，神農分八節，黃帝綜六術，顓頊命二正。自時厥後，堯欽曆象，舜察璇衡，三統迭興，代有損益。見於經傳者，非不彰彰也；然其法皆不傳。若夫漢之太初，唐之大衍，元之授時，俱號近天，元曆尤為精密，然用之既久，仍多疎而不合。……自漢以還，迄於元末，修改者七十餘次；至於明代，雖改元授時為大統之名，而積分之術，實仍其舊。泊乎晚季，分至漸乖，朝野之言，僉云宜改。而西洋學者，雅善步推，於時湯若望航海而來，理數兼暢，被薦召試，設局授粲；奈衆議紛紜，終莫能用。歲在甲申，朕仰承天眷，誕受多方，適當正位。凝命之時，首舉治曆明時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臺測驗。其時刻分秒，起復方位，獨與若望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孟夏之望，再驗月食，亦纖毫無爽，豈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創製立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曆，勅名時憲，頒行遠邇。」

這是對於湯氏治曆的褒揚，然又因治曆之故，而兼及其所傳之教，在湯氏等本以傳教為目的，以學術為手段，而朝廷却以佩服其學術，乃信仰其宗教，故其在碑文中又曰：

「若望素習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祇承朕命，勉受卿秩，洊歷三品，特賜以通玄教師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職，都城宣武門內，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復取錫寶所儲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經斯地，見神之儀貌，如其國人，堂牖器飾，如其國制，問其几上之書，則曰：「此天主教之說也。」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尚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賜額名曰「通玄佳境」，而為之記。」

其得順治帝的寵眷，於此可見，甚至授以光祿大夫封誥，祖先三代皆賜一品封典，並以潘盡孝之子士宏立為湯氏義孫，以蔭入國子監讀書，這實是從未有曠典。當湯氏七十大壽的時候，舉朝大臣，咸為祝嘏；此皆由於修治曆法與人格感召之故。後來湯氏講於朝廷，召南懷仁入京，幫同修曆。溯自徐光啓主開曆局，而引薦湯若望等教士參與修曆之事，三十多年來，教士們在這方面的貢獻，實在非常之大，尤其是湯若望。清代時憲曆的推算，都是他們的成績；這可以說天主教教士在中國文化上第一步有價值的貢獻。此後在康熙時，繼續修曆工作的，有南懷仁以及閔明我（Strinoldi）紀理安（Kilian Sumner）等人，其貢獻亦甚大。在修曆之外，又有一大貢獻，即在康熙時，諸神父奉派赴各省測量地勢，繪成了一幅精密的全國地圖。這些後話，當於下文補述。

惜當時順治去世，康熙以冲齡（卽位時只八歲）承大統，一切政權都操他人之手，而向來對湯氏懷恨的欽天監舊官吏，乃得乘機報復，便有楊光先發動的教難。

第十一章 第二次教難前後

基督教所遭遇的第二次教難，就是一六五九至一六六五年間楊光先所興起的曆獄，離開第一次南京教難大約五十年，其起因也有一部分相同，就是以為西士治曆，破壞中國成法；在沈淮第一疏中也有這條理由，不過這一次却完全爲了關於治曆上所生的憤恨而起。楊光先是安徽歙縣人，在明朝爲新安衛官生，以參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啓新而得名。他鑑於湯若望做欽天監監正，用西洋法來修中國曆，在曆書上寫着「依西洋新法」字樣，認爲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變成使中國奉西洋正朔了。所以在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上了一個奏章，參劾湯若望非中國聖人之教，未准。說者皆以爲楊氏是回教人，監正一職，向爲回人充任，中國曆算，向採回曆法，今爲西洋人所奪，因生嫉妒，想把西洋人推翻。最近陳援庵先生謂此未必可靠。楊氏是否是回教人，在中國書中沒有根據；這話很有理由。所以楊氏反對西洋人修曆，不過借題發揮，是完全出發於排外思想，與前述破邪集等人的立場差不多。看他後來參劾湯若望等的三大罪狀：（一）潛謀造反，（二）邪說惑衆，（三）曆法荒謬。還是注重於一二兩點。

因爲順治帝對於湯若望等教士，甚爲寵眷，楊氏的參劾，當然不生效力，他只好改變方針，從事於運動權貴，乞鑿於文字，來潛植勢力，於是著成關邪論上下兩篇，印刷五千份，廣爲散布。上篇是駁斥李祖白所著天學傳概一書。（李祖白是天主教教徒，任官於欽天監的。）以爲依照天主教說，是率天下而無君臣父子。

他更說：

『若望借曆法以藏身金門，而棋布邪教之黨羽於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爲常，不察伏戎於莽，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

這是他最大的理由，意思就是以邪說惑衆，潛謀造反爲教士們的罪狀。下篇是駁斥耶穌即天主之意，以爲荒謬無稽。按天學傳概一書，本爲利類思（Belli）神父所著，李祖白許之漸，各作序文弁首，而關邪論誤以爲李祖白所著。而天主教歷史中，則謂利類思作此書爲對關邪論逐條辨明。說：『楊光先見之，又作一書，名不得已，較關邪論誣枉尤甚。在不得已中說，天地萬物，係陰陽二氣所凝成，沒有什麼主宰的創造，以亞當爲人類元祖，把中國人都變成西洋人的子孫了，並且西洋人來中國傳教，無非要謀我中國。又說：澳門屯兵不少，湯若望實在是個頭腦，不可以不防備他。利類思乃作不得已以開其誣。楊書流傳既廣，影響甚大。不但朝野人士有因而相信他的，卽向來與教士們表同情的人，雖明知其言不實，也不敢得罪權貴，沒有仗義執言的人。恰值順治去世，教士們失了有力的保護，康熙年齡甚小，政權都操在輔政大臣手裏，當時輔政大臣鰲拜，本來不喜教士，現在又惑於楊光先的話，便有機會可乘。楊光先上了一個奏章，說湯若望等將潛謀造反，於是便掀起大獄，把湯若望逮捕，發交禮部審問，這是康熙三年八月間事。湯若望這時年已七十有三歲，適患痿痺之症，口舌結塞，由南懷仁（Verbiest）在旁，代爲申說，審問圖謀不軌事，毫無證據。從此每日提審在京的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Marghalas）四神父，一連審了十二堂，及至十月間，傳出諭

旨提審四神父及奉教職官李祖白、潘盡孝等盡行收監，南懷仁等皆歸籍入獄，惟湯若望監押禮部。過了兩月，判定湯若望邪說惑人，革職監候候，其餘有職的革職充軍，便將湯若望移押刑部大獄，這獄本為大盜著匪拘押之所，而湯若望以老年受此酷刑，痛苦已極。楊光先意猶未足，再三上書，說西洋曆法種種不善，舉數年前順治幼子榮親王之死，欽天監所選殯葬時刻，大為不吉，以致累及順治之喪。輔政大臣以此為情節重大，命六部九卿會勘，廷臣們已惑於楊光先先入為主之言，以為湯若望罪同弑逆，應得肢解之刑，其餘如李祖白等七人，罪應斬決。乃於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大會朝臣二百餘人，公同定案，不意案方議定，地忽大震，朝臣莫不驚惶散出，相顧失色；及至重復入堂坐定，地又大震，屋宇搖盪，牆壁傾倒。大家以為上天示警，應減輕罪名，以回天意，次日，便將南懷仁等三神父釋出；湯若望肢解之刑，改為監候斬。接着又一連地震三日，人皆露宿，惴惴不安。該輔政大臣以此案呈請太皇太后定奪，而太皇太后覽奏不悅，擲摺於地，嚴責諸輔政大臣，對他們說：「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過。」遂命速即開釋，惟李祖白等以榮親王事應當斬決。於是湯若望得蒙開釋，而李祖白未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五人，均被冤殺。其他奉教大員，如御史許之漸，臬臺許纘會，撫臺修國器，均遭革職。

湯若望蒙赦以後，即歸宣武門內天主堂（即南堂），而楊光先既得勝利，便做了欽天監監正，同時把南堂奪為自己的住宅，湯若望遷到東堂與南懷仁等同住，到第二年湯若望即因病去世，時年七十五歲，在中國為道工作，已有四十四年。

當京中這件案子鬧得利害的時候，各省督撫，也奉旨拘拿西洋教士，解京審辦，並禁止天主教的傳習，堂宇查封，經像焚毀。然而各地方長官，很有許多同情於教士們的，不忍加以拘拿，如江蘇福建湖廣等省，都很優待教士，到期派兵護送進京。松江知府，甚至為潘國光 (Pannozzi) 神父設筵踐行，南京劉迪我 (L. O. Farre) 神父，亦蒙官廳優待。惟在山西陝西山東江西等省，教士却備受凌虐，山西金尼閣 (Erigeault) 陝西李方西 (Forraris) 以及山東汪儒望，江西聶伯多 (Caroveri) 浙江洪度真 (Angeri) 等，均被鎖押，教友亦遭苦刑，甚至有因而喪命的。各省解京神父，共計三十一人，內有耶穌會二十五人，多明我會四人，方濟各會二人。五月間先後到京，即有一人棄世。諸神父大半皆年齒高邁，鬚眉皓白；他們在中國，有已歷四十餘年的，却從來沒有會面的機會，如今反可以會聚東堂，未始非窮難中的樂事。這樣居留了兩個月，方奉旨定斷，除南懷仁等四教士仍得留居京師外，其餘俱遣發廣東，交該省總督看管，於是有二十五位神父，均囿禁廣州城老耶穌會堂之內，不准出城，不准傳教，幸有奉教紳士李百銘為之照管。這時各省教務，端賴中國神父羅文藻所照料。北省有教友許謙往來行教，教務得以維持。

教會這一回所遭迫難，正有如暴風驟雨，陰霾蔽日，至此方風停雨止，不久，便光明復現。因康熙帝年事稍長，臨朝親政，兩宮皇太后曾屢稱湯若望為人，與其所推算曆法之善，向為先帝所信任，二十年並無過犯，今遭譴人陷害，深為可惜。康熙知道其間委曲，乃欲考其真相。其時楊光先既為欽天監監正，然對於天文學識，實無所知。康熙五六年日曆，本為湯若望等所造就，故無問題，及所造康熙八年之曆，乃有不少差誤。康

熙命近侍持以訪問西士經南懷仁等指出錯誤多端。帝即於次日召南懷仁等入朝，時禮部尚書名布顏與欽天監人員咸在。侍臣乃宣讀上諭：「曆法關係國家要務，爾等勿懷夙仇，各執己見，以己爲是，以人爲非，務當平心考察，誰是誰非，是者從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並將南懷仁在楊光先曆上指出的錯誤，亦朗誦一過，問楊光先何以自解？楊乃大恚，憤然與辯，而教士們却和顏悅色，侃侃而談。次日又大會朝臣，命南懷仁、楊光先測驗日影，法立直木於平地，預測正午日影所至，而南懷仁推算不差分毫。又命測驗星象，亦悉如南懷仁所預言，而楊光先與欽天監副吳明烜竟茫然不知。諸大臣乃以試驗經過，報告皇帝。楊光先知事不妙，深恐南懷仁進用，將於己不利，即上一奏章，言「中國乃堯舜之曆，安有去堯舜之聖君而採用天主教曆？且中國以百刻推算，西曆以九十六推算，若用西曆，必至短促國祚，不利子孫。」他原想把這些聳人動聽的話打動皇帝，可以不用西曆，却不料康熙早有平反前案之意，故意用這試驗之法，使一般大臣明知其曲直優劣所在，而且楊光先這幾句話，更激起了反應，便斥爲妄言，着卽革職。署南懷仁爲欽天監正，南懷仁固辭不受，惟願布衣終身，在監效勞。

當時學者，曾有對楊光先的批評，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四說：

「楊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師，以勸陳啓新，妄得政言名，實市僧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曆法之弊，遂發大難，逐欽天監正加通政使，湯若望，而奪其位。然光先實於曆法毫無所解，所言皆舛謬。如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已頒行來歲曆，至下詔停止閏月。光先尋事敗，論大辟。光先

刻一書曰不得已，自附於亞聖之闢異端，可謂無忌憚矣。」

阮元時人傳卷三十六亦有同樣的批評：

「……光先於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敗，宜哉！……元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署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歛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爲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大辟免死歸卒者也。」

王士禛說光先論大辟，固非事實，而阮元所舉歛人言，爲西人毒死，更不可信。蓋西教士以道德勸世，決無此種仇恨陰險的舉動。同書記錢大昕說：

「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之。」

同樣是不可信的傳說。但是楊光先究竟怎樣死的呢？據天主教傳教史所載是患發背而死的。先是楊光先既去官失勢，同時，那些同惡相濟的同黨，皆一一傾倒，如蘇克薩哈是一個仇教最厲害的人，當時曾力主處湯若望於死刑的。但是他在湯若望死後兩年，爲他人告發二十四款大罪，乃罹絞刑，其子姪亦皆棄市。繫拜遏必隆二人，亦於楊光先失敗之年，削職罷黜。康熙帝知道當時湯若望一案的冤抑，暗暗地叫利類思等三神父上書訴冤，許以平反，神父等便遊諭上疏，略曰：

「臣等同鄉遠臣湯若望，來自西洋，住京三十八載，在故明時，即奉旨修曆。恭逢我朝鼎新，荷蒙皇恩，勅修曆二十餘載，允合天行，頗行無異。不料遭棍徒楊光先，倚恃權奸，指爲新法舛錯，將先帝數十年成法

妄行更張，幸諸王大臣，秉公考察，古法件件誤舛，而新法則無不合；蒙恩命懷仁，仍推新曆，此已無庸置辯。惟是天主一教，即詩經所說：「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而為萬物之宗主也。在故明萬曆年間，其著書立言，大要以敬天主，愛疇人為宗旨。總不外克己盡性，忠孝廉節諸大端，往往為名公卿所敬慕。世祖章皇帝數幸堂宇，賜銀修造，御製碑文，錫若望嘉名。若係邪教，先帝聖明，豈能如此表章？乃為光先所誣，火其書而毀其居，捏造關邪論，盡惑人心，臣等亦著有不得已辨可質。且其並將修國器許之漸許續會等誣告，以致為教革職，此臣等抱不平之鳴者一也。又光先誣告若望謀反，臣等遠籍西洋，跋涉三年，歷程九萬里，在中國者不過二十餘人，俱生於西而卒於東，有何羽翼，足以謀國？今遭橫口誣讒，將無辜遠人栗安當等二十五名，押禁廣州府，不容進退。且若望等無抄沒之罪，而房屋被人居住，墳地被人侵佔，况若望為先帝數十年勤勞盡忠，羅織擬死，使忠魂含冤，此臣等抱不平之鳴者二也。臣等與若望俱天涯孤蹤，兔死狐悲，情難容已。今權奸敗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時，冒懇天恩，俯鑒覆盆，恩賜昭雪，以表忠魂，生死銜恩。」

康熙卽把這呈文交六部九卿詳議，議得湯若望李祖白等的確被誣，應照原品賜卹，並給葬銀賜祭。其因奉教而被革職的修國器許之漸許續會潘盡孝等十餘人，俱應開復原官。宣武門內天主堂房屋，應給還南懷仁等。而楊光先則因誣告反坐，情罪重大，應卽處斬，妻子流徙甯古塔，王公大臣等把這議案，呈報皇帝，卽批依議施行。惟念楊光先年紀已老，姑免死罪，着卽驅逐回籍。楊光先便狼狽出京，舟行至山東德州，背上

生一惡疽（俗叫發背）不久，便死了。講到楊光先的失敗，實在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他既然對於曆算之學，本不甚深，要在這上頭與有專門研究的教士們爭長短，同時，強詞奪理地攻擊到基督教道，這顯得他的不自量，不識時，抱着憤憤之氣來圖一時快意，阮元說他「不旋踵而敗，宜哉！」實在是很確切的批評。

湯若望這件案子，果然平反了過來，但那些被拘押在廣州的神父們，還沒有釋放；傳教之禁令，還沒有解除。這是在京三神父的主要問題，修治曆法，本不過是為輔助傳道的一種方法，傳道既不能得到公開，豈不是變成舍本而逐末麼？於是他們便決意辭去曆官的職務。皇帝知道他們的隱意，便派國舅修國網慰留，並且告訴他們欲弛傳教禁令的困難，因為朝臣中尚有許多反對的人，叫他們姑且忍耐等待，神父們始知皇帝並無仇教之意，頗得諒解，遂勉強打消辭意。一面在北京修葺東南兩教堂，天天在內獻祭講道，朝臣們亦知皇帝意思，對於他們傳教工作，並不加以阻止，所以這一年中有三千人受洗進教。第二年三神父再上疏請求開釋廣州二十五位神父並弛教禁。結果，仍為部議所不許。等到康熙九年方才獲得開釋教士的上諭，該上諭中因欲調停部議，一方面准許廣州二十五教士各歸本堂，一方面不准添立教堂與中國人入教。二十五人中如有通曉曆法的，令即來京幫同治曆。並御書「奉旨歸堂」四大字，囑分送廣州二十五神父。在廣州被禁諸神父，這時生存的只十九人，重返各省工作，各省封禁教堂，一律交還，被人拆毀的，責令賠償，地方官莫不優禮相待。其時閱明我神父已死，格里瑪弟（Grimaldi）乃冒稱其名，由澳門來華。然以其通曉天文曆法，便奉召與恩理格（Hordricht）徐日昇（Pereyra）三人一同進京修曆。南懷仁既著成永年曆

書其三十二卷，推算至二千年之久。又奉命鑄炮數百尊，皇帝親臨炮場試放，大得褒獎。康熙之於南懷仁，正如順治之於湯若望，屢加官職，升至工部侍郎，然皆固辭不就。康熙且日與南懷仁、徐日昇、閔明我講求西學，對於教會發生極大興趣。當時法國皇帝路易十四，因聞中國皇帝雅好西學，南懷仁等神父，又蒙優遇，乃派教士五人來華，此五人皆精通天文之學，南懷仁乃言於帝，奉召進京，便是法國教士初入中國之始。此後巴黎傳教會士相繼而來，四川兩廣教務賴於發展。不意該五教士在來京途中，忽接南懷仁去世消息，及至京，由徐日昇帶領引見，着留張誠（Carbillon）白晉（Bourvet）二人在京供職，餘三人任令在中國傳教。

當康熙十六年安文思病歿，至是二十六年南懷仁又病歿，皆蒙帝命賜葬。南懷仁享年六十六歲，皇帝派員致祭，御製碑文，勒石紀念，其碑文：

「朕維古者立太史之官，守典奉法，所以考天行而定歲紀也。苟稱厥職，司授時之典，實嘉賴之。况克殫藝能，有資軍國，則生膺榮秩，歿示褒崇，豈有靳焉。爾南懷仁，秉心質樸，肄業淹通，遠泛海以輸忱，久服官而宣力；明時正度，曆象無譌，望氣占雲，星躔式鼓；既協靈臺之掌，復儲武庫之需。覃運巧思，督成大器，用摧堅壘，克裨戎行；可謂蒞事惟精，奉職弗懈者矣。遽聞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勞，賜名勳敏。嗚呼！錫命永光，乎重壤，紀功廣示於遐陬，勒以貞珉，用垂弗替。」

這裏可以看見康熙對於南懷仁的寵眷，盛稱他治曆鑄炮之功，實則南懷仁最大的貢獻，並不在此，乃在於以一身繫教會之安危。自楊光先教難以來，二十多年間，教會幾經困難，從黑暗勢力籠罩之下，平反冤

獄，這是他的大事，但是教難雖平，傳教之禁仍未解除，西士不能傳教，華人不准進教，排外仇教的官吏，往往藉爲口實，橫加壓迫，然卒能安然無大風波，都是靠着他的力量。越三年，浙江便發生搶掠教堂，壓迫教友之事，蓋因巡撫張鵬翮出示禁習天主教而起。杭州神父殷鐸澤告急於北京神父，徐日昇張誠乃面見皇帝，求弛教禁，命禮部議奏，禮部不符上意，復命內大臣與滿官再議，國舅佟國綱迎合上意，具題如下：

「臣等會議，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數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進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効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之西洋人，並無爲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衆，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向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實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臣等未敢擅便，謹具題請旨。」

帝卽批示「依議」，此旨一出，全國教堂，莫不歡欣歌舞，杭州殷神父預備進京謝恩，不意方欲起程，教堂忽毀於火，事聞於帝，飭浙江巡撫重行建造，張巡撫心雖不願，然亦無可如何，康熙三十二年皇帝偶患瘧疾，太醫束手無策，張誠獻上西藥，一服而愈，皇帝大悅，遂賜張誠住宅，（該宅卽前輔政大臣蘇克薩哈舊府）並賜地建天主堂一所，親題「萬有真原」匾額，並題一聯：

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
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

又作律詩一首送至堂中，詩曰：

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
 體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室久爲初入閉，天路新憑聖子通。
 除却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崇。

當懷南仁過世以後，由閔明繼其職，到康熙四十六年閔明去世，又由紀理安補欽天監。這時張誠已先去世，徐日昇已於次年病故。在京教士，除白晉外，有巴多明（Parentin）馮秉正（de Mailla）雷孝思（J. B. Régis）等人，奉命赴蒙古及各省，用西洋三角測量方法，繪畫地圖，參加此工作者，另有神父十餘人。先從關外起頭，依次及各省內地，爲時歷九年之久，圖始告成，叫軸皇與全覽圖，還有各省分圖。這圖實在比當時利瑪竇所繪的，詳盡得多，可以說中國最科學的第一幅地圖。白晉等進呈康熙，大得贊賞。康熙在位六十年，對於教士，實有非常的好感，教會便因此日臻發達，據一六六四年的情形：

一六六四年全國教務情形

省別	地名	教堂數	教友數
直隸	北京	三（ <u>南堂</u> 、 <u>東堂</u> 、 <u>慕堂</u> ）	一五、〇〇〇
正定		七	

建昌	江西	湖廣			四川	河南		陝西		山西	山東		
一	南昌	武昌	重慶	保寧	成都	開封	漢中	西安	蒲州	絳州	濟南	河間	保定
	三 (城內一 城外二)	八				一	二 (城內一 城外五 會口一五)	十 (城內一 城外九)			十 (全省)	一	二
五〇〇	一〇〇〇	二二〇〇	三〇〇				四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	三三〇〇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上海	淮安	鎮江	揚州	江 南 南 京	浙 江 杭 州	蘇 山 崇 安	邵 武	建 寧	延 平	福 建 福 州	汀 州	贛 州	吉 安
城內老天主堂 南門、九間樓、鄉下六六	一		一	一	二	多所				一三 (連興化、連江、長樂)		一	
四二、〇〇〇	八〇〇	二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	一、〇〇〇		四〇〇	二〇〇	三、六〇〇	二、〇〇〇	八〇〇	二、二〇〇	二〇〇

上列數字，雖不十分正確，但在這四十年間，至少可以見得增加了一倍以上，亦足以證明在十七世紀康熙時代教會的發達了。但是不幸因着禮儀問題的爭端，使中國教會遭受很大的打擊。

廣	廣	福	浙	江	湖	河	陝	山
西	東	建	江	西	廣	南	西	西
七	一	七	四	八	八	二	四	三
七	一	七	四	八		二	四	一〇
一〇	一	六	二	六	三	一	一	二
五	三	三	一	四				
七	三	二		四				
	五	三		五				
		五	二	一				
		四	二					
		五	三					
一	四			一	一			
	四							
	六							
	三	三	四					
	三	二	一					
	九	三	一					

第十二章 禮儀問題的爭端與其影響

說者謂教會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忽然發生內部的爭端，爲着禮儀問題而各執一辭，使教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不可謂非教會的不幸。其實這問題的起源，在耶穌會初入中國時，却已開端。耶穌會士利瑪竇，爲了便於推行教道的緣故，處處謀迎合中國固有風俗習慣，所以他最初便穿着和尚服裝，以爲可以藉此不受中國人的歧視，及至以後知道和尚並不爲社會所重視，乃改爲儒者的裝束，在利瑪竇以爲凡不妨礙基督教根本信仰的各種習慣，不妨予以遷就。所以他在 God 的稱謂上，與尊孔祭祖的問題上，都不十分固執。因爲那時候，基督教初入中國，對於宗教上應用的名詞，一時很難決定。God 之名，起初便譯音而爲陟斯 (Dahsi)，因爲找不到一個新的適當名詞，從前回教、猶太教、景教……等對於這點都感到困難。所以利瑪竇起初用「天主」二字，後他從中國古書中，看見天或上帝的名稱，是中國古聖賢用來指天地的主宰的，於是改變初志，使用天或上帝而不用天主了。後來又讀到朱熹對天的解釋，說天不過是一種義理，即上帝亦不必是獨一的天地主宰。他又以天主或天或上帝並用。這便引起了後來的爭論，即有一派人主張只許用天主，而不能用天與上帝之稱。而耶穌會士一派以爲三名不妨並用，因爲中國古人會以此解作天地主宰。這問題辯論得非常利害，後來更正教中在翻譯聖經上也會發生同樣的討論，有主張用神字代替上帝的，直到現在有些聖經封面上還是注出「神」或「上帝」字樣，表明這書裏把 God 譯作「神」。

字的或譯作「上帝」的，不過沒有像天主教當時那樣的嚴重罷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祭祖敬孔，是否有罪？基督徒是否絕對不能參加？在這種禮節中是否含有宗教的意味？或者傳教士雖認為有罪，而基督徒仍可以憑良心的裁斷？因為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民衆習慣，一旦欲完全把牠排斥，勢必在傳教工作上將受莫大的阻力；一般人將以基督教為破壞中國的家庭主義與國家觀念了。利瑪竇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採取一種折衷辦法，以為凡基督徒認這不過是一種禮節，表示敬仰與孝思而已，不妨任他奉行，這原是一種不得已的從權辦法。但當時已有耶穌會士加以反對，像龍華民等，曾經禁止祭祖拜孔，以為這與佛道諸宗的拜偶像無異，大有背於天主教教義的。

第三，關於一部分零碎問題，如民間出會迎神等舉動，基督徒應不應輸錢與參加？或者一個基督徒，他的祖宗是非基督徒，是不是適用基督教的儀式？或者牧師為婦人施行洗禮，能否免去那些在中國習慣上所認為不甚合適的禮節？這一些小問題，是與上述問題有連帶的關係，是附屬的，而不是主要的。所以成為這次論爭中的中心問題的，還是第一第二兩點。教會在十七世紀外來的壓迫，既然減少，內部便起了爭論。結果，從兩派不同的意見，變為派別間的嫉妒，更影響到國際方面。不但在遠東的傳教士，都參與兩方面的陣線，即歐洲教會亦因此而有劇烈的辯論。

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大部分是擁護利瑪竇的主張，而多明我與方濟各會人大都站在反對的地位。一六三一年時，有多明我會士到福建傳道，他看見耶穌會士容任祭祖敬孔的事，便大不以為然。就連合方濟

各派，把這問題稟告到馬尼刺（Manila，菲律賓首邑）總主教，總主教又把這稟告送到羅馬，教皇迂爾朋第八，這是一六三五年的事。一方面由教皇派員調查，而一方面耶穌會士向教皇辯訴，到一六三八年遂由總主教撤回其訴狀。

多朋我會士有名馬拉來斯（Morales）的，從一六三三年來到中國，一六三七年被迫離開中國，他對耶穌會就開始反對，到了歐洲以後，在一六四三年把這情形告訴宣教會，提出十七條問題對耶穌會攻擊。內中有幾條比較重要的，如：

傳教士在給婦女施洗時，是不是可以取消塗油禮？

是不是可以准許中國人出百分之三十的利息，靠放債過活的人做基督徒？既做基督徒後，是否仍舊可以繼續這種職業？

基督徒是否可以捐錢給迎神賽會等迷信事情？

國家舉行祭祀時，基督徒是否可以參加此種儀式？

基督徒可否參加祀孔典禮或其他葬禮？

基督徒是否可稱孔子為神？

在禮拜堂內可否置「萬歲」一類的碑文或匾額？

經宣教會討論的結果，並呈請教皇依諾增爵第七的同意，於一六四五年九月十二日發表一道禁止

的命令。在這命令中聲明此項禁止，在未有別項決議前，須暫時遵守。而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對於這決議，自然非常驚奇，決定向當局陳述他們這方面的意見，於是在一六五一年派了一個代表就是衛匡國神父（Marini）到羅馬去解釋。他們認馬拉來斯對於他們的制度，不會有正確的了解，迨一六五四年衛氏到了羅馬，把耶穌會一方面的陳述送交「異教徒裁判所」，經過相當的考慮，由教皇亞歷山大第七裁定，准許耶穌會照他們的意見去做，讓基督徒自己決定在這範圍內的事，無論含有迷信的禮節與喪葬等事，只要不妨害他們根本的信仰，均可自由參加。這是一六五六年的命令，表面上好像與一六四五年的命令衝突的，實際上都是一種暫時性質，並沒有絕對肯定的話。多明我會對於第一次命令，本來已經不很滿意，馬拉來斯曾經提出了責問；這時候馬氏已去世，同會就有鮑郎高（Palanco）繼馬氏而起，向教廷詢問：是否取消一六四五年的法令等。到一六六九年教皇格來孟第九答覆他一道公文，說兩個法令，在依照環境情形下都當遵守，這似乎是使耶穌會得了點勝利。

當第二次教難發生，各省教士都被禁押在廣州，包括耶穌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人員，其間以耶穌會人數為最多，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機會。他們用了四十天工夫，充分討論着教會各方面的問題，共同議決了四十二個問題，中間有一條「當遵守一六五六年法令。」當議決時，與議諸教士一一簽押遵守。而多明我會有名那槐來脫（Narreto）不能同意，潛逃至澳門，又乘船回到歐洲，他在歐洲發表了些著作，大大地攻擊耶穌會，所以當時的耶穌會不但天主教中攻擊他，就是歐洲的更正教也攻擊他。不過在中國的情

形却兩樣，所有的方濟各會與斯定會人大都附知着耶穌會，即站在反對地位的多明我會中，也有替利瑪竇當時的境地而辯護的。只有那位福建主教名叫滿格老 (Maifrot)，他是大不滿意於耶穌會的制度，也有些耶穌會中的法國人，與滿氏表同情。那位滿主教曾經公佈了一條命令，禁止應用耶穌會制度，不許稱天主為天或上帝，也不准在禮拜堂裏懸掛寫「青天」字樣的匾額，以為一六五六年教的法令，在良心上沒有遵守的責任，指斥衛匡國所呈訴的理由毫無根據，所以絕對不允許教友可以自由祀孔與祭祖。因為若不把這些異端從禮拜堂中除掉，便不能使教友們專心崇拜上帝，傳教士更不能把基督的道理去牽合中國古書裏的教訓，應當注意到基督教所稱的God，乃是一個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他為了要實行這道命令的緣故，用斷然的手段開除了兩個耶穌會信徒，於是激起了耶穌會會衆的反響，發生了很大的衝突，他因此派了兩位教士，名叫管末南爾 (Guennere) 與雅爾馬 (Charnot)，到歐洲去把這問題請求教皇依諾增爵第十二重新審查。一六九七年教皇把原案交付「異教徒裁判所」研究。這問題又變成了宗教界極有興趣的辯論，一時出版許多辯論的書籍，有一位更正教的哲學家名叫萊伯尼志 (Leibniz)，也替耶穌會著了一篇辯護書。直到一七〇〇年巴黎大學神學系教授發表宣言，不贊成耶穌會的主張，並且批評耶穌會方面的書籍，才轉移了一般人的目光。

這問題既在歐洲鬧得滿城風雨，教廷便組織一個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委員會中，沒有耶穌會多明我會人參與其間，以期有公允的解決。而此時在中國的耶穌會士，適有把「祭禮與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質

』的問題去請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便於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宣言，說中國的祭祖祀孔，不過是一種崇敬的禮節，紀念其過去的善行，並沒有宗教性質。然在反對耶穌會的人，更得了一種藉口，說關於教會的事，不請求教廷解決，反而去請求教外皇帝決定，實在不當。這實足以挑起教皇對耶穌會的惡感。到一七〇四年，「異教徒裁判所」印成一件公文，得教皇格來孟第十（Clement XI）的批准，於十一月二十日公佈，其條文有：

禁止以「天或上帝」稱天主。

禁止禮拜堂裏懸掛有「青天」字樣的匾額。

禁止基督徒祀孔與祭祖。

禁止牌位上有靈魂等字樣。

教廷因欲推行這公文，第恐發生什麼不良的影響，就決定派一個特別代表，來調停東方的爭端，因為當時在印度馬拉巴（Malabar）也有同樣的事件發生，所以這個代表，必須要靈敏強幹，不但要使傳教士和本地教徒滿意，並且希望中國能諒解到教皇的法令。負着這樣重大使命的人選，一時很難獲得，最後乃派多羅（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主教帶着這道法令到中國來。先到了印度，預備在那裏解決馬拉巴的爭執，結果，給葡萄牙主教與耶穌會人反對，沒有什麼效能。乃在一七〇五年四月到了廣州，十二月四日到了北京，耶穌會裏的葡萄牙人，對於他的委任，根本起了懷疑，因為那些傳教士費了一生的精力

在中國做工，建造起許多房子，現在被一個年青的並不懂得中國情形的人來威嚇，當然不能表示充分的服從。康熙帝起初很以優禮相待，後來這位青年的代表，與皇帝的觀念站在反對的地位，對於康熙前此所發出的諭旨，不能略為遷就，使康熙大大地不悅，乃下逐客令，命其速離京師。多羅不得已離開北京，到達南京。於是康熙帝便在一七〇六年十二月間發出一道上諭，說明凡傳教士非領得朝廷准予傳教的印票，及許可服從中國的禮儀的，不准在中國傳教。

多羅主教聽到了這個命令，他想到自己所負的使命，便在南京宣佈了教皇的命令，並且加上自己的解釋，譴責那些用上帝和天的稱呼與那些牌位表示陰靈的。並且說凡違反這種禁令的，必須趕出教會；這顯然與康熙帝反對了。因此，有些法國教士，因為不服從康熙帝的命令，被驅逐出境。惟有多數的奧斯定和耶穌會人，接受皇帝的話；不過他們很希望將來去請求教皇，修改多羅的宣言。康熙帝因為多羅的反抗，就把他送到澳門看管起來，一面由耶穌會的提議選派兩個教士到羅馬去申說，希望對於多羅在南京的宣言與一七〇四年的法令有所變更。多羅既監禁在澳門，澳門的主教對於他也發生了反抗，但是多羅仍舊行使他代表的職權，趕出幾個教士，聲明凡未得代表的允許，都不能在中國傳教，也不許澳門的學院與修道院容納，於是事情鬧得更利害了，結果，在澳門的葡國官員，也起來反對多羅。不過羅馬教皇却嘉許他的忠心，升他為紅衣主教，可惜這升職的公文還沒有到達之前，他已經在澳門去世了。

多羅在南京所發表的宣言和耶穌會的請求，到了羅馬，不但沒有被教皇接受，反而重行申明南京宣

言與一七〇四年的法令，是有同樣的效力，方濟各會教士把這篇申明公布在北京的禮拜堂裏，耶穌會人因此就感到極大的不安。羅馬教廷預備更有力的舉動，教皇格來孟十一又頒布了一道正式的諭旨，重新述說前此的禁令，必須絕對遵守，否則將受逐出教會的處罰。凡傳教士必須宣誓服從。不過對於一切純粹屬於政治範圍而不含迷信的禮節，許予容納；若有一個新禮節產生時，不能決定牠是否屬於迷信的，須送教皇審查後實行。這一道嚴厲的教諭，教士們都不敢把牠公佈在教堂裏，等到主教在教堂裏宣讀出來，就被康熙帝捉去監禁。耶穌會因此仍得繼續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教廷方面不得不再派一個比較重要的人到中國來，調解這極端的爭執，於是選派了一位主教名滿柴排爾排（Monzambani）做代表，於一七一九年離開羅馬，第二年九月到了澳門，這次葡萄牙人却很優禮的接待他。十二月間到了北京，謁見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對他非常冷淡，因為過去的爭執，本來很不高興，及至看見教皇的公文，更加覺得生氣，就在公文上批着這樣的話：『歐洲人沒有資格批評中國的禮節！』耶穌會人很爲這事耽憂，因爲這樣下去，恐怕要毀壞了過去的工作，所以他們請求滿主教不要把教皇的諭旨宣布，但是不能得他的允許，仍舊宣布出來，不過在教諭的下面，加上幾條變通的辦法：基督徒可以有牌位；也可以允許基督徒不迷信的拜祖宗；爲守禮節而祭孔也可以；用香燭食物陳設在牌位前面，在棺材前叩頭，葬禮中用香燭……等等，皆可以權宜從事。這是一種對中國皇帝的讓步，但是康熙皇帝仍不滿意，所以他與皇帝間不能有較進步的感情，不得已只好離開北京預備回歐洲去，在還沒有離開之前，他寫了八條寬免的辦法給教會，與前述的變通辦法差

不多，用來作一般傳教士工作上的指導，但不許把牠譯成中文或滿文。這辦法不但在擁護教皇方面的人並不看重，耶穌會人亦不守他的囑咐，仍舊把牠譯成了中文。那時他已帶了多羅的屍骨回羅馬去了。這位滿主教，比較其他的人果然圓通得多，但在這複雜的情形下，却仍沒有帶什麼平安給中國的基督徒。

當滿主教回羅馬報告教皇之後，教皇便發了一個命令給耶穌會，責備他們不能領導教友服從教令，即是對教皇的不忠，因為不服從教令就得處罰。恰巧這時候換了幾個教皇，所以暫時擱置，直到一七四二年本篤十四（Benedict XIV）乃舊事重提，發了一道命令，取消滿主教所自定的八條允許，維持格來孟十一的禁令，聲明凡不服從這法令的，必須回歐洲處罰。這個強硬的法令，却暫時壓住了長期的爭執，雖然有不表贊成的人，却也無可如何，只好默爾而息。

繼承康熙之後的雍正，他本不很贊成基督教，所以更固執着康熙的主張。恰巧那時候又另外產生一種爭端，即有些基督徒在父母去世時，把父母的姓名職銜寫在一塊白緞上，讓教外人叩拜，在福建有些教士並不加以禁阻。北京主教覺得這是違反一七四二年的教令的，便通令各教堂，說明向死人叩拜是有罪的。不意這命令在各教堂發表的時候，引起了一種騷動，甚至有人大叫說「叩頭是不是迷信！」主教便選定了這個題目講道，希望藉以安定教友，却不料反而增加了紛擾，因為有些官家或貴族的基督徒，不能容忍這種限制，又回復到反抗的態度，爭端又復活了。教皇鑑於這種紛爭，長此不已，實非教會之福，便毅然的一七七五年把耶穌會解散。這可見教廷當局，寧可犧牲在中國的已往工作，不願和中國的風俗習慣有絲

毫妥協，這種守正不阿不肯枉尺直尋的精神，實在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們看看這故事的經過情形，並不能叫我們歡喜，因為我們看見裏面有許多妒忌，攻擊，仗勢等等不良的因素，實在違反基督教到中國來的精神。所以有以爲這種爭執，實在是自己毀壞了傳教工作，若是沒有這次爭執，若是不因爭執而觸怒了中國的皇帝，十八或十九世紀的中國，或者可以變成天主教的國家。康熙對於教士，本來有很好的感情，爲了與教皇發生了意見，就一反從前的態度。本來因爲皇帝的傾向，使那些反對教會的人，不敢有什麼動作，等到皇帝的態度一變，這種反對的勢力，也就漸漸的活動起來，造成了反教的風潮，這全是由於這次爭端所召來的惡果。但依我看來，這批評實在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基督教爲求推行上的便利，對於社會風俗的遷就，在有限制的條件下，並非絕對的不可，然而因此將影響到基督教的精神，不能不予以糾正。利瑪竇的主張，本有他的苦衷，但後來的耶穌會士變本加厲，一味遷就，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場，宜乎有人要起來反對。不過這種反對或擁護的方式，有點不智，以致影響到整個的大局，果然可惜。但是要說沒有這些爭執，教會便會達到怎樣的程度，而且不會引起反教的風潮，這都不可認爲定論的。相反的，教會若然單靠着一種勢力，他的後患必定更大，因爲某種勢力有失掉的時候，那時，反動的力量更利害。所以有人以爲康熙本來有做基督徒的可能，只因這一次爭執阻當了他。要知道康熙不做基督徒，於教會原無關係，正如上面所說的道理，反而於教會無益而有損的。

現在言歸正傳，要聯帶的說到康熙以後的教難，雖然不能說完全由於這次爭論的結果，但多少也有

幾分關係，應當在這裏敘述一二。

自前次沈淮楊光先之難平息以後，靠着康熙帝的保護，有五六十年的安寧。現在因禮儀之爭，激惱了康熙，使康熙改變以前的態度，從此歷雍正乾隆嘉慶以至道光，又遭遇着不少的困難。第一件慘案，要算蘇努全家的蒙難。蘇努為雍正的從兄弟，說他有幫助允禩（康熙第八子）謀立之嫌，便因此獲罪。原來康熙有二十三个子，末年諸皇子皆謀繼帝立，各樹黨派，互相傾害。四皇子胤禛以詐術取得帝位，是為雍正，藉故治諸弟以罪。蘇努全家也被牽連在內，蘇努之子蘇爾金書爾陳、勒什亨、烏爾陳、木耳陳等……均先後受洗進教，至是勒什亨、烏爾陳均隨允禩、允禩充軍西寧，葡籍、耶穌會、士穆經遠（Moras）神父素為允禩所敬愛，邀與同往。勒什亨、烏爾陳既到西寧，不特專務靈修，亦且熱心傳道，據耶穌會、士巴多明（Parentin）致書同會函中有云：「川陝總督年羹堯遞摺控類思（勒什亨）若瑟（烏爾陳）同入天主教，并捐資建教堂，又與教士穆經遠相善。」雍正大怒，立召二人回京收押，允禩與穆經遠神父亦因此得罪。並且禍及蘇努，發往右衛充軍，除長子及妻皆病死途中外，自己亦病歿。朝臣中之希旨者，又一再告揭，蘇努被削除宗籍，又遭戮屍，其子孫分禁各省，備受酷刑，三四年間相繼死亡。據巴函所述，蘇努一家致死的原因，純為信教之故。當時右衛將軍會追令出教，而其子孫等皆衆口一詞，甯死不願背教之故。是可知信教實為他們致死原因之一。穆神父本為雍正所惡，又誣以興起革命，為允禩黨援，乃至入獄，葡國遣使來中國營救，雍正不待葡使之至，先令人毒殺之。

先是，閩浙總督滿寶深知雍正疾惡教會，適福安有建築教堂事，乃出示禁止，並將傳教士驅逐出境。以禁絕天主教事奏聞皇帝，雍正元年十二月有「遠夷住居各省，已歷有年所，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的上諭。各省官吏得此禁教之令，遂迎合上意，大肆仇教手段，教士五十多人，悉遭驅逐，甚至百般凌虐。浙江總督李衛奏毀杭州天主教改為天后宮，福建巡撫劉世明請禁人民習天主教，兩廣總督把居留廣州之教士逐至澳門，廣州教堂被毀，教友蒙難，各處教堂有改為公廨或書院，或廟宇的；南京教堂住宅均變為積穀倉，上海天主堂改為關帝廟，不數年間，全國教堂盡遭廢毀，惟在京教士二十餘人，以服務欽天監之故，得安然居留。這時全國三十萬信徒，因教士被逐，乃至如羊無牧，困苦可知。雍正在位僅十三年，其子弘曆繼位為乾隆，乾隆賦性懦弱，常被左右包圍，故教難更形嚴重。福建多明我會桑主教 (S. S. 等) 竟為巡撫所殺。桑主教西班牙人，雍正時既被放逐至澳門，一七三八年乃潛回福建，至福安縣行堅振禮，與同會費 (Alcober) 德 (Serrano) 華 (Royos) 施 (Diaz) 四神父相會於某村，為奸人告發，被捕解省，巡撫周學健素惡天主教，乃請旨正法，桑主教及四神父竟先後被殺。

次年在蘇州有同樣事件，多明我會葡人 黃安多 (Henriquez) 與意人 漢方濟 (Athenis) 二神父，以「洋人散布邪說，煽惑良民」之罪，統死於蘇州。教友被牽連者甚多，唐德光死於獄中，汪斐理出獄即死。

自福建蘇州之事發生後，各省皆起而效，南京有五神父被囚，己至交罪，姜等譯與明。此京發生者

神父因而拘押有八年之久。各處皆搜捕教士，虐待教友，於是四川獨主教與李吳彭三神父，山西馬吉主教，陝川高主教，山東四神父，江西二神父，廣西一神父，湖廣二神父，以及其他教友神父，均被押解至京，經部臣審問，將中國神父七人，與教友十一人，刺字於額，充軍伊犁，另有教友三四十人枷號示衆，西洋教士一律從寬開釋。嘉慶朝也有中國教士教友被難喪命之事。這時西教士除在京師有職務關係的，有欽天監正戴進賢（Kogler）監副徐懋德（Pereira）繼戴進賢的有劉松齡（Hallertan）鮑友管（Orogais）高慎思（d'Espinha）索德超（Almeida）等。其他有郎世寧（Castiglione）在內廷繪畫，林濟谷（Stadlin）為鑄匠，羅懷忠（daCosta）為藥師，安泰（Rous et）為御醫。彼等仍得居留，故北京教務，仍有相當進展，其他各處，西教士均難立足，皆由中國神父主持，在這樣艱險的情形下，繼續進行工作，此不絕如縷的教會，直至鴉片戰爭以後，方得重見光明，而另入一個新的時代。

第十三章 更正教輸入中國的預備時期

當天主教教士在中國工作的時候，更正教人未嘗不注重到這東方的大國，所以也有過種種的計畫。相傳十七世紀喬其福斯（George Fox）曾經這樣歎氣地說：

「唉！能不能喚起幾位熱心的教徒，把真理宣布到中國去？」

這句話是不是實在的？我們現在却無從斷定；不過在他的日記中的確記着：

「在一六六一年有三位教友，名叫施丹白（John Stubbs）考司曲路（Richard Costroppe）福爾（Henry F. Fell），他們很勇敢的開始到中國傳教，經過了不少的困難。」

結果怎樣？却沒有知道。

萊伯尼志（Leibnitz）對於天主教在中國傳教感到非常興趣，因此在十七世紀提倡更正教徒也照樣做去，希望由各宗派聯絡起來，能在中國產生一個沒有派別的教會，雖然得着各方面的贊同，但可惜沒有實現。一七九八年有一個馬錫蘭（William Mosley）牧師，他在英國聯絡幾個同志把聖經譯為中文，將已經譯成的新約，保存在博物院裏。一八〇一年「倫敦國外佈道會」就討論到派送傳教士到中國的問題，但是沒有方法進行，決定先籌備一筆款子，以便將來可以應用。同時，「外國聖經會」主張印刷博物院裏的聖經稿子，以便分散到各地方。

當時更正教中注意到中國工作的，有三個人：一個是『倫敦佈道會』中的馬理遜（Robert Morrison），一個是在錫蘭浦（Serampore）的卡萊（Carey），領導着許多熱心同志，在印度各部份建設傳教團體，並且把聖經譯成東方的各種文字。還有一個叫麥西門（Marshman），他熱心研究中國文字，請了一個阿美尼亞（Armenian）人名叫薩拉（Issaiah）的幫忙；薩拉是生在澳門的，所以懂得中文和中國話。一八〇六年麥氏到了喀爾各他（Calcutta），遇着一位懂得中文的牧師名白奇南（Clandius Buchanan），就跟他學習中文。同時，有一個到過中國的天主教教士和一個從北平來的中國人幫助他，開始繙譯聖經。後來薩同了二個中國人回到錫蘭浦，在麥氏的指導之下，於一八一一年完成了繙譯的工作。最有關係的當然要算是馬理遜，當一八〇五年『倫敦佈道會』計畫派送傳教士到中國，最初打算派遣一位老年的教士名叫范達根（J. T. Vanderkemp），因為他多年在南非洲傳道，所以他不願離開非洲。後來又想派一位名叫勃朗（Brown）的去，結果也沒有成功。於是馬理遜就當了選。這時候中國正是大門關閉得很緊。就是因為天主教會爲着禮儀問題，起了內部的紛爭；想不到這紛爭，竟變成了教皇與中國皇帝的問題，便惹得康熙動怒，取締中國的傳教。到了雍正，更厲害了，發出了禁止全國天主教的上諭，所以從一七〇〇年一八四二年之間，天主教在中國便沒有活動的機會，這又回到元朝以後利瑪竇以前的情形，有一百多年的中斷。直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與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裏規定『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之後，不但天主教得以捲土重來，繼續他們已往的工作；即更正教亦得公開地進入中國。此

後基督教在中國，便有天主教與更正教（亦稱耶穌教）兩派並立，繼續進展了。天主教傳教中國的根據地是澳門，所以更正教初來中國的時候，便受着很大的阻礙。我們讀到馬理遜傳道的經歷時，看見當時所受的困難，不單是中國官廳的嚴禁，人民的反對，更有天主教嫉妒的壓迫。終於以馬理遜的艱苦奮鬥，建立了更正教傳教中國的基礎。所以我們說到更正教輸入的起頭，不能不對於這位開路先鋒的馬氏，表示相當敬意，把他的工作，在這裏介紹一下，一若前面對利瑪竇一樣的欽佩。

勞勃脫馬理遜（Robert Morrison）誰都不能否認他是更正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祖，以前雖然印度浸禮會有過一位教士名叫馬許孟（J. Marshman）的，曾經研習華文，得着一位中國學者的幫助，把聖經譯成華文的事實，到底在中國沒有發生什麼影響，所以還要讓馬理遜居首位。不過那時候中國的傳教門戶，還沒有開放，雖然傳教士的足跡，已經踏進廣州，因為不能公開，還只好算是預備時期。

當他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已經有傳道外國的志願，「倫敦佈道委員會」命他選擇非洲或中國時，決定了中國為其目的地，便開始學習起中國文字來，訪到一位廣東人名叫楊善達的做他的教習。同時從倫敦博物院裏找到一本不完全的中文新約，天天照樣的小心謄寫。這本殘缺的新約，並沒有繙譯者的人名，或者就是馬錫蘭所譯的那一本，但却成了後來馬氏繙譯聖經的根據。他雖然這樣熱心地預備着，可是中國海禁甚嚴，外國人不能進入中國內地，「東印度公司」的輪船，也不許傳教士乘坐，因為這時從英國到中國的交通樞紐，只操在「東印度公司」手裏，他們不讚成傳教士到中國來的原因，恐怕影響到他們的

商業。沒有方法，他只好繞道先到美國，再從美國乘船過太平洋到中國來。一八〇七年，即嘉慶十二年，到達廣州，祕密地寄居在一個美商貨棧裏，殷勤讀書，學習中文，在生活起居上，都仿效中國人，飲食衣服都中國化，後來却覺得影響到身體的健康，便一方面改變以前的方法，脫去中裝，恢復舊觀；一方面打算易地調養，暫赴澳門居住。在澳門認識了一位莫小姐，發生愛情，遂於一八〇九年結了婚。「東印度公司」也在這時候聘他爲中文繙譯，做了公司的職員，便可以免去被中國政府驅逐的恥心，而且得到了公司的薪水，也可以免得依賴佈道會的津貼；同時，更可以藉此考求中文。「倫敦佈道會」也贊成他的辦法。從此，他便一面辦公，一面繙譯聖經，往來於澳門廣州間，可以不受天主教反對。但是天主教仍舊禁止教友與馬理遜往來。除了在廣州寓所裏舉行家庭禮拜外，每禮拜日在澳門舉行正式禮拜。他這樣獨個兒工作到一八一三年，才由倫敦派來了一個叫米憐（Milne）的同工，自是非常歡迎，却不料遭受官廳及公司的反對，米氏便不能在澳門廣州安身，只好到南洋羣島去找尋立足之處，後來找到了馬刺甲爲根據地，在那裏從事于刻板印書的工作。一八一四年使馬氏最快樂的一件事，便是收得一個信徒，是七年工作中惟一的果子，就是那位幫助馬氏印刷工作的蔡高，於九月九日中國的重陽節那一天，在澳門一處幽靜的海灣中，施行了洗禮。做了中國更正教第一個信徒，雖然沒有多大事蹟可考，但却是一個忠實信徒，不幸在一八一九年便死了。關於他的死，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他是患肺病死的；一說他是被天主教徒誣陷，死於香山縣監獄中的。後來他的兄弟——兄名亞與，弟名亞三——二人都信了福音。

馬氏努力於繙譯聖經與撰著佈道文字，雇工刻板印刷，這時已經成功的，有使徒行傳、神道論、救贖教世總說真本、問答淺說耶穌教法，以及舊約創世記等書；並且進行編輯華英字典，這不但引起中國官府的注意，捕捉印刷刻板的人，也爲「東印度公司」英國總部所不滿，要辭退他的職務。曾經寫信給他這樣說：「本部聽說先生印刷中文聖經和勸世文，引起中國反對，皇帝下有諭旨，禁止這書，並要重治相幫的人，我們想這樣作去，與貿易總受影響。現下議決，公司辭退先生職務。」

因爲那時候，印教書是有干禁律的，清廷曾經頒布過禁止的諭旨，裏面有話說：

「自此之後，如有洋人祕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希圖惑衆，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爲防範，爲首者立斬；如有祕密向少數人宣傳洋教而不改稱名字者，斬監候；信從洋教而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

可見信教及印刷教書等事，都是冒着極大危險的。上述的蔡高兄弟等以及一八一六年在馬刺甲進教的梁發，都是幫助他做印刷工作的人。說到梁發，是廣東高明人，本來是學習雕板的，在一個離洋行街（亦稱十三行）即今長堤，不遠的印刷所裏作工，因此，得與馬氏發生了接觸；曾經向馬氏請求過洗禮，馬氏沒有答應他。後來他跟米憐到馬刺甲去，便變成一個熱心慕道的人，他替米憐雕刻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記板本，大受了感動。在米憐牧師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號禮拜日的日記中寫着這樣的話：

「今日十二時我以三一神之名，爲梁公發舉行洗禮。此禮是私下在傳道所的一室中舉行的。他是廣

東省人，年紀三十三歲，未有家室，除一父一弟之外，並無其他親屬。他受過普通教育，能讀普通書籍。一八一五年，他伴我由廣州來到馬刺甲，他告訴我，他曾被僱雕刻我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記，是否看了這本書而受感動的，那我可不敢斷言。」

這一位在中國更正教歷史上佔着重要地位的第一位中國牧師——梁發——後來做過一番偉大的開創工作，已經有一位李沾恩（Geo. H. Mo. Meur）牧師替代做過一冊專書，敘述他的生平，我們在那本書裏看見他爲耶穌的道理熱心工作。他與米憐在馬刺甲共事三年，在繼續幫助繙譯印刷之外，於一八一八年幫助創辦一所「英華書院」教育中國兒童，這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學校。——後來這所學校從馬刺甲遷到了香港，到現在還存在。——他更熱心地撰著佈道小書，一本叫救世錄撮要略解，末了附着幾段經文三首聖詩和十誡，篇幅雖祇三十七頁，却是第一本中國人自著的中文佈道書，他把這書稿帶到廣州給馬理遜看，印成了二百本，分送親友，却不料因此掀起了大獄，中國官廳把他下在監裏，消毀了板本，並且牽連到馬氏所印的書，連蔡亞三也一併捕去，梁發被打了三十大板，血流至足，經馬氏挽有力商人設法營救，才得爵金釋放，回到馬刺甲，仍舊幫着米憐做繙譯聖經的工作，舊約中從申命記到約伯記那幾篇，是米憐譯出的，梁發在雕板印刷之外，或者也參與繙譯方面的事。這時候他聽到他在先一年所娶的妻子黎氏，在家鄉——高明——快要生產了，便不能不打算回家，一面也希望他的妻子信道，果然不久都償了他的願望，馬氏在報告的信裏說：

「米先生施洗所收的教友梁發領着他的妻子也信主領洗，過了十天，又領他的兒子進德來領洗信主了。」

他把妻兒都獻給上帝之後，仍回馬刺甲，不料那患難相共的朋友米憐於一八二二年六月二日因患肺病而死的時候，祇有三十七歲，他在東方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年工夫，他那不朽的工作，像上述所譯成的舊約一部分，與創辦了「英華書院」外，並且出版一份月報，叫做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這可以說是第一種中文報紙。他又著成一本華文小書，名叫兩友相論，是一八一八年出版的。米憐雖死，梁發却繼承他的精神，像以利沙之於以利亞一樣，回國來傳教了。

這時馬理遜已經工作了十六年，完成兩大著作，一即完畢新舊約聖經的繙譯；一即編輯成一部英華字典，這本書所用的中文參考書有萬卷之多，全書凡六冊，註釋詳細，風俗人物，無一不備，印刷費需要一千二百金磅。這是一件高興的事，不過在高興之中有一件不高興的事發生，就是在三年前所娶的妻子故世了，他的子女已經送回國去，只贖他孤獨的在客旅中，所以他想預備回國一次，作短期的勾留。但使他躊躇的，便是在廣州澳門間沒有人替代他傳教的工作。恰巧梁發回來，却使他非常高興，就封立他為宣教士。——更正教在中國第一個牧師——他自己就在一八二四年回到英國。在梁氏一方面，他既已接受了這重大的責任，格外的熱心傳道，同時註釋一部希伯來書，又做成真傳救世文的短論。在馬氏一方面，回到了已經離開十六年的祖國，到處受人歡迎，並報告中國教會情形，引起多少人的熱情。他又在這時候續娶了，於

一八二六年帶着新夫人及前妻的子女重回澳門，中國官府與天主教都注意他的行動，使他不敢公開講道，只能用工在文字方面。馬梁二人常常在一起，馬氏會說到梁氏的宗教生活，有「如何勤讀聖經，如何長於祈禱，雖然天性暴躁易怒，然却在人前公認是基督徒。他注解羅馬人書，於我們外國傳教士極爲有用」等話。

一八二八年梁氏在故鄉感動了一個少年名叫古天青，爲他舉行洗禮。就和他在本鄉合辦了一個私塾，這可以說是中國內地第一所更正教的教育機關。馬氏向「倫敦佈道會」報告，有關於梁氏的話說：

「梁先生在主辦學塾和向其鄉人傳道之外，還著大批佈道小叢書，此類小叢書共有十二種。其中一種是爲兒童而作的基督徒問答書，其他都爲回答他的非基督教友人所發的反對基督教的問題而作的。」

因爲馬氏對於這些小書，認爲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把這些小書的原稿送到馬刺甲「英華書院」去校對付印。可見他們同樣在著作方面努力。在一八二九年有一個英國畫家名叫程耐里(Chinnery)，替馬氏畫了一幅畫像，上面畫着三個人，馬理遜手執一卷洋皮書，坐在左角。有二個助手，一個老年的俯着頭在執筆寫字，一個站在中央注視老者所寫的少年。有人認爲這老年執筆的就是梁發，少年叫梁滔，但是據湛約翰博士的考據說，「那老者並不是梁發，其名叫陳老宜，少年叫李十公，他的父親是天主教徒，曾在葡萄牙留學。」證明這畫圖的以誤傳誤，我們研究馬梁二人的歷史，看不出他們合作繙譯聖經的事，只

知道梁氏會註釋過幾卷聖經與撰著過若干佈道小書而已，所以馮博士的話是有理由的。

一八三〇年，在這個小小教會裏又增添了一個教友，名叫屈昂。他本來是梁氏的印刷徒弟，後來做了梁氏的傳道助手，幫助分散聖書和勸世文。那一年正是美國派遣傳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與裨理（Abley）二人到了廣州，馬氏非常歡迎，邀他們到家中，乃與梁發相見，他們甚至說「梁發很像耶穌」。在相別的時候，舉行一個簡單的禮拜，梁氏領導祈禱，馬氏把他的禱文譯為英語，並且對這二位美國朋友說：「梁發的禱文，與一般形式主義者的老生常談不同，乃適合於當前的環境，使聽者覺得是出於真心的。」他們從此得着一個很深的印像。

雖然這時候取締傳教與信教的法令非常嚴厲，但是那位梁發一點也不畏縮，常常在一般拜偶像的人羣中，斥責他們迷信，並且逢人便講耶穌真道，在廣州旅館中曾經勸化了旅館主人林某，與做泥水匠的李新，都做了基督徒。又絡繹收了幾個教友，在一八三一年他領了他的父親梁沖和他二個兒子，祖孫三人同日受洗。一八三二年在他給「倫敦佈道會」的報告中這樣說：

「在此數年中，已有數人信從教主，加入教會。此地差不多有十人，一心一志，繼續事主。」

可見這時在廣州已經有一個小小的教會團體，這一個初期的教會，常常在馬理遜家中聚集禮拜。因為人數的增加，給予梁發不少的勇氣，更努力於小書的撰著與印刷，在每逢鄉試的時候，分散給赴考的生員（從前科舉時代，每三年在省城舉行考試，名曰鄉試，赴考的都是些各府縣的秀才。每逢鄉試，有許多人

乘機分送講因果的所謂善書。梁氏學着這方法，乘機分散佈道書。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在一八三三年來到廣州，與梁氏相見，曾經說到過他的分書情形：

「他現在盡力從事於著書，而且已經派送過數千本了。不久以前在廣州舉行府試，有二萬五千個童生從各縣到廣州來，梁發僱苦力數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貢院前面去，他在那裏盡力把生命之道傳播與這些智識階級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個儀容可敬的老人，年紀在五十歲左右。」

一八三四年不幸的事件發生了，就是那位更正教的中國曉星馬理遜，忽然在八月一日晚間休息在救主懷中了。他那二十七年的苦心經營，希望進入中國內地的宏願，沒有實現，還只侷促於廣州澳門之間。雖然曾經在一八一六年做了英國專使的繙譯，跟着到過北京，究沒有像利瑪竇那樣立定脚跟，在他可以說是覺志以終呀！然而他那種勇敢的精神，實在可以感召後來者的熱忱。總稅務司赫德曾經這樣說：

「馬理遜在屢次失敗和絕望中努力奮鬥，卒獲勝利。英雄不是祇能在戰場上遇見，我們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馬理遜就是我們在平民階級中所找到的英雄。」

梁發在那時感到同伴的去世，覺得生命的短促，應當趁着白日加倍努力，所以繼續他那分書傳道的工作，恰巧這一年又輪到了鄉試，又約了他的同伴周亞生梁亞新吳亞清，連日分送出聖經日課二千多份，數天之後，忽然發生意外，知府把分書的人捉去了好幾個，並且捕去他的幾個親戚，結果靠着裨治文馬儒翰 (馬理遜之子) 託人向知府說情，繳納八百元贖金，被捕的人乃得釋放，不過還是要嚴緝梁發。幸虧裨

治文把他和他的兒子進德，藏到伶仃島一隻船上。他雖然經着這一次風浪，可是他並不因此而氣萎。從他分送小書的工作上，發生過很大的效力，就是那個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在赴考的時候，從他所發的小書得了感動。他們既然逃避在伶仃島，後來便從伶仃島到新加坡，馬刺甲等處繼續傳道。還有那個屈昂，也因為官廳說他是私通洋人，要通緝他，逃到馬刺甲，和他們同工。這班教友遭着非常的壓迫，「倫敦佈道會」就派了麥都思博士來慰問，於一八三五年七月到了廣州，遇着一個從梁發受洗的秀才名叫劉蔗泉，他是一個文學很有根底的人，梁發嘗把所作小書請他潤色；因此，他受着感動，於這不幸事件發生的上一年領了洗，他們一見之下，便成好友，不過因為風聲仍緊，只好躲在家裏。梁發之子進德回到廣州，也躲在裨治文家中，那時他的中英文學識，已經很有程度，裨治文對於他抱着很大的希望。鑑於那時的情形，恐於他有所不利，不得不把他送到新加坡去。後來因為麥都思分送小書的緣故，又引起了中國官廳的注意，朝廷派了專員到廣州查究外人分書的事，發覺裨治文也是個極有關係的人，但他是外國人，因此牽連到許多中國商人，風聲愈來愈緊，裨治文再把進德送到馬刺甲。屈昂的兒子，被捕監禁，經過好多時才釋放。

這時這班教友，大都集中在馬刺甲，努力地印書和傳道，有個創製活版華文鉛字的戴耳(Dyer)，就是創立內地會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牧師的岳父，熱心傳道，與梁發共事，所以一八三七年，可以說是馬刺甲的黃金時代，這一年竟有三十人受洗進教。梁氏又襄助美國公理會杜里時(Tracy)編譯一本書，名叫新加坡栽種會敬告中國務農之人，同時，他自己做了一篇鴉片速改文，勸人戒除鴉片。一八三九年，

梁氏回到廣州，那時在廣州沒有英國教士，只有幾個美國教士；在這不安定的局勢下，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同時，因為鴉片問題，中國和英國陷入於戰爭狀態。馬儒翰正在做英國駐廣州領事，梁進德在林則徐手下任英文繙譯，以及公理會『博濟醫院』院長伯駕醫生，都為消滅這行將爆發的戰事而努力，然而却沒有效果，戰事終於在下一年發生了。梁氏正在對時局極其悲觀的時候，得着了兩椿欣慰的消息，就是（一）馬理遜的長婿哈信（Holson）醫生，奉了『倫敦佈道會』的差遣，到中國來，只因爲時局的關係，停在澳門工作，後來才到香港，梁氏父子，都與他合作到底。（二）是米憐的兒子美魏茶（人都叫他小米憐）牧師也到了澳門。這都使梁發特別高興的事。這位小米憐，就是當時米夫人到中國來的時候，在船上所生的孿生子之一，可惜他的母親很早就死了，米憐在馬刺甲去世的時候，這一對小孤兒，無依無靠，只得回到英國去，現在長大了，重新到中國來，很希望同這位父執相會，所以托伯駕醫生帶一信給梁氏，梁氏在回信中說到當時他們回國的情形，使那位小米憐感動得要流淚。到一八四一年梁氏才到澳門去探訪他們——哈信醫生，小米憐牧師——同時，還有一位從倫敦派來的傳教士叫維克哈脫（Lookhart）醫生，也到了澳門，舊友新交，其樂無窮。趁機會講解經義，他們都驚奇他聖經智識的豐富。

中英戰事的結果，中國開了廣州及沿海五處商埠，並且把香港割讓給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這條約不單對中國的國運有極重大的關係，即在傳教史上也是有極重大的關係。從此，傳教得着條約的保護，前此種種不自由的障礙，都一掃而空，所以天主教更正教各教會都得空前的活動起來。『倫敦佈道會』決定

把他們在東方傳教的中心機關，及「英華書院」從馬刺甲遷到了香港，那時「英華書院」的校長就是李雅各 (Lodge)，他帶來了一個青年名叫何福堂，是一個中英文均優的英華學生，能熟讀新舊約原文希伯來文——一面與校長從事譯著，一面熱心傳道，幫助梁發在廣州、香港等地做傳道工作，到一八四六年受封為牧師。後來他與滿約翰 (Chalmers) 牧師同往佛山創設倫敦會禮拜堂，不意遭民衆暴動，搗毀教堂，從窗口逃出，回到香港，不久就在廣州去世，年紀只有五十四歲。他的兒子叫何啓，是香港有名的紳士，他的女兒就是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博士的夫人，還有一個女兒嫁給著名的醫生王寬，在廣州沙基辦理「惠慈醫院」的。

在初期的傳教士中，這位第一任中國牧師梁發，他享壽最長，六十九歲才去世，在他晚年的時候，眼見得教會一天天的發達起來，英美傳教士繼續不斷的來到中國。一方面也看見那些當時同工的人，一個個的凋謝，那個老友的兒子馬儒翰，只有二十九歲便去世了，真有點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以雖然年老力衰，仍舊努力地傳道著作，他在伯駕的醫院中傳道好幾年，感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哈信醫生曾經這樣稱贊他：「我對於老友梁發，是非常的滿意，他忠心盡力，用最聰明的方法宣傳福音。他的演講，人都注意聽他，聽後都十分感動。」

在他六十四歲那年，還感化了一個有為的青年，後來在教會裏也做了一番事業。這位青年姓周名學，號叫勵堂，先前讀過許多佈道小書，認識一位分送書籍的傳道人羅廷喜，由他介紹到梁氏地方，就領了洗。

他幫助梁氏講道並做文字工作，直到梁氏去世。後來進了循道會，服務有四十五年之久，造就許多傳教人才，這是梁氏一生中最後所得的佳果。當他去世以後，他的兒子報告他父親去世的情形說，他在一八五四年跟美國公使到南京去，回來見他的父親身體不像從前康健，勸他不要勞作了，可是他的父親說：『我信道已經有四十年了，外國弟兄尚且不遠萬里而來傳福音給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怎忍放棄不為呢？到最後的一分鐘，也要傳福音於人。』所以在臨死的上兩天，還在醫院中與家中講道，這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值得後人紀念的，所以在一九二〇年，他的墳墓葬到『嶺南大學』之中。

『倫敦佈道會』在中國南方積極工作之外，同時也注意到蒙古方面的工作，一八一七年就有傳教團體從北方到達比勒茲（Belgic）得着俄國皇帝的特許，借道西伯利亞而來，把聖經也譯成了蒙古文，並且也得着幾個信徒，後來因為俄國政府的禁止，於一八四一年傳教事宜就此終止。

英國在中國傳道的團體，除了『倫敦佈道會』以外，尚有其他如『國外聖經會』也會相當的努力，派員幫助馬理遜譯經工作。以及由荷蘭派來的乾尼克（Jan）教士，往來於澳門新加坡與中國海岸之間，學習中國語言，繼馬理遜而為澳門官方的中文書記。

英國以外，注意於中國傳教事業者，莫如美國。一八二二至一八二三年間，他們開始實行散發聖經給中國人的工作，一八三〇年從美國派來兩位教士，即雅俾理與裨治文。雅氏是代表美國的『漁人交友會』來做中國水手的牧師，裨氏則來幫助馬理遜做開創工作的。他們都得着美國商人柯利芬（D. W. C.

Olyphant) 的幫助，能夠安全而自由地到達中國，爲中國傳教事業宣傳，激起美國公理會人的注意，並且使美英婦女團體來幫助傳教工作。裨氏在廣州學習語言，不久辦了一個學校，從文學研究方面進行，同時也印成一報叫中國的倉庫 (The Chinese Repository)，這有名的刊物，不單記載傳教士的新聞與中國的法律制度等等，並且介紹中國的文化給西方人知道。到一八三二年又來了一位司梯文 (Edwin Stevens) 教士繼續雅俾理工作。一八三三年衛三畏來管理印刷的事務，他是一個學者，做了好幾年工作。一八三五年伯駕 (Peter Parker) 醫生來到中國，也是從美國公理會派來的，可以說是更正教第一個到中國的醫生，不過並不是西方醫藥輸入的起頭。因爲以前耶穌會教士已經介紹過金雞納霜到中國，其次在『東印度公司』中的外科醫生，亦曾爲中國人看病。有一個醫生名叫畢爾生 (Pearson) 曾經教過中國人種牛痘，還有一個考蘭其 (T. R. Colledge) 醫生在澳門開設一引藥房。馬理遜也做過點醫藥的工作。不過伯駕是專門辦理醫藥事業而來的，他不單在醫藥方面有專門技能，而且在科學方面也受過相當訓練。既到中國，先在新加坡學習中國話一年，就在廣州設立個眼科醫院。這些都是美國公理會幫助馬理遜在中國的開創工作。說到公理會，最初在廣東是叫他『網紀慎會』，是譯音的，是從所謂『網紀慎主義』 (Congregationalism) 譯出的，意思就是『人民平等聚議』，所以後來便改稱『公理』。同時也稱爲美部會，因爲在美國公理會中有一個國外佈道部，所謂美部者，即『美國佈道部』的簡稱。他們來中國的最初動機，是在一八二八年的時候，有旅美的廣東華商二人，請求派遣教士以助馬理遜而起。但是到了一八

六七年，他們却放棄了在廣州傳教的工作，遷到了北京去。因為他們鑑於在廣州三十七年工作之間，收效太微，只成立了兩處禮拜堂，和醫院女學校各一所，而且受洗進教的人只有三個。所以他們把廣東傳教工作讓給了長老會。

說到浸禮會，在一八三三年就有一位教士名叫瓊司 (John Taylor Jones)，從緬甸到曼谷，替四個中國人施洗。過了兩年，又有一位鄧惠廉 (William Dean) 也到了曼谷，在那裏組織了一個小小的禮拜堂。一八三六年叔末士 (John Lewis Shuck) 帶着家眷到了澳門，這可說是浸禮會第一個到中國的牧師，他曾經到廣州視察，因為官廳的禁止，不能停留，只好退回澳門。次年又有一位羅孝全 (J. J. Robert) 牧師，自費來華，也住在澳門，無法進入廣州。直到一八四二年才由澳門遷到香港，在皇后路建造起禮拜堂與住宅。再由香港推展到中國的內地。

其他還有禮賢會，在一八三〇年有一位德國教士叫郭士立，由荷蘭教會差遣，到中國傳道的，先遊歷京津，後到了閩粵，同樣感到不能在中國立足，退居澳門。迨中英戰事起，香港政府聘請他做繙譯官，乘機在公餘之暇，宣教聖道。後來繼續派來柯士德、葉納清二教士，柯氏在江門病卒，葉氏在虎門鎮口佈道施醫，第一個信教而後來協助傳道的，名叫王元深，即今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的祖父。同時，有稱爲巴陵會的，也是郭士立所手創，一八七二年禮賢巴陵二會合併，在廣州油欄門開堂宣教。後來才推廣到廣東各地。

美國聖公會在一八三五年會派了韜韓二位傳教士到中國來，因為不能入境，就駐在小哇對華僑

道。直到一八四四年有文惠廉主教東來，方才成立了上海聖公會的基礎，漸及於江蘇全省，更進而推到皖贛鄂湘等處。

一八三七年美國長老會聽到馬理遜在中國傳教情形，就派了兩位教士到中國來，這兩位教士，一位姓密，一位姓何，因為中國那時還是禁止傳教，只得在新加坡設堂佈道，並且繙譯聖經，不到幾年，密氏去世，何氏回國，到一八四二年遂有斐禮華教士來到澳門，又繼續派來了幾位教士，逐漸分工到寧波，到廈門，到上海；在廣州澳門之間的有哈巴與高利兩教士，後來高利也到了寧波。

這些材料，都是幾年前從他們本公會的領袖處探訪得來的，但却有些模糊影響，連傳教士的名氏也舉不出來，我們更無從知道他的詳細了。不過在這個時期裏，短短的三十多年工作，却已奠定了更正教在中國的基礎。受洗的人數雖不到百人，然而他們所發生的影響却是很大，例如梁發，從他一人的熱心，收得了多少的果子。聖經也已經譯成了，又發行許多的小書，在這些小書中最顯著的效果，從太平天國洪秀全身上表現出來。同時，中國的文學書籍，也有些譯成了英文，使外人知道中國是個文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學校，醫院，報紙，亦都開始辦理，西洋文化得由此介紹進來。只是因為中國嚴禁傳教，這些工作的活動，大都在南洋羣島，如馬刺甲新加坡等處，那些教士，亦都徘徊於中國門口，廣州十三行街，雖容許外國商人自由居住，澳門為中國政府所指定的外人居留地，然而十三行街只限於商人，澳門又為天主教所壟斷，所以更正教教士之來，不但得不到幫助，反而遭受他們的種種壓迫。馬理遜也只好借着一「東印度公司」的招牌，得

居留廣州，秘密工作，可見當時傳教的困難了，直到南京條約規定在商埠傳教不受限制以後，方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第十四章 太平天國與基督教

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用種種方法來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但是潛伏在秘密黨會中的反清復明思想，卻並不因此而根本消滅。自乾嘉以後，滿人的威福日盛，國勢又日益衰弱，草野之間，往往有志士揭竿而起，以官逼民變相號召；遂有道光六年的貴州之變，十五年的趙城之變，雖經次第蕩平，然繼此而起的幾乎無年不有。最著者如天地會之於湖南，三合會之於廣州，潛滋暗長，大有此仆彼起之勢。彼滿人既不思根本改圖，反而驕縱自恣，專事壓迫，外交上又著著失敗。鴉片戰後，門戶開放，國土日削，民生日敝，加以天災流行，饑饉頻見，卒至民不聊生，挺而走險，遂釀成洪楊之役，樹民族革命之幟，由廣西起義而瀰及全國。十三年命運的太平天國，事雖未成，亦足予滿人以重大打擊。記其事者，往往目之為寇逆，加以種種惡名，如平定粵匪紀略一書，記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並附着賊名邪說逆蹟瑣聞四卷，雖屬片面的理論，然亦足為歷史參考材料。又如太平天國野史、大平天國外紀等書，一方面見得滿州功狗片面的誇誕，一方面卻可以見得太平天國的聲勢。

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於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年）生在廣東花縣，野史中有天王本紀一篇，載其自幼聰穎，喜研歷史，對於歷代成敗興亡事跡，尤為注意，曾應童子試，不第，或謂其曾為秀才，所應的考試是鄉試。當他到省城考試的時候，有人送他一本小書，名叫規時良言。（這本書就是當初梁發所著的勸世良

言，中間包含九種小書的一個集子，由馬理遜代輯付印的。）他帶了那份基督教書籍回到他的家裏去，起初並不注意，把牠放在書架上有九年之久。一八三六年，他的考試又名落孫山，懷喪歸來，得了一場大病，據天王本紀裏記着，他在病中遇到一種異象，其情形如下：

「這一天，他因臥病在床上，忽然暴死，但心裏却很明白。起初，似乎看見一條龍，一隻虎，和一隻雞，一同走進房裏。接着有一隊人馬，奏着各種音樂，後面跟着一頂綵轎，到了房門口，就有一个人上前請他上轎。他心裏非常驚奇，又無法推辭，就跟着來人，坐上轎子，到了一所光明華麗的宮門口。站在宮門口的許多男女，看見他到了，都向他鞠躬致敬。有一個老嫗，引他到潔身池去沐浴完畢，就有一隊老者來引他到一間小室裏，將他的肚子剖開，取出舊的心臟，重又安上新的心臟，然後縫合起來，毫無痕迹。於是，他就一人走出室門，遊覽宮內。但見四面牆壁上，刻滿勸善的碑文。走到正殿上的時候，忽然看見莊嚴燦爛的寶座上，坐了一位黃髮黑服的老人，招他上前，流着淚對他說道：「世界上的人類，都是我所造成，衣食一切，莫不是我所賜給；但是人類不但不知報本，反而背棄我而去親近惡魔了。我希望你能夠快去蕩滅惡魔，扶持真理，使人類都能返本歸元。」說完，又拿了一把寶刀，和一顆金印，送給他，算是委他去勦奸扶正的憑證。」

他在這恍惚的病態中，說是常常遇見異象，據他自己說：「有一天，他曾夢見一位中年男子，囑咐他要努力斬除惡魔，洗滅罪惡。」他以為這中年的男子，就是天兄耶穌。在寶座上的老人，就是天父耶和華，這種

異象，是真是假，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把牠當作一種「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閒話看罷了。

直到一八四三年，他坐在書房裏看書，有一個朋友來拜訪他，發現那本在書架上擱置已久的書，才引起他的注意。當下便把牠打開翻閱。一讀之下，便覺得從前在夢中所得異象，都是上帝的啓示，他就拔劍而起，從事於革命運動，這本規時良言，却成了太平天國革命的動機。後來有一位教士美都士 (Meadows) 在一八五六年做了一本書，中間論到梁發對於洪氏的影響說：

「洪秀全和他的友人馮雲山決意到外省去傳道，而以販賣筆墨維持生計，那是他受了梁發書中所載的「先知在故土室家外，莫不受人尊敬」的一句話，和使徒行傳十九章保羅傳道事蹟的影響。」洪氏既從這本書受了感動，便和他的同志馮雲山加入到朱九疇所創的上帝會。原來這個會陽以傳教爲名，陰實圖謀恢復明室，朱九疇死了以後，他就被推爲上帝會的領袖，與同志們楊秀清等共同研究這本所謂規時良言，增加了他們對宗教的熱忱。一八四七年他第三次考試又失敗了，他決意想加入教會，願便去拜訪美國浸禮會羅孝全牧師，他與那牧師同住了幾個月，沈潛於基督教的教訓之中，他便請求牧師與他施洗，可是羅牧師因爲他對於神學的認識不很透澈，拒絕了他的請求。洪秀全在失望之餘，回去繼續他自己的團體，廣事宣傳，反對崇拜偶像，聯絡革命同志。當時清廷對於一切秘密會社，曾嚴厲取締，上帝會自然也在取締之列，他只好逃到香港。在香港又有機會與教會接近，跟着德教士郭士立研究基督教道理。大約在這時候，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只因後來他的革命事業失敗了，便有人否認他是基督徒。他曾經採取

梁發所用文字佈道的方法，也著了許多佈道小書。他初期所作的小書，極合於基督教教義，其中有一種名叫宗教戒律，麥都恩牧師曾經這樣說過：

『此書可說是太平天國諸人所著作的一些書中最好的一本，其理由正當，其禱文亦佳，而其關於人類之邪惡，耶穌以血救贖人罪，及聖靈感動人心等教義之敘述，皆能引導一切有志求道之人，共行天國。』

洪秀全所組織的團體，除了分送他們自己所著作的佈道小書外，又印送新約聖經。當時英國教會對於他們這種運動，認為極有希望，以為可以使中國人趨向真道。所以英國聖書公會在五十週年紀念時，籌募款項，印送華文聖經，響應洪秀全的工作。洪秀全在廣西鵬化山中，爲了要遠避官廳耳目，仍用上帝會名義，親自帶了馮雲山李秀成等同志，到各處宣傳上帝的道理。但是因爲他時常勸人必須毀掉孔子牌位，和一切泥塑偶像，專心拜一位上帝，所以到處都引起人的反對，說他是傳邪教。不得已，只好帶着一班同志，走到苗族區域之內。數月之間，各地加入上帝會的，已有幾千人，他一面傳教，一面著作勸世文和讚美詩，分散給各地教友與民衆，這些文字，都成了太平天國的重要文獻。據林利氏的太平天國外記中說：

『洪氏這時候，還沒有注意到新約這部聖書，他注意到的，只是舊約的文字。』

我們從洪氏的作品和思想上研究，覺得這幾句批評是很對的，因爲洪氏在太平建國的時候，仍是脫不了帝王思想，而且他們唯一的宣傳，只是叫人反對偶像，專門崇拜上帝，對於耶穌贖罪重生等項道理，不甚注重，這不過是舊約中的教義而已。而這種急進地破壞偶像的宣傳，對於一般人民的生活習慣，不免發

生醜態，因此，不但在教徒和平民之間，不能相容，也引起官廳們的注意，說他們妖言惑眾，嚴加禁止，但是他們仍舊努力地進行，發展得極快，教人一天增加一天。據說楊秀清能說預言，並且能用祈禱治人疾病，於是各地人民不願官廳的禁令，紛紛加入教會。他們又定出許多教條，禁止教徒吸煙飲酒，更不許吸食鴉片。每七天禮拜，一依基督教儀式。這時候，他們鑑於勢力的漸大，一面仍舊主持上帝會傳教事務，一面乃與當地人士，如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結為弟兄，創立起一個保良攻匪會，明為保衛地方，實是借此以抵抗官兵，免遭逮捕。

當道光末後的幾年，廣西連年饑荒，人民多有餓死的，官吏只知貪贓害民，絕不顧到民間疾苦，因此各地盜賊如毛，挺而走險。韋昌輝本為當地富豪，藉上帝會名義，廣為施濟，於是災民與盜賊，都聞風而來，投入上帝會，想藉此得着庇護，官廳得此消息，深恐發生意外，桂平知縣將洪秀全逮捕，並搜獲入教名冊，將與大獄，並處洪氏以死刑，廣西巡撫鄭祖琛本是一個慈祥忠厚的人，不願多所殺戮，命將洪氏釋放。不久，他們便以「打倒滿清，恢復漢族」為號召，已成揭竿之勢。因此驚動朝廷，立命巡撫率兵捕剿，實偏處此，便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起義於金田村，有衆萬人，兵皆蓄髮，人皆呼為長毛。不二月佔據永安，擁洪氏為天王。清廷派提督向榮副都統烏蘭泰與戰不利，因為太平軍銳不可當，勢如破竹，連奪數十城，清兵望風披靡，不久攻陷湖南，水陸並進，不到八個月工夫，居然攻進南京，遂建立太平天國，封起義諸人為王，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其餘如洪大全，秦日綱，胡以洗等，莫不封王列

候，聲勢浩大。

太平軍爲什麼有這種銳氣呢？自然是由於民族思想的鼓勵，人人希望驅除韃虜，光復漢家，所以呼滿人爲妖魔，以殺盡妖魔爲口號。然此不過是表面上的號召，猶不是他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却是他們的宗教信仰與組織。他們的軍隊是宗教化的，軍人都充滿着宗教的犧牲精神，所以每遇戰事，莫不勇往直前，置生死於度外，並且相信死後得進天國，可以享受永生的快樂，反而看死是一件很榮耀的事，以不怕死的太平軍隊去打怕死的清軍，勝敗之數，無待著卜。所以太平軍的起義，雖然是得力於種族革命的號召；但若沒有宗教的組織和訓練，也必不能有如此神速無敵的功効。我們看洪秀全初出兵時的檄文，開端數說滿人的罪惡，接着便說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來拯救人民，你們官民人等，從前誤爲滿人所用，現在應該棄暗投明，作天聖的子女。並且說到天父恩德高厚，果能敬天識主，莫不一視同仁。在這篇長凡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一則曰「天父天兄，命我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再則曰「爾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這不獨充滿着民族精神，尤其是充滿着宗教精神。

再看太平軍當攻取一城一邑的時候，必先派間諜去張貼許多布告，宣傳革命的意義。說太平軍是稟承天父的旨意，來驅逐滿族妖魔，拯救天父的子女的，凡歡迎太平軍的，就可以出迷途而登天國。這一套話，很能迎合一般人民所謂「真命天子」的思想，所以每每軍隊還沒有到那個城，已經得到了人民的歡心。其利用宗教思想以收拾人心，往往如此。

太平軍所定的軍律，尤其處處充滿着宗教的意義，如軍營規例中的第一條，便是『要恪遵天命』，第二條『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等類，沒有一種儀式不是從基督教採取而來的。所謂天條，就是基督教的十條誡命：（一）崇拜皇上帝，（二）不好拜邪神，（三）不好安題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禮拜，（五）頌讚皇上帝恩德，孝順父母，（六）不好殺人害人，（七）不好奸邪淫亂，（八）不好偷竊劫搶，（九）不好講謊話，（十）不好起貪心。又在每條底下，附着一首極普通的七言四句韻語，或者可以叫牠是詩；像第一條底下說：『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禮拜自超昇，天條十款當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餘各條底下，都有這樣相同的詩，這又與現在基督教所歌唱那些讚美詩差不多。除了這十條天條之外，還有許多歌詞之類，要每個軍隊中人，背得很熟，否則便要處罰，或責打，或處死。這種強迫式的宗教，使每個軍隊中人都成爲教徒，照這樣的情形，如果太平天國成功以後，一定把這種變質的基督教定爲國教，所以太平天國的失敗，照我看來還是基督教的大幸。因爲他們雖然採取基督教的形式，却失去了基督教的精神。且看他們的禮拜儀式，每一枝軍隊中必定有一個禮拜的地方，凡是軍隊駐紮在什麼城市村墟，必先建造一個宏大的板房於曠野之中，爲房虛星昴四天禮拜之用。他們禮拜的儀式，一方面採取天主教方法，一方面復參以中國拜天的習慣，所以便成了一種特創的儀式。堂的北端正中設一方桌，桌前繫繡花紅桌幃，外懸幃幔，張掛燈彩，聯畫軸，陳設鼎彝花瓶屏鏡明角燈之類，名之爲天主桌，很像佛教的佛堂，惟不設香案，以其不燃香燭故，或設油燈兩盞。又設花瓶或帽筩一對，插尖角小黃綢令旗一面，桌前置長約三尺的小竹板，上面

寫『奉天令』三字，爲戒責之用，這又像衙門中的公案。桌後設坐椅若干，椅上各披椅衣，自三座至七座不等，要看頭目與先生的多寡而定，禮拜時各頭目先生坐於其上。此種別開生面的離奇陳設，實足予人以不良的印象。

再看他的禮拜情形，禮拜的前一日，有人一手荷着一面旗幟，一手敲鑼周行市上，口裏高呼明天禮拜。到了半夜三更時分，即開始禮拜，燃點桌上油燈及懸掛的彩燈。並在天主桌上供設清茶三杯，飯三盂，肴三盤，鳴鑼聚衆，頭目先生各坐正中，餘皆環坐，齊誦贊美，然後先生跪誦章表，寫着全館（即全營）中的人名，誦畢焚化，這又好像道教中的建醮形式。此後或講道理，或誦經文天條，最後以所供肴饌分享衆人；是日皆可向廚司領得豐盛食品，休息快樂。這是七日禮拜的大概情形，各館中都是如此舉行的，平日亦有兩次禮拜，在朝餐與晚餐時舉行的，也是鳴鑼召集，像禮拜日一樣，不過略爲簡單一些，禮拜既畢，方始就食。即在軍事匆忙的時候，亦不能廢。這種儀式，後來漸成爲一種具文，那些禮拜的人，往往覺得討厭，暗暗咒罵，但因爲法令森嚴，無法規避。如果有無病貪睡，聞鑼不到，必杖責數百板，三次無故不到，便要斬首，所以心裏雖不願禮拜，却不敢不到，如有人犯了過失，便要在這當衆責打，即天王亦不能免。

各王宮中也有這樣的禮拜場所，陳設較爲侈麗，凡遇禮拜，得向天廚中領取海菜及點心之類，爲敬天之用，實則借此多領食物，爲宮中人享樂。遇有喜慶，亦行此種禮節，盛饌取樂，無論何事，都以禮拜爲準。即出兵打仗之前，或打仗回來，無論勝敗，皆要召集大衆禮拜並講道理，如遇敗仗，要歸罪到一二人身上，說他們

犯了天條致干天父之怒把那人當衆處死或者別的時候要治一個人的錯過也是用講道理的方法辯理或打或殺說皆本之天意。講道理是一樁極普遍的事，無論遇到什麼事體，都要召集大衆講道理，亦若現在的當衆演說。所講的道理大都是說到如何敬拜天父，如何練習天情，如何熟悉天條，有時講到天父七日創造天地的故事，或說天父的慈愛，如何照顧我們，萬事都要由天父安排，切勿懼怕。在一個限定的期間，必須把天條儀文背熟，逾期若不能背出，也要處罰，甚至處死，因此，太平軍的紀律很嚴明，都能服從命令，勇氣百倍。這些情形，是我的父親當時所親眼目親的。

在太平軍中有一位曾經在倫敦會做過傳道的名叫洪仁玕，是天王的本家，封爲干王，他特地脫離教會工作，投身到太平軍中，原想向軍人們傳道，不料天王却命他當軍師，做軍事上的參謀。他對於宗教的制度和組織，曾經想加一番改良，但是積重難歸，不能奏效；只有在規畫教區的一方面，有一些貢獻。規定凡二十五家爲一教區，設教堂一所，有一個教士主持教務，合數教區設一牧師。在縣有縣牧師，在省有省牧師，這些牧師大概是地方長官兼任的。後來他同忠王李秀成駐紮在蘇州，倫敦會教士楊格非特地從上海去看他，希望得着太平軍的保護，可以在軍事區域裏往來傳教，第一次却祇見到了忠王，忠王自己說他是信基督教的人，和西國人本是弟兄，所以很歡喜彼此常常往來。第二次才得見干王，很受干王歡迎，並且探聽教會的工作，他又說：「基督的國，必要發達，終久要戰勝一切敵者。」楊氏就在他的營裏領了一個禮拜，干王自己唱了一首讚美詩，覺得太平軍中的宗教空氣，非常濃厚。後來，由干王介紹，得到南京謁見天王，要求天

王出一諭旨，准傳道者在天王轄境內，有隨意傳教的自由，得着天王允許。可見太平軍不但使他的軍隊宗教化，也是希望宗教能普遍到民衆。

現在我們所提倡的白話文，以爲是文學革命中的產物，是空前的，却不知道當太平天國的時候，早有過一番改革。我們且看一看他們所用的經典與文告，有好幾種很通俗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很淺近的，與現在的白話差不多。想不到在貴族文學極盛的時候，竟有這種平民文學出現，可見太平天國的革命，不單是單純政治民族問題，也是及到了宗教與社會革命。他們每禮拜所誦讀的，有所謂新遺詔、聖書、舊遺詔、聖書。我們現在把新遺詔、聖書與新約馬太福音比較一下，覺得完全是一樣的。第一章講耶穌的譜系和降生，以下每章都與馬太所記相同，全書也有二十七章。文字都是非常的淺近。他們辦理許多初級學校，實施國民的強迫教育，同時，也用開科考試的科舉，分爲男女兩科。以聖經裏的教訓做考試的題目。特編三字經、幼童詩、做初級學校的教科書，是根據新舊約的歷史編成的，文亦淺顯。

三字經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萬物備。六日間，盡造成，人宰物，得光榮。七日拜，報天恩，普天下，把心虔。說當初，講番國，敬上帝，以色列；十二子，徒麥西（即埃及國），帝眷顧，子孫齊。後狂出，鬼人心，忌與旺，苦害侵。命養女，莫養男，煩役苦，實難堪。皇上帝，垂憫他，命摩西，還本家。……乃釋放，出麥西，日乘雲，夜火柱。到紅海，水汪洋，以色列，實驚慌。遣兵到，上帝欄，會紅海，水雨開，以色列，盡保全。行至野，食無糧，降甘露，人一觴。西

奈山，顯神蹟，命摩西造碑石。皇上帝，設天條，傳至後，暫不遵，中魔計，陷沉淪。皇上帝，憫世人，遣太子，降凡塵，曰耶穌，救世主，代贖罪，真受苦，十字架，釘其身，流寶血，救凡人。死三日，復重生，四十日，論天情，臨昇天，命門徒，傳福音，宣詔書。信者救，得上天，不信者，定罪先。……」

全書有三百五十二句，從這裏所節錄的幾句，見得牠是完全敘述基督教歷史，每個小孩子，從小讀熟了這樣的詩，將要發生什麼樣的效果呢？幼童詩是仿從前的神童詩，是五言一句的意義上與牠差不多，是說到禮拜上帝的重要。此外有許多詩歌和格言，如敬雙親詩，君道詩，臣道詩，父道詩，母道詩，子道詩，媳道詩，以及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婦道……等等，都各有詩。又有身箴，目箴，耳箴，口箴，手箴，足箴，也各有詩，而且每本書末附載天堂詩一首：「貴賤皆由己，為人當自強，天條遵十款，享福在天堂。」文字都是那樣的通俗淺近，在一般士大夫眼裏，自然覺得太俚鄙，但却不知道是普及思想的利器，這方法在更正教初期也會採用過。另外有所謂天父上帝醒世詔，也稱為十全大吉詩的，是七言一句，不但俚俗，而且像一種謎語，每首詩裏用拆字的方法，暗藏着一個字。好像第二首說：

「人字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間，爲人不可起歪心，全敬上帝自無尤。」

這裏面是明明含着一個「全」字，十首詩都是這樣子，在我們覺得很奇怪，然而在民間文學的疇範裏，却有偉大的價值。而且我們看牠末一句不押韻，用一個「尤」字煞脚，若然要押韻，很可以換個「愈」字，這又可看見他們對於舊詩的格律音韻，一起推翻了。我們又在他們的文告中，看見許多忌諱的字？例如：

把「丑」字改作「好」字，「卯」字改作「榮」字，「亥」字改作「開」字。還有一種特別的名詞，像「燈草」、「放草」、「寬草」、「一條草」這一類，很有些莫明其妙，後來纔知道「心」字是忌諱的，所以用「草」字代替。但是爲什麼忌諱？爲什麼這樣改法？到底什麼意思？却不能知道，在宗教上恐怕是沒有關係的。

林利氏在太平天國外紀中說道：

「基督教在中國三十年中，僅得千四百信徒，今太平天國一旦有七千萬信徒，而歐洲教士，不知加以扶助教導，其外交官且禁止教士入太平境，此其顛倒之甚者矣。」

又有一個美國人名叫白齊文，他本來在清軍中服務的，鑑於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竟表示非常的欽佩，特地從清軍中出來，投身到太平軍中，爲之計畫軍事。並且說：

「鋒鏑之中，乃能篤信宗教，不失儀節，其道德自當高出於清軍，吾何憤憤，乃爲虎作倀，憑利器而殺上帝之信徒哉？」

於是他便在神前懺悔，誓效忠於天國，後竟爲太平天國而死。可見西人中贊成太平軍的，大有其人。可惜有許多教士，看見太平天國的宗教儀式中，加入了許多中國固有儀節，認爲基督教的叛徒，加以反對，各向他們的本國政府報告，說了許多壞話，像郝姆斯的南京遊記中有一段說：

「洪秀全不是一個詐騙者，也必是一個無智識的狂徒；從他的人，都是些危險分子。他的組織，無異於

「韋盜匪，擁戴他做盜匪的頭兒罷了。」

這篇遊記，由英公使轉呈到英政府，英政府受了他的影響，便把太平天國看做亂黨，派兵幫助清政府攻打，這是太平天國失敗的一個原因。所以林利氏很爲之不平，說：

「太平之宗教戰爭，不背上帝之誡，而歐洲教士之至支那者，未能扶助此宗教之革命……如維多利亞主教，如約翰，如密爾，如密納，如洛勃斯克，如倫白等，皆未反對者。獨有郝姆士，則更狂詆太平，不足以傳教矣。」

真是「說好不足奇，說壞傳千里。」像郝氏的話，便發生了極大的壞影響。尤其是那時的天主教徒，對於太平天國，大都表示不滿。原來洪秀全的上帝會，起初是取法於天主教的，後來又受了耶穌教的影響，對偶像，不獨把佛道教的偶像，盡行毀壞，就是天主教的聖母像等，也爲他們所蹂躪。於是天主教人把破壞正教的罪名，報告到羅馬教皇和法國政府，於是法國政府便與英國政府抱同樣態度，幫助清政府平亂。

同時，他那毀壞偶像，不拜祖先的舉動，與中國數千年來牢不可破的習慣相背。凡太平軍所到之處，廟宇偶像，無一倖存，初起，大家知道是民族革命，所以十分歡迎，及至定都南京以後，卻變成了社會革命，連一切宗教上的遺傳，都用激烈手段澈底破壞，不但如此，凡一切習慣和風俗，都要加以改革，如禁止纏足，改用陽曆，實行共產，都足以引起舊社會的不安。所以後來的人民，不但大失所望，更發生仇恨之心，不可謂非太平軍操之過激的緣故。清政府便利用這種社會弱點，從舊禮教舊宗教方面去鼓動人民反抗，使十三年壽

命的太平天國，乃至功敗垂成。質言之：太平軍之興，興於利用宗教的力量，太平軍之亡，也亡於宗教上的矛盾。因為太平軍以破除迷信為前提，而他自己所產生的宗教，仍舊是變相的迷信，想要利用宗教做手段，來達到他的革命目的，那自然要失敗的。而且這種強迫式的宗教，像林利氏所說：『一旦有七千萬信徒，』這種信徒，我以為完全靠不住的，當時即使成功，也是於基督教有害無利的。

我們述說太平天國的經過與他在宗教上的情形，最大的用意，不過是證明馬理遜梁發等教士們工作上所生的影響，而這種影響，究竟是好是壞，那是另一問題。

第十五章 道光以後天主教的復興

一七七三年耶穌會被羅馬教皇解散以後，天主教在中國傳教工作，幾乎陷於停頓；直到一八一四年，在歐洲始行恢復，一八四二年由教皇選派巴黎南格祿（Gotteland）與艾方濟（Esseve）李秀芳（Brueyre）三人重來上海。其時正值鴉片戰爭結束，中英條約上有：

「耶穌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一體保護」

的話，於是教士來華設堂傳教，爲條約所許。從此基督教在中國轉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八四六年道光又有上諭說：

「前據耆英等奏，學習天主教爲善之人，請免治罪；其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圍像，誦經講說，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教堂，除改爲廟宇民居毋庸查辦外，其原有舊房屋，各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

因這道上諭與後來法國條約所規定，各省天主堂均得收回。例如上海南門的聖墓堂與老天主堂，皆歸還天主教；北京的南堂，亦得啓封。於是天主教工作，不但盡行恢復，抑且日見進展；各國天主教的修會，又紛紛派員來華。除耶穌會已於一八四二年重來分派在江蘇安徽兩省及河北省東南部傳教外，不久，在上海徐家匯設立了總部。由各修會認定地點工作：如傳教於福建的，則由西班牙多明我會士管轄四川貴州

雲南兩廣滿洲和西藏的，則有巴黎外方傳教會；在山東山西陝西湖北湖南五省工作的，則有方濟各會士；至於遣使會的教士們，接管耶穌會在河北江西河南浙江等處工作。到十九世紀的下半期，更有其他修會來華，試觀下表：

各修會來華工作表

年份	會名	傳道地點
一八四二	耶穌會(重來)	江蘇、安徽、河北東南部
一八五八	密良外方傳教會	河南
一八六五	聖母聖心會	蒙古
一八七〇	教學會	香港
一八七九	奧斯定會(重來)	河南
一八七九	司帶爾聖言會	山東一部
一八八三	苦修會	河北楊家坪
一八八五	聖伯多祿聖保祿會	陝西
一八九三	聖母小昆仲會	上海

一九〇二	慈幼會	澳門
一九〇四	巴爾瑪外方傳教會	河南
一九一七	伊蘇登外方傳教會	貴陽
一九一八	瑪利諾外方傳教會	廣州江門
一九二〇	聖高隆龐外方傳教會	漢陽
一九二一	苦難會	湖南辰州
一九二二	比布斯二心會	瓊州
一九二二	聖心司鐸會	雲南大理
一九二三	救世會	福建邵武
一九二五	本雪爾凡尼的本篤會	北平
一九二五	印五傷司鐸會	河北易縣
一九二五	司格包羅勃埒夫外方傳教會	浙江處州
一九二五	開培克外方傳教會	遼寧四平街
一九二六	洛本的本篤會	四川西山

一九二六	方濟各特規會	陝西興安
一九二六	白冷外方傳教會	黑龍江齊齊哈爾
一九二八	奧斯定重整會	河南歸德
一九二八	贖世主會	河南駐馬店
一九二八	聖奧油爾的本篤會	吉林延吉
一九二八	聖若翰保第斯大小兄弟會	安國(華人自立)
一九三〇	主徒會	宣化(華人自立)
一九三三	奧斯定常律會	西藏
一九三三	聖母心子會	安徽徽州

根據上表，我們看見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修會，有三十餘種之多，另外還八十多個女修會，可見他的派別也是很多的。不過德禮賢氏在他所著的中國天主教史十三章內這樣聲明說：

「非天主教讀者，宜注意此等傳教會，都是天主教各種修會，並不是像聖公會長老會等各樹一幟，不相統屬的。天主教內傳教會，不過是修士團體，都在唯一天主教公教教會以內。」

外國來華的女修會表

年份	會名	工作地點
一八四二	仁愛會	
一八四八	沙德聖保羅女修會	
一八六〇	加諾薩女修會	
一八六七	拯亡會	
一八六九	聖衣會 隱修會	上海
一八七五	包底歐上智會	
一八八六	方濟各聖母傳教會	
一八八九	多明我女修會	
一九〇四	安老會	上海
一九〇五	司帶爾聖神忠僕會	山東兗州
一九〇九	加拿大聖母始孕無玷會	廣州
一九一〇	埃及方濟各女修會	湖北老河口
一九二〇	瑪利諾多明我外方傳教修會	香港

一九二〇	山林聖瑪利亞上智汀會	河南開封
一九二二	包勒杜瑪利若瑟會	熱河
一九二二	勒奶維爾天神母后會	貴州貴陽
一九二二	聖若瑟小姊妹會	山西潞安
一九二二	羅馬聖烏蘇拉會 羅馬聯合會	廣東汕頭
一九二三	南林勞萊篤會	漢陽
一九二三	聖母進教之佑會	廣東韶州
一九二三	魯文奧斯定會	寧夏
一九二四	加拿大寶血會	河北獻縣
一九二五	奧斯定第三會教學修女會	湖南常德
一九二五	吾主仁愛會	湖南辰州
一九二五	方濟各會服務醫院會	山東濟南
一九二六	聖高隆龐傳教修女會	漢陽
一九二六	畢資堡聖若瑟修女會	辰州

一九二六	聖母贖撈會傳教修女會	蘇湖
一九二六	加羅薩聖母會	獻縣
一九二六	耶穌聖心會	上海
一九二六	聖心會修女會	浙江嘉興
一九二六	救世主會	福建邵武
一九二七	巴爾瑪烏蘇拉聖心會	安徽蚌埠
一九二七	盧森堡方濟各第三會仁愛會	湖南永州
一九二八	奧斯定重整會	歸德
一九二八	永久朝拜方濟各會	武昌
一九二九	沃海窪若瑟山仁愛會	武昌
一九二九	聖十字架修女會	齊齊哈爾
一九二九	巴伐利亞方濟各沙拉諾修女會	山西朔州
一九二九	奈繆聖母修女會	武昌
一九三〇	美國本篤會修女會	甘肅平涼

一九三〇	嘉布遣會第三會聖家會	
一九三一	門斯德聖母始孕無玷會	山東濟南
一九三一	耶穌孝女會	安慶
一九三一	善牧會	上海

從鴉片戰爭以後，天主教事業的發展，固已不是已往所可比擬。然而在這發展的過程中，却又遭遇到不少的風波；其所遭遇的逼迫，實比更正教為大；且略舉咸同以來的天主教教難如下：

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在廣西西林法國神父馬奧斯定為知縣張鳳鳴逮捕處死，同時有教士貝滿及女教師曹桂英皆一同喪命。經法領事交涉之後，乃將該知縣革職了事，此後殺死外國人及教友的事，仍舊繼續不斷地發生；如兩廣總督葉銘琛捕殺了英國的水手，焚毀了工藝廠，便引起極大的交涉，同時法國亦因中國官吏屢次有殺死教士的事，英法兩國便聯合出兵，會師於香港，移文兩廣總督，要求遵約保護，賠償損失。不意葉銘琛竟置之不理，反而下令備戰，結果葉氏兵敗被擒。這是咸豐七年的事。次年二月間聯軍移師北上，要求派遣大臣議約，清廷又不理。不得已率師進逼，於五月三十日入天津，清廷始派大學士桂良議和，訂立天津約條，說定第二年換約，兩國遂撤兵。清廷又復反悔，並出上諭禁止傳教，到了次年六月間換約時，不但拒而不行，反命僧格林沁封鎖白河，伏兵攻殺英兵五百餘人，並毀戰艦三艘，朝廷且嘉其忠勇。禁

止傳教，更甚於前。江西福建又有查擊教友的事。英兵既中伏敗衄，乃約同法國，派遣大隊戰艦，以圖報復。兵至上海，下哀的美敦書，要求認罪賠償，履行天津條約。這是咸豐十年三月間事。北京政府接到哀的美敦書後，不知悔禍，反而下令宣戰，任命僧格林沁經略戰守事宜。八月間交戰數次，大沽砲臺失陷，英法兵復入天津，清廷方始惶懼，復遣桂良議和，仍圖虛與委蛇。一面求和，一面整頓軍隊，出其不意，將通州兩國使臣三十八人擄掠而去。聯軍不得已乃繼續進攻，清兵傷亡甚衆，僧格林沁率部北逃。皇帝亦攜后妃逃至熱河，命皇弟恭王留守京師，遣使求和，聯軍要求先行釋放被擄三十八人，不意這三十八人已被處死過半，聯軍聞信憤怒異常，乃焚燒圓明園，情勢愈趨緊張，恭王遂被任爲全權議和大臣，遂得簽訂十三條和約。在這十三條之中，有幾條是關於傳教問題的，略舉如下：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凡奉教之人，皆得保其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

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

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

從此美俄義葡等國，皆沿例要求通商傳教，中國門戶，於是洞開。時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尙與清廷爭持，同時，河南張總愚的捻匪，四川雲南的回匪，相繼騷擾，全國鼎沸，人民塗炭，教會亦遭波及。而仇教官吏，往往借端陷害，誣教友爲匪；離京較遠的地方，又往往任意慘殺。咸豐十一年有貴州教友張有揚等四人被殺，同治元年又有文神父與教友吳學聖等四人被殺，皆誣以通匪之罪，這一年南昌重慶也有搗毀教堂等

事。各省仇教之事，仍不斷發生。

四川酉陽以巨紳張丕昭作謗教書，人民爲所蠱惑，羣起仇教，在同治四年，又有殺死教友與馬神父的事，到同治七年鬧的更兇了，仇教者聚衆搜殺洋人，被殺者有李神父與教友等四十人，堂屋盡毀。彭水地方亦有焚掠教友七八百家之多。四川鬧教，影響貴州，在遵義地方，亦起仇教風波。知府陳光壁放任人民劫掠教堂，教友家被搶劫者不下七八百家，教士雖未遇害，而遭打受辱，亦有多人。

江蘇省中鎮江淮安揚州等處，謠言「教士迷拐幼孩，摘心挖眼」乃至演成驅逐教士，焚毀教堂等慘劇。安徽省城安慶亦然，紳民爲謠言所惑，亦有驅逐教士，焚毀教堂之事，教友家之被掠者，八十餘家，死於非命者，二十五人。

湖北亦有仇教事，天門縣地方，有秀民聚衆仇教，焚毀教堂四五座，焚掠教友數十家。利川縣知縣拘捕教友，毀其廬舍。湖南更甚，藍月旺神父在長沙罹難後，竟不許西人駐足。江西河南廣東陝西直隸皆有同樣的遭遇，教士教友，有死於鬧教中的，也有死於兵亂中的，不勝列舉。而當時最大的教案，要算同治九年的天津事件。

天津教案，由陳國瑞一人煽動而成。陳國瑞本是價格林沁的義子，疾惡洋人特甚。當他在南京時散播謠言，希圖煽起仇教事件，因計不得售，乃北上至天津，徧貼謗教傳單。果於六月二十二日發生暴動，圍攻天主教堂。官府不加彈壓，亂民愈聚愈多，謝吳兩神父即報告法領事 豐大業，豐領事即請北洋大臣 崇厚保護，

崇厚百端推諉，領事與隨員及神父均因而遇害，領事署天主堂亦付之一炬。又焚燒「仁愛堂」，「仁愛堂」乃一修女院，內有修女十名，收養孤兒幼女，並施藥施診，行種種慈善事業。是日屋宇被焚，修女被殺，孤兒亦多死傷，並波及鄰居法商及俄僑多人喪命，英美福音堂亦遭焚掠。結果賠償撫卹，懲辦官吏了事。

光緒二年長江下游，又起謠言，說天主教教友楊琴錫等，散放紙人，夜間剪人髮辮，仇教者乘機鼓惑，安徽建平宣城寧國等處又演成焚燬教堂，殺死教友等事。光緒十年中法戰爭，廣東等省竟有遷怒於教會，多處教堂遭受毀損。越南東京國王下令屠殺教友有三萬八千多人。光緒十四年長江流域又有仇教排外之謠，引起騷動。到十七年湖南有周漢者編印書籍圖畫，煽起教禍，影響及於安徽的蕪湖廣德江蘇的丹陽無錫湖北的武穴宜昌江西的九江等處，又有焚燬教會各種房屋，劫掠財物等暴舉，惟幸未傷人。此後更有庚子的大屠殺，當另述。

總之：此種教案之起，純由於民智未開，以天主教所舉辦的育嬰事業，誤為誘拐小孩，發生種種謠言，說什麼挖眼剖心，製為藥材，不獨愚民無智，盲目聽信；即士大夫中智識階級，亦多相信，見於文章著述之中，試看梁章鉅所著浪跡叢談的話：

「自西洋人設立天主堂，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曰喫教，按名與白銀四兩……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針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人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臨門行殮。殮畢以舊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巾囊曰衣胞，緝其

頂以入棺，或曰借殮事以列死人睛，作鍊銀藥。」（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卷二九，下卷四九一）

如此愚昧之言，見之於記載者，固屬不一而足。辟邪紀實書中捏造事實，尤爲荒謬絕倫，此皆引起教案的唯一原因。在此種教案之中，往往波及更正教堂，特別是庚子之變。不過教會往往在苦難中生長的，每遇一次苦難，便有更進步的發展；因爲在苦難中，不但可以增強奮鬥精神，且可以從反省覺悟自身的缺點，以資改進。所以這時候的教會當局，覺得在外人領導下的教會，很容易引起誤會。因而有基督教的「本色」運動。「本色教會」這個名稱，雖然產生於最近更正教會中，但也是天主教多年來所注重的一件事。他們最初便注意到「本籍神職班」的造就，希望有多數中國人出來負擔中國教會的各項職司。當一八九三年教皇宗良十三世會頒布過這樣的話：

「要是沒有國籍神職班和國籍主教，那麼，教外國中的天主教信仰，不會有確定的將來。」

後來像本篤十五世庇談十五世都發表同樣的意見，如說「每一個國家，應該培養自己的神職班。」耶穌的神職，假使沒有本籍神職班做基礎，不能有穩固的進展。」可見他們把「本籍神職班」的培植，看做一件重要的事。當利瑪竇最初傳教時，便領導鍾鳴仁黃明沙進耶穌會爲修士，他曾經這樣記着說：

「在我們各處的住院中，除了本會會士以外，還有其他許多的學生們，都是生長在中國的，他們正在預備着進耶穌會。」（見利瑪竇二冊）

據一九一一年北京出版的一六九七年以來傳教中國遣使會司鐸修士目錄說到「從一六九七年至一

九一一年間。在中國傳教的五百九十三名會士中，有十一個蒙古人，都是司鐸，一百八十五個中國人，除了八人外，其餘都是司鐸。『其中有二人，在一九二六年，祝聖爲主教。這是單從遣使會一會而言，其他修會也可以此爲比例的。最有名的，要算一六八五年在廣州祝聖的主教，名叫羅文藻，他是第一個中國主教，後來由他所祝聖的三個司鐸，一個叫萬其淵，號三泉；一個叫吳歷，號漁山，別號叫墨井道人，是清代六大名畫家之一，現在有墨井集流傳。一個叫劉蘊德，號素公，做過『欽天監』監副。此後華籍教士一天天的增加，有些地方，反比外籍教士超過許多。尤其女修士們的數量，很快的增加。庚子以後，其進展更不可以道里計，下章當另述。

第十六章 道光以後更正教各宗派的活動

一八四二年以前，基督教傳教士，不能以傳教名義進入中國境內。馬理遜等少數教士，獨能逗留於廣州者，莫不假託經商之名，其他有志傳教於華人的西洋教士，祇能駐足於南洋諸島與澳門等處，如倫敦會教士之駐馬刺甲，聖公會教士之駐爪哇，均無法入境。及至南京條約訂立以後，傳教士得條約的保護，方絡繹來到通商口岸，從此各教會之來中國者，除意法等國的天主教外，在更正教方面，有英美德坎等國的各公會；以是在中國的更正教傳教團體，竟有一三〇多不同的差會，同一長老宗，而有英、美、坎、拿大等之分，同一監理宗，而有監理、美、以、美、循、理、美、道等之分，他會亦然。試觀下表：

更正教宗派系統表（根據中華歸主）

聖公宗	浸禮宗	公理宗	信義宗	監理宗	長老宗	內地會系	其他
英聖公會	來復會	公理會	巴色會	美福音會	蘇福音會	內地會	貴格會
坎聖公會	美浸禮會	倫敦會	德信義會	循理會	英長老會	德女公會	宣道會
美聖公會	英浸禮會	美普會	丹路德會	美道會	坎長老會	女執事會	公誼會
華北英聖	孟那福音	協同公會	北美信義	美以美會	艾長老會	自由會	美女公會

教會本同戴基督爲元首，爲佈道作證引人歸主的機關，其宗旨本無不同，特在行政的制度與所在地域不同的緣故，乃有此分別，茲且把牠的背景與特點略予說明。

一曰「公理宗。」其在中國有網紀慎會，美華會，浸信會，倫敦會，瑞丹會，瑞華會，或自理會，宣道會等不同名稱，其義爲全體治理，不受制於一人，是純粹的民主制度，只重信仰，不拘儀文畛域。

二曰「長老宗」(Presbyterian) 介乎監理宗與公理宗之間，既不承認監督主治之權如監理宗，又與權在教友的公理宗異；是一種共和制度的政體。創立者爲克立文，屬於「預定論」者，在中國傳教的公會，以其所來的地點不同，故有蘇格蘭、愛爾蘭、紐芬蘭、坎拿大等等的分別。

三曰「信義宗」(Evangelical Lutheran) 亦稱路得宗，爲更正教最古的教會。「人得稱義，端賴信仰」，爲該宗要道。其對於聖餐的見解，固不信餅與酒卽爲基督的血肉，但確認在酒餅之中有基督實質在其中。在中國的名稱雖不同，而今則統稱之爲「中華信義會」，其政制則爲議會制，由各堂決定其自治權。

四曰「浸禮宗」(Baptist) 注重以全身浸入水中，爲信仰的表示，信道全由個人自己意志的決定，父不能強其子，故不收未成年之童子進教，取絕對的民主制度，信徒一律平等，無階級之分，會中執事，不過是一種職務，沒有管轄權力。安息會，基督會，三一浸會雖亦注重浸禮，然並不屬於本宗系統。

五曰「監理宗。」創始者爲衛斯理，故亦名「衛斯理宗」，其英文名稱 Methodist，原義爲循規蹈矩的意思，因有譯爲「循道」，亦有譯其音爲「美以美」。其組織爲監督制，最高立法權，操於大議會，注重個

人靈性的保證，保守因信稱義之道。

六曰『聖公宗』是由 Holy Catholic Church 譯成的，初譯爲『聖而公之教會』，也有譯英國聖公會爲『安立甘會』，也有稱爲『監督會』，一九〇九年則通稱爲『中華聖公會』，不問其來自何國，其組織爲監督制，其儀式近於天主教，故爲新舊教的調和者。與舊教不同之處即大度包容，採取自由主義。

七曰『內地會系』是專門向中國內地傳道的教會的總稱，沒有所屬的宗派。

其他各教會，大都由於幾個同志結合而成的，崇拜或傳道的團體，雖各有其特點，却不能成爲一稱宗派。

宗派的背景既明，然後依次略述各公會在中國的傳道經過：

一 公理宗

倫敦會是公理宗中一種向國外傳道的組織，起初稱爲『倫敦傳道會』，也稱爲『國外傳道會』，英文叫做 Foreign Missions。馬理遜是第一個東來的人，繼之者爲米憐，他們的事蹟已見前述。及至一八四三年英國又打發麥恩都來至香港，不久，就和哈信醫生一同遷至上海，麥家園大安堂，即其最初的根據地。後來由此推廣至江蘇南部與浙江北部，成爲倫敦會『江浙傳道區』。經後人的繼續努力，成立堂會十六處，已有數處自理，自建禮拜堂四處，男女醫院各一所（即仁濟醫院），學校十一處（中有麥倫中學）。米憐的兒子也到上海幫辦麥氏工作，麥氏著了一本通俗三字經，並且繙譯聖經及編著英華字典，爲當時學術

界一大貢獻。

在粵港方面，自李雅各把「英華書院」從馬刺甲遷到香港，就在香港主持一切教務，傳教辦學之暇，又把中國的四書及詩書易左傳等書譯為英文。不久，有基教士與華人屈昂、梁發、何福堂（伍廷芳之岳父）協助傳道。一八四七年，英國又派夏吐囉醫生來設醫院於灣仔。同時哈信復由上海回廣州，設「惠愛醫館」。一八五二年，又有馮約翰來助，立教會於廣州沙基，與華教士如區鳳稱、謝恩祿、招觀海等的努力，遂成爲今日「中華基督教廣東大會」。一八六二年在香港，又得德教士歐德理與英教士越治及譚臣醫士相助，並聘禮賢會華牧師王煜初（王蘭惠之父）及後來張祝齡等主持，會務日愈進展。何啓律師（何福堂之子）的夫人雅麗女士去世，建一紀念醫院，後來與公理會長老會同寅會、美瑞丹會合併爲中華基督教會，王牧師以爲澳門爲蔡高受洗的發祥地，乃籌建禮拜堂曰「志道堂」，豎橫額曰「福音初到之地」。張祝齡倡改爲中華基督教，籌建「第一受洗人蔡高紀念堂」。一九一八年落成開幕。倫敦會在粵港區域中有分堂四十餘處，大小學二十餘處，醫院四處，男女信徒二千多人。

又由粵港教會推廣到福建，在廈門、惠安、漳州、汀州等處建立教堂。一八六一年，楊格非牧師由上海往漢口，創立起湖北傳教區。說到楊格非在中國傳教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他是在一八五五年與韋廉臣同到中國，韋氏創辦「廣學會」，提倡文字佈道，楊氏在上海學習華語，也會幫助戴德生創立內地會，並且往來平湖、杭州、松江等處傳道。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曾在倫敦會做過傳道，楊氏特地到蘇州去見他要求

傳教的自由。一八六一年，他才到了漢口，計畫建立教會，在武漢三鎮奠定了基礎，又溯江而上，經宜昌重慶而至成都，協助內地會傳道，又到陝西湖南等處做開闢工作。當在漢口時組成漢口「聖教書會」，編著許多勸世文，所著德慧入門一書，頗為人所稱譽。同時，又助「蘇格蘭聖經會」繙譯和合本聖經。其傳道於中國計五十七年，開創長江上游的傳道工作，設醫院，立學校，至今在湖北區內，有支會七十八處，學校二十餘處，醫院八處，信徒二千多人，實不能不歸功於楊氏。其生平事蹟，廣學會另有專傳。

同時，艾約瑟開創直隸區工作，在天津北京滄縣蕭張等處，建立教堂，至今有支會九十處，醫院九處，學校二十餘，信徒二千餘人。

總倫敦會在中國傳道地點，計分五區：即江浙粵港福建湖北直隸，一切工作，全由倫敦會全國顧問會議通盤計畫，以策進行。

公理會是美國第一個來華的宣教會，故亦稱美部會，裨治文是美國第一個來華的宣教士，他在一八三〇年到廣州，後與伯駕醫生同創「博濟醫院」。至一八四七年離粵至上海，以廣州傳教工作，讓與長老會，裨氏在上海專事譯經，至一八六一年去世。於一八八三年，嘉理自美至香港，公理會在粵事工，又能復興起來。他在廣州香港間建設教會，開辦學校，經營有二十七年之久，其最關重要的工作，即到香港時，為孫總理施洗。繼有伍賴信在廣州創辦神學，此後經中國教士陳遂昌翁挺生，梁文壽，譚沃心等擘畫經營，日見發達，迄今有支會二十三處，信徒二千七百多人，學校二十三處。

公理會第二傳教區是在閩北，在一八四七年，有楊順教士從暹羅到福州南台，開始工作。同時，有陶來、滿夫婦二人，亦從暹羅來到福州。到一八五二年，教士夏察理方在下渡租得一店舖，作講道禮拜之用。是為福州第一個禮拜堂。一八五三年，教士盧力在保福止買得某家花園，開辦男女學堂，劉孟湜是當時頭一批學生，後來在公理會做頭一個牧師，時美以美會，公理會亦來福州傳道，乃劃定傳道區域，以邵武之永泰、長邑為公理會傳道範圍。由此，先後在永泰、洋口、長樂、洪山橋等處，設立分堂。開設「格致書院」、「文山女學」一八九六年舉行五十年紀念大會時，林日新牧師發起自立運動。到一九二三年在閩北區內有教堂七十一處，受餐教友二千六百餘人，學校二十三處，與聖公會、美以美會共同辦理「協和大學」、「協和神學」。

華北區域，包括晉、燕、魯三省地界，從一八六〇年有柏亨理牧師到天津，居津四年，創立教會，開辦男女學校。一八六四年到北京，「貝滿女學」即於是時創辦，推廣到通縣、保定、德縣、臨清、太谷、汾州等處，一九一四年成立三省董事部，謀求統一。總計華北區內有衆議會八處。

在公理宗系統中，另有美普會在張家口傳道，開始於一八六四年，第一個牧師名叫儒理。他亦曾傳道到蒙古。一九六七年有馬維廉，一八七六年有雷雲霄等，先後來助。華人如蔡清、馮錦成、姚樹德等，皆畢業於「協和大學」而從事傳道。一九〇九年海寧、爾爾牧師，復與庚子以後的教會辦理學校醫院，有支堂十三處，教友一千三百餘名。同時，有宣化教會，本為瑞典人生得本所創辦，本屬於宣道會的，到一九一四年，乃併入

美普會了。又有協同會在陝西傳道，當一八九三年，有挪威教士孫芝城首先至興平設堂，以後推廣到八十餘支堂，又會購辦帳幕三頂，大可容七百餘人，作遊行佈道之用。

二 信義宗

信義宗中，最早來中國傳教的差會，要算禮賢會與巴陵會。當一八三〇年的時候，德教士郭士立受荷蘭教會差遣，來中國傳教，僑居澳門學習粵語，一八三八年，中英戰起，郭氏受聘於香港政府任譯官，日則辦公，夜則講道，乃函請祖國派人前來相助，一八四七年，禮賢會便派柯士德、葉納滿二教士東來，柯氏至江門患痢疾故世，葉氏入虎門鎮口，佈道施藥，首爲之助者，有華牧師王元深（即王龍惠之祖）繼又有羅存德，高懷義先後由德國來華，推廣教務，成立福永荷坳西鄉石龍虎門莞成等教會。福永陳長興、莊滿和奉派至廣西傳道，爲道喪命。一八七二年，禮賢會與巴陵會合併，設堂於廣州油欄門，由戴惠臨牧師主政。次年陳貢川由德國留學歸來，開設北江南雄教會。一八八一年復與巴陵會分工，以廣州及北江歸巴陵會管理。次年葉道勝由德國來，設神學於福永。王謙如、陳貢川先後立爲牧師。在莞城設「普濟醫院」，又開辦神學，及「東莞中學」、「瘋人院」等工作。一九一四年，香港新堂落成，適歐戰起，乃交華人自理。

當時在廣東傳道的有「三巴會」，即巴陵、巴色、巴免，都是德國教會。巴陵會的創始，是由郭士立的計劃，於一八四〇年該會派了吳教士等到中國來，吳教士同他的夫人駐在香港傳道，同時收養被棄的嬰兒，成立了一個「育嬰堂」。幾年以後，吳氏夫婦因病回國，韓士伯繼續他的工作。一八六二年有何必烈來

幫忙，傳道於惠陽、淡水等處，因受地方人的逼迫，才到省城辦學，後來韓氏夫婦又因病回國，祇賡何氏一人工作，當時「德國中國傳道會」因經濟來源斷絕，要求巴免會接辦他們的工作，巴免會就在油欄門買得房子，並在花縣設立福音堂。不久巴陵會又派員來幫助「中國傳道會」，巴免會便把油欄門房屋讓與巴陵會，使巴陵會仍承「中華傳道會」工作，擴充傳道區域，在新安、惠陽、花縣、清遠、東莞、韶州、南雄各縣設立支堂，在惠陽的永湖設立總堂，以便聯絡。以油欄門為巴陵會總機關，設立男女學校，一九一四年，也以歐戰的緣故，經濟來源斷絕，郭宜堅總牧，向信義會借款維持，會務仍得進行，男女教友已有六千三百餘人，中西教士駐所有一百二十七處，辦有高等神學，與中小學二十二所。一九二〇年參加「信義宗大會」於雞公山，談信義宗在中國的統一與進行。

巴色會在一八四七年由黎力基、韓山明傳道到中國，在香港的長州、九龍、塘笏、箕灣等處，向客家佈道，復奔走於潮州的鹽灶、廣州的新安、東和、深圳、布吉、沙灣、李朗等處。其傳道區域，大概在梅江、東江之間，由樟村起而展至源坑、嵩頭、博石、嘉應、大布坪，分為十七教區，教堂並宣道所有一百四十二處，教友有一萬二千多人，自一九二二年起，教權漸操於華人，至次年實行自立者四會，改巴色會之名為崇真會。

信義會在中國傳道的區域，可以分為豫鄂、湘中、湘西、豫東、中粵、陝西、關東等處，雖為同一宗派，而差會的來源不同，湖北、河南是美國的，湖南是挪威與芬蘭的，粵南是德國的，陝西是挪威的，關東是丹麥的。歷史最老的，則在豫鄂，稱為「中華信義會」，原由樊城、鴻恩會，信陽、路得會，光州、信義會三會聯合而成。開創

人為李立生牧師，他於一八九〇年到漢口，後擇定樊城為根據地，推廣到信陽與光州，三處合併，有分堂一百二十二處，在漢口有「信義神學院」並有「鴻文學校」，「同濟醫院」等事業。其次則為湘中，一九〇二年，挪威差會派教士戈德白，醫生戈本普等數人到長沙，次年在長沙益陽建築總堂，而於桃花崗建立醫院學校等慈善機關。分設沅江寧鄉新化東坪以及崩塢春華山等處支堂。有一百七十一處佈道機關，有七千六百多教友。

當一八九六年時，丹麥路得會派柏衛外得勞二牧師到關東三省經過岫岩大孤山鳳凰城安東貔口金州旅順等處與長老會在營口商議傳教地點，沿海一帶劃為路得會佈道區域。於是外牧經營旅順，伯牧經營大孤山。一八九八年開岫岩為第三佈道區，明年開鳳凰城為第四佈道區。一九〇一年開安東為第五佈道區，一九一一年季天申開工於綏化。一九二三年在長春向女界佈道，同時，開大會於鳳凰城，改稱路得會為信義會。

陝西教會，由挪威人夏明華於一九一七年開始的，在興安建造教堂，學校，醫院，又在恆口設立分堂，向回民傳道，當時有駐兵一營，十分之八皆記名慕道。當時內地會在該處的工作，因傳道無人，至此全歸信義長老會接辦，佈道區域乃愈推廣了。

他如在廣東南部工作的，稱為粵南區，有德教士若申阿白曼傳道於白海，林州，南豐等處，在河南歸德工作的，稱為豫東區，有美教士孔斯德主持，與聖公會合辦醫院，並開總堂三處。在河南許昌工作的，稱為豫

中區，由美教士易德文於一九〇七年開創，不久推廣到禹縣、臨汝、洛陽、郟縣等處，華人中如吳玉潤、劉秉章等皆熱心傳道，進展甚速，已有教友一千二百多人。在湖南、澧縣一帶工作的，稱為湘西區，一九〇三年，芬蘭教士石約翰在津市成立總堂，後得喜漫恩來助，建造教堂，推廣教區，在澧州、石門、慈利、大庸、安福等處，分設支堂。以上各會，會於一九二〇年，開聯合會議於雞公山，成立「中華信義會大議會」，商訂統一辦法，並組織「協進部」以策進行。

此外屬於信義宗的，又有行道會，分為南北兩支：南支乃瑞典國、韓宗盛，任大德、梅保善諸牧師於一九〇年至武昌而創始的。越三年便建造禮拜堂，並分設支堂於麻城、宜昌、沙市、荊州、黃州、鹽州、圻水等城市，設立神學校，師範學校，普通中小學校，醫院等事業。北支乃美國、馬德盛牧師於一八九一年到襄陽開始的。繼而在南漳、宣城、荊門、荊州府等處分設支堂，亦從醫院學校為佈道入手。著名的「荊州神學」便是行道會所設立的。

三 聖公宗

聖公會由英美坎拿大三方面傳到中國，在中國傳教區分成十一轄境，即屬於英、聖公會的，有浙江、福建、港粵、華北、山東、四川、桂湘七轄境；屬於美、聖公會的，有江蘇、鄂、湘、皖、贛三轄境；屬於坎、聖公會的，則有河南一轄境。最先來中國的則為美、聖公會，當一八三五年有駱韓二教士來華傳道，因不能入境，留駐於爪哇，對華人傳教。一八四四年文惠廉主教至上海，建立了聖公會的基礎。由此推及江蘇全省，更進而建設皖、贛、鄂

湘等處教務，皆由江蘇主教遙領。一八九三年第五任主教郭斐蔚任職後，教會益形發達，乃於一九〇三年開鄂湘爲一轄境，段德生爲初任主教。後美德施繼之。一九一二年又分皖贛爲一轄境，韓仁敦任主教。上海的「聖約翰大學」自卜舛濟任校長以來，逐年擴充；與武昌的「文華大學」都是名播中外的，尚有許多中小學和女學，成績亦甚優美。

英聖公會於一八三五年，卽有佈道中華的意思，只因經濟人才的缺乏，未能如願，直至一八四三年，有某富翁捐款，遂得派遣史密斯主教至香港，開辦學校，卽今之「保羅學校」。一八四八年始在寧波開始佈道工作。戈柏陸賜佈道三年，僅得二人信教，卽鮑學義與某君。後來，有岳斐迪，包爾騰來助，包氏曾至北京傳道，一八七五年乃任爲香港主教，同時，陸賜氏陞任爲華北主教，總持九省教務，又有慕稼毅來華，先居寧波，後移杭州，乃於一八八〇年任爲浙江主教，服務浙江教會有五十餘年。浙江教會中，華人會長，要以沈恩德爲第一人。王有光（王正廷之父）夏光耀陳誌醒亦漸陞爲會長。

先是一八五〇年，派韋翟二教士至福建傳道，初無效果，十年以後，派醫生前往施醫，教會始漸形發達。要以胡約翰總會吏之功爲最，一九〇六年，始成立獨立轄境，以貝加德爲主教。

霍約翰任香港主教時，嘗派教士至廣州傳道，至今已偉大之禮拜堂，與男女學校等事業。

華北轄境自陸賜去世後，由史嘉樂慕稼毅任主教，史氏駐北京，總理燕晉及東三省會政。一九〇三年分立山東轄境，以艾立法爲主教。

四川佈道之期，始於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九〇年蓋偉良入川，會務始有進步。五年後被任爲主教，四川成爲一轄境。英聖公會在廣西之湖南之南部，亦有傳教區，稱爲桂湘轄境，一九〇九年班爲蘭爲主教。

坎聖公會以河南爲其工作地，懷偉廉於一九一〇年任爲主教，故河南轄境，在聖公會爲最後，而進步却甚快。

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召集一次「中華聖公會總會」組織「中華聖公會佈道部」，爲統一辦事機關。一九一六年由傳道部派葛石六、浦化人至陝西傳道，進行甚速，至一九二二年調查，已有教友一百八十多人，以陝西成爲佈道轄境。十一轄境中教友總數有四萬八千七百多人。

四 浸禮宗

中國浸禮會曾在一九三六年編印了一冊浸禮會在華百年史把全國浸會工作敘述得很詳細，這裏只節取其大意而已。浸會在中國傳教區域，分華南（包括兩廣嶺東）、華東（包括江蘇浙江）、華北（包括山東及山西陝西東三省一部份）、華西（四川）、華內（包括河南安徽）、五區以及英浸會在山東山西陝西間，與瑞典浸會在山東等等工作。

最先到中國的，是爲一八三六年到香港的叔末士與一八三七年到澳門的羅孝全，旋成立教會於香港。越二年在廣州租一平房，組成「粵東浸信會」，並雇船在海上傳道。一八五〇年時洪秀全會請領浸禮於羅牧師未成，而培植成中國第一個牧師叫楊慶。一八五六年紀好弼到廣州，浸會遂入於進展時期，他的

工作不僅限於廣州，且推廣到肇慶及廣西梧州桂林，設立講堂及醫院。立華人黃梅為牧師。有威靈女士於一八七二年創立了「慕光瞽目院」，服務失明的女子，有四十二年之久，後因病回國，紀好弼夫人便繼其任，她又兼管着「培道女學」，繼續服到四十七年。一八九五年湛羅來創辦「浸會書局」，推行基督教文字事業，時相助著作的，先後有李會珍陳夢南，以至於張亦鏡，他們努力於譯經編報（真光雜誌）外，又創辦「培正中學」，佈道工作，尤見推廣。「恆孤院」「安老院」先後成立，在華江門東石等處教會皆先後自立。一九〇四年，力約翰創辦了「麻瘋院」，先是紀好弼創辦的「浸會神學」，至是建成宏大校舍。紀氏在華南服務有五十六年之久，一九一二年離世。華南浸會，在廣州東山與梧州的事業，今日猶方興而未艾。

其次有「嶺東教會」就是在潮州揭陽嘉應汕頭這一帶地方，先時有幾個潮州人，在暹羅進教，他們就把道理傳到本鄉，內中有黃寶山，後來成為忠誠的華牧師。一八六四年，在潮州成立了教會，汕頭揭陽澄海等處，也先後成立教會。一八七三年，斐女士設「聖經女學校」於汕頭，稱為「明道女子學校」，是中國最初的女神學。一八七六年，她又開了一個男學校在角石，那就是現在的「角石中學」了。在汕頭與揭陽又設了兩個醫院，在汕頭設了個「普益社」，做社會服務的機關。在說潮州話的人中間傳道的，成立了「潮州協進會」；在說客家話的人中間傳道的，成立了「客家協進會」；共計管轄一百多會堂，與六千五百多教友。

說到華東區，不能不紀念到一八四七年到上海的晏馬太夫婦，他們學習了一年華語，便組織起老北門的教會來，從此領導這教會有三十八年之久。一八五六年有黃品三進教，到一八六二年便做了中國第一個牧師。推廣佈道工作到崑山蘇州鎮江，先後建造禮拜堂，連上海成立了四教會。一八八六年萬應遠海林來助，到一八八八年晏馬太去世，這年又有白多馬戴佐恩等來華，分派在蘇州鎮江等處工作。又從鎮江推廣到揚州。一八九七年，開辦一個女校，名叫「桂秀」，即今日的「晏摩氏女學校」。在上海有五個教會，（一）老北門的「第一浸會」，（二）「廣東浸會」，是旅滬廣東基督徒所組織的，（三）「懷恩浸會」，是「明強」「晏摩」兩校員生所組織的，（四）「懷施浸會」，（五）「開北浸會」。近年在「滬江大學」裏又有「滬東教會」的組織，「滬江大學」是一九〇〇年，由萬應遠辦理聖經學校起頭而進展成功的。同時吉惠麗女士在老北門建了個「婦女讀經室」，今已擴展為學校了。在崑山蘇州鎮江揚州都有相當的進展。

浸會在華東的事業，實在從寧波起頭的，頭一個到寧波的，是一八四三年的馬高溫醫生，一八四七年才有羅梯爾牧師來，便創辦了教會。三星期就有頭一個入教的周祖濂（是著者妻子的祖父）他本是教馬醫生華語的，已經受感一年多了。後來做傳道士，並且著了一消罪集福真言小冊，散布甚廣。一八四九年又有高德來，他努力於繙譯聖經。工作逐漸擴展到杭州以及金華湖州紹興，成為華東教區，以杭州為中心。

在華北區的工作，開始於烟台，一八六〇年，花海兩牧師到了烟台，不幸花牧師犧牲於太平軍之亂，而

海牧師在十分困難中，救護當時的難民，並且把工作推廣到黃縣、平度、上花等處，後來遭遇了拳匪之亂，有許多教友殉難。亂平以後，又推廣到青島、濟南、濟寧等處，一九二二年在掖縣創辦了一個「孤兒院」，該處各教會組成「山東議會」，派員傳道於山西、陝西及東三省，「山東會議」乃改稱為「華北議會」，管理七十九個教會。

華西區是始於一八八九年，有魏侯兩牧師到了四川，組織一個教會。一八九四年又有十一位教士到四川，開闢傳道區域，於是瀘州、自流井、嘉定、雅州皆成立了教會。次年女傳道部派遣女教士，辦理婦女工作。一九〇五年，又開闢了寧遠工作，一九一三年在成都設立「師範女學校」，並在成都組織了教會聯合辦理「協合大學」，畢業生費崇之、留美歸來，做了華西浸會第一任幹事。教會漸漸達到自養的地位。迄今在四川有四個佈道中心區，教友已有三千多人。

還有在河南工作的，稱為華內區。在一九〇四年有施陸兩牧師到鄭州開始工作，後來擴展到開封、歸德以及安徽的亳州，及張市、銅山。開封所辦的男女聖經學校，實為該區中傳道的中心力量。

英國浸會，在山東開始傳道，要以李提摩太為最有關係的人了，李氏於一八七五年到青州，次年仲均安來與他同工，兩年以後，李氏便到山西，放賬去了，只留仲氏在青州工作，開始就注意於教會的自養自治問題，培植中國領袖，王保泰便是中國第一個牧師。到一八八八年已有六十個佈道處，一千五百教友。當時懷恩光牧師已在青州立了個「培真書院」，成為傳道牧師的養成所。拳匪之亂，袁世凱做山東巡撫，西教

士難得着保護，而中國教友仍有一百二十多人被慘殺。亂平，教會復興起來，與長老會合辦「廣文大學」，「培真」亦改爲神學。懷恩光在濟南又辦了個「廣智院」，陳列許多圖表及關於天文、地理、地質、礦物與道路建築等模形，彷彿是一個「博物院」，參觀的人很多，乘機向他們宣講福音，並且把「廣文」、「培真」及「濟南的醫學」合併而成爲「齊魯大學」。當李提摩太到山西放賑，山西人沒有一個人不敬仰他，他就長久在太原傳道，山西受拳禍最厲害，但教會却反而更興旺，後來得閻錫山的同情，學校醫院相繼成立，教務逐漸進展，推廣到陝西，在西安建設了教會各種事業。在英浸會範圍內的教會，自養自治自傳的程度，實爲全國各教會的先進。

瑞典浸會得戴德生的鼓勵，派員來華視察，擇定了山東爲佈道地點，即在青島以西，膠濟鐵路以南，包括六縣城七千多村莊中工作。先是有溫道慎牧師在安慶內地會「華語學校」學習華語，同時有令約翰來華，與溫氏同到膠州傳道。以後陸續又來許多教士，從膠州推廣到諸城、高密、日照等處，成爲佈道的中心區。並且創辦醫院學校「聖經學校」、「孤兒院」等等事業。

此外有孟挪浸會在福建的上杭工作，來復會在南京工作，友愛會在山西平定壽陽工作，安息浸會之在上海，新約教會之在北海，都有相當的工作，這裏不能詳述了。

五 長老宗

開始長老會在中國的工作的，據說是一八三八年由美國來的密(J. A. Mitchell)何(R. W. Orr)

兩教士，駐在新加坡。一八四二年，斐禮華到澳門，次年又有哈巴和高利等到廣州，不久高利攜帶了印書機器與斐氏到寧波，留哈巴一人在廣州澳門間工作。同時也派雅俾理到廈門。一八四七年，斐氏到上海幫助繙譯聖經，工畢而回，在途遇盜，溺斃。寧波教會便由高氏獨力支持。一八六〇年，美國因南北戰爭的影響，教會亦分成南北，最先來華的，如上面所說，在廣州與浙江方面的是北長老會，在廈門的是歸正教，此後才有蘇格蘭的坎拿大的大英的愛爾蘭的烏絲崙的以及美南、復初、約老、同寅等共計十二會。

在廣州方面會於一八四五年，創辦一男學校於澳門，後遷入廣州，就是「培英中學」。一八五一年又辦了一女學，就是「真光書院」。一八四七年英長老會亦傳入廣州，而北長老會推廣傳教事業到海南島，於一八九三年成立海南長老會。其推廣的佈道區域，在廣東的二十餘公會中為最廣，與其他公會合辦的事業如「協和神學校」、「協和中學」、「嶺南大學」等。「夏葛醫科大學」為北長老會所首創，又附設「柔濟醫院」及「護士學校」。

在浙江方面有應斯理教士於一八六四年到寧波，漸漸推廣到紹興與杭州，而以杭州為浙江區的中心，應氏卜居於杭州的大井巷。繼續來杭的西教士，有郝理美、吳思敦、貝恩德、司徒爾，以及藍周、葛諸女士，創辦女學醫院及推廣德清新市、衢州等教區，華教士如陳達三、桑堅、葉劉德森、周茂公先後按立為牧師，又有畢來思、花第生、創嘉興、教會、杜步西、創蘇州、教會、海敦、李德理、創江陰、教會、柏雅、各吳板橋等，創鎮江、教會。南長老會在江北方面，由鎮江、湖連、河北上，在鎮江、宿遷、淮安、徐州、海州等處創設教會，賽兆祥、白秀生、葛馬可

以及英長老會周碧桃、馬錦章、二女士等，皆為開始工作的人。

同時，久在寧波傳道的倪維思，往山東傳道，在烟台立了自養自傳的教會基礎。烟台自一八六二年起，已有麥嘉締、郭顯德等工作，推廣到濰縣、濟南、濟寧、沂州等處，倪氏來，注意於鄉村布道，四十年熱心勤苦，領導多數教會自立。劉壽山、于子明等皆為烟台教會中重要份子。

北京方面的丁隹良起初也在寧波傳道，編成寧波土話羅馬字聖經，後來到北京去任「同文館」教習，編輯了許多書籍，如格致、入門、性學、舉隅、富國策、天道溯源，均為士大夫所傳誦。李佳白也是傳道於智識階級的，曾經發起「尚賢堂」，用宗教比較的態度，來發揮基督教的優點，坎拿大長老會，在直隸的磁縣，與河南的汴梁、彰德、衛輝等處，創立六處總堂，稱為「豫直長老會」，李理斐曾任其牧師。

江蘇方面，在上海南門會設「滬南區會」，在租界上則設有「美華書館」，此館本由寧波遷來，范約翰為之經理，創建「思婁堂」。「閩北區會」由俞宗周所創設。另有海士開闢蘇州，李滿開闢南京；又由南京派柯某開闢安徽懷遠，成立了「江安區會」。

一九〇二年，凌霄志開闢湖南工作，在長沙建立教會，高伯蘭傳道湘潭；梅知理傳道柳州；葛惠廉傳道衡陽，成立了湖南區會。

關東方面，開始於一八六六年，有蘇格蘭聖經會韋廉臣遊歷其地，居留未久；次年英國賓維廉由北京至營口，設立福音堂，越二年愛爾蘭長老會亦派人來設堂施醫。一八七六年蘇愛爾南長老會合辦奉天、東西

兩關教會，並推廣到錦州、鳳凰城、吉林各地，漸成十五個中心教區，散佈於奉天、吉林兩省之間。蘇格蘭長老會在湖北宜昌創立教會，時在一八七八年，開辦者有郭佈倫牧師，後分設支堂十餘處。

閩南教會，開始於一八四二年歸正會雅俾理的到廈門；一八五〇年英長老會用雅各醫生由香港來，行醫設學。一八六二年兩會合一，成爲「漳泉長老大會」。

英長老會在廣東潮惠二州傳道，於一八八一年成立大會，其範圍東至福建詔安，北至福建汀州，西至海陸豐，南瀕海，以汕頭爲中心，稱爲「嶺東大會」。

一九〇一年時，甘路德倡議長老會合一，使在中國工作的八長老會——（美北、美南、歸正、坎拿大、愛爾蘭、蘇格蘭、自由大英）與所創立的六大會——（關東大會、華北大會、五省大會、（蘇、浙、皖、鄂、湘）閩南大會、東廣東大會、西廣東大會）——合成一會，經一再召開全國大會，商討至一九一六年始成立「中華長老聯合會」，此後又與倫敦會公理會合成爲「中華基督教大會」。

至於復初會之在岳州，約老會之在廣東德慶，同寅會之在廣州、河南，都是長老會一系中的工作。

六 監理宗

監理宗就是衛斯理宗，在中國共有八個差會，第一個傳來中國的是美以美會，一八四七年柯林斯與懷提夫婦到了福州，開始學習語言。次年美國又派了一個赫克來作後援，不意那年懷提夫人去世，次年赫

克也病故了。只顧懷揣在行醫，柯林斯在辦學，再過兩年，柯氏也因病回國去了。此後有吉卜生，馬克來夫婦等來，馬夫人開辦女學。一八五六年建造了真神堂與天安堂，偉來牧師一面傳道一面行醫。一八五七年得着第一個教友，名叫陳安，足以鼓舞了傳道人的精神。尼斯頓女士辦了一個女學。一八五九年辦了一個印書局，印出二十頁的一種小冊，名叫道理和奇事，又印小本福音數千本，同年在城內租得房子作禮拜堂和住宅，不久，城內人民，發生暴動，只得仍遷至城外，但是信道的人，却年年增加，一八六七年有三三九名，一八七〇年便有二千名了。傳道工作，推廣到興化、延平，在福建便成立了三個年議會。更由此向西，到江西、九江，一八六七年，在九江找得四個信徒，便組織起一個禮拜堂，金斯來會督在九江區巡視會務，覺得九江應與福建分離，以赫爾提專任九江工作，九江亦漸成一年議會。一八六八年福州開會時派裴來爾、羅銳二牧師北上，由天津到北京開闢傳道工作。一八七一年購得一所房子，並收得一些教友，奠定了北京教會基礎。裴氏即爲主任傳道。後來又有衛立爾夫婦和鹿依士夫婦到四川、重慶、成都等處開始工作，成立四川教會。所以到現在美以美在中國有華南的福州與興化、延平三年會，華中有江西年會，華北有北京年會，華西有四川年會，一八九二〇年有牧師三六七位，教友四二、六八〇名，學生有三四、七七〇名，到一九二三年教友便加到六、二八〇九名，其進步之速，可見一斑。

美國南方的美以美會，在中國名叫監理會，一八四八年有秦右牧師與戴醫生到中國來，賴氏因妻病留在香港，戴氏帶着妻子到了上海，在王家碼頭租到一宅房子。明年秦氏亦來，在鄭家木橋建造一所禮拜

堂，在一八五〇年落成。同時開辦起女學校小學來，有教員劉竹松同他的兒子進了教，幫助秦氏傳道。一八五二年派來耿惠廉牧師，明年又有唐雅各、雷大衛、藍柏三位來一同工作，不久又有一蘇州人殷勳山在上海進教，於是回到蘇州傳道。林樂知亦在這時到中國，任「廣方言館」教習，兼做傳道工作，推廣到上海四鄉。在蘇州有藍柏和劉竹松創立教會，得李子義和他的兒子伯蓮、仲單進教。同時曹子實由美國回來，史子嘉由杭州長老會薦來，在所設立的「存養書院」中教書，後來都做了牧師。一八七五年潘慎文、雷金女士等來辦學，藍醫生行醫，林樂知助李提摩太創辦「廣學會」。蘇州所辦的「博習書院」產生許多中國牧師，如唐沐三、凌子賢、俞止齋等，把傳道工作，推廣到湖州、常州、無錫等處，成立六個教區。一九二三年發起東三省佈道，在哈爾濱成立衛斯理堂。一九三九年在雲南、昆明協助錫安聖堂。今且與美以美會實行合併。其事業有「東吳大學」與「博習醫院」以及男女中學等，成績亦甚可觀。

聖道公會原名叫偕老會，由直隸、山東的聖道會，雲南的美道會合併而成的。一八六四年英國母會派遣教士闕斐迪和燕樂拔到寧波傳道，從鄞縣開始而推廣到奉化、象山上虞各縣屬，後有海和德烈、德理諸牧師，慘淡經營，發起自立會，得熱心教友贊助，負教會經濟責任。共立七區會，五十二處教堂，有三千左右教友。先是一八六〇年時英國有郝睦廉、股森德二牧師在天津、娘娘宮地方設立教堂，是為華北聖道公會的開始。後推廣到山東、樂陵、德中、陽信、濱州、密化、海豐、惠民等縣，設堂辦學，以天津、山東、唐山為中心區，共有佈道處二百二十八處，教友約四千人。

循道會在湖南工作，湖南空氣素稱頑固，故傳道非常困難，當一八六三年即有葛君（Gezell）首先到湘潭未能立足。當時楊格非與內地諸牧師都受到阻礙。一八八〇年蘇格蘭教士都亞當從武昌到岳州漢壽賣書傳道，往來於湘鄂之間，與內地會戴德生共同工作，到一八八二年方在洪江租着一所房子，經過多少艱難。九年工夫，遊行傳道，處處有性命危險，一八八八年他抱病死在湖北石首。後來其他教會入湖南傳道的，有北長老會在臨武，宣道會與內地會在常德，倫敦會在岳州都立了基礎。獨循道會至一九〇〇年方在長沙賃屋立堂，始有固定的傳道地點，庚子以後，湖南傳道之門大開，傳道的差會乃有十四個之多，教務便蒸蒸日上，信徒有二萬人左右。

遵道會亦從一九〇二年到湖南，德慕登教士偕內地會劉佐霖從江西到了長沙，設堂傳道，不久，推廣到湘潭醴陵攸縣茶陵等處，同時在湖北的棗陽，有美教士齊能設立遵道會教堂，亦推廣到附近十餘村鎮。循理會在一九〇四年，由美國差會派安培生，蘇爾斐傳道到四川，次年差會又派李女士等到鄭州，不兩月，李女士積勞病故，便命四川安蘇二牧師回鄭州傳道，遂放棄四川，專在河南經營，擴展到開封滎澤。一九〇八年，接收清江浦孤兒院，次年又接收杞縣教會，其後於河陰陳留滎陽等處，皆設立分堂，設立學校醫院，教會工作便愈推廣了。

福音會初在湖南辰州傳道，一九一四年始入貴州，在銅仁建立教堂，開辦醫院。在上海亦有福音會教堂，創始於一八八二年，祝名揚牧師，後由華教士周亮亭主持，稱爲「中華福音會」，不限宗派，無限何種公

會教友，皆可加入，變成一種合衆教會，經濟完全自立。

七 內地會系

內地會本不是一種宗派，乃是一班熱心教士，自由組織的傳道團體。創始人是英國戴德生牧師，他是在中國傳教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偉人，但已有他的專傳，在此無暇詳敘。當他在英國的時候，聽一個醫生演說中國之人傳道的情形，便激動了許多信徒，組成一個「醒華會」，一八五三年他就被派到中國來。後來因與該會意見不同，就脫離關係，獨自傳道。一八六〇年，因病回國，到處演講中國需要傳道情形，越二年帶了家眷和十六位男女教士，重來中國，以杭州爲根據地。一八六七年，成立了杭州紹興寧波奉化台州溫州六處教會。同時有童跟福（George Duncan）到了南京，戴氏自己到揚州鎮江，明年又在清江浦設立教會，一八六九年，梅度士（James Meadows）韋靈生（James Williamson）在安徽省城佈道，高學海（J. E. Cardwell）在九江分書傳道。他們雖已在浙江安徽成立教會，但仍竭力擴張，一八七五年，又開創武昌教會，做進行西北工作的根據地，一面函請英國續派教士十八人來助，分赴山西陝西甘肅湖南四川貴州雲南等處，先後設立教會，又曾至西藏遊行傳道。那時華傳道士亦已有二十餘人，協助工作。在國外傳教士中，本來只有英吉利蘇格蘭愛爾蘭威爾斯人，至此則有美國坎拿大澳洲德國瑞典挪威瑞士芬蘭意大利等國的教士，同來合作，西南的苗族傳教，尤爲內地會注意的工作對象，於是派遣亞當氏（J. R. Adams）與華德氏（B. C. Watons）前往傳道，從一八八八年起，八月之間，已有一千人信道。而在貴州幾近萬人，雲南亦

有數千有出人意外的成績又有泰羅女士(Miss A. Taylor) 子身入西藏內地茂爾夫婦(J. R. Muir) 在松潘茂州潘根(George Parker) 衛德(G. W. Hunter) 在新疆迪化，先後開堂佈道總之最能刻苦犧牲的，莫如內地會中的西教士，他們絕不顧到衣食住的舒適，吃的是大餅饅頭，臥的是草堆，不怕苦，不怕死，是他們的偉大精神，這種精神，都是戴德生所感召的，而且他們的教會，都是自立自傳，不受外來的津貼。散佈在全國的內地會，名稱雖不同，精神都是一樣的，恕不一一分述。

八 其他教會

貴格會是一種自由的組織，於一八八七年由美國傳到南京，初創的教士名義白理，繼任者乃華牧高師竹。宜教會在長沙武昌無為、臨潭、梧州，均有偉大工事。公誼會就是英國的貴格會，傳道於四川，美女公會傳道於上海。使徒信心會傳道於廣西、陝西、山西、浙江、與上海等處。復臨安息會傳道於浙、蘇、桂、閩、豫、湘、粵、晉、魯、陝、蜀、滇等省。上帝教會傳道於燕、隴、桂、粵、晉、陝等省。以及南直、福、晉會之在直隸，救世軍之在燕、晉、魯、弟兄會之在閩、贛、蘇、魯，五旬會之在雲南，美基督會之在南京、與安徽，瑞美會之在廣東……等等，都有相當的工作，這裏因篇幅關係，不能詳述。

更正教傳道區域表

年份	會別	創立者	始立地點	傳道區域
一八〇七	倫敦	馬禮遜	馬刺甲	澳港、江浙、河北、湖北、廈門

一八三〇	公理	裨治文	廣州	粵東 福建 華北
一八三〇	禮賢	郭士立	澳門	香港
一八三〇	巴陵	郭士立	澳門	廣東 博羅 惠陽 韶關
一八三五	美聖公	韓駱君	爪哇	江蘇 湘鄂 皖贛
一八三六	浸信	叔未士	澳門	廣東 江蘇 華北
一八三八	北長老	何宓君	新加坡	關東 華北 閩南 東廣東 西廣東
一八四二	歸正	雅俾理	鼓浪嶼	龍巖 漳平 永福 華封 寧洋
一八四三	浸禮	馬高溫	寧波	寧波 金華 紹興 杭州 湖州 上海
一八四六	巴色	黎力基	香港	香港 廣東
一八四七	安息	卡華二君	上海	上海
一八四七	美以美	柯林斯	福州	華中 江西 華北 華西 福州 興化 延平
一八四八	英聖公	戈柏	寧波	浙江 福建 建港 粵華北 山東 四川 湘桂
一八四八	監理	秦右	上海	上海 蘇州 常州 湖州 松江 太倉 南潯
一八五〇	英長老	用雅各	廈門	閩南 關東 兩湖

一八八八	宣道	賴普	武昌	長沙常德漢壽武昌甘肅蒙古梧州
一八八七	瑞華	符勵愷	河南	山西陝西河南
一八八七	貴格	義白禮	南京	南京
一八八七	美瑞丹	寬俚倫	廣州	南海香山高要博羅
一八八六	基督	馬林	南京	南京滁州廬州蕪湖南通
一八八二	福音	祝名揚	上海	銅仁
一八八〇	英浸禮	仲均安	徐州	青州開封濟南汾州
一八七八	蘇長老	郭佈倫	宜昌	宜都董市雙蓮寺
一八六七	美普	馬維康	張家口	青圪塔蔚縣城
一八六五	內地	戴德生	杭州	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山西貴州
一八六四	美公理	儒理	北京	一九〇九併於美普會
一八六四	南長江	應斯理	寧波	江蘇浙江
一八六〇	聖道	郝賡廉	天津	天津甬甌肇慶
一八五二	循道	柯克私	廣州	漢口武昌湘陰平江

一八九九	同 寅	梅 靈	廣 州	新塘小徑大杭九洲基古鎮……等處
一八九〇	德 華 盟	奔 德	處 州	麗水松陽縉雲龍泉撫州……等處
一八九〇	行 道	韓宗盛	武 昌	武昌沙市荊州黃州襄陽南漳
一八九〇	信 義	李立生	漢 口	關東豫鄂豫東豫中興安溝口廣東
一八九一	北直隸	愛 君	宣 化	保安州多倫張家口下花園
一八九二	英 美	赫斐邱	成 都	成都重慶涪州自流井
一八九三	協 同	孫芝城	興 平	咸陽馬嵬……等處
一八九五	救世軍	羅開泰等	源 昌	雙門底
一八九七	約 老	梁多馬	廣東德慶	德慶羅定雲浮太平……等處
一八九八	來 復	慕向榮	南 京	南京和縣蕪湖
一八九八	聖 潔	高樂生	山西渾源	莊窩西溝……等處
一八九八	酬 恩	李道輝等	山東登州	山東後合併於長老會
一八九九	恩 典	金樂滿	浙江塘棲	一九二二年合併於杭州長老會
一八九〇	德 婦 女	吳香珠	四 川	萬縣開縣岳溪……等處

一八九〇	復初	海維理	岳州	辰州 永綏 湖濱 長沙 湘潭 常德
一九〇二	基督徒	謝洪貴等	上海	上海 香港
一九〇二	遵道	德慕登	湖南	長沙 湘潭 醴陵 攸縣 茶陵 耒陽
一九〇三	同盟	王耀基	陝西商縣	龍駒寨 山陽 雒南：等處
一九〇四	循理	安培生	四川	鄭州 開封 榮澤 杞縣 河陰 蔡陽
一九〇五	自立	俞宗周	上海	江蘇 浙江 福建 廣東 湖北 湖南
一九〇七	救恩	挪心清	河南泌陽	泌陽
一九〇八	友愛	庫範恪	山西太原	平定 壽陽 遼縣
一九一〇	自理	甘素貞	雲南楚雄	楚雄 姚安 牟定 鹽豐 大姚
一九一〇	坎聖公	懷偉廉	河南	開封 商邱 鄭州 蘭封 虞城 睢縣
一九一一	清潔	薄清潔	直隸濮陽	大名 濮陽 清豐 車明 南樂 長垣
一九一一	孟挪浸	衛英士	汕頭上杭	上杭 永定
一九一二	海面傳道	何麗臣等	香港	香港 廣州
一九一二	中華基督教	孟省吾等	北京	天津 北京 烟台 青島 濟南 太原 星洲

一九一七	滇南教	富力敦	雲南猛烈	普洱 思茅 墨江
一九一七	五旬節	馬錫齡	雲南	蒙自 極寧 及狹狽山 裸黑族 白苗族中
一九二一	內國佈道	李素貞等	雲南	雲南 黑龍江

第十七章 庚子的教難

中國基督教的流血慘史，莫過於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了。這一次事變，共計被殺害的天主教五萬，教士四十八人，教友一萬八千人；更正教教士一百八十八人，教友五千人，實在是空前的浩劫。

記錄這一次教難的書籍，有廣學會季理斐牧師（Rev. D. Mao Chih-ray）所彙集的庚子教會受難記二冊，與聖教會柴蓮甫氏收集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皆載更正教受難情形。拳禍記、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與聖教史略中，有附載天主教被難情形。茲且根據他們的記載，約略地加以敘述：

考義和團本來是白蓮會一類的秘密組織，很早就有的。雍正五年曾經出諭禁止過。乾隆時，河南商邱地方有一個名叫邵生文，專門傳授拳棒，招收黨徒，後來因犯案正法。嘉慶時，江南之類、毫徐、河南之歸德、山東之曹沂等處，復有聚徒弄武，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諸名目，橫行鄉曲，朝廷明諭嚴禁。又有邵生文之孫邵坦、焯，與青縣李八葉、福明等，傳授義和門教，同時固縣葛立業、青縣尤明等傳習義和拳棒，均為地方官拘獲，明正典刑。在直隸有王景曾一族，散處灤州、盧龍等處，以大乘教清茶門傳徒斂錢，奉諭搜捕。至光緒初年，冀州土匪，名叫黑虎，勢甚猖獗，時適李秉衡為該州知州，設法招撫，編成義和團隊，惟黑虎抗不受撫。義和團之名，蓋始於此。這是義和團起始的原因，至於義和團的組織，實甚離奇怪誕，其頭目稱曰老師，小

頭目稱大師兄二師兄，每傳拳法，必招集二十五人爲一團，圍立一首，全團聚散，皆從其命。其所拜之神，皆發源於戲劇小說，如姜太公諸葛亮孫悟空豬八戒楊香武黃天霸之類，有許多荒誕不經的咒語，曾在故城拿獲一和尚，名大貴，據供是山東人，並述其教咒語，有什麼「日出東方一滴油，驚動弟兄天下行……」等語，還有什麼「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開，一指地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這一類荒唐話，（稍有智識的人，莫不嗤之以鼻，不意身爲王公大臣者，竟會爲其所惑。）欲習拳術者，必須焚香念咒，以涼水潤身，咒畢仆地，口吐白沫，不多時便奮然而起，索刀索棍，手舞足蹈，如醉如痴，口裏大聲說：我是某神仙。說從此雖手無寸鐵，亦能破堅攻敵。又有所謂紅燈照，都是十餘歲的幼女，身著紅衫紅袴，一手持紅燈，一手持紅巾，謂能飛行空際，隨意縱火，帶同義和拳，剪滅洋人，拳匪稱她們爲大師姐二師姐。到處鼓煽，勸人習拳，以保清滅洋爲鼓煽的理由。一面盛稱拳術的神奇，一面痛詆洋人的禍中國，說教士摘心剜眼，迷拐小兒，種種謠言，鄉愚皆信以爲真。呼洋人爲大毛子，呼教民爲二毛子，其他通洋語用洋貨的，呼爲三毛子四毛子。這一年恰值天旱，於是散布謠言，說是教士擋住了天。凡此都足以煽動愚民，起而仇教的。時值李秉衡任山東巡撫，毓賢爲按察司，二人皆昏庸不識時務，常懷排外思想，見義和團專以仇教爲務，正符其願，故聽其轉輾傳佈，不加禁止。於是教案日多，於光緒二十三年殺死一德國教士，李秉衡毓賢均因此撤任。越二年毓賢任山東巡撫，以其信任拳匪，省內漸有多人演習拳棒。匪首朱紅燈，自稱明朝後裔，聚衆千餘人，託名習拳，實與教會爲仇，焚毀教堂，搶劫教民，毓賢不但加禁止，反而一味縱容，以致效尤者紛紛並起，在平原禹城茌平東昌等十餘縣屬，

皆被騷擾，肥城乃有殺死英教士卜克斯之案，毓賢因此撤職，袁世凱繼任，捕獲匪首孟洗汶吳方城吳經明龐燕木李潼關等多名，分別斬決，賠償造堂費九千兩了事。

毓賢既因教案去官，更加仇恨西人，乃進京向權貴們遊說，稱拳匪爲義民，且多有神技妙技，不畏槍砲，正可利用之以伸民氣，強國之道，無過於此。端王剛毅本有滅洋之志，今乃惑於毓賢之說，自是贊同。此時端剛既踞要津，大權在握，在京大員，莫不隨聲附和，如徐桐、崇綺、英、啟秀等，以及其他朝臣，十之八九，大都傾信拳匪，首相榮祿與慶王王文韶等雖心知其非，亦不敢力爭。因爲這時候慈禧太后欲謀廢立，方倚任端剛，乃亦爲其言所惑。時溧水涿州拳匪作亂，命剛毅與趙舒翹前往查辦，二人不但不遵旨查辦，反召見其大師兄，多方獎勵，並引之入京。且盛稱拳匪之忠勇可用，端王又力爲德惠，太后乃愈信之。連日召見王公貝勒六部九卿會議，廷臣咸知太后已聽端剛的話，決意主戰，莫敢發言。惟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五人，力言釁不可開，拳民不可恃，殺洋仇教，必觸各國怒，將合而謀我。端王一聞此言，甚至斥他他們爲漢奸，其罪當誅。袁許二人連上三疏，剴切陳辭，乃於七月初四日奉旨正法，十七日又殺徐等三人，數日間連殺五大臣，全國震動。當時會議凡三次，光緒帝亦力言戰畔不可開，無如端剛等勢饒甚張，無力挽回此危機，一般附和端剛之流，衆口一詞，說人心不可失。遂下詔褒揚拳匪，稱爲義民，賞銀十萬兩，並頒給口糧，比於官軍。因拳匪人數衆多，不可無統帥之人，乃命載勛爲統領天下義和團大元帥，剛毅爲副，於是義和團仇殺洋人的舉動，便成爲國家明令允許的政策了。我們看看當時的那道上諭：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洋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罕不待以懷柔。道光咸豐年間，倭准彼等通商，並許在我國傳教，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人民，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民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教士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眸，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卹教民，爲民教解釋宿怨，朝廷懷柔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有杜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砲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泱泱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世，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剪彼兇鋒，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資，益助餉械，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卽刻嚴誅，決不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

這一篇自尋苦惱的糊塗話，是在五月二十五日發表的，這時拳匪已經非常猖獗，加上這一番鼓勵，正如火上添油，便一發不可收拾了。先是五月初一日，拳匪進襲長辛店、盧溝橋二車站，放火焚燒，截斷電線，京城戒嚴。從此連日焚燒豐台、京津、蘆保等車站，一路拆毀鐵路橋樑，至十一日，京中官員眷屬紛紛逃難。十四日有安徽姚提督自甘肅入都，在市遊行，見遍地都是拳匪，聲言要殺鬼子，姚叱曰：昇平世界，你們不可胡說，你們要殺鬼子，恐怕你們將要被鬼子所殺。匪便誣為二毛子，把他拖下馬來殺死。十五日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聞本國使館衛兵將至，乘車出永定門迎接，為董福祥所見，命兵士將他殺死。接着到處焚毀教堂，屠殺教民，京師大亂。京城內外，所燒毀的西人住宅，統共有三十四所，教堂十八所，男學堂十二所，女學堂十一所，傳道學堂四所，施藥局十二所，醫院八所，印刷所三處，盲目學堂一所，天主堂二所。殺死的人更不計其數，端剛等下令圍攻使館。

圍攻使館的情形，據一位被圍在英國使館中的某教士，寫信寄給他本國的朋友，說得很親切。現在把他的大意，節錄在下面：

「記得我們被圍困到如今，差不多五十天了，雖然曾經派了許多送信的人，但能到天津回到北京的，祇有三人，其餘都在路上被殺，所以信息全無，外邊的事情，一概沒有知道。

「我們在沒有進入使館之前，已經受着許多從古以來所沒有的苦痛。去年冬天以來，在京城的周圍，中國教友，受着拳匪的逼害；却想不到在京城裏面，也這樣任憑拳匪攪擾，更使我們受苦。現在被圍在

使館裏的，除了西國人之外，一共有二千多中國教友。離使館九里路遠的地方，有一所天主堂，俗名叫北堂，也有二千多教友，被拳匪圍困在裏頭，只有四十個法國、意國兵在保護，我們不能通個信，不知道現在平安不平安？但聽見北面鎗礮的聲音，沒有停止罷了！

「五月二十日，那天京城裏西國教士和中國教友都聚集在崇文門裏的美以美會禮拜堂，那地方離開英國公使館有三里多路，只有幾個美國水兵在看守門戶。每天晚上看見四處有火光，知道拳匪在放火燒教堂。二十三日早晨，接到美國公使的信說：中國王大臣請各國公使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京到天津去，我們知道這是一種奸謀，因為這時在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拳匪像亂麻一般，我們若是出去，必定半路上給他們殺死。況且各教士都不忍扔掉中國教友，所以我們願意在這裏與他們同死。第二天早晨派德國公使克林德帶了參贊，到總理衙門（即外交部）去商量，在路上克公使被殺，參贊也受了重傷。因此，圍在使館的西人，更加不敢到天津去了。我們有七十一個西國人，七百個中國教友，便一齊搬到英使館去。因為人多，英使館容納不下，對河便是肅王府，幸虧有位從前在山東傳道的秀牧師，同肅王府中的人認識，就派他到肅王府去商量，容中國教友避難，不幸秀牧師在路上也被拳匪放鎗打死了。過了一天，總稅務司赫德也帶了稅關上的各西國人，進英國使館來避難。稅務衙門四十年來的公文，都被燒掉了。

「拳匪起初都用長鎗大刀，被西國兵用快鎗打走他們，他們就在上風放火，翰林院衙門在英使館北

面，也被燒掉，中間有許多世間少有的古書，都損失了。這一夜，在南面有六處起火，使館裏的男男女女，都竭力救火，幸未波及。

「從五月二十四日起，拳匪日夜不斷的放鎗攻打。受圍困的一個武官，曾經在西園打過好幾回仗，他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那樣兇狠的敵手。有一夜，天下大雨，雷聲隆隆，拳匪趁機加緊來攻，鎗聲雷聲，攪成一片。他們用鎗不能取勝，就排大砲進攻，我們都有點害怕，恐怕所防守的牆垣要守不住了。曾有人計算過，開花砲彈落在院子裏的有二千八百顆的多，但是却沒有一個人受傷。他們在內城的城牆上，正對着公使館北面安排了兩個大砲，向下攻打，牆頭都被打得破壞不堪。西園小孩子，常常在院子裏，用小筐子拾彈子做玩意兒，像不知道有拳匪在外打仗似的。各國公使館裏，受損最大的，算法國德國兩處。婦女們一天到晚縫布袋，盛着泥土，做破缺處的防堵。防守的各西兵，只有鎗沒有炮，所以漸漸有不能抵擋的樣子。

「恰好在某舊貨舖裏找着一個舊砲，在一八六四年用過的，如今當作廢物，埋在地下，我們把牠找出來。但是沒有炮架子，仍舊不能用。剛巧又在某公使館裏找着一個舊砲架，恰恰相配。就是缺少砲彈，有人在某公使館找着許多未曾開花過的砲彈，大小也正適合，就拿來試試看，果然把拳匪嚇得四散逃走。拳匪有四五萬人，守使館的西國兵，只有四百多人，他們竭力攻打，屢次被打退。拳匪最恨的是中國教友，要叫使館裏把中國人交出來，就可以免了攻打。西國官那裏肯把無罪的好百姓交給仇人的手

裏呢？

「六月十七日下午天，攻打得最利害了，他們在法國公使館放了三個地雷，把房屋轟掉大半，又傷了許多人，醫院也被打毀了。爲了防備砲彈，特地在空地上挖了幾個窟窿，預備給婦女孩子們躲避。有一天，陣亡了一位兵官，正在把他抬到樹下葬埋的時候，忽然一個開花彈飛來，打在樹頂上，嚇得大家四散奔避。這兩個月裏，西國人死了六十，傷了一百四十，現在圍困在府裏的，一共有十七國的人。七月十八日我因病躺在床上，聽見救兵已經到了天津，拳匪知道救兵快到了，更加拚命的打，院子裏的彈子像雨點一樣，晚上也拚命的打，拳匪頭目催緊許進不許退，正在危急萬分的時候，聽見城外炮聲，知道救兵已到，大家膽壯起來，更加用力的抵抗了。」

「二十一日午後，救兵打破京城，打退了拳匪，大衆都同聲感謝上帝，使我們能發從死裏復活。」這篇報告，寫得非常動人，在這裏因爲篇幅關係，節掉了許多，文字上也有些改變。（原文可參觀庚子教會受難記上卷）聯軍雖已入京，解了使館之圍，但在西什庫一帶，兵匪之圍攻北堂者，仍不稍懈。皇城各要區，尚有重兵據守，聯軍復於二十一日節節進攻，東華門之戰，尤爲劇烈，良久，兵匪始潰，遂被皇城。次日日本兵先到北堂。法兵繼之，從此兩月之被圍苦守，一旦告終，莫不喜出望外，感謝上帝洪恩。計北堂避難教民三千四百人，被困兩月餘，死四百人；地雷炸發，斃幼孩七十六；護堂西兵四十二名，陣亡十一人，京師既陷，董福祥縱兵大掠而逃，數萬拳匪，與鹿匪王大臣，皆鳥獸散。凡寺觀與王公府第中所設拳壇，皆被焚毀，皇太后

已攜光緒帝逃往山西太原，後又逃到陝西西安。命慶親王會同李鴻章與各國議和，各國要求先辦罪魁。太后以縱匪仇洋之人，多係親貴，因此爲難，命李鴻章竭力分辯，而聯軍統帥德國瓦爾德西（Waldorf）乃說：「所索罪魁，還是附從的人，真正罪魁，爲保全中國體面，還沒有提出。」這明明是指着西太后說的。李鴻章密電以告，太后懼，始允分別治罪。乃於十二月發出上諭：

「京師自五月以來，拳匪倡亂，開釁友邦，現經李鴻章與各國使臣在京議和，大綱草約，業已畫押。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昏謬無知，喜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剿辦團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以至邪焰大張，聚數萬匪徒於肘腋之下，勢不可遏。復主令兩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久，釀成奇禍，社稷隳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生民塗炭。朕與皇太后危險情形，不堪言狀。至今痛心疾首，悲憤交深。是諸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前者兩降諭旨，尙覺法輕情重，不足蔽辜，應卽分別等差，加以懲處。已革莊親王載勛，縱容拳匪，圍攻使館，擅出違約告示，又輕信匪言，枉殺多命，實屬惡暴冥頑，着賜令自盡。派署左都御史葛寶華前往監視。已革端緒王載瀾，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致啓釁端，罪實難辭。降調輔國公載瀾，隨同載勛，妄出違約告示，咎亦應得。着革去爵職，惟念均屬懿親，特予加恩，均着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先行派員看管。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今爲之揄揚，以致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任內，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兇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着傳旨卽行正法。並派按察使何福盈監視行刑。

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袒庇拳匪，釀成巨禍，幷曾出違約告示，本應置之重典，惟現已病故，着追奪原官，卽行革職。留任甘肅提督董福祥，統兵入衛，紀律不嚴，又不諳交涉，率意鹵莽；雖圍攻使館，係由該革王等指使，究難辭咎；本應重懲，姑念在甘肅素著勞績，回漢悅服，格外從寬，着卽行革職。降調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於載勛擅出違約告示，曾經阻止，惟尙可原；惟未能力爭，究難辭咎，着加恩革職，定爲斬監候罪名。革職留任刑部尚書趙舒翹，均着先在陝西省監禁。大學士徐桐，降調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殉難身故，惟貽人口實，均着革職，並將卹典撤消。經此次降旨以後，凡我友邦，當共諒拳匪肇禍，實由禍首激迫而成，決非朝廷本意。朕懲辦禍首諸人，並無輕縱，卽天下臣民，亦曉然於此案之關係重大也。」

將此上諭與前述對外國宣戰的上諭一爲比較，見得所謂罪魁禍首，還不是端王、剛毅等人，直是那個貽禍中國的西太后！西太后又徇各國之請，出諭懲治各省戕害教士教民的地方官吏，於是道台、鄭文欽、都司、周之德、知縣、白昶、文星等，均置重典。尤軍與革職永不敘用的，凡百餘員。其他殺人兇犯，亦有爲教民指控，經官判令抵償的，爲數亦不少。綜計拳匪的死亡，爲數實倍蓰於遇害的教民。

各國除要求懲兇外，又要求十二款，如：因戕害德國公使與日本書記官，須派專使赴兩國謝罪，賠償各國人及教士教民所受公私損失。西太后一一答允，於是議定賠償各國兵費四萬五千萬兩，分三十年還清，每年還一千五百萬。各省焚毀的教堂與教士教民的屋宇，皆由地方官就地籌款賠補。拳匪大亂的一件案

子，就此結束了。

但是上面只敘京師一部分的情形，而京師以外各省情形，在此有略加補述的必要。這時候從山東省起，連上山西的地方和直隸河南，更有東三省，沒有一處安靜的地方，其間受禍最烈的，要算山西了。因為山西是在毓賢的管治下，他是第一個提倡義和拳的人，招徠了山東的拳匪頭目，教授拳術，以仇洋滅教為號召，所以在山西所遭遇的教難比別處更利害。六月初二日那一天，他開始在太原屠殺了，先派兵把守城門，防教友們逃走，一面集了一萬多拳匪，把天主堂圍困起來，上一夜曾經圍攻過英國更正教堂，被教堂裏面的人開鎗打死了幾個人；現在他們看見天主堂的人更多，深恐像昨天一樣，所以先叫知縣白昶，假言保護，進到堂裏探聽虛實，知道裏面一無準備，報知毓賢，然後再來勸西教士們遷到鐵路公司，一到公司，便被捕殺。主教們既被殺死，房屋數百間，盡被放火焚燒。當時尚有數百教友，聚集城中，就捉到官署，逼他們反教，又被殺死三十多人，還有『慈幼堂』內修女與女孩二百餘人，亦被拘禁，也殺了好幾個。他們搜索城內教友，每逢尋到一個，便逼他反教，若肯焚香拜佛，到官廳買一張反教執照，便可以免死，但是多數教友都寧死不願，就被殺掉。而且他們用種種殘忍的方法，如挖心挖眼肢解活燒等等，真是慘不忍說。當他們放火燒醫院的時候，醫生教師等人從圍住的人中逃出來，一位姓顧的女教士，因為要搶救一個女孩，落在後頭，拳匪就把她連女孩一齊推在火裏燒死。毓賢定計要殺害那些住在鐵路公司的人，親自拿了兵器，把許多西國人捉到巡撫衙門，吩咐開刀，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未了殺孩子，把首級號令在城上，那天殺死的兩人，天主教有兩

一個主教，三個神甫，七個女修士；耶穌教有牧師夫妻十六個，醫生夫妻二個，女教士二個，孩子十一個。第二天在北門殺了天主教中國教友四十七個，更正教教友也被殺許多。同時，在榆次壽陽等縣，也有大殺中國教友的事，單壽陽一處，有七十二人之多。在山西其他各地受害的，天主教外，更正教以內地會爲最多，此外如公理會，浸禮會，瑞典會，大英聖書會，美國紐約播道會等等亦不少。受難的人數，總有好幾千。單記華人在山西受難的更正教人，柴蓮馥氏的著作裏有山西之難一冊，裏面廿七篇記錄，大都是可歌可泣的事實。

其次說到直隸，總督裕祿，臬司廷雍，都是饒賢一路人，四五月間，拳風已大熾，蔓延幾遍全省，幾乎沒有一個村莊不習拳棒。老者黠者，充頭目師兄，天天以搜殺教民爲事，北京城內已鬧得天翻地覆，其他各城各村，亦莫不風聲鶴唳，殺人如麻。教友們無處逃生，只好團聚一莊，掘濠築壘，以備抵禦。這種爲保全性命不得已辦法，官廳不諒，倒說教友聚衆備械，抗拒官兵，形同叛逆，官兵乃助拳匪圍攻。景州朱家河，成爲教友避難聚集的地方，適李秉衡率兵北上，其部將陳澤霖路過其地，州官乃誣稱朱家河洋人聚衆謀逆，請其剿除，於是千數百教友與兩神父，皆被慘殺；陳澤霖因此得着西太后的特賞。南皮縣吉行村也發生同樣的慘劇，被匪攻破，有聶鮑二神父與一百多教友同被殺。宣化府有數百教友避匿山洞中，被拳匪積薪洞口，悉數燒斃。獻縣地方，被活埋了一百多人。鞏村地方，有拳匪一隊來搜捉教會中人，將趙牧師及劉姓教友殺死，並開膛破肚，屍首扔在河裏。保定孟繼先牧師，他勸教友們都躲到別處，自己與西牧師等留待殉道，後來果被拳匪殺了。美以美會的教友被殺死的，據一位海牧師當時的報告，說在開平有四十五人，另外在逃到天津的

路上被殺了三人，因逃難而餓死的六七人。在這些死難中人，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情形。在延慶有六十歲的一個老牧師陳大鏞一家四人，都被殺死。遷安一處慘殺了九十一人之多，在北通州被殺的人更多，單在更正教方面，有男教友四十二人，女教友五十四人，男女小孩四十一人，記名教友五人。拳匪殺人的方法，真是殘酷到了極點，在遷安把一個姓吳的女教友，拴在廟裏的柱子上，用一大把香燒她的臉，又把四肢割下來，堆在門外用火燒。還有被活埋的，有用滾水倒在喉嚨裏燙死的，諸如此類的事體，真是多得不可勝數。（參看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第三冊）。

再說到山東，原是拳匪最初的發源地，毓賢李秉衡都做山東的高官，他們是提倡拳匪最先最有力的，星星之火，從山東蔓延到山西直隸而成燎原之勢。光緒二十五年便有肥城縣殺死英教士的事，次年又有曹州土匪滋鬧的事。幸虧毓賢調往山西，袁世凱來繼任，他是一個明白時勢的人，對於拳匪，本來很恨，所以拳匪不敢在他的境內滋擾，不過這時端剛的勢儀很大，西太后又宣布了宣戰的上諭，不得已令西教士暫避到海口租界，一面把教堂房屋稽查封入官爲名，以防被匪毀壞。不過在濰縣樂陵泰安等處，也不免有毀教堂，焚掠教民家的事，教友死難的，也有二百九十人。濰縣有個學堂叫「樂道院」爲暴徒搶劫焚毀，也有學生朱東光爲匪毆斃劉作哲受傷的事。從濰縣焚毀洋樓之事，傳布到四方，各處拳匪，都蠢蠢欲動，有些地方靠着長官的賢明，平安無事；有些地方，因爲地方長官的糊塗，也發生暴動。例如蓬萊縣地方，雖亦有拳匪屢次鬧事，幸虧知縣李于堦，百般壓抑，方得無事，這位李知縣，實在是很有膽略的，因爲當時登州知府是

一個滿洲人叫端謹，也傾向於拳匪的，同時，有守備魏某地保馬某，都是煽動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竭力保護教會，是十分困難的，幸虧袁世凱的態度是和他相同的，又得了薩鎮冰臂助，使登州教會一點沒有受着意外。又如武定府屬等地方，因為地方長官不竭力彈壓的緣故，樂陵縣知縣何業健竟出示袒匪，故濱州一處，有中國教友八十九個遇害。黃河南岸有一處秦市里地方，有二十四個與菱棚地方有十一個人受害。樂陵西倉上一處，殉難的十七人，魏家倉殉難的三十八人，該村房屋盡被焚毀。朱家寨的西人住宅醫院學校教堂，都遭燒毀。這幾處所遭遇的困難，與山西直隸等處無異。可見當時拳匪的擾亂，全以地方長官的態度為轉移的。有袁世凱的鎮壓，山東省總算還不致大糜亂。

還有東三省，也非常利害，因為做副都統的晉昌，素來仇教，雖然盛京將軍增祺曾出示禁止拳匪，一點也不生效力。在六月初四初五這兩天，拳匪兩次攻打南關的天主堂，被堂裏的人放鎗打死了幾個，晉昌便自己領了炮兵，來幫助拳匪攻打，主教對大衆說，我們只可以敵匪，不可以敵官兵，就叫教友們停戰。因此拳匪便得攻進天主堂，逢人即殺，紀主教及艾李二神父及教友一百多人，及許多婦孺，盡被殺死。燒毀教堂及教友的房屋，又殺死了許多更正教教友，當那些教友被殺的時候，一點也不害怕，瀋陽有個姓侯的女教友，臨殺的時候，還大聲的禱告，王家屯有教友王富恆一家被殺，也大聲禱告。在瀋陽一共殺死十一個男教友，三個女教友。內中有一個瞎眼教友，名叫常森，本來是個賭徒，並且學「混元道」，後來瞎了雙眼，到醫院醫治，得聽道理，痛悔前非，勸化了許多「混元道」中的人，常常講道勸人，人都稱他小保羅，這次也殉了難，臨

死他還唱讚美詩此外在新賓堡殉難的有四十二人。永陵有二十三人。旺清門有十四人。夾河有二人。懷仁縣有十多人。八家子有三人。遼陽有八十多歲的一個女教友，合家都被殺。在廣寧一帶，也有五十多人受難。新民屯等處一共死了三十八個人。天主教被殺的更多，單在奉天一省，有一千四五百人，內中有一個主教，十個神父，三個中國神父，吉林黑龍江也有受難的人，只是比較少一點。

在蒙古天主教分三區，受禍之烈，不下山西直隸，在東區因灤平知縣文星仇教，有把司神父活埋的慘劇。中區西灣子總堂，逃難教友五六千，團結自衛，散處他方的，十之八九皆被殺。被害的有三千二百多人，內有神父五人。西南區殉難教友八百餘人，內神父四人。更正教在法庫湯門地方，有許文明劉種玉等以及男女學生受難的十多人。此外在河南光州信陽等內地會路得會，都受着逼迫。

總起來說，在北方受拳匪之禍的，以山西直隸為最利害，其次為奉天，其次為山東蒙古河南等處一部分，獨南方則倖免，前面已經說過，全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之力。當宣戰上諭到南方的時候，他們二人往返函商，都以不奉中央命令，保衛地方，為正當辦法，兩廣總督李鴻章在粵亦不奉詔，南方遂免拳匪之禍。然而地方上仇教的莠民與哥老會等，亦都想乘機竊發，故不免有焚劫教堂教民之事。河南巡撫裕長（乃裕祿之弟），浙江巡撫劉樹棠，河南巡撫俞廉三，江西巡撫松壽等，傾向拳匪。故在河南境內，教堂被毀者十之七八，教友數千家亦遭劫掠。浙江以衢台二州為最烈，教堂與教友家無一倖免，亦有多人喪命。湖南衡州道台隆文知府裕慶，與北省仇教大員遙通聲氣，乃有主教神父殉難之事。江西北境尚無大損。陝

西亦賴端方維持，尚稱平安；惟密近山西之處，亦不免波及，因有郭神父及數教友喪命。惟有四川雲貴兩廣福建等省，被害較輕。

基督教遭此莫大的洗劫，我們一讀此類記載，莫不爲之心悸。然而在基督教本身，利害相權，實在利多而害少，因爲庚子以後的教會，因遭此一番鍛鍊，不但教友的信德愈堅，不良分子，予以淘汰，而其進步之速，較十倍於庚子以前。所可惜的，滿清政府從此對外傷失國體，對內失去人民信仰，不十年國祚便移，而改爲中華民國。這不可謂非滿清當局的愚昧有以致之。

第十八章 庚子後基督教的新趨勢

中國基督教從庚子年得到了很大的教訓，覺得以前的傳教方法，有改革的必要，天主教當局對於教士幫助教友訴訟的事，重申禁令，而注重於教友的訓練與教友全家歸主的運動，所以成立了許多訓練教友的團體，如山東、江西、四川、延平、保平、天津、河南、湖北、蒙古……等處，都有這種組織，有些是培養教友宗教生活的，有些是討論個人佈道方法的，有些是為鄰友祈禱的，總之是以鼓勵教友佈道為目的，規定每人每年必須領導一人進教。果然，效力大著，在燕山一處地方，竟從七百個教友，突然增加到三千多人。同時，對於慕道者的訓練，亦加緊起來，每個慕道者，非經過二三月之長期訓練，不可以進教。其訓練的方法，或聚合在一起，如短期學校一樣，使他們學習一切教義問答，並且習讀經文及十誡等；或由教士們親至慕道者家中，施以教授。在訓練期中，教會每開支了巨大的經費，予慕道者以相當的津貼；有時且利用賑災的機會，吸引了許多貧民，來受宗教的訓練。在一九一〇年直隸災荒時，曾一面放賑，一面以金錢召人聽道，結果，便增加了許多教友。這種方法，當然會引起一部分教士的反對；不過在施用這方法的人，以為待他們進教以後，可以用教育來把他們品格提高，並且在二三代以後，他們的子孫，從小就可以獲得宗教的薰陶，而為良善的教友了。所以他們很普遍地採用這方法來吸引教友。

一九〇〇年以前，在中國的天主教，只有十個修會，即方濟各，奧斯定，多明我，耶穌會，以及遣使會，聖言

會，聖母聖心會，巴黎密良羅馬等「外方傳教會。」到一九〇〇年以後，便絡繹增加到三十多會，（見前章修會來華表）傳教士的國別，起初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後來不論法美英德比坎荷奧匈波捷瑞……等國，皆派教士來華，其人數的增加，實足以驚人。

傳教士人數增加表

年 份	外 籍 傳 教 士	本 籍 傳 教 士
一九〇〇	八八六	四七〇
一九一〇	一、三九一	五二一
一九二〇	一、三六四	九六三
一九三〇	二、〇六八	一、五〇〇

傳教區域增加表

年 份	區 數
一九〇〇	六
一九四四	一〇

教友人數增加表

年 份	人 數
一九〇〇	七四一、五六二
一九〇七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六五	二二
一九二〇	五二
一九二六	七六
一九三〇	一〇〇
一九三三	一二〇

一九一〇	一、二九二、二八七
一九二〇	一、九九四、四八三
一九二一	二、〇五六、三三八
一九三〇	二、四九八、〇一五
一九三二	二、五六二、七四二

從上列各表，可以見得天主教在一九〇〇年後的進步。而在教育、慈幼、印刷各方面，亦有很顯著的發展。

原中國之有新教育，實不能不歸功於基督教，在天主教方面，從一八五〇年開辦「徐匯公學」以後，逐漸增設許多普通小學中學與教理學校，為便利學生深造起見，法國耶穌會於一九〇三年創辦「震旦大學」於上海，一九二五年北平的「輔仁大學」，初由美國本篤會所創辦，到一九三三年改由聖言會管理；法國耶穌會又在一九二二年創辦「工商學院」於天津。這是天主教在中國的最高學府，都已先後向中國教育部依法立案。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三大學學生有一、三八四名。高初中學校共五十一所，男生八、三〇六名，女生四、〇二六名。師範學生男二七九名，女生三九五名。至於高初中小學，高小男校一九七所，學生一〇、三八九名，女校一一七所，學生八、三八七名。上述各級學校中，有半數以上是教外學生。而純粹培植教

內學生的，有教理學校八、六四〇所，男女學生一六二、四八五名；教理教員養成學校中有男女青年一、六三名。此外則專攻神學的修院，是培植傳道人才的，在一九三〇年一年中，習拉丁文的有四、三五一，習哲學的有三二七名，習神學的有四二五名，尚有在羅馬留學，預備晉陞司鐸的有二九名。只就學生的人數比較，一九三〇年的統計，差不多比一九一四年加了一倍；其教育發達的情形，可見一斑。

各教區中所設的『孤兒院』，有三六〇處，收容孤兒有二、八五八名；聖嬰會收容嬰兒，有五二、八九四名。從上面種種數字上看，覺得天主教所特別注重的工作，即是收養嬰孩孤兒與培植教內子女，使他們從小就得着宗教的訓練，可以建立起中國教會的基礎。同時，也設立了『留養院』，有二三二所，收容老人和病人，由修女們擔任看護之責。這些修女們，大都受過簡單醫藥常識訓練，所以對於嬰兒孤兒與老人遇尋常疾病的時候，他們便可以為之醫治。苟有重病，方送醫院診治，在漢口、陝西、上海等處曾設醫院，施診給藥，在一九三〇這一年中，就醫人數有七、〇六一、四九二人；在廣州亦曾設『麻瘋院』一所，收容麻瘋患者。

至於印刷和著作，據最近統計，共有定期刊物三十餘種，週刊半月刊月刊之外，又曾在一九一五年創辦一日報，即天津的益世報，在中國的新聞界中也佔着重要的地位。有印刷所二十餘處，規模較大的，要以北平、天津、上海為最；出版書籍，上海共有五十三萬多種，重慶共有四十萬種，他如獻縣等處，亦出了不少書籍。為發展此種事業計，曾於一九二八年設立一個中樞機關於北平，名為『中華公教教育會』，大部份的工作，是督理全國的出版事業。

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加緊中國領袖人才的訓練，努力於中國教士與職員的增加。當一九一八年時中國教士佔百分之三五，至一九二三年加到百分之四一；一九一六年時中國職員佔百分之六六，十年之後，便增加到百分之七二。對於一般新興的建築，大都採用中國式樣。又編成了許多中國讚調的詩歌，教區的名稱，都改為中國地名。這些工作，與更正教所提倡的本色教會運動，有相同的意味。在一九二四年召集一次「中華全國公會」議決從速建立一個尋常自立的本國教會，並且劃定了幾個自立傳教區。在這會議中，分設七個小組委員會，計畫各方面工作的聯合。此後幾年中，傳教區域，陸續移交於華籍神職班管理，使中國教會可以漸漸達到自立的地步，可見最近二十年來，跟着時代的潮流，向着這新方向邁進。

一般的批評，以為天主教對於社會服務的工作，不若更正教的努力，其實亦不盡然；我們看天主教在救災救難的一方面，也很有偉大成績。例如一九三一年華北水災時，教皇及中國信徒發起的賑災會，募得二十餘萬元的賑款，最近如「一二八」「八一三」的中日戰事中，多數天主教教堂，都充作了難民收容所，並且設立許多軍事醫院，為救護傷兵之用。饒神父為難民奔走呼籲，劃定難民安全區，不獨在上海，也普及到各戰區；受他蔭庇的人，更何止幾千百萬。一般中西修士與教友，日夜為難民服務，尤不乏其人，中國領袖如陸伯鴻、相伯等人，亦莫不為之盡力。

至於教友人數的增加，在一九〇〇年前，必須經三十年之久，方加一倍；而今從一九〇〇至一九二二年，只十一年間已加了一倍。不過從一九一八年後，其增加的速率，較為遲慢，一九一八年的統計為一九六

三、六三九人，到一九二四年加到二、二四四、三六六人，只增加到四分之一四·三而已。

說到更正教，在一九〇〇年以後，與從前大不相同。從前國人仇視基督教，多誤會外人來華傳道，含有政治作用；不幸拳匪倡亂，各國乃有瓜分中國之議，但經教會人士力持正誼，主張保全中國領土，始得轉危為安。其後山西浸會首先以其賠款創辦「山西大學」，而美國乃主張退還賠款，創辦「清華大學」，各國多亦效法，均將賠款退還，遂使國人仇教心理為之一變。其次如政府銳意維新，廣設學校，算術英文及科學教員，大都取材教會；尤其在國民革命的時候，參加革命工作中，每有不少基督信徒。民國成立以後，基督徒充任政府要職的，更不乏其人；單在廣東省政府中，當時任職人員，信徒竟佔百之六十五以上。並且基督教所辦各種慈善事業，每每取得一般社會人士的信任，遇有水旱兵燹的時候，不獨教會能慷慨捐輸，尤必擔任放賑事務，任勞任怨，涓滴歸公，凡此皆足以改變國人對教會心理的原因，所以最近二三十年，能獲得一部份人的諒解。

在教會自身，因遭遇許多困難，發現了許多弱點，力謀改絃更張。例如教會的自立自傳運動，從此更加猛進，一九〇六年俞宗周在上海發起「中國自立會」，設辦事處於寶山路，發行聖報為宣傳機關，到一九一〇年浙江平陽內地會首先響應，宣告自立。自立的風氣，遂漸漸普及到全國，如上海的羅店，浙江的鎮海，定海，永嘉，福建的莆田，廣東的南澳，湖北的京山，天門，湖南的常德……等處，皆先後成立自立教會；並設總堂於上海閘北。一九二〇年便召集第一次全國大會，當時報告有八十多處自立教會，從此歷年增加，一九

二一年增至一百五十餘處，一九二二年增至一百八十多處，一九二三年增至二百九十處，一九二四年增至三百三十多處，在這四五年之間，幾乎是級數的增加，進步之速，於此可見。同時，上海又有高鳳池、謝洪賢等發起『中國基督徒會』，不久，在香港設立了支會，逐漸推廣到北京、天津、寧波、徐州、長沙、太原……等處，亦先後成立支會；其後在天津則改稱為『中國基督教會』，他處亦漸漸的無形消滅，惟香港至今猶存。

一九一〇年時，天津徐君匯、張、伯、岑等聯合當地五公會教友，發起一個自立教會。一九一八年又有長老會教友劉、壽、山等在山東烟台組織『中華基督教會』，青島、濟南相繼成立分會，推及到山東全省以至於直隸、山西等處，而成立華北的自立系統。同時，上海基督徒作家沈嗣莊、李逢謙等組織一個自立教會，名為『基督徒團契』，在香港、廣東、福建……等處，尤努力於自立自養自傳，而改稱其教會為『中華基督教會』。全國教會差不多都有謀求自立的計畫，即未完全自立的教會，亦必將其原有名稱，冠以『中國』字樣，或改稱為『中國基督教』，而在傳道工作方面，那漸漸由華教士負主要的責任，西教士乃退處於輔佐的地位。

其次，中國大多數的教友，不但覺悟到自身應負教會的一切責任，並且應推廣佈道工作到各方面，於是有『國內佈道會』等的發起。（另詳基督教事工章）如在黑龍江、陝西、蒙古、雲南……等處佈道，十數年間，成立了二三十處機關。

再次，謀全國教會的大聯合，不但在事工上消滅了宗派的界限，一致合作，如拒毒運動、歸主運動、國內

佈道會，信仰自由請願……等等，已不復有宗派的區分。而一九〇七年所召集的「百年大會」更表現了各教會的合作精神。該會自四月二十五日開會至五月八日閉會，以上海青年會新建的殉道堂為會場，各教會各機關所派出席代表，共有六百多人，討論的總題為「中國的教會」。結果，有人主張組織一個無宗派的基督教協會，亦有人主張各省組織省基督教聯合會，然後由省聯合會聯合成全國基督教議會。此後，各省基督教紛紛組織了省聯合會，地方教會亦組織了許多地方聯合會。不過這次大會閉會以後，沒有負責推進的中心機關，進行得很慢。直至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又召集了一次「全國大會」，由穆德主席，組織成一個全國基督教中心機關，名為「中華續行委辦會」。她的任務：（一）執行全國大會的議決案，（二）作中西溝通的機關，與艾丁堡續行委辦會通聲氣，（三）提倡通力合作的事業，（四）發表教會公共的意見，（五）為各教會的諮詢機關。設立事務所於上海昆山花園五號，聘請誠靜怡為總幹事，開始做調查與研究工作；把調查全國各方面的事業，印成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繼續至今已出至十三期了。一九二二年五月間又召開了一個全國大會，中西出席代表有一千一百八十人之多，與上次大會比較，見得進步了許多，上次會員中華人佔三分之一，而此次則佔二分之一強。開會凡八日，分五股討論，對於佈道，醫藥文字，教育，工業，婦女等問題，皆有詳細的計畫。改「中華續行委辦會」為「中華基督教協進會」，選舉中西會員百人，仍以誠靜怡為會長，提倡「本色教會」，編成中西文中華歸主兩巨冊，全國各教會的工作情形，悉載無遺。由是各教會咸謀聯絡或合併，除長老會曾於一九〇七年成立「全國聯合會」，並與公理會、

倫敦會合組『中華基督教聯合會』外，全國信義宗教會，亦聯成『中華信義會』，全國聖公宗教會亦聯成『中國聖公會』，最近屬於衛斯理宗的監理會，美以美會，美道會，亦已實行合併而為一會，這可以見得中國教會的日趨於聯合而統一了。

最值得注意的，則為近年來因中日戰事的發生，教會在物質方面雖受很大的損失，而在救濟難民的工作上所盡的力量，却博得一般民衆的好感，為千載一時的傳道良機，使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日愈鞏固，前途便有無窮的希望。並且以最近統計，列表於下。

最近二十年中教友人數增加表

年 份	教 士	受 餐 徒	學 習 徒
一九〇五	三、八三三	一七八、二五一	二五六、七七九
一九一〇	五、一四四	一六七、〇七五	三二四、八九〇
一九一五	五、三三八	二六八、六五二	五二六、一〇八
一九二〇	六、二〇四	三六六、五二七	八〇六、九二六
一九二八	四、三七五	四四六、六三一	
一九三三	五、七七五	四八八、五三九	

一九三五

五、八七五

五二二、八七三

第十九章 基督教與國民革命

因為人們在生活受着一種壓迫，對於舊制度有不滿的時候，便會生出了反抗的情緒，用一種激烈的手段，來達到理想中平等自由的生活，那就是所謂革命。世界上無論是政治的革命，社會的革命，宗教的革命，或者其他一切的革命，莫不出發於這個理由。我中國自受滿清統治以後，人民失去了生活上的自由平等，最先就有洪秀全所領導的民族革命，只因爲他的革命陣線不健全，乃至於功敗垂成。繼之而起的，則有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所倡導的國民革命，他自己用了四十年繼續不斷的奮鬥，把二百六十七年滿人的統治權推翻，使君主專制政體，變成爲民主共和政體，完成了一部分的工作。現在有他的信徒在依照他的遺志，繼續努力，以期完成一個平等自由的中華民國。

我們研究這種革命精神的來源，却不能否認與基督教有相當的關係：洪秀全既從基督教得到了他的革命精神，發動這十三年偉大的力量，雖然他那種利用基督教的手段，不能叫我們贊同，而他與基督教的關係，却無可否認的。孫總理也是如此，他從小就受着基督教思想的薰陶，獲得了基督教革命的精神，做成他一生犧牲奮鬥的原動力。不信！我們可以看一看他的生平。

對於孫總理與基督教的關係，一般替他寫傳記的人，都把牠隱諱。只有一位英國朋友名叫林百克（Paul Linoberger）的，寫了一本孫逸仙傳記，才把他一生的宗教生活，毫無忌諱的述說出來。從這本書裏

我們大略可以知道孫總理個人的宗教生活與他所領導的革命，不無密切的關係。

當他在十四歲那年（一八七九年），跟着他的哥哥德彰離開了生長的翠亨家鄉，到夏威夷火奴魯魯（檀香山）去的時候，就進入了一個基督教的學校，在那裏讀了三年書。後來又入了香港的皇家學校，在香港公理會嘉理（C. R. Hager）牧師手裏正式受了耶穌主義的洗禮。這年他是十八歲（一八八三年）他寫在基督徒冊籍上名字叫孫日新，因為廣東音「日新」與「逸仙」是同音的。他為什麼不寫「逸仙」而寫「日新」？我們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大約的推想起來，或者是因為家庭中不贊成的緣故。他的哥哥也是反對的，因為那時候的讀書費用，是由他的哥哥供給的。在香港進教的事，被他哥哥知道了，就寫信給他，叫他與基督教斷絕關係，否則不再予以經濟上的援助。可是他的志向並不因此動搖，他哥哥沒法，只好叫他回檀香山，說有業務相託。到了檀島，他哥哥迫脅禁阻，且不給一錢。當時在僑居的信徒中，見他熱心宗教，就資助他回國學習傳道，後來棄傳道而習醫，原來想藉行醫以傳道的。從「博濟醫院」畢業後，在澳門設立了醫院，便開始進行他的革命工作了！先是他從進教以後，對於耶穌的犧牲精神，不但一天天的了解，而且生活變成基督化了。一本聖經，便做了他終身行事的法規，而有虔誠的信仰。林百克在孫逸仙傳記第三十三章裏有一段話說：

「他當耶穌教是文化的法規，他把中國文化同耶教國文化比較，看出中國沒有一種進步的宗教的害處。他看見耶教與近世文化一司生進的……因為他親見耶教有實現的成功，他才信服。他看見

耶教訓練個人，增加他的力量，減少他的弱點。」

他在那年回到家鄉，曾經毀壞了翠亨村上萬人崇拜的北帝神像，便引起了大眾的咒詛，他們罵他：「這個瘋孩子，都是外國教育使得這樣的；這種褻瀆神道的舉動，只有洋人教得出來。」他的父親因此也生了氣，叫他離開了家鄉。但是他還是拿着一本聖經，在一個小的油燈邊靜靜地念着。林百克又記着說：

「他這個時候，出神地想……他覺得他已屬於耶穌的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已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分子。這個神像的碎木，和鄉民反對的聲浪，爲什麼緣故？因爲他們不懂得耶穌生死的道理。要使中國人知道耶穌犧牲的道理，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盡的；第一，必須使民衆的經濟情形提高，教育的地位於是也可以增高，他們就可以知道耶穌救世的道理了……耶穌是愛與和平的救主。」

這個時候，他已經深植了耶穌的犧牲無畏的精神，所以後來能夠本着這種精神，始終不變，做他革命的事業。當他在三十一歲（一八九六）那一年，在英國遇到一次非常的危險，就是所謂「倫敦被難」的一件事，全是靠着他的宗教信仰與他的宗教關係上而脫險的。他被人誘到中國使館去，被中國駐英公使龔照璠密囚起來；那一天正是禮拜天，在將赴禮拜堂的途中發生的。他既被禁在使館之中，外面一些也沒有知道。使館中正布置着怎樣把他秘密運回中國，一切都預備好了，時間很急了，在這千鈞一髮，萬無生望的時候，憑着他那宗教的信仰，用誠懇的禱告，得着上帝之助，借手於他的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而得脫於難。我們看康德黎所著的孫逸仙及中國之覺悟（Sun Yen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一書以及他親手寫給香港道濟會堂區鳳輝長老的一封信，就可以知道他的宗教信仰。現在把這一封信抄錄在下面：

「啓者，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細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之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戶俱閉，嚴密異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遞傳食物各件。前已託之傳書，已爲所賣，將書與衙內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範更爲加密。而可爲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爲我傳書。次早，他入房中，適防守偶疎，得乘間與他關說，果得允肯，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幸前時將名帖寫定數言，未曾搜出，即交與傳出外，與簡地利（按卽康德黎）萬臣二師，他等一聞此事，着力異常，即報捕房，即稟外部，初時尚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爲顛狂者，使館全推並無其事。他等初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運往別處。初報館亦不甚信，迨後彼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報館始爲傳揚，而全國震動，歐洲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想香港當時亦必傳揚其事。倫敦幾乎鼓噪，有街坊欲號召人拆平清使衙門者，沙侯行文着即釋放；不然，則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館始懼而放我。此十餘日間，使館與北京電報來往不絕，我數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計而謀耳。

幸天心有意，人謀不臧，雖清虜陰謀，終無我何，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虜朝之名，從茲喪盡矣。弟現擬暫住數月，以交此間賢豪，弟遭大故，如蕩子還家，亡羊復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孫文。」

他又寫過一本倫敦被難記的小冊，但在這一封信裏，已經可以包括倫敦被難的大概情形了。他這次能在萬分危險中得着釋放，正如死裏復活一樣，全靠康德黎營救的力量。這位康德黎先生，在孫總理去世的時候，他還健在，當旅英華人開追悼會時，曾經到會，涕淚沾襟，輓詞中有這麼幾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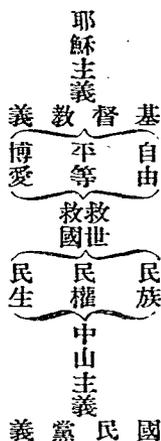
「孫先生革命的抱負，及由此抱負所產生的苦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穌救世的精神。」

在這封短短的信裏，充滿着宗教的信仰，他怎樣在危急的時候，懇切的祈禱，從祈禱中怎樣得到內心的安慰。在萬無生望的當中，竟會脫出危險而安然無事，覺得是上帝的特別施恩，因而始終不忘他「從神道而入治道」的使命。（再看這位英國人侍者哥羅，怎肯為一個外國的犯人傳遞消息？當孫總理與他關說的時候，曾經說「我是一個基督徒，將為基督而受難。」因此得了感動，並不接受給他的酬報，把孫總理送他的金錢，交還給康德黎夫人，可見這位侍者，完全出於一種基督徒的義俠與同情。）及至得到康德黎的回信，知道有重生的希望，揮淚而感謝上帝，他雖然以後不很談到基督教，而他的生平，却處處表出他是「以耶穌之心為心」的林百克所以說：

「中山雖然不大談論宗教，但是他是以使統統的善人都做弟兄為心的耶穌主義者；他是個全人類

都是弟兄的耶穌主義者。」

這結論實是確切不移，我們看他所發明的三民主義，更是充滿着耶穌的博愛精神。記者在民國十五年曾經寫過一篇孫文主義與耶穌主義的短文，把民族民權民生的含義與耶穌所主張自由平等博愛互相比較，張亦鏡先生也在真光雜誌第二十七卷十號裏詳細的比較過，並且列一個表做結論。



在這裏我們不需要詳細的重提，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孫總理的革命精神，完全出發於耶穌的救世精神而來，這在平心靜氣加一番研究的人，決不會說是穿鑿附會的。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午前病卒於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的時候，最後的遺囑中，他承認是一個基督徒，要用基督教儀式，殯葬他的遺骸，因為他覺得一生（六十歲）的生活與他努力的革命事業，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當時用基督教儀式舉行喪禮，曾引起國民黨同志中一部份的反對，孔祥熙等爲此事通電解釋，而素來反對基督教的汪精衛，爲此事也曾有過說明：

「中山先生曾說他是基督徒，臨終並不否認，當中山先生去世之後，孫夫人和孫哲生主張在協和醫

院行基督教禮儀，但有一部份的人反對，我在當時却是放任的。」

這是汪精衛在一九二五年對劉浩恩、李應林說的話，可以證明孫總理自己承認是基督徒的一件事。是確實的。還有他的結髮夫人盧氏，在後來答覆香山商會的一封信，述說總理平生的末一段，有這樣的幾句：

「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手書所言，十分多謝天父，允氏所求，復賜科父信上帝之心，此乃氏至安慰者。」

更是真確的見證。我們總孫總理一生的精神與事業，不但處處與基督精神相符合，而且能把基督精神活用於革命事業之上，這不可謂非基督教在中國的一大收穫。崔滄海（即通約）在敘述基督徒合作革命之信史一文中，不但證明孫總理是一忠實基督徒，更說及當時參加革命的人中有不少基督徒，其言曰：

「先總理是一個平生忠實之基督教信徒，先總理之家庭也完全是基督教信徒；總理少年信仰宗教，非常熱烈，讀舊約至摩西導引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樂土記，眉飛色舞，拍案大叫，我孫逸仙豈不能令我漢族脫離韃虜而建新國乎？」（見真光雜誌二十五週紀念特刊）

「中西教士與總理之患難結識，其名更僕難數；最著者其師康德黎，其友莫爾干，皆英人也；畏友區鳳墀，楊襄甫，王煜初，諸教士，皆我國人也；亦皆革命派之基督教信徒也。」

他又敘述革命之初，往往借教堂爲革命機關，在雙門底長老會福音堂中，有傳教師王質甫曾幫助孫總理秘密工作，用教堂名義，暗藏軍械於書箱中，祕密運輸，爲海關察破，連累牧師坐監。其他教堂爲革命機關的，如永漢路四牌樓黃沙的長老會福音堂，河南的巴陵會福音堂，花地的格致書院，芳村的培英書院，仁濟大街的博濟醫院，油欄門天主教徒胡心泉的鴻興客棧等處，可見基督教機關的贊助革命如此。更有基督徒之參加革命的，如首先爲革命犧牲的史堅如，是一個教會學校的學生，雖沒有正式受洗，但他對基督教却篤信而不疑。又如洪全福、鄧蔭南、李杞堂皆熱心教徒，奔走於港澳之間。總理從日本派來梁務光、梁務義兄弟，皆巴色會信徒，爲李準所殺害，後來莫榮新附逆，鄧蔭南憤不可遏，暗設機關於廣州，城南，基督徒黃福、譚思義、司徒不偏等密製炸彈炸藥，以事機不密，三人皆被害。其他基督徒中熱心濟助軍餉的，如吳東啓、王棠、林護等人，更難計數。最令人難忘的，黃花岡之役中，已死難之七十二烈士，有幾個基督徒，不過不能舉其名。當時參加革命的，據崔氏所知的基督徒，曾列表如下：

宋少東夫妻	長老三支會	入興中會	生存
宋居仁	巴陵會		生存
崔通約	長老三支會	入興中會	生存
陳少白	道濟會堂		生存
鄧蔭南	在檀香山領洗	入興中會	已故

吳義如	大良長老會	入興中會	生存
羅伯許	大良長老會	已故	
蘇焯南		入興中會	生存
徐甘棠	花地長老會	入興中會	生存
李杞棠	倫敦教會	入興中會	生存
鍾榮光	倫敦教會	入興中會	生存
練達成	巴陵會	入興中會	已故
林信賢	巴陵會	已故	
劉錦丹	長老三支會	已故	
宋玉臣	長老三支會	已故	
黃福	長老三支會	已故	
張石臣	長老三支會	生存	
李植生父子	巴陵會	已故	
楊香浦	浸信會	已故	
蕭勵初	浸信會	已故	

毛文明

長老一支會牧師

生存

朱德華

長老一支會

生存

胡心澄

天主教

生存

胡心泉

天主教

生存

崔氏列此表時，尙矍鑠健在，但今已故世。足見當時基督徒之參加革命的，僅廣東一隅，已有如許人，他處當亦不少，惜無人調查耳。如今承繼總理而領導革命的首領蔣總裁，亦正式領洗而爲基督徒。其夫人宋美齡女士，本生長於基督徒家庭，爲監理會本處傳道宋躍如的第三女公子，兄弟姊妹一家皆爲熱心基督徒，其母宋太太十年前猶熱心傳道，奔走於教友家庭中探望。其戚屬孔氏孫氏等，莫不信奉基督教。其他如馮玉祥、張之江、王寵惠、王正廷、鈕永建、馬相伯……等，更屬不一而足。可見基督教對於國民革命的關係，是異常密切的！

第二十章 非基同盟與本色運動

要說非基同盟，必須先說非基同盟所以產生的背景。簡單地說，牠的背景有兩點值得注意的：一即新思潮的運動；一即外交上的反應。說到新思潮運動，開始於非基同盟產生前六年，這運動是由於北大的六君子發生的；六君子就是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劉復、胡適、及周作人；這時正是蔡元培做北大校長。這運動實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對於一切舊思想，舊倫理，舊制度，舊學說，皆加以價值上的重估。所以牠不單是影響到中國整個的文化，亦與基督教有莫大的關係。陳獨秀所著基督教與中國人，胡適所著不朽，蔡元培所著以美育代宗教，都足以表現新思潮運動對於宗教的態度。同時，對於中國思想界發生重要影響的外國人，莫過於美國的杜威與英國的羅素兩博士，他們應中國教育領袖之請，來華演講。杜威主張實驗主義，羅素主張經濟的社會主義，同樣對於基督教有反對的態度。杜威以宗教不當佔學校課程之一部，羅素提倡男女自由同居，都是給新思潮運動以莫大影響。胡適是杜威的學生，所以以實驗主義做他的思想中心，處處叫人抱着『爲什麼』的懷疑態度。宗教是感情的產物，不能用『爲什麼』的理智來分析；以爲凡不能以理智分析的所謂形而上部分，都是非科學的；非科學的東西，都在排斥之例；只有科學才是萬能的。六個人中，影響最大而最速的，莫如陳獨秀的唯物主義；胡適的實驗主義；其次則錢玄同的疑古。當時青年學生界，莫不跟着他們跑；非基同盟，不可謂非新思潮運動中的一種結果。我們看他們反基的理由，大都是以馬克

斯的唯物史觀，與信仰科學萬能爲出發點；後來才走到反帝國主義的路上。

第二種背景，當一九一九年歐戰告終，巴黎和會的結果，激起了極大的思潮，國內的學生界以及商人，因外交上的失敗，有非常激昂的輿論，對於世界各國，都籠統地表示懷疑而至於抱恨，以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加上五卅，六二三等慘案，覺得凡屬外人，莫不是帝國主義，都是不懷好意而來的。非基同盟，又不可謂非這種民氣所造成的結果。看他們非基的理由，多少帶一點排外的色彩。

背景既明，然後可以說到非基同盟的事實。什麼叫非基同盟？乃是基督教在中國所遭遇的第四次反對，在性質上，比第三次庚子反教來得嚴重，在形式及意義上却不同：

第三次

發動於無知識的拳匪

由一般頑舊的王公大人提倡

出發於排外思想

取野蠻的屠殺手段

僅限於北方的幾省

在物質方面儘量破壞

發生流血的慘劇

第四次

發動於知識階級的學生

由幾個教育家文人的領導

出發於科學思想

取文明的文字討論

普及於南北各地

在思想方面盡情進攻

影響教會的改革

從這幾點比較上，可以知道這次所謂非基同盟，是一回什麼事。我們且先來看一看非基同盟的產生：當一九二二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開第十一屆大會於中國，我國以地主的地位，借北京「清華大學」為招待三十餘國代表的會場。自四月四日下午開會，至八日晚間閉會，與會代表，計外國一百四十六人，我國各省區出席代表有四百餘人，大都是全世界學生界領袖，其間有著名的文學家、著作家、美國穆德博士為該會會長，我國如王正廷、余日章等皆為該會中堅。會中分六股討論：（一）國際與種族問題；（二）基督教與社會及實業界之改造；（三）如何宣傳基督教於現代學生；（四）學校生活之基督教化；（五）學生在教會中之責任；（六）如何使女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在世界中成一更強有力之團體。此外有霍德演說「基督教與國際」；法代表蒙博士演說「基督教與平民運動」；德國某哲學家演講「基督教與哲學」；丹麥學生代表演講「基督教與實業」；巴黎大學某博士演講「基督教與文化」等等。這原不過是一種尋常的宗教聚會，並沒有別的意義，却不料會引起非基督徒學生的反對。他們一聽見四月間有這樣一個聚會，不問這個聚會的性質如何，便在三月間就發動起反對來，三月九日發出一篇宣言，叫做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原文如下：

「我們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我們現在把我們底真態度宣布給人們看。我們知道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在歷史上，曾製造了許多罪惡，這且不要管他；但是彼現在正在那兒製造或將製造的罪惡，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墮落的人，決不能容忍寬恕他。我們知道：現代的社會組織，是資本主義的

社會組織。這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方面有不勞而食的有產階級；他方面有勞而不得食的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就是一方面有掠奪階級；他方面有被掠奪階級被壓迫階級。而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我們認定這種殘酷的壓迫的悲慘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圖建造不可。所以我們認定這個「助桀爲虐」的惡魔——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是我們的仇敵，非與彼決一死戰不可！世界的資本主義，已由發生、成熟而將崩潰了。各國資本人家，——不論是英、是美、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盡手段，冀延殘喘於萬一，於是就先後擁入中國，實行經濟的侵略主義了，而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這經濟侵略的先鋒隊。各國資本人家在中國設立教會，無非要誘惑中國人民歡迎資本主義；在中國設立基督教青年會，無非要養成資本家的良善走狗。簡單一句，目的即在於吮吸中國人民底膏血，因此，我們反對資本主義，同時必須反對這擁護資本主義欺騙一般平民的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爲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的產物。但們預備於本月四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華學校」開會，所討論者，無非是些怎樣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及怎樣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把戲。我們認彼爲汗辱我國青年，欺騙我國人民，掠奪我們經濟的強盜會議，故憤然組織這個同盟，決然與彼宣戰。學生諸君！青年諸君！勞動者諸君！我們誰不知道資本主義底罪惡？我們誰不知道資本主義的殘酷無情？現在眼見這些資本人家走狗，在那裏開會討論支配我們，我們怎能不起而反對起起！大家一同起！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一九二二，三，九。

這篇宣言，是以社會主義爲立場，硬說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先鋒，把這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看做是資本主義支配經濟的會議，我們一看前面所述大會中的議題，便知道這種反對完全是誤會的。次日又發了一個通電（即灰電），其意義與宣言不同，側重在『清華乃國校，不能供一教之用。』隔了七日，又有非宗教大同盟的駁電及宣言。灰電沒有發電地點及負責人名，駁電却說明是北京各學校並有『北京大學第一院金家鳳收交』字樣，又有七十七人簽名的名單。其宣言則稱爲非宗教，內容還是非基督教，特別痛罵青年會。同是對基督教的攻擊，不過立場不同，而以基督教爲違反科學，束縛思想，麻醉青年的毒物。中間有幾句極決絕的話：『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是欲把宗教從人類社會中掃除，也就是要把基督教從人類社會中掃除。這兩次宣言發表以後，便引起全國學生界的響應，於是函電紛馳，對於教會不無仇視。是時，有一會在教會學校肄業，已爲基督徒三年的潮州人李春蕃，因在上海某教會大學肄業，偶與校中一職員衝突，該職員是個基督徒，李春蕃因此輟學，遂遷怒於基督教，乃借民國日報覺悟刊載其攻擊基督教的文字，七日一次，名之曰非基督教特刊，隨民國日報附送，並另作單張分發。並於十二月九日，撰一『非基督教週』短文，登諸刊首，主張於耶穌誕日前後一個禮拜，作大規模的反教運動，簡稱爲『反基週』。由此影響到全國，在廣州尤爲激烈。教堂及男女學校莫不受其蹂躪，他省也有相同的情形，惟不若廣州之甚。廣州民國日報亦發刊反基週特刊，非教空氣，更形緊張。且特黨部與

政府爲後盾，動輒指基督教爲黨國之敵！甚至以宗教宣傳招紙上『罪惡之價值乃死』，謂爲詆毀孫總理人格，通電全國黨部，一致聲討；蓋孫總理適去世未久，廣州黨部有誌哀標語，而教會招紙誤貼其旁，乃認爲有意侮辱。不知此招紙尚有下句『上帝之恩賜乃永生』，註明羅馬六章廿三節經文，爲教會歷來常用的招紙，他們乃截去其下句，只以上句爲攻擊口實，橫生風波。是年恰又有上海五卅慘案，廣州又發生六二三事件，愈增非教勢，教會愛國之士，亦對於基督教發生不滿，主張中國教會脫離帝國主義，而引起內部紛紜，欲謀教會革命；然却因此反而變成教會不幸中之大幸。次年的『反基週』情形，更形厲害，在廣州原擬招募二萬五千暴徒，準備在十二月廿五日，散往各處教會機關，實行暴動。廣州教會聞訊，咸慄慄危懼，以爲大禍將臨。不意至期，各暴徒已聚『廣州大學』，預備出發，忽而如鳥獸散，事後探知其故，蓋由於鮑羅廷之出爾反爾。是時鮑羅廷服官廣州政府，不啻爲廣州之太上皇帝，反教份子，咸聽其指揮。教會領袖，既聞此種消息，卽往謁鮑，詳陳利害，並說基督徒，多爲革命份子，鮑氏乃悟，恐因此而發生國際問題，影響革命前途，遂卽用電話制止反教示威。廣州一偶，因而暫安，而他處則不然，仍不免有許多挑釁舉動，幸教會人士，都能處以鎮靜，不致發生流血慘劇。然而言論的非毀，已變爲政府黨部所特許，故到處有挑動仇教的言論。閩浙湘蘇贛鄂等處，常有捕捉傳道牧師，反縛戴紙帽，遊行市中，百般侮辱，且有因而喪命之基督徒。教會機關有被佔爲非教辦事處，教會學校亦有受迫停辦的，共產黨復運動在校學生放火搗亂。如福州的『協和大學』、『格致中學』被焚去一部份，卽其一例。從此至民國十六年，無日不在紛紜擾攘之中，幸至民國十六年

四月國民黨有清黨之舉，共產黨反教理論，亦隨受影響，原來如光赤的基督教與世界改造的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明明以共產主義的立場，引馬克斯「宗教乃人類鴉片」的話，做攻擊基督教的根據。至是鮑羅廷失勢潛逃，其他共產份子，亦皆隨而潰散，反教勢能乃稍殺。然而國民黨仍有許多反教份子潛伏其中，陳獨秀本為共產份子，其對於基督教，自屬反對。而朱執信汪精衛李石曾從科學立場，言宗教已無存留餘地。時汪氏為廣東教育廳長，對於反教運動可算最賣力了，發表許多反教言論，於是在廣東全省之青年學生皆受其影響，非教同盟，其勢愈張。孫哲生氏會說：

「這回非基風潮，恐有國民黨員從中主動，也未可知。但非教運動，斷不是國民黨的主張……政教分離，那件事，我們老早已認為民國建國大綱；宗教自由，載在約法，任何宗教，在法律下應受平等的保護。至若謂有等國民黨員，以個人名義來反對基督教，無異有等基督徒以個人名義來做賊，這些都屬個人行動，與全體無關。很希望多些基督徒入國民黨，負一份責任。」

這是孫哲生氏在民國十四年冬向兩方解釋中的一段，孫氏是總理的公子，總理一家都是基督徒，臨終的時候，曾把夫人託付於同志說：「她是個基督徒，也是個同志；你們不要因她是基督徒，就歧視她。」（徐季龍言中山語）不料當時國民黨中竟有人罵基督徒是洋奴，是走狗，是無知愚民，是亡國賤種。更說：「站在國民黨立場，應當收沒全國宗教機關。」「他們宣傳上帝是唯一的尊者，難道總理在上帝之下麼？」這些話完全與總理自己的態度大相反背，誠是總理在世所不及料的。更有江蘇省黨部有這樣的議案說：「

基督徒須聲明脫離所信仰之宗教方可入黨。」上海學聯會呈中央黨部說：「基督教徒不得任國民政府之政務官職務。」這些真是不知大體的臆說。可見當時國民黨反教的空氣，還是很濃的。他們把一切所有的罪惡，醜名辭，儘量加在基督教身上。

但是國民政府對於基督教的態度怎樣呢？他們始終維持信教自由的原則，對教會加以保護。當一九二二年「反教週」在廣州發生滋擾的時候，國民政府馬上討論應付的辦法，有「本黨對於宗教問題，取信仰自由之義，對於此次反基督教風潮，亦本此態度處之。反對與贊成兩方，雖可自由討論，任其各個發表意見，但兩方皆不得為騷擾及脅迫之行爲」的議決。由政治委員會通諭所屬各警區保護教堂，制止暴動；一面由中央黨部轉知青年部，約束一切暴動性的示威巡行及集會。香港教友何樂琴醫生曾函詢汪精衛：汪雖是個領導反教的激烈份子，而他的覆函，也不能不說些「信教自由」的遠心之論，他對李龍也說：「尊重他人的信仰，反對的，不過是傳教的手段。」同時，潮梅警備司令部奉蔣總司令的電報出一布告說：「現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皓電開，查年來各屬，有擾亂教堂情事，其發生於十二月廿五日者尤多，殊於地方治安，大有妨礙。仰該司令嚴飭所屬軍警，切實維持，免滋紛擾。」廣州公安局同時通告所屬一體保護教堂學校。汕市公安局政治部，以福州誤會天主教慘殺嬰孩事（福州天主教教育嬰孩堂有病死嬰兒，遂起謠言，甚至把死孩照相，到處懸掛，天主教堂被搗毀）出一布告，中有「民衆呀，拔劍奮起，殺呀！殺呀！」等語，幾釀成大風潮，廣東省政府馬上發令制止，並把該政治部主任革職。這足以見得政府的態度。

在基督教方面，能夠出來與他們辯駁的，却是很少，只有真光雜誌的記者張亦鏡氏，可算是唯一努力的健將，他在真光雜誌上差不多每期都有辯駁的文章，後來他把這些文章印成一冊，叫批評非基教言論彙刊。他那種孤軍深入的精神，也給非基督教人們的一個反攻。另外有許多基督徒作家，對於非基督教的言論，却相當地容納了一部份意見，指出基督教內部的缺點，發表了許多自省的文章，如徐寶謙的反對基督教運動與吾人今後應採之方針；趙紫宸的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武漢基督徒革新運動宣言等等，大都是對內的言論，而於非基督教的言論，認為不屑與辯的。倒有幾個第三者出來評論其是非，最初有周作人等五人，「在非宗教同盟」電報發表以後，接着就發表一篇宣言：

「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該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智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特此宣言。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三月三十一日。」

這是第三者根據信教自由的立場，來反對非基同盟。意思就是說，強迫人信某種宗教是違反信教自由，強迫人不信某種宗教也是違反信教自由，非基同盟就是犯了後者的毛病。這的確給予非基的學生們一杓冷水，所以在東電裏表示對五人電報的不滿意，他們說：「對於現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而對於耶教學生同盟，又獨不表示反對，雖說他們「不擁護任何宗教」其實已經有傾向於擁

護宗教的嫌疑，而失了完全的中立態度。」這見得非宗教同盟的無聊解嘲，因為這句問話，很容易解答的，假使他們要回答的話，只要說「耶教學生同盟並沒有干涉到非耶教人的自由！」一看這電報，就會懂得有這句話在裏頭，所以我說東電裏的駁語是無聊的。

梁啓超也以第三者來說幾句折衷的話，其實也是對「非宗教同盟」的一個忠告，梁先生本來憤於說兩面光的話，他在四月十六那一天在「哲學社」公開演講，題目就叫「非宗教同盟」，他替宗教下了個定義，說一切信仰都是宗教，證明非宗教的不可可能，他說：「我在我所下的宗教定義之下，認宗教是神聖，認宗教為人類社會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我自己徹頭徹尾承認自己是個非非宗教者。」這個意思，明明是駁他們「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的話。他所下的宗教定義，果然太嫌籠統，但是對非宗教同盟者的武斷態度，的確是一個針砭。常乃德也寫了一篇對於「非宗教同盟」的諍言，他以為「非宗教同盟」的人，還沒有把問題弄清楚，自己以為擁護科學，却不知不覺有「武斷」「謾罵」「兇暴」等非科學的氣概。他說：「英國美國是基督教國，但他們的科學進步，比非基督教的中國，究竟誰好誰壞？」他竟舉出了三十二條不解，說他們不能平心靜氣地加以研究。這也是對於那班非宗教的學生們一番不客氣的教訓。陳衡哲在努力週報上寫了一篇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從歷史研究的立場，說了一番持平話。另外有一位旁觀者叫劉紹寬，他却沒有像上面幾個人那樣客氣了，竟說：

「……深嘆非基督教一般人全無學識，盲言瞎論，亡中國者必此輩人也。此輩自認為科學中人，而科

學家如歌白尼奈端侯失勒諸人，皆是基督教中人，彼竟不知……今乃於新舊約全未見，凡新約中所主張真平等真自由，及力破資本主義處，全未知之，反謂誘人歡迎資本主義，要養成資本家的走狗，真是夢話。至謂我國本無宗教，又云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等語，更是無法無天之極……獨恨中國學子，全是盲從，胸無點墨，如汪精衛……等，自命通人，而所言鄙俗尚如是，他更安足言耶？徒藉盲言瞎論，叫囂一世，以自文其不學無行之罪狀，而禍害一世，不可救藥矣。」

這正如老師痛斥頑皮學生一樣的嚴厲，便成爲斬斷亂絲的快刀。

溯自民國成立以來，對於保障信教自由，教會曾經有過相當的努力，當時有人主張規定孔教爲國教，全國基督徒結合團體，並會同其他宗教，起而與爭，奔走呼號，派代表赴北京請願，並主持其事，幸而能獲得信教自由的條文規定；此次的反教，顯然有背于信教自由的原則，是以那班局外的學者作此不平之鳴，使這次普遍的反教運動，漸漸地無形消滅。雖然這一次的反教，僅僅是一場筆墨官司，但却給予了基督教不少刺激；能使一般基督徒在精神上在思想上自己加一番檢討，覺悟到自身確有其不可或諱的弱點。同時，覺得要消除外間的誤會，使基督教從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中解放出來，惟有使中國教會脫離西洋化而爲中國化。于是有中國「本色教會」的運動。

何謂「本色教會」？解釋的人很多，簡單地說：就是一個自理自養自傳的中國化教會。這個運動，是從「基督教協進會」提倡起來的。誠靜怡氏曾經說：

「當今舉國皆聞的『本色教會』四字，也是『協進會』所提倡。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醜號。」（見真光雜誌二十五週紀念特刊協進會對於教會之貢獻）

在這短短的幾句話裏，很明白地指出『本色教會』的任務與目的。任務有兩種：一使中國信徒自負責任。這責任就是自理自養自傳，在經濟上行政上工作上，都是以中國信徒為主體，西國教士可以退處於輔佐地位。雖不免有少數西人懷疑到是一種排外的舉動，但是大多數賢明的西教士，都十分同情，協助這運動的進行。因為中國教會真正能達到自理自養自傳，可以減輕了西教士的負擔，所以在很早就有人在提倡，像俞國楨氏所創立的『中國自立會』（自立會有兩種：一稱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一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成立有六百餘處，散佈在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蘇山東福建廣東等省）與胡素貞女士所發起的『國內佈道會』，皆其一例。另一任務是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那就是要使教會與中國文化結婚，洗刷去西洋的色彩。這在當時便有人主張改變禮拜儀式，採取一點佛教的方法，在禮拜時燃點香燭，跪誦經文禱文等等，上海在寶興路曾有過這樣一種試驗，在南京艾香德氏所組織的『景風山』完全變成了佛化基督教。同時，也有從詩歌方面入手，特著了許多中國歌調的讚美詩，一方面也修改固有的讚美詩，使詩歌中國化起來。但是這種形式上的改變，不獨不足以適合本色教會的原意，却反而覺得愈加紛歧。所以有人主張從思想方面來研究，一方面研究中國文化是什麼？一方面研究基督教思想如何與牠調和，基督教學

者曾發表了許多意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類的文章，在教會雜誌上層見叠出，吳雷川氏曾著成了一專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他如徐寶謙、趙紫宸、謝扶雅……等都著作過這類的文字，這些大概是從建設方面着想的。另外有從破壞方面着想的，像聶雲台主張「基督教儒教化」，張純一主張「基督教佛教化」，他們的言論，雖然離開了根本的立場，幾乎站在反對的地位，但是他們不滿意于基督教的西洋色彩，是相同的。我們看一看「基督教全國大會」裏所發表的教會的宣言第二段，舉出九條關於「本色教會」的意見，其間第三第六第七條說：

「三，我們對於西來的古傳儀式，組織，倘若不事批評，專做大體的抄襲，卑鄙的摹仿，實在是不利于「中華基督教」永久實在的建設，這是我們教會同胞的公意。」

「六，所以我們請求國內耶穌基督的門徒，通力合作。用有統系的捐輸，達到自養的目的。由果決的實習，不怕試驗，不懼失敗，而達到自治的正鵠。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領袖的栽培，及摯切的個人傳道，而達到自傳的目的。」

「七，我們宣告時期已到。吾中華信徒，應用謹慎的研究，放膽的試驗，自己刪定教會的禮節和儀式，教會的組織和統系，以及教會佈道及推廣的方法。務求一切都能輔導現在的教會，成爲中國本色的教會。」

這確可代表一般中國基督徒要說的話，西國人也有很多是同意的，歐德模氏發表過這樣幾句話，也

可以代表一般西國人的意見：

『中國教會本色的問題，是「協進會」的必需。……比如嘗有蘇格蘭的友人警告我說，我應當時刻小心，不要過于推重美國人的思想，或是習染美國人的方法。因為這種美國色彩的東西，決不合蘇格蘭的民情。同時，我也看得出來，若是一種辦事的方法，過于帶英國的色彩，又不是美國人的利益，同時歐陸各國的友人，也要發生一樣的感覺。……到甚麼時候基督教纔能有真確的本色的發揚呢？就是甚麼時候基督教的運動，是本國人親手來主持他，管理他，必要他們自身去取決行止，那就是那一國的基督教自由發展了。……若是基督教必需按着本國的國情自由發展，那個問題的答覆，不祇是由中國人自行決斷，乃是中國人要自身去發生一個自動的問題。……中國人到底是否要自動的擔負完全責任？依鄙人看來，一種帶西洋色彩的責任，中國人還未必願意去負擔他。』（上皆見全國大會紀錄）

這樣，可以見得無論中西人士，一致承認中國教會必須脫離西洋色彩，就是上面所說「要消除洋教的醜號」，這便成爲提倡「本色教會」的目的，而使基督教完全成爲中國的基督教。

在這個運動之中，附帶地產生了兩個問題：一個是「脫離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一個就是「收回教育權」。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候，最大的不幸，就是與不平等條約發生了關係，因此引起一般人的誤會。要消除這種誤會，非使基督教脫離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不可！一般覺悟的基督徒，不約而同的有取消不平等

條約的呼聲。『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鑑于各地基督徒的輿論，曾發表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宣言，同時西教士中有司徒雷登等聯合請求政府脫離傳教條約的保護，湘潭美教士梅知理等亦宣言廢除傳教條約，武漢基督徒革命運動宣言中有『我們很歡喜『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已經通過贊成及宣言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了，我們一致擁護此議決案。我們不要基督教建立在砲艦政策之基礎之上，更不願以甚麼武力為福音之後盾。』又說：『關於收回教育權一項，我們一致贊成，我們要使教會學校都歸中國教會自辦，受中國政府之監督。』『廣東基督教協會』也有宣言：對不平等條約，則主張廢除，對收回教育權，則定有大綱。全國基督徒團體，莫不發表宣言，有『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口號。此外在一般基督徒的言論中，有不少類似的話，例如徐寶謙在『基督教運動與吾人今後應探之方針』文內有：『我以為中國基督徒當此時機，應參加反對不平等條約（包括傳教條約）及收回教育權各種運動，使人們得知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並無何種不解的姻緣；使人們得知基督徒愛國之心，不居人後。』施雲英女士在『基督徒學生應如何盡力於國際友誼之改進』文內，也有『在中國的西教士，大都不知道不平等條約的不人道，我們基督徒學生如能平心的向他們說明條約的真相，至少能得到他們的同情。再說現在已經有許多西國教士覺悟了，他們竟願大膽的向他們的政府請求廢除傳教保護條約。』又說：『如能將種種不平等條約宣告各國青年學生，他們亦定有相當的同情。』比較激烈的言論，更有如徐謙所云：

『反基督教的基本觀念，就是反帝國主義，認基督教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不是一種批評，乃是一種事

實，這是不容否認。……假使外國傳教士要否認這句話，就可以問他們宣傳基督教，既有救人的和犧牲主義，為什麼要用不平等條約作保障？傳教士自動的入到反教的地方，犧牲了性命，反要中國割地賠款，這不是爲帝國主義之工具的明證麼？」

徐氏是基督徒，他本來很爲基督教辯護，至此態度大變，這幾句話與非基督徒口吻，如出一轍，我爲說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則可以，說基督教就是帝國主義，未免有些冤枉。徐氏又說：「馮同志（即馮玉祥）親口向我說：我從前做基督徒，聽牧師講，只以爲專是救人的，現在我聽了你的話，才明白基督徒是應該救國的。五卅事件發生後，馮同志通電中外，大罵帝國主義基督教。以上證明我的確是個反基督教的份子了。」但是他聲明他是反基督教而不是反基督徒，意思就是對於教會表示不滿，對於基督徒還是相當的信仰。至於張純一、聶雲台反對得更利害，從反對教會而牽涉到教義上去。這些人本來都是基督徒，而且是很熱心的基督徒，他們這樣突然地改變，站立在反對的方面，很顯然的是因爲不平等條約的關係。更進一步，甚至有主張革命式的獨立，例如武昌「反基督教大會」議決案第五條：「全國的基督教堂，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徒，一齊獨立起來，離開一切外國神父牧師的統治，向一切外國帝國主義者，爲本國民族自由而戰。」廣東協會有一條議案說：「凡外國差會現在所轄各項事業，應於最速時間內移交大會接收，以後外國差會停止管理行使其向有支配教會事業之職權，所有人材經濟之助力，亦概由大會或大會特設之機關支配之。」蘭州教會發出宣言：「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開會議決，純粹由華人組織『中華基督教會』」

與西國宣教師完全脫離關係，務期自立自傳自養。」桂林教會亦有相同的宣言。其他各處都有這種教會自立的醞釀，許多教會都改稱爲「中華基督教會」，取消原有的宗派名稱。這些所謂自立，簡直帶點革命性的獨立了。而可以說是從反基運動而來的反應。

至於「收回教育權」的事，乃是由反基運動變而爲反文化侵略運動，基督徒也有很多表同情的。教會教育權，本來操在外國人手裏，各自爲政，多不向中國政府立案，中國政府亦無從管理。國民政府鑑於國民的一般輿論，與統制教育的重要，乃於一九二六年頒布了私立學校立案規程，中間最重要的有五條，就是（一）組織校董會。（二）不得以外國人爲校長。（三）不得以宗教科目爲必修科。（四）如有宗教儀式，不得強迫學生參加。（五）依限呈請立案。這規程大部分是指教會學校而說的。同時教育部又對教會學校發一佈告，有「凡外人捐貲設立各等學校，向教育行政官廳請求認可。學校校長，應爲中國人，爲請求認可之代表人。校董會應以中國人占過半數。學校不得以傳佈宗教爲宗旨」等條文。這種法令，最使教會學校當局有些爲難的，就是限止宗教傳布，取消宗教科目，認爲與教會設立學校的原意有背，所以對於立案問題，頗費躊躇。但是經過了多方的研究，與一般基督徒的輿論的督促，各教會學校大都先後呈請立案了，只有極少數的學校尚未履行，（如「聖約翰大學」：等至今尚未立案）但是在立案之後，並沒有感覺到什麼困難。這一點也未始不可以說有反基運動促成的力量在內。

總之：這一次的反基運動，對於基督教不但沒有什麼害處，却相反的成了基督教的諍友，而蒙受着極

大的利益和進步。至少可以使中國基督徒覺悟到自身的責任，變更了西教士在中國教會中的地位。

第廿一章 基督教的事工

這裏所說的基督教事工，是專指更正教（即耶穌教）而言，因為我們對於天主教，除了前面已經略說過的以外，其他實在所知不多。關於更正教的事工，我們可以說的，大約有五部份，即佈道，文字，教育，醫藥，和社會。依次加以敘述：

一 佈道

所謂佈道事業，從廣義方面說來，下列的各種事業，都是佈道範圍內事；但這裏所說的，祇是指用口舌宣傳的一方面，說到這一方面，我們知道是更正教所特別注重的一件事。當更正教初入時期，即注重于向大眾或個人演講，或散發印刷小冊及單張等工作。從一八五六年以後，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內地自由旅行，因此，更正教教士的足跡，幾乎踏遍到全國；他們常常攜帶些單張傳單，上面刊着聖經章節或簡單的基督教教義，到處宣傳；這在天主教看為是一件不大莊重的事，而更正教却認為重要的工作。第二步設法在商埠與城市中，租賃或購買房屋，作為佈道機關，那時候外國人要租賃房屋非常不易，不要說在內地，就是在開放的商埠上，也感到相當的困難。因為條約上並沒有外國人可以置產居住的明文，不過傳教士若然得着了住屋或地皮，中國政府亦並不加以壓迫，當地官廳亦不能不加以保護。

既經成立了一處佈道機關，往往建立起禮拜堂，談道所，醫院，學校，住宅等等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大概

是在城市之中，用紅磚砌成的西式房屋，足以引起當地人民的注意或反對。又由此推廣到鄰近村鎮，在熱鬧的大街上，租賃商店房屋，成立一小禮拜堂，有中國協助傳道者居住其間，作非正式的講道，隨時招待鄰近的人民往來談道，從個人的接觸上，漸漸引人信仰。在城市機關中的談道所，亦有同樣的設備，如同一種應接室，用中國固有的禮節，接待來賓。

禮拜堂是專門作崇拜之用，與村鎮間的小禮拜堂不同。但是這種禮拜堂，最初是異常簡陋，或用中國舊屋改成的，或特別新建的，或用西洋的形式，或沿中國的舊制，頗不一致，但都不很注意到美化的裝飾。當時因男女界限分別極嚴，所以當禮拜的時候，大都是男女分坐，甚至有在中間隔以屏風的，禮拜的儀式，不過是唱詩禱告讀經講經而已。所唱的詩，都是從英文翻譯的，而用外國的調子。在中國的習慣上，實在非常陌生，所以唱來不甚好聽；同時，在翻譯的詞句上亦甚俚俗。其聖經與讚美詩，間有用本地土白譯成的，如有所謂福州土白，廣州土白，上海土白，甯波土白……等類，在寧波更有羅馬字拼音的土白，使外省人完全不懂。禱告的口語，是臨時隨口說出的，雖不十分美化，却實是心靈中自然的呼籲。除了聖公會比較固定的禮節外，其他都十分簡單，沒有中世紀及天主教的繁文縟節。在一個總機關下，分設出若干市鎮鄉村的小團體，即上述的小禮拜堂，因為這小禮拜堂，是漸漸由于當地的信徒組織起來的。而這種信徒的來源不一，有藉醫藥，有藉教育，大多數是由于個人的友誼而來的。小團體中必有一負責傳道的人員，主持其事，普通稱他牧師。而總機關裏的最高當局，或稱為主教，或稱為監督，或稱為會長，總牧……等等不一。此最高當局，必

須計畫每一小團體的經費，每年中有幾次巡視各堂，負監察、施洗、指導、訓誡……等等責任；有時亦爲之解決問題，調停糾紛。這些小團體，有稱爲堂會的，亦有稱爲區會的，總之是總機關——或稱總堂——的基礎。每一公會，必有如是的總堂若干處，隸屬于一總主教或監督之下，每年開全體會議一次，稱之爲年會或年議會，聽取各部傳道人員與牧師等的報告，以計畫未來的種種佈道工作。這是各公會在佈道方面組織的大概情形，因各公會在名稱上系統上略有不同，在此只能籠統地說起。

上面是說到在禮拜堂以內的佈道情形，還有許多在禮拜堂以外的佈道，例如沿街佈道，值熱鬧市區，或茶肆之中，一面分散印刷品或聖經，一面也有用聖經故事圖畫，或用手風琴隨拉隨唱，晚間或用幻燈影片，使途人羈聚，然後傳道者站立在較高的階沿上或板凳上，向衆演講，所講的大都是「上帝如何創造天地」、「人類如何犯罪」、「耶穌如何降世」、「如何捨身贖罪」、「信仰可免罪得永生」等等問題。後來擴大範圍，有舉行篷帳佈道，其法就一空隙的廣場，支搭一座大布篷，可以容納四五百人之多。排列着許多長檯，正中設一講臺，懸掛了許多標語宣傳品之類。用大字寫些佈道詩歌于白布上，有風琴或其他樂器和唱，按日有幾次演講，如是舉行一星期或數星期不等。也有用這方法在禮拜堂內舉行，每禮拜總有幾次在晚間或白日舉行所謂開堂佈道，有時請得著名人物，舉行演講，或講科學，或講時事，或講耶穌道理。當一、一、一三年美國佈道家穆德與艾迪遊行遠東佈道，先在日本與印度演講，後來到了中國，在十四處大城開佈道會與科學演講會，聽講者有十三萬七千五百七十九人之多，立志研究聖經者有七千〇五十七人。次年

艾迪又重來中國，在十二大城佈道，聽講者有十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人，簽名入查經班者七千餘人。當時擔任翻譯的有王正廷、誠靜怡、溫佩珊、曹雪芹等人。事前由當地各教會聯合籌備，組織祈禱會，訓練招待員，以及張貼廣告之類。更預定較大會場，在上海會借大舞臺戲院為會場，每講可容二三千人。講題大概為「中國之轉機」、「中國之希望」一類的愛國思想，把中國情形詳加分析，而後歸結于耶穌道理與國家關係。一般青年學生聞而受感，簽名研究。教會對於這些簽名的人，擔負起善後栽培工作。組織研究會查經班，因此受洗而為基督徒的，為數也頗不少。這種佈道方法，實為中國佈道工作上的一大奮興劑，此後各處教會，往往仿效而開聯合大佈道會，請余日章、饒伯森、王正廷、丁立美；等人演講。特別是饒氏，帶了科學儀器，到處演講，頗受各處歡迎。這些都可以稱為羣衆佈道，有時也能收到一些效果，至少能使一般人知道「耶穌教是什麼」一點知識。同時，在演講耶穌道理之外，也常講到普通知識，如提倡衛生，破除迷信，公民常識，識字……等等問題，也可以當作一種民衆教育。而在這種舉動中，需要多數男女教友的幫助，所以做牧師的責任，不獨要訓練教友們信德上的上進，更是要訓練教友們佈道的能力，使教友能在這種場面下做佈道工作，亦能做個人佈道工作。說到個人佈道，收效實較羣衆佈道更大，天主教所以只注重個人佈道而不注重羣衆佈道，就是為此。實則兩方面都有他的功效，耶穌嘗以捕魚比喻佈道，說「得人如得魚」這裏可以說羣衆佈道是用網捕魚，個人佈道是用釣捕魚，兩種方法都可以得些魚，不信，請看利瑪竇當時用個人佈道的方法引導了許多學者信教，而梁發在考場外分散書本，用羣衆佈道的方法，也吸引了些信徒。這些從羣

衆佈道或個人佈道所感化來的所謂慕道友，到怎樣的程度，方才可以允許他受洗進教各公會的意見不很相同；有的以爲只要有信仰便可以，有的以爲非培植到有相當程度不可！總之，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培植，是大家認爲極其重要的事。所以主日學及聖經研究班等組織，與每禮拜舉行崇拜禮道，有一樣的重要。不但使受訓練者能了解一切多妻，賭博，鴉片，拜偶像，擇日，風水，早婚，離婚，偷竊……等種種行爲，應該澈底拒絕，更使他們有博愛，犧牲，服務的精神。不然，便會引起意外的不幸。初期天主教與更正教因求數量上的增加，訓練工作不能充分的緣故，有些不良分子，抱着別種目的，進入了教會，不免有包攬詞訟，藉勢欺人的事，神父牧師受其蒙蔽，出頭與官廳交涉，特別在天主教中常見的事，成了鬧教仇洋的原因。所以後來更正教中以教士干涉詞訟爲大戒，而努力于教友信德的培植，使教友都能潔身自好，不求個人的利益。以前的教友，都是沒有什麼學問的人，一下子要訓練他們成爲有力的教會主體，自然不很容易。因爲當時的人數既不多，經濟也不寬裕，又是大都藉教會生活的人，所以免不了有人說信教是吃教；這些教友，要他捐款來維持教會，不但事實上不可能，也是沒有這種習慣。所以教會便注意到人材的訓練，努力計畫設立高等傳道學校，在一九〇〇年以後，便有許多合格領袖繼續產生出來，在教會裏擔任各種不同的職務；也有女傳道人員，擔負向女界佈道工作。這時候在每個教堂裏，差不多都有中國牧師，也有許多協助佈道的人，如同沿街分發宗教書籍的，領導各種聚會的大都是中國人。這些人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有從小信奉基督，獻身爲傳道的。到了後來，方有許多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的青年，他們從小就受着家庭的宗教教育，立志做佈道

工作。這些大概是在教會裏訓練成功的，他們跟着牧師實地練習，像中國從前「拜師父」的情形一樣。或者有時候教會爲這些人開一個會，如「夏令傳道會」「傳道研究會」之類，規定學習的功課，與領袖們的演講，繼續着二星期的訓練，也造就了許多合適的人材。一八六六年乃有正式的神學院產生，英國長老會首先設立一所「神學院」在廈門；一八六九年荷蘭教會也在此設了一所「神學院」；到一八八四年兩院便合併起來。那時教會都注意于神學的設立，福州在一八七八年中華聖公會也設立了一所，一八七九年上海「聖約翰大學」裏附設神科，次年便有十三個學生。此後不但神學的數量逐漸增加，而程度也日愈提高。據十年前的調查，中國現有神學共十三處，「聖經學校」有五十處。比較著名的，如奉天的「基督教神學校」，北京「燕京大學神科」與「華北協和道學院」，「婦女聖道學校」，濟南的「齊魯大學神科」，南京的「金陵神學院」，「金陵女神學院」，上海的「滬江大學神科」，江蘇「聖經學校」，福州的「協和道學院」，廣州的「協和高等神學校」，長沙的「湖南聖經學校」，湖北的「荊州神道學校」，瀋陽「信義神學院」，成都的「華西協合大學神科」與保寧「神道學校」等等。肄業的學生，大都是高中以上程度。這些神學，起初程度很低，從「聖約翰神科」用英文教授神學生，以及其他神學課程，都漸合大學程度，並且有許多既經畢業，又留學歐美，而有很高深的造詣，所以在現今中國傳道人中，有不少的留學生，也有不少的神學博士，普通傳道人非畢業神學，即畢業某種高等學校或大學。同時，又提倡學問的自修，各公會都規定傳道人必修的課程，經過相當的考試及格以後，方能升爲牧師。尤其注重中文的訓練與

文化的研究，不但各神學提高中文程度，並且常有懸獎徵文的事，如「廣學會李提摩太紀念徵文」之類。可見中國佈道人材的日見增加，並且把中國佈道責任，由中國人自負起來。更因受着庚子年的教訓，覺悟到中國教會，非自立自養自傳不可！于是有中國熱心教友組織了中國自立會，中華基督教會，以及原有各教會，莫不向着這一條自立自養自傳的路上邁進。同時，更合全國基督徒力量，發起「國內佈道會」，向蒙古雲南東三省：等處，擔起佈道的責任，使中國基督徒佈道的力量，得以向外發展。在這裏略略將「國內佈道會」的經過，附述于此：

「中華國內佈道會」于一九一八年，開始赴雲南佈道，一九二二年推廣到東三省的黑龍江，次年又擴展到蒙古，所有經費，由全國更正教徒所捐助，由誠靜怡蔡蘇娟陳維屏：等二十一人為執行委員，聘請李瓊階為執行幹事。成立之初，即由發起人胡素貞在香港聯合各公會信徒倡議組織「協進部」，同時，在直隸方面，亦有順德的劉汝剛醫士和長老會幾個信徒，相繼成立同樣的「協進部」，從此南北二京和其他城市中，開風興起，繼續設立「協進部」有八十餘處之多。「協進部」的責任，除代禱宣傳之外，更努力于捐款，成為中國人自己負責的佈道會。在雲南工作的地點，有雲南府祿豐縣箇舊縣三處，首先創辦女學校和幼稚園于雲南府，頗受各界歡迎。初往工作的，有林藉恩醫士，陳玉玲女士，陳鐵生牧師，成績甚佳，香港「協進部」捐助建築八千元，當地紳商學各界領袖，熱心贊助，為建築新會所和禮拜堂之用。對於佈道教育醫藥各項事業，都有充分的發展。黑龍江佈道工作，成立於民國十一年，同時在哈爾濱設立「協

進部，負責管理一切經濟人材事務。佈道地點，共有八處：(一)大黑河，由史世良牧師主任，至民國十六年已有教友七十九名，經濟已能自養。(二)北安鎮，由朱輯五君主任，已有教友七十六名。(三)克山縣，由張成仁牧師主任，又在城東設立分堂，教友已六十九名，有自建的新會所，並籌備自立。(四)拜泉縣，由金秉權君主任，有教友一百〇九名，慕道友二百九十四名。(五)海倫縣，由王仁甫牧師主任，教友有一百〇四名。(六)省城卜魁，由于作霖牧師夫婦與李秀華君在此工作，教友有九十三名，募款三千五百元，購買平房十九間為新會所之用。(七)嫩江縣，由信徒自行組織佈道團體，並組織基督徒新村，定此為職業佈道區。(八)海拉爾雖為交通要道，然教會較為幼稚，僅有教友十四名。至于蒙古佈道工作，早為國人所注意，及至民國十二年，年中議決實行，先行組織『蒙古佈道籌備會』。從事調查，雖已籌得開辦費二千元，然以人材經濟沒有充分準備，未能實現，同時，其他公會也有國內佈道團體的組織，如監理會獨力在東三省開發，設總部于哈爾濱，類如此種的團體，有二十餘個之多，此可見最近十多年來，中國基督教一面謀所以自立自養自傳，一面更擔負起向外佈道的責任來。現在更有人注意到除上述三處外的新疆西藏青海等邊陲地方，以推廣其佈道工作，一九三〇年翟輔民牧師發起過國外佈道，向南洋羣島及安南非列濱等處華僑佈道，以王載為團長，成績亦甚佳。

此外，尚有幾個佈道團體：(一)『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于一九一〇年由山東濰縣『廣文學校』發起的，初名『義勇佈道團』，推丁立美為幹事。一九一四年改稱此名，添聘王善治為幹事。遊行各地，向學

生們演講佈道工作的重要，喚起一般基督徒學生的熱心，因而立志終身傳道的，每年有百餘人簽名。全國成立支團有十三處，團員一千一百七十人，決意傳道的五百三十人，入神學預備的八十七人。(一)『湖南逐家佈道團』于一九一一年由長沙內地會葛蔭華牧師與蕭慕光牧師發起的。初僅團員六人，後因團員增加，分成南北兩隊，南隊由楊熙少帶領，佈道于衡州各屬；北隊由蕭慕光帶領，佈道于湘陰平江等處。共有團員二十八人，遊行佈道，攜帶各種單張小本聖經。逐家分送，五年之間，曾進十萬七千餘家中佈道。(二)廣東『河南佈道團』于一九一二年由杜女士等發起的。廣東有在水上聚族而居的蛋家，杜女士特造『啓明福音船』，專向他們佈道，該船可容百餘人坐而聽道。杜女士常住船中，日則與佈道人員分向各蛋家船中談道，夜則招集蛋家在船中演講，並且贈醫施藥，就診者甚多。一九一四年又『創立義學船』，教育蛋家兒童，其效亦甚大。(四)『上海車夫聽道處』又名『維持人力車夫會』于一九一三年由英人馬達生創設的。馬氏乃巡捕房總巡，目擊車夫的困苦，在身心兩方面予以幫助。初在開封路租屋一間講道，後因擁擠，乃改租阿拉白司脫路房屋二間，每日晚間講道，並有教授識字，衛生演講，練習唱歌等工作。寒天准其借宿，且施粥一碗。患病的送『仁濟醫院』免費醫治。每禮拜有一次專為車夫妻女講道。又在嘉興路添設分堂一所，有一年逾四十之車夫，勤懇夜讀，後竟獲得智識，改營他業。受洗人數，每年約有數十人。其造福于人力車夫，實匪淺鮮。(五)『福州旗族佈道』，光復後旗人生活異常痛苦，福州公理會衛瑪玳女士，薛子隱學生，發起向旗人佈道。設查經班四處，每星期分兩處禮拜，各有七八十人聽道。後見旗人生計困難，設立『婦

女工藝廠。』因而進教者有八十餘人。後又開辦女學，半日婦女學校，幼稚園，閱報所，施醫局，晨光小學等事業，成立了一個很興盛的教會。(六)『香港海面佈道，』亦向海面生活的蛋戶佈道，成立于一九一三年，購船裝修，二月一日行下水禮。聘邵天賜為傳道員，並設小學于船上，進教者甚多，資助梁美姪女士入婦女傳道學校肄業，並資助有志學道之男子多人，養成傳道人才。(七)『上海基督徒佈道團，』借麥家園天安堂為會所，推嚴忱熱為團長，團員有一百十二人，分隊四出佈道，夏令在公園中露天演講，因而記名慕道者亦不少。(八)『監獄佈道，』首由北京青年會發起，各地皆有同樣的工作。(九)『回民佈道，』中國各地散處的回民甚多，熱心基督徒組織團體，進行此項工作。(十)『上海佈道福音車，』由榮耀會主辦的，于一九三六年出發至南京沿途各鄉村佈道，放射影片及用無線電收音機播音。(十一)『福音廣播電台，』由王完白等發起，上海各教會機關輪流佈道，今請竺規身牧師主任其事。上述為比較著名的佈道團體，大都由華人自動發起而負責進行的。

二 文字

更正教初入的時候，即已注重用文字來佈道，馬理遜、米憐等創辦印刷所于馬刺甲，並且努力翻譯聖經，梁發更撰著了許多小冊和單張，即已開其先河。此後繼續來華的傳教士，莫不十分注重，迄今一百多年，欲加一全盤的統計，很不容易。當一八六七年時，有偉理牧師 (Rev. Alexander Wylie) 開始調查所有作品，撰成中華基督教文字索引，經過四十餘載，未嘗加以修纂，直至一九〇七年季理斐方補充再版。一九

一六年「中國續行委辦會」基督教文字委員會，鑑于該項工作的重要，原擬聘請中西各一人，用一年的工夫，專事調查全國基督教書籍，重行編纂，卒因人才難得，遂商請漢口雷振華牧師代理，一九一八年撰成一教會書報目錄彙編，他在這目錄中用英文將全國教會所有機關出版書籍，一一加以說明。一九三〇年「中華基督教書報發行合會」會擬修改前書，沒有成功，一九三三年由上海「廣協書局」收集各書局目錄，編成中華基督教文字索引，同時根據廣學會出版界每期所載新書，隨時補入。一九三八年又增刊一續編，這可以說是基督教最近而完備的目錄。據雷振華氏當時的報告說：

「教會出版之書，共計二千八百餘種，調查時以書面多少為等差，五十面以上者為大冊，五十面以下者為小冊，僅一面者為單張，此項單張，共八百〇五種……小冊共九百九十三種，只四百六十七種可以列入教會書林；大冊共一千〇二種，有三百五十種，不得列入教會書林之內。」

可以列入教會書林的書，共一千一百十九種，計分：宗教，自然神學，聖經，教義，靈修，講道，教會，宗教史，宗教與科學，衛生，倫理，小說，傳記，教授法，雜記等十五類。未能列入教會書林的，如醫學，算學，格致，以及其他有時間性與公會界限等書。一九三八年所增補的有三千五百餘種，其間佈道單張及招貼約一千種，醫藥及教科書詩歌種類約一千種，可以列入教會書林的有一千五百種，合計當為二千六百多種。最近二十年間所增入的書，有永久價值的，比較前期為多。可以見得基督教在文字方面，質與量皆有相當的進步。在這書目裏，也有少數天主教的著作，而天主教著作的黃金時代，當在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時代，現在似已成過

去；從天主教索來的書目觀之，近代作品，數量甚少。以天主教所有著作，必須經教會當局的核准，不若更正教的自由，惟其太自由，所以在質的方面，反不若天主教的精神，是無可否認的。

更正教中發行及出版的社團，有六十九處，其間要以廣學會，青年協會，聖教書會，浸會書局等的歷史最久，出版最多。他如興華報社，基督教教育會，信義會書報部，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文社，女青年協會，等出品亦不少。至于發售基督教書籍的書坊，有一百三十多處，在上海則以「廣協書局」為最集中；其他男女青年會，及各教會機關與大學中往往附設售書處。

現在我們應當首先述說的，厥為聖經翻譯的經過。這一件事本為歷來傳教士所注意，當第七世紀景教傳入中國之初，即有「翻經書殿」的事，大約當時已着手翻譯聖經，究竟成績如何，以彼時印刷尚未大行，現在却無從考證。至十七八世紀天主教亦曾翻譯聖經中的數部分，大約並未刊印。馬理遜在未到中國以前，已留意于翻譯聖經的事，既到廣州，用六年工夫，將新約譯成，就在廣州雕板印刷。又從事於舊約的翻譯，至一八二三年完成，在馬刺甲印刷。他用十六年光陰完成這偉大的工作，得着「大英聖經公會」濟以巨款，乃得印成。同時，在印度、蘭坡地方有教士名馬書曼，亦曾翻譯中文聖經，在一八二二年完成新舊約，用活字木板印刷，這可以說是中國印刷上的新紀元。一八四二年以後，向來只活動于南洋羣島的教士們，得有機會遷到香港，便公開地從事翻譯工作。他們對於馬理遜所譯的聖經，覺得在文字上有不甚妥當的地方，組織一個委員會，重行翻譯，希望得一文字較優的中國聖經，自一八五二至一八五四年完成，名曰麥

譯聖經。同時，俾治文與克培臣(Cutberson)譯成的文理聖經，出版于一八六二年。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間將馬書曼譯本修改兩次，曾印數十萬本發行。此外，尚有許多人各別翻譯，至一八七七年已有譯本十一種。凡此皆初期教會中所應用的聖經，然各教士尚以爲未盡完善，乃于一八九〇年開會于上海，推選委員會重譯，於一九〇七年出版新約，名曰和合譯本。同時，在北京的天主教士，亦譯成一文理聖經。

先是在一八八五年漢口楊格非譯一淺文理新約，一八八九年有包博二教士合譯的新約，與施約瑟獨譯的新約，皆爲淺文理譯本。一九〇二年淺文理新舊約全書，方始付印。初期教會所譯聖經，都注重於文言，但後來因爲教友日愈衆多，文言聖經只能供少數文人閱讀，故由高深文言而變爲淺近文言，再由淺近文言而變成官話土白。第一次官話譯本，乃一八五七年在上海發行，第二次一八七二年在湖北發行。一八七四年乃發行舊約。楊格非也于一八八九年譯成官話聖經，直至一九〇七年始有官話和合新約。一九一六年舊約亦完成，此爲最近通行的譯本。至于土白新舊約全書，有上海蘇州寧波台州福州廈門興化廣東等。汕頭客話，海南島江寧温州只譯成新約，或舊約的一部分。對於滇黔苗族，已譯成客家花苗喇家力婁及犴夷等苗文四福音。另外有蒙文新舊約全書，滿文新約與漢滿文和合的四福音，西藏文的新約與舊約一部分。在長江流域，尚有一種用羅馬字拼成土音的新約或舊約，寧波最爲盛行，使一般不識字教友有極大的便利。爲供給盲人用的，另有高凸字聖經。

當時在聖經翻譯的問題上，有許多困難問題，大都由西人主任，而聘華人執筆，爲欲求文字的美化，不

免要失去原文的意義，爲欲符合原文的意義，在文字上不能美化，文言文不能普遍于普通教友，于是有官話土白，而官話土白，又爲當時外界所詬病。却不料這種官話土白，竟成了中國文學革命的先鋒。還有在翻譯 God 這名稱時，幾乎蹈天主教的覆轍而引起糾紛；有主張必須譯爲「神」字的，但也有仍舊譯爲天或上帝。在浸禮洗禮的名稱，聖靈聖神的區別，曾有小小的辯論，幸而兩方面並不十分固執，終至于各行其是而已。無論那一種譯本，皆由聖經會印行，在中國的聖經會有三個：一曰「大美聖經會」，二曰「蘇格蘭聖經會」，三曰「大英聖經公會」。前二會在一八五六年以前就來中國，一八六二年「大英聖書會」始來，派以前在倫敦會服務的偉理爲經理，除督理印刷工作外，又到各處去旅行，在他的指導下，雇用幾個外國人及許多中國人沿街叫賣，分散聖經及書籍，因此，聖經得在中國流行，直至一八七七年因目力衰弱而辭職。「大美聖經會」亦努力工作，聖經推銷的工作，增加得很快。「蘇格蘭聖經會」原是由幾個舊團體在一八六〇年聯合辦理的，一八六三年派韋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爲第一任經理，辦事處設在漢口，到一八九〇年有九個外國職員，一百個分書人。這些聖經會最初的政策，原是把聖經贈送人的，後來因爲要中國人重視一點，略爲收一點代價，所以每年要耗去巨大的經費。得着各傳教團體的幫助，使聖經漸漸地著名了。雖然有些學者鄙視牠的文字，却至少能知道有聖經這本書。中國基督教女教友送給慈禧太后一本很美麗的新約聖經，做她六十歲的壽禮，後來光緒帝也向教會要了一本新舊約。在一九一四年的報告中，三會所售出聖經總數，爲一千八百〇二萬七千八百十六本。又據力宣德報告僅一九三五，三

六兩年中，售出九百三十萬四千五百六十二本。由此例推，又知三會售出總數，差不多可以到一萬萬本，其工作的偉大，可以想見了。

其次則有許多發揮教義的作品，一方面藉以介紹給非基督徒，一方面勉勵和聯絡基督徒。有文言文的，有用白話的，有些名詞是基督教創造出來的，有些名詞是從佛經中借用的。當一八七七年上海會議時的報告，說有四十三本佈道書，五二一本神學書，二五本傳記，八二本問答書，五四本祈禱書和禮節書，六三本讚美詩，七種刊物，一〇一張單張。這些作品，大概是傳教士在傳道之餘由中國人執筆而寫成的，差不多都是由英文翻譯的，那時候中國領袖能寫作的還是很少。特別是剛剛開始的科學書，不但在教會所設的學校裏要採用為課本，即教外所需求的，也必仰給于教士們的翻譯，在一八七七年會議中也委派負責人員，供給學校的課本；總編輯是由寧蘭雅 (John Fraser) 擔任，他在一八九〇年會議時報告說：譯成的有算學，化學，物理，地理，音樂，生理衛生，天文，歷史，哲學，神學，教育，法律等書。同時，也有其他傳教士譯出同類的書籍。這些西教士不但把西方學說介紹到中國，並且比較東西文化，很受一般進步的中國人所歡迎，成了後來中國革命的導源。這些作品，大都是文言的，為的是要得着當時學者的尊重；惟有關於宗教的書籍，大多是白話的，甚至有些課本是用羅馬字拼音的，希望容易普及到民衆。在當時的著作中，對於教育上貢獻最大的，莫如編輯字典一事，起初有馬理遜所編的漢英字典，後來又有教士們所編的廈門話字典，廣東話字典，都很給予一般研究者以便利。同時，他們把中國的古書與孔孟學說譯成英文，使一般西國人了解到

中國文化的內容，引起他們對中國學說研究的興趣。他們又編輯許多刊物，當一八九〇年會議時報告當時已有十三種刊物，最早的要算一本一八七〇年福州的郇山使者。一八七四年又有一種兒童新聞（The Childrens News）後來就有一種時事報告，名為 A Review of the Time，目的是把西方的思想介紹給一般中國學者。也有些英文刊物，專供傳教士閱讀的，此後有許多同樣的刊物，在福州及上海等處發行，大概是記錄教會各方面的消息。

這些書籍和報紙，都由教會自辦的印刷所印行，在一八九五年的時候，已有各公會自辦的印刷所十處，到一八九七年又加了一處，其中最重要的，莫如美國長老會所辦的一所，在一八四四年創辦於澳門，一八四五年移到寧波，一八六〇年又移到上海，這就是「美華書館」。最初經理館務的有柯麥鹿、高魏及甘君，至一八六四年，得惠柏諸君及狄氏兄弟為經理，一八七六年有何君經理，一八八四年始由范約翰經理，一八八八年由費啓鴻繼任，在其任中，特建印刷所房屋于上海北四川路，並設發行所于北京路。當時聖經會、聖教會、廣學會一切出版書籍，皆由其承印，並且兼印教外各種書籍，為上海最大而最早的印刷機關。所承印的各種教會報紙，英文如教務雜誌及各種月報季報年報，中文如新民、開風、福幼、神學、通問等報及聖日課。實為上海歷史最久的印刷所。民國初年乃停辦。一八六一年福州美以美會也創辦一個印刷所，一八九九年廣州浸信會由紀好弼牧師計畫開辦印刷所，自印出版書籍，一九〇二年自建房屋于沙面。發行真光報，一九一二年遷移至東山，自建房屋，出版許多佈道書籍，後來遷到了上海，到現在還存在。這些印

刷所，實開中國新法印書的先河。

當時在教會著作界最有權威的，要算廣學會了。先是一八八四年在蘇格蘭的格蘭斯哥有人組織一個聖教書會。到一八八七年此會因事解散，便將所有的印刷機器，送給在中國辦理「蘇格蘭聖書會」的韋廉臣，韋氏于是便聯絡了同志，組成爲廣學會，來繼續格蘭斯哥的工作。計畫編著書報，發揮基督教義，韋氏實爲開創廣學會第一人。這時的中國，是在沈睡狀態之中，對於世界大勢，茫無所知，從西方輸入的學說，也不被一般人所注意。廣學會着手編譯書報，希望能喚醒中國的迷夢，特別注意于智識階級，所以在一八八九年創辦萬國公報，按月出版，由林樂知爲編輯主任，並聘請中國學者，協助譯著工作，最負盛名的，如蔡爾康，任保羅，范子美等，以極優美的文筆，介紹西洋思想與文化，頗引起中國維新份子的歡迎，後來那些主張政治改革的人，大都受着這些書報的感動。次年因爲自己所辦的印刷所，賠累甚多，便將印刷所停辦，把機器賣給漢口「蘇格蘭聖書會」，而專門努力于著作方面了。韋氏于是年秋後病故，由會長總稅務司赫德和幾位同志商決，延聘李提摩太教士繼任，乃于一八九一年就職。李氏于一八九二年遍函全國各教會領袖，徵求意見，究竟現在中國需要何種書籍，有二十七人發表了他們的意見，建議許多具體辦法；同時，也有二十多人應許幫助譯著，供給材料。又討論到銷行的問題，與其儘量贈送，賠累太多，應如何發售以補經濟的不足。然而普通書店，又不肯代售，只有自辦發行所，於是成立廣學會售書處，直到現在還是繼續存在。這一年恰值順天鄉試，李氏乘機到了北京，分送他前著的救世教益一書，這本書本來是他在天津的時候

著成的。他對於當時的幾位大臣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丁寶楨等都相當的熟悉，曾向他們條陳過許多新政，這次進京，尤多影響。其時林樂知、何假回、萬國公報、教會公報等編輯，都由李氏代理。又着手編譯泰西新史攬要一書，出版以後，銷售極多，在中國各省大著效力。

一八九三年，爲清慈禧太后六十壽辰，各省舉行恩科鄉試，同時，有德國教士捐助一千二百元，爲印刷自西徂東一書，分贈各省舉子，並又分送其他書籍，共計送出有六萬餘冊。那時，萬國公報有各省教會機關代爲經理，銷行其廣，因此感動了幾省的督撫大員，都贊成廣學會工作。張之洞特捐助一千六百元，聶仲芳也捐助銀兩。招商局職員，購買泰西新史攬要百部，分贈其同人。至一九〇二年，聶氏陞任浙江巡撫，又捐助千元，以後他在浙江任內，勸本省官紳，每年購買廣學會書報甚多。其夫人是曾國藩的女兒，後來在一九一四年信仰了基督教，做熱心的教友，他的兒子中有兩個也做了熱心基督徒。聶其杰是上海青年會著名領袖，聶其焜亦爲長沙熱心信徒。這都是當時所下的種子。一八九四年英商漢璧禮多馬捐銀六百元，爲廣學會徵文之費，其徵文題目，即如何改良中國幣制，建築鐵路，擴充郵政，用機器製茶製絲，敦睦外交，禁止鴉片等等切要問題，爲要激發當時的文人，注意於國內要政，發表改進意見。漢氏臨終時，遺囑捐銀二萬五千兩，建築廣學會新會所於北四川路。這種幫助，更足鼓勵他們的努力。直至一九一五年，李氏因身體衰弱，辭去總幹事職務，其時廣學會的工作擴大，有六位西人在會工作，有十八位華人任助譯錄等事務，財產約值二十五萬，他自己所譯著大小書冊，有百餘種。廣學會在他二十五年工作下，感動了英國的佈道會，發生最

大的興趣儘量的贊助並且感動了多少中國智識階級。那些維新運動的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他們所組織的強學會，在所辦的中外公報上轉載廣學會不少的文章，李氏也曾在他們時事叢刊上著了三十餘篇論文。廣學會鞏固的基礎，實在由李氏一人打定的，所以後來潘慎文這樣說：「多年以來，李提摩太與廣學會，二而一，一而二，廣學會就是李提摩太；我們與先生同工，越接近，越令人親愛而又尊敬。」這話實在是確評。當李氏辭職後，由瑞思義繼任，而李氏仍任名譽總理。當時與李氏同工的，有林樂知、高葆真、丁韜良、花之安、潘慎文等人，他們對於譯著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當戊戌政變的時候，廣學會書籍數百種，行銷已及全國，以其時所有之著作，多半是介紹西洋學說，匡時拯俗的東西，為一般留心時事的人所歡迎。瑞思義會親往武昌、漢口、北京、天津、濟南、廣州、香港等處，實地調查，以為改進方針。增聘梅益、盛赫士等，擔任編譯及注釋工作。季理斐與華人張純一、杭海等撰著時論，投載教外各日報，是時偉大著作，莫如瑞季二氏主譯的聖經字典，其次有關發揮教義的譯著多種。又刊大同報，以提倡東亞和平為旨，其內容雖不如萬國公報的充實，而銷路却不減少。同時，創辦女鐸報，由前南京匯文女學校校長亮樂月擔任編輯，有女學畢業生襄助，實為中國女界最早且最有價值的刊物，又繼續出版教會公報。並由樂靈生編輯英文中國教會年鑑。此後歷季理斐、寶樂安、莫安仁與賈立言、勵德厚、貝德厚女士諸人相繼工作，有季理斐夫人主筆的福幼報、月刊，李路德主筆的明燈、半月刊、宗教倫理百科全書，為莫安仁主編的，陳金鏞專輯勸世單張十數萬套，這些都是比較顯著的事工。華人中又有聶紹周、雲路、許耐、盧謝頌、張仕章以及李冠芳、沈駿英二女士等，五十年來，

除出版書籍不下千種外，刻下所繼續的報紙，則除福幼明燈、女鐸外，有女星、道聲、平民與紫晶數種。

其次在基督教文字事業上佔先鋒地位的，要算『聖教書會』。原來『聖教書會』設在中國的有六處：(一)上海、聖教書會，(二)漢口與天津合併的聖教協和書局，(三)華西、聖教書會，(四)兩粵、基督教書會，(五)閩南、聖教書會，(六)閩省、聖教書會。六處中以上海為最早，其於一八七八年，由上海中西人士范約翰、丁韋良、林樂知、顧詠經、吳虹玉、鮑華甫等提倡成立，仿效英國、倫敦、美國、紐約兩聖教書會辦法，印刷各種聖經、註釋與勸世文、醒世歌、報章、單張等類，專以開通民智、化導人心為宗旨。每年發行的單張，約有百餘萬張，內而二十二行省，外而華僑足跡所到各地，莫不風行遍及。所印的書，有大部小冊，有文言白話，或發揮真理，或闡明科學。漢口、天津起初是分立的，後來合併改稱『協和書局』，以漢口為總局，天津為分局，成立全國協會，計畫合併問題。六處同樣印刷佈道書籍和單張，都以華文為主。惟華西則兼印苗文，上海、閩粵兼印土白，使此種佈道單張，能普及於各處民衆。總計六會所出書目，上海有五百六十三種，津漢有五百二十九種，華西有一百八十九種，兩粵有二十九種，閩省有五十種，可見其事業的偉大了。上海總理斐有文，華人如柴蓮馥、徐維繪等，除編撰書籍外，亦曾出版新民、開風等報。他如丁韋良所著基督教辨證，尤為闡揚真理之作。

跟着時代進步的著作機關，我敢說要算『青年協會』的書報部。牠有一個特點，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就是始終由中國人負編輯的全責，不若上述的機關，以西人為主體，華人只處於輔佐的地位。所以在『青年協會』的出版物中，創作佔大部份，翻譯佔小部份，與其他機關成一個反比例。在思想上、技術上都比較

地前進得多。湖中國之有青年會，始於一八九五年，比廣學會、聖教書會爲後進。這一年世界學生同盟總幹事穆德博士第一次到中國，促進組織教會學校青年會，進行非常之速，不久就有二十九個學校成立校會。一八九六年便召集各會代表於上海，開第一次全國大會，便產生全國的總委辦，潘慎文當選爲總委辦會長，來會理爲書啓。這時所說的委辦會，即現在所謂董事會；所說的書啓，即現在所謂幹事。同時，決定一條議案：『編印適用書報以促進學生宗教生活。』於是便成立了『全國協會』。成立之初，假上海青年會四樓之一室爲事務所，因陋就簡，除通信及巡視聯絡各學校青年會外，編行學塾月報。到了一九〇三年，謝洪賈加入協會以後，便組織起編輯部來，謝氏即任爲編輯部長。原來現在協會這個名稱，起初叫做『中國學塾基督教徒會總委辦』，後來因爲包括韓國青年會在內，所以改稱爲『中韓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繼又改爲『基督教青年會組合』，直至一九一五年第七次全國大會議定改『組合』爲『協會』。第八次大會又擴充編輯部爲書報部，一九二〇年新會所落成於博物院路。關於書報部工作，一方面編輯，一方面發售。除了青年報爲記載消息外，又編輯進步月刊，討論學術。出版以後，頗受教育界歡迎。後來把青年與進步合爲一報，就稱爲青年進步，始終由范子美擔任編輯，到最近數年前纔停刊。此外，又出版了不少書籍。一方面發揮基督教義，並討論到宗教與科學等問題；一方面闡明青年會的本旨與工作。同時，又發揮中國固有學術，本基督教的立場，對中國文化分別其優劣與價值。歷來主持筆政的，類皆飽學之士，如謝洪賈之後，有奚伯綬、胡貽穀，以及現在的吳耀宗。中間有許多學者從事著述，如謝扶雅、應元道、黃稻孫、沈體蘭、張仕章……

學家的宗教觀，頗能引起讀者的興趣。『文社』始創於一九二六年，其本旨是謀促進中國本色基督教的國文著作，曾發行『文社月刊』，對於一般的讀物，加以批評，言論較為激烈，爲一般人所忌，一九二八年遂停辦。此外有北平的『生命社』，的劉廷芳、趙紫宸、徐寶謙、吳雷川等所創辦，除出版『真理月刊』，後改爲『真理與生命』外，亦兼出宗教叢書。後又由劉廷芳創辦『紫晶月刊』。

湖北漢口『有信義報社』，由楊道榮等主政，除發行『信義報』外，亦出版書籍。

又有寧波的『三一書院』，梧州的『宣道書局』，滬江大學的『通俗教育社』，烟台的『晨星報館』，台州的『內地會』，上海的『勉勵會』，以及個人如赫顯理的『日用指明』，余慈度的『佈道書籍』，『覺社』的小冊子，『國學社』的『國學研究』……等等，皆各出版不少書籍，名目繁多，不及枚舉。

現在我們來講一講教會報紙的大概情形。中國教會最早的報紙，要算福州所出郇山使者月報，時在一八七〇年，由武林吉創辦，黃乃裳爲主筆。

一八七五年上海『聖教書會』發行的月報，亦爲最早之報，由范約翰創辦，鍾子能爲主筆，專爲幼童立言，多載孩童故事及寓言之類，間插圖畫，一九〇七年由柴蓮馥主筆，一九一三年上海漢口兩聖教書會合併，該報亦改名爲『開風報』，至一九一五年因歐戰關係而停刊。

又有圖畫新報，亦爲『聖教書會』所出月刊，於一八八〇年發行，以開通教友知識，聯絡教會聲氣爲宗旨。先後由鍾子能、柴蓮馥主政，後改名爲『新民報』，於一九二一年停刊。

萬國公報，於一八八九年由林樂知私人創辦的，每星期出版一冊，後林氏服務廣學會，便變為廣學會的出版物，改星期刊為月刊，以灌輸新知識為宗旨，操筆政的有蔡爾康、范子美等，當時盛稱為有益士林之刊物。至一九〇七年以林氏去世，遂亦停辦。

真光報，創辦於一九〇二年，在廣州由湛羅弼主政，陳禹廷編輯，名為真光月刊，繼聘廖卓菴為協理，盧氏與張亦鏡本同在香港辦理中國郵報，故邀張氏來助，此後真光便為張氏終身事業，刊載不少辯道文章。一九一七年改稱真光雜誌。後隨「美華印書局」遷滬辦理，張氏去世，今由曹新銘編輯。

通問報，乃長老會機關報，創始於一九〇二年，由吳板橋主政，陳春生任編輯，每星期出版一次，以有光紙印的單張，專載全國教會消息，行銷甚廣。

教會公報，亦為廣學會出版，創始於一九〇四年，初名中西教會報，高葆真主政，馮九卿為編輯，多載經題講義，教會新聞，至一九一五年停刊。

光報，於一九〇五年旅美華僑基督徒所創辦，亦載教會消息及經題解釋等，間插圖畫，在華文之外兼刊英文，由黃梓材、伍盤照為中英文主筆，每月出版一次，數年後即停刊。

聖公會報，創於一九〇八年，初名聖教會報，由聶高榮主任，為聖公會刊物。一九一三年改稱中華聖公會報，後移漢口發行，而以孟良佐為主筆，一九二四年改為半月刊，簡稱聖公會報，仍遷回上海，由董健吾主筆。

神學誌，乃南京「金陵神學」出版的季刊，一九一四年出版，由陳金鏞主筆，專以發揚教義，指導牧師爲宗旨。後由王治心主筆，增加篇幅，充實材料，遂爲基督教領袖所歡迎。今則改爲頁數較少的月刊。

興華報，爲美以美會與監理會合辦的機關報，起初美以美會武林吉在福州辦有華美報，監理會林樂知在上海辦有教保，後來合併稱爲華美教保，月出一冊，由林氏主政，及范子美任保羅等襄助。後林氏故世，由潘慎文繼任，曹邁豪襄助。一九一〇年改稱興華報，每星期出版一冊。美以美會，又派師圖爾主任，聘屠坤華編輯。至一九一一年師氏因病去世，仍由潘氏主理，聘王治心爲編輯。一九一七年由陳維屏李逢謙編輯，後羅運炎繼陳氏職，仍由李氏操筆政。行銷不亞於通問報。

大同報，爲廣學會刊物，創於一九〇四年，高葆真主筆，張純一徐翰臣等襄助撰著，以灌輸智識爲宗旨，民國紀元增添內容，銷數亦加，至一九一五年因歐戰而停刊。

奮興會報，係香港十餘華信徒辦理的，創始於一九一四年，由楊少泉糾合同志，分任編輯，初僅載會中消息，互通聲氣，後乃增加篇幅，裝訂成冊，以發揚個人道德爲主，按月出版，未嘗間斷。

談天，也是香港基督徒所辦，一九一六年出版，注重說教，七日一出，爲尹文楷醫生所手創，後由黎文錦麥梅生陳安仁張亦鏡諸人主筆政。

青年進步，乃青年協會所出版。由謝洪寶主政的青年與後起之進步兩報合併而成，月出一巨冊，主編輯的爲范子美，其他奚伯綬胡貽毅應元道皆襄助譯著，於溝通中西文化，實有莫大貢獻，自范氏告老，該報

遂改爲華年，而變爲潘光旦個人主持的週刊，今則華年也停辦，青年會刊物中，只臚消息報告學生部事工，同工載職員的工作情形。

信義報，湖北漢口信義會的機關報，初與通問報相仿，以互通消息爲主，由楊道榮等編輯，後逐漸改進而裝訂成冊，按月發行，兼及教義的發揚，今已停刊。

湖廣月報，漢口聖教書局發行，創始於一九一〇年，內容有論文消息等，民國以來，已不知究竟。

醒世月報，一九〇八年出版，由武漢懇親會辦理，內容亦較豐富，民國以來，也不知是否繼續。

女鐸報，由廣學會亮樂月女士所創辦，華文主筆爲許篤齋，專供女界閱讀，內容豐富，按月出版。

晨星報，由山東煙台長老會出版，於一九一〇年始創，內容以故事小說爲多，月出一冊，傳道人甚爲歡迎。

物，聖經報，由梧州宣道書局發行，主筆爲翟輔民，月出一冊，專以解釋聖經爲主，亦爲傳道人所歡迎的刊物。

此外有協進會所辦專以聯絡全國教會爲旨的中華歸主，北京基督徒注重發揚真理的真理與生命，與提倡基督教文學的紫晶，基督教教育專以促進基督教教育的教育季刊，廣學會提倡中學生宗教文藝的明燈，平民識字運動的平民，與介紹新書的出版界，提倡靈修的靈光報，靈食，靈聲等。促進文字事業的文社月刊，鼓吹教會自立的聖報，以及其他各大學神學中學的校刊，如約大週刊，約翰聲，協大學

基督教書籍歷屆調查統計

年鑑 期次	調查年份	所得種數
1	1914	186
2	1915	159
3	1916	75
4	1917	119
5	1918	66
6	1921	553
7	1924	—
8	1925	572
9	1927	265
10	1928	163
11	1931	—
12	1933	378
13	1936	549

術和藝文，金大團契通訊，金陵學報，南大工友，建道院刊，哲理聲，真光校刊，培正校刊，崇真月刊，崇真季刊，華北神學誌，道南，齊大旬刊和季刊，燕大團契聲，之江校刊，嶺南大學校報……等等。又如各宗派各教會機關的機關報，例如女青年，天津公理會月刊，中華女佈道會季刊，循道會月刊，公理公報，北平公理會月刊，江蘇浸會刊，自立月刊，合一週刊，佈道雜誌，河南聖公會刊，兩廣浸會週刊，新生命，道風，福音光，福音鏡，衛理，桂林自立會刊，癡瘋季刊，時兆月報……等等更多。又有各地青年會會刊，真是舉不勝舉。其間有許多已經停刊的，有許多無定期的，有許多是創辦未久的，因為限於篇幅，不及詳載，姑以見聞所及，略舉如上，不免掛漏了許多。茲將湯因君在十三期年鑑上統計，轉錄於下，藉以考見基督教在文字工作的一斑：

基督教雜誌歷屆調查表

年鑑 期次	年份	中文	英文	合計總數
1	1914	25		25
2	1915	40	4	44
3	1916	43	4	47
4	1917	50	4	54
5	1918	66	7	73
6	1921	101	11	112
7	1924	125	11	136
8	1925	125	11	136
9	1927	206		206
10	1928	156	27	183
11	1931	148	29	177
12	1933	193	18	211
13	1936	211	27	238

三 教育

當中國尚在用八股試帖，開科取士的時候，基督教帶來了西洋教育制度，用格致科學來訓練人才；這在中國覺得是一件極陌生的事情，並且動搖了固有的教育基礎。因為從這種新教育制度中造就的人物，不能應付國家的考試，與從前傳統的「讀書是爲做官」的觀念，大相背馳，所以一般人不願把他們的子弟送進教會學校。只有兩種人敢去嘗試：一是「要讀書而沒有錢」的貧寒人家，因為那時的教會學校，不但不收學費，反而津貼學生的衣食零用。一是想進洋行海關謀生的人，他們鑑於教會學校注重英文課程，

希望造成所謂買辦階級。然而進教會學校，大家都以為帶點冒險性質，所以要招收教外學生，實在不很容易，只有一些基督徒家的子弟，因為可以藉此避免崇拜孔子的麻煩，基督教最初辦理學校的動機，也是為基督徒子弟便於讀書的緣故。以教育為宗教介紹的意義，原不是最初的動機，到後來才逐漸發展起來的。天主教在教育上到現在還是注重在第一點上，他們不甚重視學校的辦理，所有的學校，無非是培植教內的修士修女，以及所留養的孤兒，大都就是所稱的教理學校，所以起初他們的學校數量是很少的。後來鑑於更正教在努力辦理學校的一件工作上，進展得非常迅速，便也相當地努力起來。一八五〇年在上海開始創辦『徐匯公學』，一八〇三年創辦『震旦大學』於上海，一九二二年創辦『工商學院』於天津，一九二五年創辦『輔仁大學』於北平，據最近的調查，各教區中，教育最發達的，要算南京北平香港漢口兗州和天津等處：南京區內，共有男子中學八所，學生二千六百二十五名；女子中學五所，學生九百五十五名；北平區內，共有男子中學十所，學生一千一百八十六名；女子中學十三所，學生七百九十六名。漢口區內，有男高小學校二十所，學生九百四十七名；女高小學校十九所，學生九百名。至於小學數最多的是南京區，高小學生有一千五百九十六名，初小學生有八千〇七十三名。香港則女生為多，有高小學生一千六百名，初小學生二千八百五十五名。此外在兗州有二百五十三所初級男小學，有四千五百十五名學生。天津有一百三十所初級男小學，學生不計；尚有初級女小學。南京區有六千四百四十八名。香港區有二千八百五十五名。這些都是普通學校，招收教外學生讀書的。至於所謂教理小學，其數甚多，在獻縣有一千〇六十九名，

兗州有七百十二名，永平有五百二十二名，北平有五百十九名。還有讀經學生：獻縣六千三百二十五名，北平五千四百四十九名，南京四千九百四十九名，兗州四千〇二十三名。這是根據德禮賢氏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的記載，看見所謂教理讀經學生數，與普通學生數差不多相等。其普通學校與更正教的統計一爲比較，就覺得相差甚遠了。更正教教育狀況，據一九三四年統計：

大學十三所

學生五千七百十八名

醫學院三所

學生一百八十二名

神學院七所

學生一百八十八名

總共三十二所

學生六千〇八十八名

男中學一百十五所

學生高中六千八百九十二名

初中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七名

女中學一百〇二所

學生高中二千九百十九名

初中六千八百九十名

男女同校中學四十三所

學生高中一千四百四十八名

初中六千六百六十三名

總共二百六十所

學生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九名

又據一九二二年中華歸主中的統計：

總共六千五百九十三所 學生十八萬四千四百八十一名

這統計還是十七年以前的情形，當然現在又增加了不少。但是根據這統計，與天主教同年的數目比較，已有七與一之比，證明更正教對於教育事業注意的一斑。現在且略略將更正教教育經過情形，敘述於下：

最早的學校，當然要算一八一七年馬理遜在馬刺甲所創辦的「英華書院」，後來在一八四二年遷到了香港，在這個學校裏產生過不少的教會領袖。校長李雅各用宗教教育和中英文字教授學生，是為中國人習學英文的起頭。一九二五年公理會有葛蘭德女士在新嘉坡為中國女子設一學校，是為中國女子受新教育的起頭。一九三五年西國信徒為紀念馬理遜的緣故，捐資在澳門設一女學。這些學校都設在中國沿海的島嶼之上，至於在中國內地設立的學校，是為南京條約以後的事。最先在一八四四年有阿爾德女士奉了英國「東方女子教育會」之命，來華設女校於寧波，同年施牧亞力山大與養夫人分設「英華男女兩校」於廈門。一八四六年崇真會在李朗設「存真書院」，即後來的「李朗神學」，可謂最早的神學。一八四八年美以美會柯林斯創辦男校於福州。一八五〇年馬克來夫人又在福州創辦女校。同年，長老會用雅各設學校於廈門，又在鼓浪嶼設「英華男校」，「懷仁女校」。歸正會同時亦在鼓浪嶼設立男女學校。一八五六年廈門又成立了「真道學校」，一八五九年美以美會在福州亦辦一女校。一八六一年范約翰手創「清心書院」於上海，即今「清心中學」。一八六四年公理會設「育英學堂」於北平；俾治文夫人亦在北平創辦「俾治文女學」，後來遷到了上海。又設「格致書院」於福州，即今「格致中學」。

一八六五年聖公會在上海設立「培雅學堂」，次年又設立「度恩學堂」，到一八七九年兩校合併成爲「約翰書院」，遷校址於梵王渡，卽是今之「聖約翰大學」。先是在一八四五年北長老會在寧波所設的學校，於一八六七年遷到杭州，名叫「育英義塾」，到一九一〇年南北長老會合併，便把牠改成大學建校舍於錢塘江畔六和塔，名曰「之江大學」，卽今「之江文理學院」。一八六五那一年，又有美以美會在九江設立「南偉烈書院」，後稱「南偉烈大學」；長老會丁騷良在北平創設「崇實館」，後改稱「崇實中學」。次年巴陵會在廣州油欄門設男女學校。一八五九年美以美會屋斯頓又辦女學於福州。一八六七年公理會弼夫人在福州又辦女校。一八七〇年香港「聖保羅書院」成立。同年，監理會在蘇州設立一學校，初開時只有兩個學生，到後來改名爲「存養書院」，繼又改爲「博習書院」，再後將在一八八一年上海所設的「中西書院」收併，就成爲現在所稱的「東吳大學」，文理科辦在蘇州天賜莊，法科則辦在上海。鼓浪嶼的「毓德女校」也於是年成立。一八七二年登州浸會設一學校，初僅學生十二人，後逐漸發展，不久遂增至五校。一八七五年九江美以美會增設「儒勵女學」。一八七八年監理會有甯廣女士在南翔設立「悅來書塾」，後來遷到吳興，改爲「華英學校」，就是現在的「東吳第三附中」。同年，宜昌有男女學校成立。一八〇五年浸禮會在蘇州開辦「晏成中學」，後又添設「慧靈女學」。一八八二年美以美會沙德納女士在南京創辦了「匯文女學」。一八八三年公理會有宋女士又辦一女校於福州。同時嘉理在香港辦一學校，夜則教授英文，孫總理就是從這個學校裏受洗的，當時一同進教的有三個人，一個叫

宋毓林，一個叫陳中桂。廣州的「培英」也在這時創立的。

一八八五年的登州「文會館」實為山東基督教基礎，因為有許多教會領袖，都從這裏產生的，他們那些畢業生，每年捐助教會自立費，並且在一八九八年創辦「自立學塾」，可以說中國人最早自辦的學校。當時本有一「廣文大學」，後來這個「文會館」就變成現在「齊魯大學」的前身。一八八九年長老會在廣州花地創設一學校，這個學校後來在一八九八年遷到沙基，庚子時因為拳匪的影響，又遷到了澳門，名呼「格致書院」，直至一九〇四年遷回廣州 河南 康樂 埠，改名為「嶺南學堂」，一九一六年才稱為「嶺南大學」。一八八九這一年，也有「培正中學」設立於廣州。一八九〇年漳州成立「振興女學」。一八九二年金井成立「毓英學校」；重慶成立「廣益學校」。一八九八年在永春有「育賢男女學校」成立，成都有「華美女中」成立；同時，倫敦會在上海創立了「麥倫書院」即今「麥倫中學」。一八九九年倫敦會又在漳州設立「中西學塾」。

因為學校的數量逐漸增多，教育當局便覺得有互相合作的必要，所以曾經在一八七七年發起一個會議，結果推出一個課程委員會，這就是教會學校表示合作的第一步。進一步的合作，就在一八九〇年組織了「中華教育協進會」，目的是要推進中國基督教教育，並聯絡各學校的教師，規定每三年召集一次。這時候中國亦改變其教育制度，廢除科舉，亦漸漸注重科學的學習，各省各府紛紛地設起學校來，不過程度都不若教會學校，教授英文及科學的人才，大都仰給於教會學校。在紀律校風方面，亦不若教會學校的

嚴肅。當時供職於海關、洋行、郵政，各方面需用英文的機關的，類多取材於教會學校，因為教會學校對於英文方面的教授，較為可靠。國家亦感到人才的缺乏，於是派遣多數學生留學日本，也派少數學生留學西洋。東西洋的新思想新制度便由此源源而來中國，不但影響到整個教育的制度，也漸漸影響到政治的改革。從基督教本身上講，因着學校的發達，產生許多服務教會人材，使佈道事業亦得因此而進步。所以在各公會的差會中，都認辦理學校是一種效力宏偉的佈道工作；因此，差會所供給的教育經費，反而超過了佈道經費，教育事業的進步，當然更加來得可觀了。

試就這時期中學生人數和教友數量，略加比較，以覘其進步情形的一斑。

年份	學生數	信徒人數	百分比
一八七七	五、九一七	一三、〇三五	四五
一八九九	一六、八三六	三七、二八七	四五
一九一〇	一〇二、五三三	一九五、九〇五	五〇
一九一五	一六九、七〇七	二六八、六五二	六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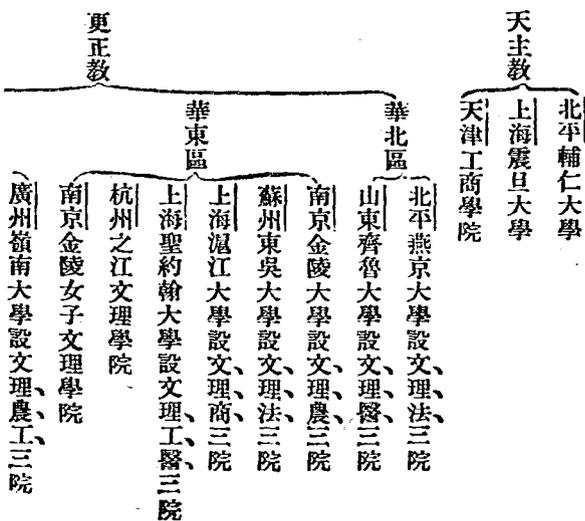
以前那些教會學校，是被少數人所輕視的，但在這時候漸漸引起人的注意了，所以學校的人數迅速地增加起來，收進的學費與中國人的捐輸，也可以供給一部分的開支，一部分教員的薪水，可以從收入的

差不多每個教堂的旁邊，都有一所小學，男女學生並收。中國女子向來是不受教育的，從教會女學一天天的發展，女學生便一天天的多起來，女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的提高了。甚至連雲南的苗族也設立起學校來。同時亦普遍地設立幼稚園來，數量的增加，尤見迅速，在一九〇七年有四二、五四六個男女學生，二一九六個中學，四年中便增加到四六、七三二個學生，校數二、五五七個。再看小學的進展：一九一四年初小學校有四、一二〇所，初小學生有一〇、四八四一人；高小學校有二六八所，高小學生有一三、四五三人。

從一九〇〇年以後，基督教教育更進一步趨向於高級學校的建設了。除了一般的高級中學次第的增設，如廣州的『通志英文學校』（一九〇〇）、南京的遊行『聖道書院』（一九〇一）即『金陵神學院』的前身。奉天的『文會書院』（一九〇三）後改遼寧『文會高中』，美以美會設『葆靈女學』於南昌（一九〇三），泉州的『培元中學』（一九〇五），信義會設中學於益陽（一九〇六），美以美又在福州設立『英華書院』（一九〇六），香港成立『聖士提反書院』（一九〇三）……等等中等學校以外，許多最高學府，都次第的建立起來，如杭州的『之江大學』是在一九一〇年成立的。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在一九一三年已有三百七十學生，許多政商學界及教會中的著名領袖，如顧維鈞、顏惠慶、余日章……等人都出於該校。南京的『金陵大學』在一九一一年由原有基督會美以美會長老會三學校合併而成。後來添設農科師範科，一九一三年便有五百學生，四十個教師。一九一五年『金陵女子大學』亦開始成立，今稱爲『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爲中國基督教所辦的女子最高學府。上海浸禮會所辦的

「滬江大學」溯其最初的起源，則一九〇七年的「浸會書院」幾經擴充，始成大學，建校舍於楊樹浦黃浦江邊，連中學有學生千餘人；後來又在租界建設商學院夜校，給一般商界青年補習機會。蘇州監理會所辦的「東吳大學」前已說及，其校舍建於天賜莊，有三個附屬中學，第一設在大學內，第二設在上海，即從前「中西書院」舊址，第三設在湖州，即從前的「海島中學」，總共不下有一千五百學生。後第二中學合併於湖州，在上海所辦的「東吳法學院」即移設於二中原址。成都由四公會合辦的「華西協合大學」，發起於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〇年始正式開辦，佔地六十畝，在一九一四年有二百五十八學生，今則倍之。當袁世凱時代，中國政府曾給以相當的資助。通州的「華北大學」屬於當地「華北教育會」所經營，該會是由倫敦會、長老會、女公會聯合組織起來的，又有「華北女大學」是從一九〇五年開始由「裨治文學院」改組而成的，至一九一一年始合併而成「燕京大學」。一九一五年得董事部批准，遂兼收女生，可以說開中國男女同學的先河。校址設於北平，海甸，規模相當宏大，在教會大學中可以首屈一指。山東、濟南的「齊魯大學」由長老會浸禮會合辦，由「文會館」擴充而成，於一九〇三年創始的。初僅辦文理兩學院，後來荊州的浸會神學與師範學校與在濟南的醫學院先後併入，便成現在的「齊魯大學」。福州有一個「協和學院」創始於一九一八年，又有一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可以說是福州省內的最高學府，這兩校學生皆甚少，久欲合併，到現在還沒有成功。此外有幾個業已不復存在的大學，如岳州的「湖濱大學」，長沙的「雅禮大學」，寧波的「斐迪大學」，益陽的「信義大學」，九江的「南偉烈大學」等等。

亦會造就過不少人材，但因種種關係，與他校合併或停辦了。
上述的教會學校情形，不過舉其大者而言，掛漏必多，茲再根據最近統計，概括地敘述於下：關於大學部。



華南區 福州協和文理學院

福州華南子女文理學院

湖北華中大學設文、理、教、育三院

華中區

湖南湘雅醫學院

華西區 四川華西協合大學設文、理、醫三院

總上表有十一個大學，六個學院，一九三二年統計學生總數，有六千八百三十八人，其中男生佔百分之七十九，除了天主教學校不收女生外，其餘都是男女同學。專就更正教而言，教員五百五十八人，內華人三百五十六，西人一百九十四人。歷屆畢業總數，大約有七千人，以職業論，服務於教育界的百分之四十，經商的百分之十二，從事宗教及社會事工的百分之十，從事於政界的百分之七，出國求深造的百分之七。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申報發表教育部統計全國私立各大學沿革，茲摘錄其關於教會大學的一部分於下：

一、東吳大學，初為教會人士為擴充教育事業，將蘇州博習書院上海蘇州兩『中西書院』合併而成。今校，民國十一年三月正式開學，十八年七月呈准立案。

二、震旦大學，初為蔡子民馬相伯兩氏，以京師『譯學館』因戊戌政變停辦，商請耶穌會創辦今校，逐年設科，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呈准立案。

三、滬江大學，初為『浸會大學』，民四改為『滬江大學』，十八年三月呈准立案。

四，金陵大學，由「匯文」、「宏育」兩書院合併而成，民三「東方醫科大學」復併入該校十年七月，經前教育部核准立案，十七年九月經大學院復准立案。

五，嶺南大學，初為美人創辦之「格致書院」，民國前十二年改為「嶺南學堂」，民十六國人接收自辦，改名「嶺南大學」，十九年七月立案。

六，齊魯大學，該校初為「廣文學校」，與濟南「共合醫道學堂」合併，稱以今名，十二年北京「華北協和女子學校」復併入該校醫科，二十年十二月呈准教育部立案。

七，燕京大學，由北通州「協和大學」北京「匯文大學」合組而成，民九「女子協和」復併入，十六年春，經前教育部認可，十八年六月呈准立案。

八，武昌華中大學，為教會所辦「武昌文華大學」，「博文書院」之大學部長沙「雅禮大學」三校合組而成，十六年政變停辦，十八年恢復，並加併「湖濱大學」，二十年十二月呈准立案。

九，輔仁大學，為公教學校，初為「輔仁社」，嗣更名為「輔仁大學」，十六年六月經部批准試辦，二十一年八月准予立案。

其餘如「協和」、「華南」、「金女大」等，亦相繼立案，惟「聖約翰」則尚在籌劃中。

關於中學部份，調查基督教所辦的中學，全國約有二百四十處，有三四〇八一學生，其中百分之三十三係高中，百分之七十是初中。以省分來分配：

省名	學生總數	學校總數
江蘇	七、三三七	四〇
河北	六、八四九	一九
福建	三、九六三	五二
浙江	三、二四九	二〇
山東	二、八二七	二〇
廣東	二、三九四	二一
湖北	一、八一〇	一一
四川	一、六五六	一六
湖南	一、〇四八	八
安徽	六九五	七
東三省	六七一	一四
山西	五五八	三
江西	五五四	四
河南	四七二	五

總數三四、〇八一

總數二四〇

辦理比較完善的，大都設在大都市之中，且看：

上海	三、七二二	一八
福州	一、八〇〇	一四
廣州	一、三八二	九
蘇州	一、五六一	九
北平	三、八一〇	八

總數一二、二六五(佔百分之卅五) 總數五八(佔百分之廿四)

其間男中學一百十八處，女中學九十二處，男女同學的中學三十處。肄業高中的學生有一〇、一八四人。內男校學生為百分之六十一；女校學生為百分之二十七；男女同校中學生為百分之十二。肄業初中的學生有二、三八七人；男校學生為百分之五十二；女校學生為百分之二十八；男女同校中學生為百分之二十。說到學生的宗教情形，在高級中學裏，基督徒佔百分之三十五，初級中學裏則佔百分之二十。由基督徒家庭中來的學生，其比率亦如之。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的一年中，中學生受洗人數共有四百六十七人。而教員中的基督徒數，平均是百分之七十五。

至於小學。到現在還沒有確切的統計，一九三〇年北長老會報告他們一會中有高初小學三百八十

三處，學生一四、六九三人。美以美會報告他們一會中有高初小學五百五十一處，學生二九、三七二人。其他公會中所辦小學，未能盡知，從上述兩會的報告而加以比率的推測，小學校數至少在三千以上，學生數大概有十萬人。

上列的種種統計，雖不十分正確，而基督教教育事業的逐漸進展，是顯然的。綜基督教在中國辦教育的經過，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一九〇〇年以前，可以稱為草創時期；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二年可以說是發展的時期；自一九二二年以後，便入於革新的時期。現在且略述最後時期的情形。

從一九二二年非基運動發生以後，基督教教育便受着猛烈的攻擊，一九二四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時，余菊等曾提議收回教育權，孫恩元等提議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在中華民國領土內對於中華人民施行國家教育；吳士崇提議取締外人在中國設立學校。同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開年會時，也通過教育實行與宗教分辦，及取締外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見新編收回教育權運動四十八頁）當時，國民黨中的左傾份子，主張把基督教學校完全接收，於是竟有若干學校被佔據，也有若干學校被迫而停閉的。他們所加於基督教學校的罪名，最大的兩點，就是基督教教育是一種反科學的文化侵略，基督教教育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外來的攻擊壓迫，既如是利害，而基督教內部中也起了反應，教會學校，處在內外交攻的情形下，不得不考慮到向政府請求立案的問題。根據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北京教育部所頒布的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共六條，與民國十五年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所頒布的私立學

校規程，內容大同小異。最重要的條文，就是：不得以宗教課目爲必修科，不得在課內作宗教活動，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不得以外國人爲校長，組織華人爲多數的校董會等等。其用意是要把宗教與教育分離，並且要使教會學校統制於中國政府。而基督教辦理教育的當局，對於立案問題，費了很多討論，深恐立案以後，受政府干涉，失去自由，並失去基督教特殊精神，特別是英國教士，多抱這種顧慮。『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爲了這個問題通函各處教會人士，徵求意見。結果主張極端贊成的爲一一三件，主張相當贊成，而對於第五第七兩條要求修改的有一〇一件，主張不贊成的有四二件。（見教育季刊二卷三期五十五頁）但是大多數學校，自動地願意遵照政府法令，請求立案，少數學校有的自行宣告停辦，有的被官廳勒令解散。立案以後，實施黨化教育，必修黨義課程，舉行紀念週，懸掛總理遺像及黨國旗，各級學校黨義教師與訓育主任，須一律受『黨義教師檢定委員會』檢定。後來在『全國教員會議』中，取消『黨化教育』這名稱，另訂三民主義教育方案，以三民主義編入公民課中。也有少數中西人士，對於紀念週的舉行，向總理遺像與黨國旗行鞠躬禮，認爲與基督教信條有根本衝突的地方，因此，不免又發生小小糾紛，而大多數領袖們以爲是無關重要，一律奉行。於是教會學校，在這種情勢之下，漸漸把西人管理權移交於華人，組織校董會，推選華人爲校長，如鍾榮光任嶺南大學校長，陳裕光任金陵大學校長，劉湛恩任滬江大學校長，楊永清任東吳大學校長，吳雷川任燕京大學校長，林景濶任福建協和學院院長，吳貽芳任金陵女子學院院長，章卓民任華中大學校長，王世靜任華南女子學院院長……以及其他大學及中學，莫不如是。西人中的開

明人士，他們的地位雖然改變，然皆樂以贊助，認此舉於教育本身有莫大利益，教會教育，終必由中國人自己起來負責，現在時機已到，毋庸推諉。陳湘帆會這樣說過：

「移交之事，無論其程序如何繁重，責任如何重大，實有不可不行之勢。今日不行，必有行之一日。與其留待將來，夜長夢多；不如今日排萬難，披荆棘，毅然決然勉力行之。」（教育季刊第四卷第二號八十一頁）

這話實足以代表當時一般見解，而成爲一致的輿論，移交之事，終於在順利進行中，見諸實行。在內部方面，有其他種種問題，如：經濟的重新支配，學校與教會的關係，西教士與學校的關係，以及宗教課程；等等，結果，都得到意外的圓滿解決。最初那些抱着懷疑態度的人，深恐宗教課程，一旦變爲選修，勢必等於消滅；但實行以後所得的效果，反比以前增大，選修宗教課程的數量，平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都抱自動的研究態度，在精神方面，實有極大的進步。而學生們的參加宗教儀式，人數雖僅佔百分之五十左右，然實比強迫式的參加爲有價值。

如今教會學校，在國家教育系統中，實佔着平等的地位，在宗教自由的原則下，得到政府經濟的補助，使教會學校有相當的進展。最近政府又有取消宗教限制的法令，教會學校的前途更有無窮的希望了。

末了，我們應該補敘幾個有關於基督教教育的問題。第一，是「基督教教育會」的組織。基督教在中國辦理教育，已經百餘年了，各學校應當如何聯絡，宜有一個中心的機關，所以在一八七七年開傳教士大

會的時候覺悟到該如何統一教會學校的教材材料便推出一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了中國基督教學校第一個聯絡的機關。從專編教科書的範圍，進而為討論一般教育的問題了，在一八九〇年便定名為『中國教育會』，其責任除編輯教科書以應教會學校的需求外，更謀教授上的互助與一般教育問題的解決。一九〇〇年出版了一本教育指南，一九〇七年發行一種教育月刊，一九〇九年改為教育雜誌，後來改為英文教育季報。一九〇七年聘請西爾斐為總幹事；一九一二年第七次大會時，改名『中華基督教教育會』，賈腓力路義思為正副幹事。一九二二年英美教會因欲調查中國教會教育情形而籌聯合進行計劃，特派視察團視察一切，依照視察團的主張，分四部組織：高等教育組，初等與中等教育組，宗教教育組，推廣與成人教育組，各組設委員會及幹事，以四組委員會代表。合組為全國董事會，各省區設立分董事會。分中國教育區為十區，即：

一華東 二華南 三華西 四華中 五燕晉 六福建 七皖豫 八湖南
 九東三省 十山東

各區又設區教育會，發行教育季刊為總機關報。一以謀各學校的合作，減少教育上的衝突與浪費；一以代表基督教學校與政府機關有所接洽，俾於國家教育系統上佔一地位。這便是『中華基督教教育會』重要的使命。

第二，中國基督教學校，在辦學經驗上，覺得要增厚教育上的效能與力量，必須努力於合併與合作。例

如「燕京大學」本爲數大學合併而成，「華西協合大學」乃四教會合作而創立，一九二二年「教育觀察團」曾作此項合併與合作的建議，直至一九二八年基督教高等教育組，通過了具體的聯合辦法，主張華東七大學聯合成一大規模的大學，稱爲「華東協和大學」；華中五大學合成一「華中大學」；後者已實現。並且指定各大學的工作，如南京「金陵」將擴充農林專科，嶺南亦有規模比較小的農科，「燕京」亦設農事試驗場，覺得應各分工合作，以期減少重複。其他關於醫科，法科，商科，教育科，均有相同的計劃。並創設「研究院」，限於兩中心地點之「燕京」與「華東」，使經濟人才各方面不致浪費，並且能收互助之效。但是因有地域的限制，政策的各別，所以很難使這種計劃完全實現。不意現在却得一意外的合作機會，即如七七抗戰以後，各淪陷區中的學校，均集中在一隅，如上海「聖約翰」，「東吳」，「之江」，「滬江」四大學的合作，四川有「金陵」，「金女大」，「齊魯」，「華西」等的合作，中學校亦有不少由數學校合併辦理，這是從前遲遲不能實現而今竟成爲事實的奇蹟。

第三，佈道教育，教會辦學的目的，原是佈道，所以造就佈道人才，當然是教會學校所注重的；所以最初就組織了許多「聖經研究班」與「聖經學校」。不過在一九〇〇年以前，程度是很低的，到一九〇〇年以後，不但程度漸漸提高，而且此種學校的數量，亦逐漸增多。在一八七六年只有二十個神學，二百三十一個學生；到一九〇六年便有六十八個神學，七千八百七十二個男學生與五百四十三個女學生了。這些學生入學的程度，必須是中學畢業，這猶是一九〇七年以前的限制，及至美國聖公會在武昌招收神學生中，

有三個是大學畢業生二個是大學肄業生一九一二年山東『齊魯大學神學院』裏其中有八個是文學院的畢業生。當時的各大學中，差不多都附設『神學院』，如『燕京』、『滬江』、『約翰』等校，栽培出不少傳道人才。至於獨立的神學院，則有如南京的『金陵神學院』、『金陵女神學』，滿口的『信義神學院』，廣州福州的『協和神學院』……等，都是造就高等傳道人才的機關。此外有程度較低的各種『聖經學校』，為數亦甚不少。

第四，師範教育。為應付各級學校的教授人才起見，不得不設立『教育學院』與『師範科』，訓練適用的教員，曾經有人主張每省設立一『聯合師範』學校，在廈門福州蘇州武昌等地都開始實行過。

第五，醫藥教育。這也是基督教教育範圍中重要的工作，初期基督教便已注重到這一點。培植中國醫藥人才，實比由各國派遣醫生來華，更為切要，所以從一九〇〇年以後，便有醫學校次第成立了。一九二二年瀋陽正式成立了醫學校，一九〇六年創辦北平『協和醫學院』，清朝慈禧太后亦曾捐輸款項，並由政府頒給學位。在北平另有『華北女子醫學院』，一九一四年有二人畢業。上海有『女子醫學院』。廣州有『夏葛醫學院』。山東『齊魯大學』附設『醫學院』中，在一九一四年時，有學生二十五人，教師四人。一九〇二年在漢口有『聯合醫學校』，長沙有『雅禮醫學院』，南京也有聯合的醫學校，一九一三年併入『金陵大學』。一九〇八年又曾辦『護士學校』，『東吳』、『聖約翰』等大學設醫學系，亦授醫學博士學位；其他大學中亦多設醫學預科。在杭州有梅醫生繼續訓練醫藥人才；在福州曾設有『協和醫學院』。

一九二一年就停辦了。『香港大學』亦設有醫學系。廣州有『華南醫學院』和『中華醫學會』所辦的醫院，按一九一三年的統計，全國有五百學生受醫學的訓練，更有不少的護士學校。被稱為煤油大王的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對於醫藥衛生事業，特別感到興趣。因而組織一個『基金委員會』，到中國來研究醫藥學狀況；根據這委員會的報告，又組織了個『中國醫藥董事會』，支配一筆巨大的款子，計劃培植中國的醫藥人才，並津貼教會各醫學校。又創辦二個『肺病療養院』，預備獎學金給中國出洋學醫的學生。該董事會在上海重新辦了一個醫學校，又擴充了北平的『協和醫院』，補助湖南『雅禮醫學院』和其他許多醫院，大學中所設有醫學預科的，都着他的津貼。於醫藥教育上的貢獻，實在不少。

第六，方言學校，是為剛來中國的西教士預備的。一九〇〇年以前已有此種設備，至一九一〇年倫敦會在北平創辦了一所『華言學校』，一九一三年擴充成一個聯合的學校。在南京『金陵大學』附設了一所『華言學校』，廣州和成都都有同樣的組織，使初來中國的西教士，先在這學校裏學習一年的中國話，然後分發到內地去做傳道工作。

第七，職業學校。在濟南有專製花邊等工藝品的學校，上海興化宜昌福州都有此種小規模的組織。

第八，平民教育。因為中國文字過於艱深的緣故，教育便不易普及，所以在一般提倡平民教育的人，研究如何改良文字，用簡易的方法，來推行識字運動。『滬江大學』董景安編著了一種六百字通俗課本，組織起『通俗學校』，各處教會都熱忱地推行，在一九一六年成立了二百多個學校，但是六百字究竟不夠

應用，於是又增加到七百字。青年會重復加以研究，另編一種平民千字課本，晏陽初也有同樣的提倡。一、二、三年組織起一個『民衆教育會』，推行這種工作。另一方面，用羅馬字拼音翻譯聖經，如寧波、福州等處都會熱烈地實施。後來中國政府規定『注音字母』來做普及教育的工具，教會最努力於這種工作，不但用『注音字母』譯成單本聖經，且辦理『學習注音字母學校』。同時，在『主日學』課本中都加以採用。此外如『婦女半日學校』，各種『補習學校』，以及『盲童學校』，『聾啞學校』，『聖經函授學校』，亦皆屬於基督教教育範圍內的工作，現在我們不能一一詳細說明。比較重要而極普遍的教育工作，則又莫如各教會一致辦理的『主日學』。『主日學』的創始，雖然已經很久，但是在一九〇〇年以前，不過是傳教士的一部分工作，教會中設立『主日學』的，只有八分之一。後來由『萬國主日學合會』負責推行，編輯中文的課本，分兒童的，少年的，成人的，各種不同的程度，於是『主日學』的範圍，不單是屬兒童的訓練，也是普及到教會以外，『成爲平民教育』的工作了。負責推行這件工作的，有『中國主日學合會』，郁春園盡了多年的力量，使全國各教會沒有一處不有主日學的設立。因此，基督教的教友百分之六十的男子，百分之四十的女子，都能讀聖經，其識字的百分比，實在比普通的人民高多了。用許多方法，減少文盲，當時有一句口號：『每一個基督徒必須能讀聖經，每一個基督徒必須是不識字者的教師。』

四 醫藥

中國在醫藥學上，本有很悠久的歷史，與高深的哲理，不過是立足於形而上方面的，乃致以虛實邪正，

陰陽五行爲辨別病源的根據，陷入於抽象玄想之境然而在大體上不是沒有優越的地方，不過不能掩蓋牠的許多缺點。從西洋新醫術傳進中國以後，這種醫術便發生了問題。推原介紹西洋新醫術的功臣，不能不說是基督教。唐朝以來，已經有景教僧侶以西洋醫術爲中國人治病的故事；天主教中一般女修士，又往往具普通的醫藥知識，任「孤兒院」中的看護工作。更正教特別重視這種工作，認爲是推行基督教佈道事業的良好輔助，所以在百餘年前「博濟醫院」的憲章中，已有這種明文的规定。直到現在，還是保持着原有的意旨，看醫藥事業與宣教工作一樣重要。當馬理遜來華以後，便有伯駕醫士哈信醫士繼續來華，伯駕在一八三四年奉英國公理會的派遣，先在新加坡設立醫院，後乃移至廣州，成立中國最初的醫院，就是「博濟醫院」；一八四七年英國倫敦會打發一個夏吐囉醫生到香港，在下環灣仔山上建立醫院，次年又有哈信醫士到了廣州，在金利埠設立「惠愛醫館」；這都是中國最早設立的教會醫院，他們的目的，不但要減少人身體上的痛苦，更是要拯救人的靈魂。所以大多數的醫生，在沒有到中國來的以前，都會受過神學的訓練。他們的責任，是要向病人宣傳福音，使大多數就醫的病人在離開醫院的時候，得着一種宗教上的影響。對於一般貧窮的病人，不受醫資，不收藥費，使他們感覺到教會醫院，完全是一種慈善事業，對於宗教方面，發生了興趣。所以醫院中在宗教方面的設施，非常的注重，一般看護士及職員，大都施以宗教上的訓練，特別在每個醫院之中，有專聘的傳道人員或牧師，擔任向病人講道及分發佈道傳單等工作。因此，感動了無數就醫的病人，受洗而爲基督信徒。教會當局，鑑於這種工作的成效，加倍努力以求其發展。從一八

五六年以後，便有很穩定的進步；一八七四年有十個醫師；到一八八一年便增加到十九個；一八七六年有十六個醫院，二十四個藥房，四一、二八一個病人；到一八八九年便有六十一個醫院，四十四個藥房，三四八、四三九個病人。十餘年間，進步有這樣的快。當時在每個比較大一點的傳教機關裏，至少有一個醫生，一般無知的愚民，便造出許多離奇的謠言，說教會裏剝病人的心，摘病人的眼法製藥，去做電報，這種無中生有的謠言，現在看來，果然不值一笑，而當時却引起絕大的糾紛，大多數的鬧教風潮，大都以謠言為號召羣衆的根據。後來民智漸開，這種誤會，便漸漸地消滅了。

新醫術在中國的發祥地，要算廣東，當南京條約尚未訂立之前，在廣東已經有一個「中國醫藥會」；後來中英戰事爆發，大多數西教士都因此回國，這個「醫藥會」也感覺到很多的不便，但却仍舊在艱難中繼續維持下去，集中力量於廣州的「博濟醫院」，這個醫院會由美國北長老會嘉約翰 (J. G. Kerr) 醫生主持，歷四十年之久，就醫的人數有百萬之多。又訓練了許多中國人做醫藥事業，並編輯了許多關於醫藥衛生的書籍。他在一八七二年動議設立「瘋人院」，到一八九二年方在廣州芳村建築了一所房子，一八九八年落成。這是中國唯一的「瘋癲醫院」，開辦以來，留醫人數，前後不下三四千人。甫及三年，嘉醫生即因病去世，由恂嘉理醫生繼任其職。來醫人數，日漸增多，三分之二，是由官廳送來的；病者的種類不一，男女老幼，貧賤富貴，無所不有。因為住院人數之多，不得不謀擴充，本來僅佔十八畝地基，房屋三座，可容一百病人，後便添置基地九畝，增築樓房三座，平房九座，有曠地可資遊行運動，有工藝娛樂種植等場所，設備

意見完備，常有五百人住院。內附設禮拜堂，每日舉行禮拜，講道、病人及工役等，因此信教者頗多。

其次，我們可以特別提到的，就是北平「協和醫院」的經過。這個醫院開始於一八六一年，從倫敦會駱克和（Lockhart）醫生創設一個「施醫院」起頭的，地址在英使館的旁邊，開辦之初，遠近來醫的躑躅相接，乃於一八六三年添聘德貞醫生來院襄助。次年，駱醫生回國，由德醫生主持院務，遷院址於米市大街，另建房屋，並收學生數十人，翻譯全體通考西藥大全等書。一八九五年魏女醫生於附近設立「婦孺醫院」。嗣因庚子之變，全院俱燬於兵燹；至一九〇一年，權賃舖房，依舊開診，由科齡醫士接辦，逐漸整理，悉復舊觀。一九〇三年更於院側設大藥房一所，一九〇五年「協和醫學校」成立，錄取學生四十五名。成爲中國唯一的最高醫學校，後乃得美國洛克斐勒津貼，院務大加擴充，據一九一四年報告，初次來診的有二萬九百餘人，復診的有四萬三千五百餘人，住院男九百二十四人，女二百八十二人；至今猶爲中國最大的醫院。

同時，在汕頭有英國長老會的「高德醫院」，一八六七年新院落成，初僅容病人五十至六十人，至一八七四年可收容七八四個住院病人。倫敦會有個著名的醫生名叫麥根司（McKenzie）於一八七五年來到中國，在漢口倫敦會所設的醫院中服務，後來因他的夫人身體關係，就搬到天津。治愈了李鴻章夫人的重病，因而取得官方的讚美，並捐助一筆款子，建造一個醫院，同時麥氏也辦了一個醫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後來都在政界裏服務。直到一八八八年麥氏去世，官方才停止他們的津貼，而這個醫院的

工作，就由倫敦會接辦下去。

一個青年有才幹的醫生名叫蕭斐德 (H. A. Schofield) 拋棄了在英國的高尙事業，用自己的經費在一八八〇年參加中國內地佈道會在山西的醫藥工作，三年之後，竟不幸因傷寒而病故。

蘇格蘭長老會在滿州的醫藥工作，非常著名，有兩個醫生：一個叫亨德 (Joseph M. Hunter)，一個叫杜加 (Dugald Christie)，一八八二年在瀋陽設立醫院，當時有人懷疑他們是英國軍隊的先鋒，傳出許多挖心摘眼等等謠言，幸虧他們的工作取得官廳和人民的信仰，因此，他們的醫院反而擴充起來，西方藥物漸爲一般人所歡迎，並且也設立了一個醫校。

大英聖公會醫生梅藤更 (Dunstan Main) 一八八一年到中國，在杭州設立一個「廣濟醫院」。倫敦會在上海設立「仁濟醫院」，美聖公會在上海設立「同仁醫院」，以及英長老會之在廈門，英衛斯理會之在漢口，英長老會之在台灣，美長老會之在北平，美國教會之在福州，倫敦會之在香港，美以美會之在南京，中國內地傳道會之在成都……等處，都有相當的醫藥工作，見後列醫院表可知，這裏用不着細說。

第一個到中國來的女醫士，就是康醫生 (Combs) 在一八七三年由美以美會派到了北京。同來的有哈醫生 (Howard)，在天津設了個醫院，他專門爲李鴻章家屬看病。一八七四年美以美會「婦女國外佈道會」派了一位女醫士到福州；美國「婦女傳道聯合會」於一八八五年派了一位女醫士章太 (Mrs. Williamson) 到上海，據一八九〇年調查，在中國的女醫士一共有二十一立。第一箇中國女醫士，

要算是尤梅慶，她本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因為父母過世，由寧波長老會傳教士米卡悌 (D. B. Macartee) 幫助，學醫於美國，回來便在「婦孺醫院」中工作。第二個是福州人名叫吳敬恩，也是一個牧師之女，一八九四年赴美國 菲拉特非爾「女子醫學院」學醫，畢業回來，在一八九九年任「吳士登紀念醫院」 (Woolsten Memorial Hospital) 院長。更有石美玉醫士，也是一個牧師的女兒，跟一位傳教士到美國，在「密西根大學」醫科畢業，一八九六年回國，在九江開設一個醫院。這是幾個著名的女醫士，其他習醫的女子，當然不少，這裏不能一一詳舉。

這裏且說一說關於醫藥上的譯著，倫敦會 胡醫生 (Francis Hobson) 翻譯了一些關於醫藥的書；衛斯理會 史密斯 (J. P. Smith) 與嘉約翰 (Kear) 都曾寫過一些醫藥書。禮賢會 羅醫生 (Wilhelm Lobscheld) 曾寫許多醫藥論文，美國在福建的奧醫生 (D. W. Osgood) 翻譯Gray氏所著的解剖學，後來又經過了Whitney氏重編。先是「中國博醫會」曾於一八八七年發行一種醫藥雜誌。藉這雜誌推進醫藥教育，提倡公共衛生，統一醫學名詞，並且出版了一本醫學和科學的名辭字典，和一部醫學課本。後來合組而成的「中國醫學會」也曾出版一種雜誌，並注意於新醫術的介紹。

說到「麻瘋醫院」的設立，要算廣東 北海 倫敦會醫院所附設的為最早，成立於一八九一年，創辦人為傅特醫生，他鑒於廣東地方麻瘋患者之多，乃請求「萬國麻瘋救濟會」幫助，創設此院，收容男女麻瘋一百多名，強行注射，成效卓著。調查麻瘋患者，以閩粵兩省為最多，他省亦不少，總計全國不下有百萬人之

多；於是各省醫院咸注意到這種麻瘋救濟的事，一八九二年杭州梅藤更醫生，也在「廣濟醫院」附設一「麻瘋院」，於一九一四年在與市場較為隔遠的松木場建立新院所，分男女兩部，共收病人六十餘名，該院背山面湖，空氣清潔，為全國最合適的病院。一九〇五年德國長老教會的柯納醫生 (Dr. Kuhne) 得「英國萬國麻瘋會」之助，在東莞創設一「麻瘋院」，收容患者有三百多人，省政府按月津貼五百元。一九〇七年天主教康神父 (Louis Conrardy) 在廣州石龍建築一「麻瘋院」，一九一三年得省政府的津貼，大加擴充，收容患者不下七百人之多。該院大小房屋有三十餘幢，麻瘋人居此，彷彿成一村落，男耕女織，各勤操作，惟宗教色彩太濃，每天必舉行幾次彌撒，對於醫治注射方面，不很注重，未免美中不足。此外大衾島「麻瘋院」發起於一九一四年，浸會力約翰牧師 (John Take) 至，一九二五年建築完成，曾得伍廷芳捐資，規模甚大，可容五千患者。福州東西門外有麻瘋村二處，歷史甚久，由官廳與教會人士發起組織「閩北麻瘋救濟會」，設立大規模「麻瘋院」一所，完全由中國官廳自辦的「麻瘋院」，只有汕頭一處，於一九二四年成立的。其他如孝感滄州蘭州梧州福州清仙遊煙台雲南省城，均有英國「麻瘋救濟會」的工作，引起中國人士的注意，才組織「中華麻瘋救濟會」，並在香港汕頭福州廈門設立分會，聘鄒志堅任總幹事，為拯救此百萬麻瘋患者而努力。關於麻瘋救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服務工作，但也是一種醫藥事業，所以在這裏加以敘述。

根據一九一四年的調查，旅華西醫士，男的有三百人，女的有一百三十五人，西看護有一百十二人，中

國醫士有九十四人，住院養病的有十二萬七千人，門診的有二百十三萬人，教會在華醫藥事業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其時雖值歐戰，旅華的英德醫士，多數回國服務，而在中國醫藥工作上，並不發生什麼影響，因得洛氏基金委員會儘量資助，反見擴充而進步。一九一六年歐美返國的醫學生，在上海組織了一個中國醫學會。一九一七年『中國基督教博學會』與『中國醫學會』開聯合會於廣州，通過的議案中，有幾件重要的事，即反對嗎啡私運入華，主張設立公共衛生部，更主張設立中央醫務部，計畫全國醫學校的課程與程度，使教會醫學不致落人之後。當時全國醫學校，共有二十六處，有一千九百三十八個學生，在二十六校中有八校是由中國人自辦的，學生則居總數之半，而教會所辦的醫學校，似感不及，應如何加以改進，便是這次大會所最注意的一件事。

『中國醫學會』成立雖不甚久，會員人數日增，類皆畢業於東西各國的醫學士，乃能不分派別，謀醫藥前途的發展。『中國博學會』已有很久的歷史，開始於南京條約以前的『中國醫藥會』為西醫士所組織。至此，中西兩醫學會，乃聯合青年會辦理公共衛生事業，如預防傳染，禁止鴉片嗎啡，提倡清潔等等運動，都是由醫學界在中間主動的事。有醫學士畢德門氏，周游通都大邑，開會展覽，登壇演講，計各處聽講人數，不下十數萬人。

一九二二年又開聯合大會於北平，『協和醫校』內，到會會員有五百人，其間有八十餘中國人，以教會醫士佔最多數。其餘則為地方代表與東西各國代表，不啻是一個『萬國醫學大會』。討論許多醫學上

的推進問題，特別注重學術上的演講，演講題目有一百八十件之多。並改選兩醫學會職員，龔孫（G. L. Johnson）為博醫會會長，俞鳳賓為中國醫學會會長。

當革命軍北伐與非教風潮的時候，教會醫院遭遇到不少困難，一九二六年竟有若干醫院受地方政府與黨部的干涉，有勒閉、強佔、劫掠、搗毀等出人意外的事情，尤以河南福州、上海長沙、杭州……等處受損最大。醫院本是無偏無黨的機關，凡需求醫藥上服務的，無論屬於何方，都有不能推卸的責任，決無藉故加罪的理由，所以此種對醫院所施的壓迫，足以引起國內外醫學界的驚異。不過這種施行暴舉的人，大都是外來的軍隊，與一般仇教份子，在內策動，並不是當地的人士；因為當地人士對於醫院多數表示好感，予以相當的同情與維護！當時的醫院情形：

在國民政府治理下的

醫院總數 一六五

照常辦事的 三五 (百分之二一·二)

暫時維持的 七一 (百分之四三·三)

被軍事當局佔用的 四 (百分之二·四)

閉歇的 五五 (百分之三三·四)

在北方政府治理下的

七〇

照常辦事的 四九 (百分之七〇)

暫時維持的 一七 (百分之二四·三)

無

四 (百分之五·七)

在這裏，河南雲南等處，尚未列入，可見當時醫院所受打擊之大了。除了被軍隊強佔與被迫閉歇的

以外，有些醫院，因負責人他往，由一般職員暫維現狀，也有一小部份醫院，把事業移交到華人手裏。不過這種現象，却是暫時的，不到二年，逐漸恢復，各地官廳的態度也多改善，尤其是中央政府本不贊成這種行為，所以對濟南當局封閉齊魯大學醫院，曾加以制止，廣州醫院的未遭佔據，亦是爲此。凡屬醫院，必須登記，是這次風潮以後所得結果。教會醫院，絕不反對登記，只因登記條例，多由就地自擬，絕不一致，有些地方，非常苛嚴，遂大感困難。

教會醫院自經此次打擊後，不但不因此而衰落，却反得着特殊的進展，即從前由西國人主持的醫院，至是有許多變爲中國人主持了；從前稱爲外國人的醫院，至是人多稱以西醫了；從前華職員處於被動地位，至是則因西人離開職守，都由華人出來負責，而變成主動了；多數教會醫院於此皆經改組，由華人充任院長，與由華人組織董事部；此皆在事變中所獲得的成功。從此以後，基督教醫藥事業，便在平順中得着相當的進展。到一九三二年，中國博醫會，與中國醫學會，合併而成爲範圍較大的中華醫學會。據『平信徒調查團』(Fact Finding Commission) 李諾克斯 (Lomnox) 在一九三二年報告中說：『華醫與西醫的比例，在一九二〇年爲百分之五五，至一九二五年爲百分之五七，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六七；』見得中國醫生的逐漸加增。『一九三〇年，住院病人共一七八、四六七人，至處診所受診者共三、一四一、四六七人。』在教會醫院任職的外國醫士，共二七五人，有相當資格的華醫，至少有四百人，大半由醫學校最近畢業的。在各醫院服務的華看護，共約有七百人左右，每一個醫院裏，都有他們自己訓練的看護士。

而這些醫生與護士中，百分之八十四是基督徒。以前教會醫院的經費，都仰給於外國，近年來因外國經費銳減，多數醫院不能不當地籌募，中國人的捐款數量，在比例上日見增高，但大部份仍來自外國，所以幾年來所討論的移交問題，要求中國人自負經濟上的全責，尙未能完全辦到，不過中國國民政府對於教會醫藥事業，頗能予以合作，最顯著的是年來在公共衛生方面的進行。最近在中日戰事中，教會醫院雖受相當的損失，常受敵機轟炸，與淪陷區中的破壞，而對於籌設傷兵醫院與參加前綫救護工作，實會相當的努力。可見教會醫院與政府合作程度日愈增高了。茲將現有各教會所設立的醫院，列表如下：

會 名	醫 院 或 分 院 名
中華基督教會 — 六十七院	蘇州福音醫院 更生醫院 婦孺醫院 江陰福音醫院 宿遷仁濟醫院 嘉興 福音男女醫院 餘姚惠愛醫院 武昌仁濟男醫院 仁濟女醫院 漢口協和男 女醫院 皂市仁濟男女醫院 宜昌仁濟女醫院 普濟男醫院 黃陂仁濟醫院 孝感仁濟醫院 衡陽仁濟男女醫院 郴林惠愛男女醫院 湘潭惠景醫院 桃源問津醫院 常德廣德醫院 辰州宏恩醫院 宿州民愛醫院 壽縣春華醫 院 江門仁濟女醫院 仁濟醫院 廣州普惠醫院 柔濟醫院 陽江化民博濟 醫院 連縣惠愛醫院 嘉積基督醫院 瓊州那大福音醫院 海口福音醫院 汕頭福音醫院 中華男女醫院 潮安念賓男女醫院 揭陽福音男女醫院 汕頭汕尾福音醫院 福州塔亭醫院 聖教婦幼醫院 長樂聖教醫院 永泰亨 通醫院 邵武耶穌教醫院 泉州惠世醫院 廈門救世醫院 惠安仁世醫院

<p>美以美會—二十五院</p>	<p>聖公會—二十九院</p>	
<p>鎮江保黎醫院 蕪湖蕪湖醫院 平潭基督教西醫院 古田懷禮醫院 福清和新田醫院 閩清善牧醫院 沙縣美以美會醫院 延平吐吡哩醫院 涵江興仁醫院 仙遊美以美會女醫院 永春永春醫院 成都存仁醫院 重慶寬仁醫院 寬仁女醫院 資中宏仁醫院 北平同仁男醫院 婦嬰醫院 張家口惠濟醫院 昌黎廣濟醫院 遵化同仁醫院 天津婦嬰醫院 山海關普濟醫院 南昌南昌醫院 九江生命活水醫院 但德福醫院</p>	<p>兗州廣仁醫院 歸德聖保羅男女醫院</p> <p>上海同仁醫院 廣仁醫院 無錫普仁醫院 杭州廣濟男女醫院 寧波仁澤醫院 慈谿保黎醫院 臨海恩澤醫院 桂林道生醫院 武昌同仁男女醫院 宜昌美華醫院 北海普仁醫院 福州柴井醫院 福清惠愛醫院 普愛女醫院 連江普孺醫院 霞浦聖教醫院 屏南潘美願女醫院 寧德婦幼醫院 建甌基督教男醫院 建寧婦幼醫院 莆田聖路加醫院 華實產科醫院 仙遊聖路加醫院 保寧仁濟醫院 綿竹教會醫院 雲南府惠濟醫院 平陰廣仁男女醫院</p>	<p>漳州協和醫院 平安救世醫院 漳浦源梁醫院 重慶仁濟醫院 仁壽仁濟醫院 榮縣仁濟男女病院 自流井仁濟男女醫院 樂山仁濟男女病院 涪陵仁濟男女醫院 彭縣仁濟醫院 忠州仁濟醫院 瀘州仁濟醫院 濟南德鄰醫院 青州廣德醫院 周村復育醫院 烟台毓璜頂醫院 北平道濟男女醫院 邢台福音醫院 束鹿耀西醫院 漳德廣生醫院 汲縣惠民醫院 牯嶺中華普仁醫院</p>

<p>浸會—二十院</p>	<p>楊州浸會醫院 寧波華美醫院 紹興福康醫院 金華福音男女醫院 西安廣仁醫院 太原博愛男醫院 汕頭益世醫院 桂林浸信會醫院 廣州兩廣浸會醫院 潮陽潮光醫院 揭陽真理醫院 雅安仁德醫院 敘府明德女醫院 平度懷阿醫院 黃縣懷麟醫院 掖縣梅鐵男醫院 愛憐女醫院 膠州瑞華醫院 亳縣福音濟生醫院 開封濟汴醫院</p>
<p>循道公會—十六院</p>	<p>溫州白累德醫院 寧波普仁醫院 梧州西醫院 漢口普愛醫院 德安普愛醫院 武安普愛男女醫院 大冶普愛男女醫院 鍾祥普愛醫院 零陵普愛醫院 邵陽普愛男女醫院 佛山循道醫院 曲江循道西醫院 昭通府福滇醫院 朱家寨循道施醫院 惠民如已男女醫院 永平循道醫院</p>
<p>內地會—十三院</p>	<p>蘭州溥德恩醫院 臨海普濟醫院 龍泉路加男女醫院 長沙德生醫院 洪江愛隣醫院 平陽教會醫院 潞安鴻恩醫院 迪化內地會醫院 元江哲理醫院 貴陽福音醫院 開封福音醫院 烟台體仁醫院 鄱陽教會醫院</p>
<p>長老會—十一院</p>	<p>徐州基督醫院 坤維女醫院 清江仁慈男女醫院 海州義德男女醫院 懷遠民望醫院 民康女醫院 九龍江教會醫院 濟寧德門男女醫院 沂州教會醫院 濰縣教會醫院 保定思羅醫院</p>
<p>中華聖公會—七院</p>	<p>大同首善醫院 安慶同仁醫院 婦孺醫院 羅源聖教女醫院 河間聖安得烈醫院 永清聖司提反男女醫院 安國聖巴拿巴醫院</p>

公理會—七院	太谷男女仁術男女醫院 清源仁濟醫院 汾陽汾陽醫院 臨清華美醫院 德縣衛氏博濟醫院 北通潞河男女醫院 定縣教會醫院
信義會—七院	長沙信義女醫院 益陽信義男女醫院 津市津蘭醫院 新化信義會男女醫院 潢川信義女醫院 確山慈仁醫院 信陽協和醫院
安息日會—五院	上海聖心醫院 療養院分院 南寧安息日會醫院 惠州惠安醫院 鄆城鄆城療養衛生院
行道會—五院	沙市康生醫院 監利瑞華醫院 襄陽同濟男女醫院 麻城福音男女醫院 黃州鄂東醫院
倫敦會—四院	上海仁濟醫院 天津馬大夫紀念男醫院 滄縣博施醫院 蕭張蕭張男女醫院
監理會—四院	上海婦孺醫院 蘇州博習醫院 常州武進醫院 吳興福音男女醫院
友愛會—三院	平定友愛醫院 壽陽友愛男女醫院 遼州友愛醫院
貴格會—二院	南京貴格醫院 六合和平醫院
遵道會—二院	醴陵遵道醫院 銅仁銅仁醫院
基督會—二院	南通基督醫院 合肥基督醫院
美以美會女佈道會—二院	福清惠樂生女醫院 南昌婦幼醫院

美道會——二院	成都仁濟男醫院 仁濟女醫院
公誼會——二院	遼寧博濟男女醫院 潼川仁慈醫院
崇真會——二院	梅縣德濟醫院 河源仁濟醫院
約老會——二院	羅定博愛醫院 德慶惠愛醫院
北長老會——二院	嶧縣瑞門德男女醫院 滕縣華北醫院
南長老會——一院	鎮江基督醫院
安息浸禮會——一院	瀏河惠中男女醫院
德華盟會——一院	松陽博愛醫院
伯特利會——一院	上海伯特利男女醫院
路得會——一院	老河口福民醫院
來復會——一院	巢縣普仁醫院
禮賢會——一院	東莞普濟醫院
通聖會——一院	南管陶教會施醫院
清潔會——一院	濮陽清潔醫院

坎拿大聯合會	沁陽恩賜醫院
學校的——三院	長沙湘雅醫院（雅禮學校） 廣州博濟醫院（嶺南大學） 濟南齊魯大學醫院
協和的——五院	福州協和醫院 南京鼓樓醫院 蒲台鴻濟醫院 泰安博濟醫院 北平協和醫院
中華麻瘋救濟會——一院	上海中華麻瘋療養院
無會的——一院	鹽山道生男女醫院

這表是根據一九三六年第十三期基督教年鑑編成的，其間沒有東三省的醫院在內，因為從「九一八」以後，關於東三省的基督教現狀，非常模糊，所以在這期年鑑裏便沒有東三省的記錄。從兩年以前的調查，知道在東三省本有十八個醫院，現在情形怎樣，却不得而知了。這張表裏所列入的公會凡三十四，加以學校附設的與數公會合辦的，共計有二百六十個醫院。此外尚有許多小規模的醫藥機關未列入，可見基督教在醫藥方面的努力了！

五 社會

「我來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這是耶穌親口詔語門徒的話，是以歷來的基督教會，莫不本此意義，實行社會服務。如上文所敘述的教育，醫藥，文字……等等，本來也是社會服務範圍內的事，但是這裏所要說的，是單指「拯困濟危」「改良風俗」的一方面。

中國風俗的亟宜改良者，除破除迷信外，莫如烟酒賭博。說到煙，最先努力謀所以剷除的，莫如一九〇八年所組織的「萬國改良會分會」。該會以丁義華爲幹事，專門勸人戒除煙酒賭博。時中國正在努力禁煙，政府與英國訂定十年禁絕條約，所以該會對於禁煙問題，爲第一入手工作。他們曾經（一）聯合中國政府暨各省當局，認真嚴禁。（二）聯合各報社，宣佈鴉片流毒，使人人有所注意。（三）聯合商學各界，在各處各學校演說鴉片毒史。（四）通函各國新聞報，請各慈善家輔助中國進行。（五）組織全國「禁煙聯合會」，一面請政府設立專管機關，由內務部設立「督查禁煙處」。（六）函請各省官廳，凡有緝獲煙土，定期當衆公焚。（七）聯合「英國國民禁煙會」，鼓動英國政府，提前禁煙，以免流毒隣國。經此努力，果生奇效，當時各行省中，已有十四省已告禁絕。又會聯合各省教會及青年會，設立分會，於撲滅煙毒之外，更勸人戒吸捲煙禁止賭博。該會自設立以來，編著書籍，刊印圖畫，函電紛飛，東西奔走，工作異常緊張，耗費亦屬不貲，然所用經費皆仰給於美國，故當歐戰發生時，華盛頓總會不遑兼顧，遂不得不謀經濟上的獨立，改名爲「中國萬國改良總會」，並購置北京王府大街民房爲會所。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希望數十年煙毒，可以從此掃除，想不到竟功敗垂成，前此七八年的努力，都付流水。因爲當時上海洋商存有六千箱煙土，中國政府竟循洋商之請，命上海道蔡乃煌與之訂立合同，准其運銷江蘇江西廣東三省，以製藥爲名，設立專賣局，這不啻公然開禁，奸商乃乘機謀利，軍閥又藉此抽稅，死灰竟至復燃，該會亦因此無形消滅。間接繼承其工作的，在這一

年十月間有「天津拒土會」的發起，設總會於北京上海廣東武漢山西河南等處，皆次第設立分會。聯合

呈請政府取消公賣，徐世昌總統便毅然明令燒燬存土一千四百萬金，禁煙前途，又呈樂觀，曾幾何時，毒氣復熾，不但鴉片遍滿全國，加以嗎啡，高根，海洛因等毒物，源源而來，於是『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聯合『青年會』、『醫學會』等團體，發起組織『中華國民拒毒會』，一九二四年八月成立於上海。規定九月二十八日爲『全國拒毒運動日』，印發拒毒圖畫，全國報章特刊專號，並公開演講，舉行大規模遊行，以期喚醒民衆。發行拒毒月刊，規定五年計劃，經長時間的奮鬥，始獲國民政府贊助，嚴厲禁種禁吸，毒氣幾告息滅。又不意七七事變發生後，沿海淪陷區中，復毒氣漫天了。

次言賭。中國賭風之盛，莫如廣東，是以『廣東基督教聯合會』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開會時，曾討論勸釋奴婢及戒煙戒賭一案，推李育泉起草，次年李氏提出剷除煙酒賭奴四害意見書。一九一九年年會時認禁賭爲先急之務，因決定三條議案：（一）請願政府嚴禁賭博；（二）請願警廳禁止未成年男女吸煙及賭博；（三）禁止信徒賭博（無論麻雀撲克凡屬賭具一律嚴禁）。並召集各教會各學校代表，推定委員會負責進行。規定一月間一星期爲拒賭禮拜，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開成立大會，到會男女有五千多人，廣事宣傳，分三部進行工作，（一）調查，（二）廣告，（三）徵求，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二日止，已徵求拒賭會員五萬零二百九十人，於是設辦事處，聘請駐會幹事，發行拒賭週刊，後來此組織也影響及於他處。

對於這種不良習慣，力謀加以改革的團體，有好幾個，例如『婦女節制會』也是以反對煙酒娼妓組織的。當一八八六年時，有美國『萬國節制會』代表來華，遊行演說，乃於上海鎮江等處設立支會，因缺乏

相當負責人員，上海會務，幾乎無形消滅，直至一九〇七年，「萬國節制會」又派代表來華，重復喚起國人的熱忱，並推定上海長老會范女士為中國婦女節制會總會長，負責推行，連任數年，由九江美以美會石美玉女醫士繼任，對於會務，多所擘劃。一九〇九年北京公理會美國富軻慕慈夫人任「萬國節制會」駐中國幹事；她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在中國宣道，已歷有四十年之久，對於中國的風土人情，無不熟悉，任事之初，即從事於書籍小說圖畫等等的著作，廣事宣傳，到處演講，組織支會。除鎮江外，有支會四十六處，無一非夫人所手創，後來由梅雲英以至劉湛恩夫人為該會總幹事。工作範圍，逐漸推廣，不但曾參與「中華拒毒會」的發起，舉行拒賭運動，及宣傳香煙酒的害處，更設立「尚德部」提倡家庭道德；「女工保護部」謀求婦女工人的幸福；「幼童部」培植兒童智德體育的發展；「社會服務部」創設婦孺教養院一所，院址在兆豐路，來院教養者有百餘人，出院後類能謀得自立的生活；「國際和平部」謀劃除戰爭，增進人類友愛；「學生部」舉行作文競賽，演說競賽，暑期演講等。當上海一二八戰事發生時，因多數會員避難租界，乃創辦「上海女子公寓」又創辦了一個「節制女子家事學校」於江灣，在這個學校裏一切事務，都由學生自己操作。最近自八一三戰事發生以後，遷於租界，改為「新生女子職業中學」可見節制會的工作日愈擴大了。

一九一八年上海公共租界各團體，鑑於娼妓充斥，要求工部局，設立「正俗委員會」工部局乃邀請「基督教教士公會」「基督教婦女禁酒會」等十七團體，開聯席會議，結果，組織成功一個「風俗改

良會。』到一九二〇年改名爲『進德會』。專門謀賣淫事業的減少，規定妓院必須領照，每年按照抽籤，減去百分之二十，以期五年抽盡。並且說感化所，收容沿街拉客妓女，成效卓著。其進行工作：（一）盡力營救陷於罪惡中的賣淫婦；（二）研究婦女本身的難題，助其經濟獨立；（三）警告人用正當的花柳病療法，免受欺騙。又發行進德報，在學校中提倡性教育及衛生。關於救拔妓女的問題，早爲一般基督教人所注意，先是在一九〇〇年有西國女士五人，因見上海妓女的痛苦，遂同心祈禱，計畫設立『濟良所』以資拯救，至次年果然成立，初有包女士及中國張女士留所辦事，不數年建有房屋五處。至一九一五年，任事者有西女士六人，中國職員二十三人，女傭十三人，住所婦女四百七十人，前後十四年中收容九百二十人，由所擇配的約三百人。起初立所於西華德路，後遷移至浙江路，復在寶山路建二層樓房一所，中有讀書室，有工業場，佔地十三畝，會所於是擴大。當一九〇五年時，有滬紳十一人，捐資設立分所於四馬路，後移至南京路南香粉弄，專門收容會審公堂所判送的妓女。來所之人，半日教以讀書識字，半日教以女紅烹飪，後入工業場作工，予以相當工資，使能自立自養。自分所開設以後，數年中收容有一千八百人之多，每晚在分所宣講福音，禮拜日舉行『主日學校』，並派員赴會審公堂女監中及妓女中講道。一九〇六年復於江灣開設『愛育學校』，專爲培植脫離妓院的幼女而設，特建三層樓房一所，大廈一座，可容百人，內分幼稚初小高小等級，與普通學校相同。一九〇九年開設醫院一所，一九一三年建立禮拜堂一座名『思裘堂』。一九一二年復於唐山路購地建屋，專收被拐迷途路無處安插的男女幼孩，收容有八百餘人，此外在滬西亦設有分校，亦收容拐

孩及被主人虐待的婢女。此種工作，到現在還是繼續地維持着。同樣在其他通商大埠上，亦有此種救拔不幸婦女的工作。數年前廈門的教會中人，曾有救拔婢女的組織，亦曾收容數十婢女。關於解救婦女的事，又有天足的提倡，中國婦女纏足的風俗，已有很悠久的歷史，推其弊害，不但有背人道，抑且使女子身體孱弱，影響到國民體質。一八九五年李德立夫人李提摩太夫人商議創立天足會，宣傳纏足的害處，利用廣學會的書報，廣事宣傳，於是發刊了許多小冊和勸世文，分散到各地。各處教會，亦多響應，教會學校的女生，先行放脚以資提倡。李德立夫人又親身遊歷南北各省，開會演說，並請求各省督撫大員及皇太后出諭勸導全國，實行放脚。奔走數十年，發生巨大影響，至今中國女子已完全脫離纏足惡習，推本窮源，不能不歸功於四十年前李夫人。此外如天津雍劍秋曾發起『養真社』，在消極方面，亦注重戒嫖戒賭等改良工作；在積極方面，提倡敬天，齊家，愛國，互助，孝親等運動。主張修養四真五愛：何謂四真？一曰靈真，要將一切迷信打破，篤信上帝，遵守上帝博愛世人之旨。二曰心真，要將一切私心打消，遵行上帝真理，以基督為模範。三曰體真，要將一切有傷身體之事掃除，不作嫖賭納妾之事，堅守一夫一妻之義，藉保天真。四曰行真，要將一切虛偽欺詐，屏除淨盡。何謂五愛？一曰自愛，二曰愛人，三曰愛家，四曰愛國，五曰愛和平。當時入社同志有三千餘人。南京長老會牧師孫嘉聖發起『南京改良會』，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開成立大會於『協進會』，入會的有二千餘人，推定宣傳員二十四位，規定宣傳事項：(一)戒鴉片，(二)戒香煙，(三)戒飲酒，(四)戒賭博，(五)戒邪淫，(六)戒納妾，(七)戒奢侈，(八)戒淫書，(九)戒裹足，(十)戒迷信。提倡之事亦有十項：(一)公共

衛生，(二)公共遊戲場，(三)通俗學校，(四)通俗報，(五)殘廢院，(六)流民習藝所，(七)遊行演講，(八)博物院，(九)惜性會，(十)賑災會。後在漢西門，溧水縣，湖熟鎮，山東濟寧府，嶧縣，登州府，次第設立分會。並請求「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通函各省教會提倡。

總之：中國當時一切社會惡習，無論煙酒嫖賭等嗜好，風水星相等迷信，偶像鬼魅等崇拜，都是基督教所極端注意，而竭力以反對的。

次言極困濟危。天下最困苦的人，莫如盲目聾啞與孤兒，特別在中國，這種人的痛苦更利害，因為一般社會對於他們沒有什麼救濟的辦法，譬如生一盲童，他的父母，看做一個廢人，男的叫他學習星相算命，女的叫她學習歌唱做瞽妓；一生命運，便入於悲慘之境。基督教教士，本其人道主義，設法予以救濟，當一八四〇年的時候，有某教士偶然收容瞽士六人，因中國此時尚無盲人學校，故分送二人至美，四人至英，入盲人學校受適當教育，至英國的四人中，後有一人返國充寧波「瞽人院」院長。一八七四年，始有某教士在北京設「瞽人院」，以後在漢口奉天福州九龍保定成都湖南寧波上海等處，相繼設立，收容男女盲童，雖皆施以適當教育，尚未注意到工藝的學習，有之自一九一一年「上海盲童學校」始。該校為美國傳蘭雅獨力捐資而設，中分四種功課：(一)為家庭部，即學習家庭中的種種操作，(二)為文學部，學習中西文字及打字，(三)為音樂部，學習彈琴唱歌，(四)為工藝部，學習編織等手工。其所用書籍，係用硬紙製成凸字，讀時以手代目，自左而右。此種凸字，是以∴∴六凸點變換而成五十四音，計前音十八，後音三十六，如中國固有切

音方法，把前後二音合成一音，而得四百四十字音，各盲校皆以此為教授根據，並且曾用此點號印成了新約全書，這學校經傅步蘭（傅蘭雅之子）繼續辦理，進步甚速；其畢業生受各處盲校之聘而為教員的為數甚多。又組織西樂隊，及創辦印刷部，發行盲人月刊。學生中有畢業聖約翰大學而得文學士學位者一人。一九三一年又創辦女學部。

其次如廣州的「明心瞽女學校」，創始於一八八二年；當時在博濟醫院中的一位美國女醫士名叫賴馬西，一日見路旁有一被棄的失明女孩，年僅週歲，憐而攜歸，未幾，又收得失明女孩三人，寄養於醫院之中。並聘得香港巴陵會「育嬰堂」瞽目女教員，教授該孩等凸字。後來盲生漸多，不得不另租校舍，但屋小僅容三十人，乃別謀建築校舍，蒙恂嘉理醫士以所購上芳村空地十五畝，讓與建築。但賴醫士妙手空空，初無的款，以前費用，皆出私囊，轉讓向親友們捐募，直至一九一〇年始行落成，計女生宿舍兩座，男生宿舍一座，校務日見發達。一九二八年賴氏因年邁回美，由嘉秉道女士繼承辦理。該校自創辦至今，已歷五十餘年，所收男女學生，共有三百七十五名，畢業者有任傳道或教員的，也有藉手工謀生的，類能自食其力。當一九一二年時，廣州警察廳取締女賣淫事，乃將學習彈唱瞽女七十一人，送至「明心學校」教養，那時的「明心」已患人滿，因此另立一個「正心學校」。

還有福州聖公會創辦一個「靈光學校」。一九〇〇年以前在廈門本來有過一個盲童學校，但不久即停辦。一八九八年有一位澳洲教會的奧女士（Amy Oxley）到了福建的連江，是擔任醫院的看護的，

她很注意盲童的痛苦，在順昌遇到一位久辦盲人教育的教士叫柯先生（Coak）他本是發明華音凸字的人，她便採用這方法在連江創辦一個學校，於教授讀書之外，又教授織蓆工藝，其出品甚為著名。一九〇〇年庚子亂起，遂即停閉，女士例假回澳洲，乘機募款，以備重建，次年回華，與旅福州醫士魏更生（Williamson）結婚，遂於醫院附近租得大廈，開始其計劃已久的盲校工作。特別發展其工藝，學生所編竹籃，所結草蓆，曾得南京工業展覽會與巴拿馬展覽會的獎章。在工藝部內，有織蓆機十架，並有修琴室，製籐椅，熱水鉛壺……等各工場，畢業生有任教員，傳道打字等各職外，大都以工業謀生。一九〇三年又有英國「印度婦女傳教會」教士蒂芬女士在福州創設「明道盲童女校」學生亦甚多，小學畢業後，即令學習織補縫紉等手工。先是一八九七年，德國教會在九龍創設「警女書院」起初附學於「明心」後學生漸多，乃自建校舍，有學生七十九人，並設分校於香港，有學生四十六人。九龍校中兼收警目嬰孩，故課程有幼稚園而至高等，其音樂與織造，成績最佳。中有一既盲而又聾啞的學生，後來竟能藉工藝以自食其力。而長於音樂的，又為各處禮拜堂聘為琴師。該校中又設「師範班」其畢業生都任一般盲校的教師。在肇慶德慶亦曾分設「盲童小學」此外在漢口有「訓育書院」長沙有「警女學校」奉天有「重明女學」保定有「盲啞學校」以及其他……類皆由基督教教士所肇劃經營，其間少數曾受官廳津貼，而大部分經費，都由教會捐募而來。據一九二六年統計，中國盲人學校，共有三十八處，收容男女盲人有一千餘人，不幸因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政潮影響，多數盲校已縮小範圍，並有若干處遭受搶劫，書籍物品，全被毀壞，越二

年始恢復舊觀以至於今。

聾啞之人，痛苦更甚，因為凡聾者必啞，以其未嘗聞人的語言，故遂不知如何發言。泰西諸國教聾啞人以語言及文字，不但能發言，亦能懂人的話，一如普通人一樣。有一個美國教士名叫梅理士與夫人耐德女士同在中國登州傳道，却不料生了個聾啞的兒子，耐德女士便悉心教他，使他能懂得語言文字。因此，她想到中國這樣大的地方，一定有許多聾啞的人，所以在一八八七那一年，創設一「聾啞學校」，把她自己的經驗與美國所施用的聾啞教授法，來救濟這些痛苦的人。不意來學者甚為寥寥。未幾，梅理士去世，耐德女士乃於一八九八年把學校遷到煙台，購地建屋，以謀擴充。復從美國聘來了哈愛德女士，乃添設女學講室，總名曰「啓瘡學館」。至此來學者乃漸多，而學生中有高麗李某某，杭州周耀先，福州黃女士，學成後各歸本地創辦學校。一在杭州白馬廟巷口福音堂內附設「聾啞學校」，學生九人。一在福州曲城妹妹會女學校內附設「聾啞學校」，學生數人。其他學生學工學藝，類能自謀正業以維生活。

至於救濟孤兒，在天主教是十分注重的一件工作，凡在大城市裏的天主堂，差不多都附設着一個育嬰堂或孤兒院的。他們那些修女們稱為姆姆的人，都是負擔着照顧嬰兒與教育兒童的義務。從上海土山灣的情形推之，亦可以略見一斑。上海土山灣的育嬰工作，是由「聖母院」負責辦理的，起初有薛孔昭司鐸，於一八五五年創設「聖母院」於青浦的橫塘，一八六四年遷到王家堂，一八六九年再遷到徐家匯土山灣，第一任院長，是個多明我的姆姆，經營肇創，主持有三十年之久，使院務蒸蒸日上，達到今天的宏大規

模。現在院內分爲『育嬰堂』、『幼稚園』、『聾啞學校』、『啓明女校』、『聖誕女校』、『徐匯女中』、『施醫處』、『洗衣廠』、『刺繡所』、『花邊間』、『裁縫作』、『……等部份，拯亡會會長戴步賢爲現任院長。其『育嬰堂』收容初生至五歲的無靠嬰兒，自成立以來，前後收容過二萬五千多名，目前有嬰兒六百五十名。有完善的醫藥設備，自蓄乳牛二十四頭，以新鮮清潔牛奶育養這班嬰兒。六歲以上，即受『幼稚園』教育，一年以後，送入土山灣『孤兒院』繼續修業。若女孩則學習縫紉、刺繡、花邊、編織及其他家庭工作。及至長成，堂方即協助擇配，與奉教男子結婚。結婚以後，如仍願在堂工作的，堂方則給以工資，始終維持密切的關係。男子則令學習工業：有印刷，有銅匠，有修琴，有繪畫；等等自辦工場。即不在院內工作的，亦能各有一謀生技能，以維個人或家庭生活，平時又受有相當的宗教訓練，大多數都能恪守人生的道德而取得人家的信仰。天主教對孤兒的教養，不但是規模宏大，且亦辦理完善，實爲更正教所不及。

更正教亦辦有不少『孤兒院』，據一九一四年的調查，有『孤兒院』三十七所，大抵爲各教會所設立；收養的孤兒，約有二千五百餘名，男女各半，分佈在全國，江蘇最佔多數，計十一所，鄂浙二省次之，各五所，大多數是成立在一九〇〇年以後的。成立在一九〇〇年以前的，爲數不多。最早的則在香港，是一八五一年創辦的，其次則在上海，開辦於一八八四年。大抵這種『孤兒院』的設立，有一共同的情形，即有幾個熱心的基督徒，抱着基督的博愛精神，對於一般無依無靠的男女孤兒，負起教養的責任來。譬如上海『孤兒院』的發起，則由高鳳池、顧念劬等在普陀夏令會時因見一無家童子，激發憐憫之念而起頭的。寧波『植

孤院。」也是同樣從杭州的傳道大會中有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偶然談起的。如果調查每個「孤兒院」創辦之始。十九是這樣起頭的。同時，也有同樣的辦理情形，除向國內外各教會各個人勸募捐款，維持衣食生活外，授以相當的普通教育，及予以生活上的技能，兼辦各種工藝，如印刷，織布，製造籐器，木匠，種植……等種種小工業。比較天資聰穎的人，繼續資助升學，有升中學或大學，甚至留學東西洋的。後來這些孤兒，類能在社會上謀生或竟佔着重要的地位，這是一般孤兒院大概的辦理情形。因為沒有詳細的統計，不能把每個孤兒院的經過，一一敘述，姑舉一二，以例其餘。

上海「孤兒院」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初借城內長老會的「雨化堂」為院址，後來在龍華獲得曠地二十餘畝，募款建築院宇，分男女兩院，通常任院學生有男生三百女生一百人，半工半讀。在教育方面，是一個完全的二級小學，六年課程；在工藝方面：則分籐工，木工，旗工，醫藥，音樂，縫紉，烹飪，絨線八科；亦曾辦過織布，種植，編草，漆工等科。出院學生，有升送中學的三十餘名，入商務印書館任職的六十餘名，學習看護及醫生的八名，當工藝教員的八名，入印刷所的二十餘名，入公司工廠的三十餘名，留學日本「帝國大學」的一名，入「南開大學」的一名，升「香山慈幼院」習工的七名，其餘在院讀完小學課程，各能自謀職業。女生中由院擇配十餘人。

廣州浸信會「孤兒教養院」創始於一九〇六年，男女學生五十餘人，大都附讀於該會「培正」，「培道」等男女學校，並學習農林畜牧的工作。寧波「恤孤院」發起於一九〇九年，由寧波六公會維持，男

校設在高橋，女校設在餘姚，男生七十五人，女生二十五人，由院辦完全小學，會辦拍照，縫紉，理髮，烹飪，農業，又會派畢業生到地慈專校學習四年，回院辦理地毯科，所製成的堂毯車毯椅毯，頗受社會歡迎。其學生中有升中學、道學、大學、師範、醫科、牙科、影片等專科的；有任教會傳道、教會機關幹事，以及中小學教員、公司經理、工廠主任、醫院院長的；其成功可知。他如山東曹縣江蘇興化等「孤兒院」，則以刺繡紡織，編帽製履著名；「香山慈幼院」以及長沙杭州松江泰安鄭州……等等，莫不工讀並重，造成自食其力的人。尤其注意的，則為宗教教育的訓練，男女孤兒，不獨敦品勵行，更能以傳佈福音為天職，長沙某孤兒竟能跋涉長途，傳教苗人之中，其熱心聖教，可見一斑。上述的各「孤兒院」，都屬地方性質，各自辦理，毫無統屬，惟在一九二八年孔祥熙等所發起「中華慈幼協濟會」，方是全國性質的慈幼組織，是以謀全國一萬二千萬兒童幸福為宗旨的。分五部工作：（一）兒童保障部。對於一切虐待婢女、學徒、童養媳等，設法予以救濟，或代向地方警權機關申訴，遇有必需收養的兒童，或介紹其他慈善機關收容，或由該會附設的「慈幼教養院」收容。（二）兒童教養部。當山東河南諸省發生災荒時，曾匯寄賑款，救濟災童，並收養孤苦兒童三百多名，分別寄養於各地「孤兒院」，並在上海設立「慈幼教養院」，收容無靠孤兒。（三）兒童衛生部。在貧民聚集的地方，設立若干處慈幼保健醫病所，施診施藥，並演講衛生常識。（四）兒童研究部。敦請兒童教會專家，組織「兒童研究委員會」，舉行心理與生理的測驗，發行慈幼月刊及嬰兒保健表、孕婦保健表、慈幼叢書等出版物，設立並兒童圖書館等。（五）社會教育部。舉行慈幼運動大會，衛生運動大會，喚起社會同情，宣傳慈幼事

工，普及慈幼智識。因為要推行這種工作，便組織了一個執行委員會。委員十七人，如孔祥熙、余日章、陳鶴琴、郭秉文、夫人等，皆屬知名之士。歷來辦理虐待男女兒童案件，不下百餘起。規定四月四日為全國兒童節，已經政府核准。每逢兒童節，全國各大城市都舉行盛大典禮，又在南京籌建「模範教養院」，並增設「保健所」，「工人託兒所」。北平、南京等處成立「慈幼分會」。召集全國慈幼領袖會議，呈請立法院釐訂兒童法律，設立兒童法庭，取締婦孺販賣、救濟雜妓、童工、難童，特別收容戰區婦孺。以一九三五年為兒童年，使全國人民都注意兒童生活的改善。最近慈幼月刊改稱現代父母，並編輯了許多小冊，如怎樣教小孩子，為兒童造良好的環境，又麻雀與家庭教育等書，有吳維德、陳鐵生、陳征帆等先後任該會幹事，負責進行。先是在青年會本有童子事業，其性質祇限於教育方面，而不及於救濟，容於下文敘述青年會事業時再詳。

任何人都承認青年會是一個基督教社會服務的機關，他的歷史與事工，也值得我們注意的。中國之有青年會，是始於一八九五年，其實在一八八五年北通州「潞河中學」，福州「英華書院」都曾組織一學校青年會，這才是青年會在中國最初的發軔。到一八九五年「北美青年協會」派來會理到中國來，首先在天津創辦了一個城市青年會，一八九九年路義思又創辦上海青年會，其後青年會事業在中國奠定了堅固的基礎，由試驗而開拓，由開拓而擴張了。分為城市青年會、學校青年會兩種，其進步情形列表如下：

青年會歷年會員比較表

年 份	市 會	會 員	校 會	會 員
一九一四	三四	一〇、〇〇〇	一二〇	七、〇〇〇
一九二〇	三四	三二、三三〇	一七四	一五、五五五
一九二五	四三	四四、五五〇	二〇八	二七、四八七
一九三一	三九	三六、二一五		
一九三五	四〇	三七、六四八	一二二	八、四二四

當一九二二年在天津第八次全國大會舉行二十五週紀念祝典時，到會者有千二百七十一人，代表十八省二十九處城市青年會，一百三十一處的學校青年會，和七處海外青年會，十五處基督教團體，實為中國青年會開一新紀元，見得二十五年來進步之速。總青年會一切事工的，則有『全國青年協會』。協會組織於一八九六年，其時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總幹事穆德第一次來華，巡視各地教會學校，促進學校青年會的組織，得二十九處校會派遣代表，於十一月三日至五日集會於上海，是為青年會第一次全國大會，產生總委辦，其名曰『中國學塾基督幼徒會總委辦』，以潘慎文為總委辦會長，來會理為書啓，其時所謂書啓，即今日所謂幹事。後來就有中國人做總幹事，如王正廷，余日章以及梁小初等。一九〇一年第三次全

國大會集於南京，因韓國青年會加入中華青年會之故，改稱爲「中韓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合會」。在第五次大會中又刪去香港二字，又變成「中韓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後來因爲將韓國青年會分出，改稱爲「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組合」，呈請國民政府內務部立案。一九一五年第七次大會始改爲今名，即「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當協會初創的時候，借上海青年會四樓的一室爲事務所，其任務爲通信及巡視各學校。編行學塾月報。即後來的青年進步。一九一〇年成立學生立志佈道團，聘丁立美爲旅行幹事，亦爲協會事業之一。一九二〇年協會新會所落成，範圍日廣，其工作分八部二組。八部即宗教、職工、庶務、體育、幹事、學生、書報等部；二組即校會組、市會組。屬於智育部的事，有科學演講、平民教育、公民教育、團影、教育、學校教育等。在宗教方面，派幹事巡遊演講，並指導查經佈道方法，訓練查經領袖，鼓勵個人談道，舉行職員退修會，教請世界名人舉行布道大會，如穆德、艾迪等曾在十幾個大城講道。在智育部方面的工作，則有科學演講，如饒伯森攜帶儀器，赴各大城市演講。其次爲平民教育運動，爲晏陽初、傅若愚兩人所發起，編千字課本，激發各地開辦平民學校，並用圖畫幻燈及電影等到處演講，備有八百餘卷關於道德、衛生、智識等電影片，曾出租於四十餘大城。關於學生方面的事，除聯絡各校學生，發展各校會務等以外，尤注重每年夏令會的召集與指導。又有所謂童子部，是由一九一三年克樂愷來華辦起的，組織俱樂部，舉行旅行童子營、演講會，以及徵求會員的工作。同時，因提倡自治精神，有童子養成團的組織，欲發展個人天才，有演劇團的組織，並提倡服務，開辦「惠寒學校」與組織「社會改良會」、「個人佈道團」等事。一九二三年第九

次全國大會，提倡公民教育，聘劉湛為幹事，負責進行，全國校會市會紛紛組織「公民研究社」，有九十處之多，組織「公民宣講隊」，到處演講，又舉行公民問題論文競賽，規定五月三日至九日為「公民教育運動週」。當時頗得「中華教育改進社」、「江蘇省教育會」的贊同與合作，中央教育部各省教育廳亦多來函褒揚，認為是切要工作，其他如書報部及學生立志佈道團等工作，前文已略及，此不復贅。而近來最有價值的工作，則莫如戰時服務。當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發生，有十五萬華工，在法國參加後方工作，青年會特派幹事約百人，就華工中設立一百六十一處青年會，備些樂器玩物及象棋之類，使他們在操作餘暇，得一娛樂之地。也是中國參加歐戰的一種貢獻；而青年會爲了要鼓勵這班華工的精神與高興，並解除中西間的隔膜與誤會，去擔任這服務的工作，這也是對歐戰一種間接的貢獻。並且把青年會工作，推行到軍隊之中，成立了「軍人青年會」等。到歐戰結束，華工回國，這班幹事擔任一切招待事宜，使他們安然到家。並且在青州周村設立了二個「職工青年會」，天津濟南漢口南京各地青年會，也添設了職工部，專門爲這班回國華工及普通工人提倡通俗教育。在九一八東三省事變與一二八淞滬戰起時，組織「基督教戰地難民救濟會」，設立「難民收容所」，並組織「戰區服務全國委員會」，敦聘全紹文爲前方戰區服務部主任，辦理傷兵招待處，傷兵醫院俱樂部，軍官俱樂部，及慰勞等工作。及至蘆溝橋事件發生，揭開中日戰事的序幕，青年會即分三部份工作服務：（一）爲軍人，（二）爲學生，（三）爲難民。當戰事初起，即由協會主持成立「全國青年會軍人服務委員會」，以梁小初爲執行幹事，分設支部五十處，擔任慰勞與招待，

裏傷與救護，訓練與教育，遊藝與娛樂四種工作。設立「軍官俱樂部」、「軍人俱樂部」、「傷兵招待處」、「醫院服務處」如代軍人寫信，分發慰勞品，供給茶水，教授識字唱歌，報告時事，演講，戲劇，電影，音樂會，遊藝會，遊戲，游泳，佈道，個人談話：等等。各地方青年會如廣州南昌長沙寧波上海北平漢口等處，亦都有同樣的軍人服務，戰事蔓延，文化機關被炸，戰地學生，流離失所，上海劉湛恩等發起「學生救濟委員會」其後香港福州昆明成都重慶貴陽桂林沈陵北平寶雞西安延安激江等地亦相繼有同樣組織。救濟工作分：（一）工讀及貸金，（二）旅費津貼，（三）設立經濟宿舍，（四）學生公社，（五）醫藥補助與藥品供給，（六）學生合作社等。並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如重慶貴陽成都昆明建立學生會所，招待流亡學生，使他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此種救濟經費，大部分是國外捐來的，在上海立有「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黎昭寰為該會主席，分撥款項到各地委員會，實施救濟工作。而該會辦事人員都是由男女青年會幹事義務擔任。救濟難民，雖為基督教普遍的工作，亦屬青年會主要服務之一，從各戰地流亡的難民數，無慮千百萬，各地的情形雖不同，而青年會所擔負的工作，大約有四點：（一）受地方政府委託，辦理難民收容與遣送事宜；（二）與當地社會團體合作，負責經營「難民收容所」；（三）聯絡當地基督教團體，進行一般救濟工作；（四）為戰區難胞募集捐款及物品。尤其重要的，在「難民收容所」內，實施教育及服務。這是青年會在社會服務方面一般的工作，簡略的敘述如此。

同時，又有女青年會，其大部分的工作亦相等。一九〇〇年以後，中國文化起了極大的變化，美國女青

年會鑑於中國婦女的亟待服務，便派遣潘女士來華計畫設立中國女青年會，於一九〇六年成立上海城市女青年會，以顧恩慈為幹事，一九一三年潘女士返國，顧女士乃任為協會總幹事，當時成立的市會不過三四處，校會三十餘所，至一九二二年，市會已達十二所，校會有八十餘所，顧女士八年成績，可見一斑。顧女士病故，繼任者為文自立女士，一年以後，文女士回國，由丁淑靜女士代理，為中國人任總幹事的第一人。一九二三年在杭州舉行第一次全國大會，規定協會的典章，以聯絡發展中國各地女青年會，促進女子德智體羣四育為宗旨。發行女青年報。其工作大旨與青年會相同：在德育方面，辦理查經班、靈修會、主日學、宗教演講，及各種退修會等。智育方面，出版書報，提倡平民教育，半日學校，及家政、烹飪、縫紉、音樂、美術等。體育方面，訓練體育師資，提倡正當遊戲，演講衛生等。羣育方面，設「寄宿舍」、「休憩所」、「東道廬」及提倡娛樂交際等。此外又注意勞工事業，農村服務，家庭改進，和公民教育等運動；又與「青年會」及「基督教協進會」等教會機關辦理各種慈善事業，如此次戰事中的救濟難民工作。至最近一九三五年，共有市會十八處，會員四千餘人。校會九十五處，會員五千餘人。男女青年會在最近幾年中提倡「團契」，由兩會學生部推行，許多校會已改成了基督徒團契，另外又有所謂少年運動與少女運動，亦有非常的進步。

末了，略為述說基督教一般的救災恤難情形。救災恤難一類的慈善事業，本為基督教活動中重要的部份，據「華洋義賑會上海分會」調查，在上海的慈善團體有七十三個，而實際能擔負這種這種救恤事工的，要算「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上海華洋義賑會」、「紅卍字會」幾個團體。而這些團

體中，大半是基督教所組織的。每遇什麼水災旱災兵災，基督教便引為唯一的義務，負責實施救濟的責任。例如一九一四年廣東連年水災，美教士湛羅弼等，聯合基督教各團體，成立「賑災會」，電外國及華僑及本國信徒勸捐放賑，教堂學校盡為災民收容之所。一九一八年直隸水災，基督教合組「華北水災賑濟會」募款製衣，收容盡力救濟。同年汕頭地震，房屋傾倒，人民壓斃者甚多，教會亦出動救護。一九二〇年華北五省旱災，赤地千里，災情尤重，每萬人中有二百八十人凍餓而死，二百〇八男女災童被賣。除「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一致努力賑濟外，基督教亦組「賑災會」，在工作上捐款上均盡相當的力量。北平「華洋義賑會」請內地會安先生至甘肅主賑務，請貝克教士至山西主賑務，其他各處都託教會主持。一九三一年長江流域大水災，淹沒田地達七萬方哩，一八三二年東北又生水災，基督教人士尤多盡力。遇有戰事發生，往往擔任救護難民工作，自革命軍興，以至於連年內戰，各處教會都曾為救護難民而努力。如一九二五年齊盧內戰，滬寧一帶廬舍為墟，人民失所，南京教會便組織「戰地救濟會」與「紅十字會」同時出發工作。近如九一八之役，一二八之役，以及最近七七以後，各地基督教莫不聯合組織，禮拜堂盡成爲「難民收容所」，天主教亦十分盡力，鮑神父在上海南京以及漢口等處設立難民區，賴以保全生命的，無慮數百萬衆。又曾奔走號呼，向中外人士廣募捐款。而更正教全國牧師教友，幾乎全體動員，爲難民捐款服務，此爲盡人目覩的事，將來當有專書記載的。

此外基督教人士曾熱心提倡農村合作，農村改造等等運動，自一九三三年「基督教協進會」在河

北定縣討論平教運動，基督教的農村事業便爲人所注意，以華北爲最發達，如公理會在潞河舉辦的鄉村服務，保定樊家莊、同仁學校的鄉村工作，遼東三縣的婦女教育，昌平、清河、龍山、福山等處農村服務實驗，「銘賢學校」在山西改良種植，以及新德「農業試驗場」等等，可謂農村運動的先鋒隊。其他如「華東教會」亦多辦理農村事業，如蘇州青年會劃唯亭爲「農村服務區」，女青年會最初在遼寧四鄉，山東、福山、廣東、台山、江蘇大場及宋墅辦理農村婦女教育。後來又在湖南、漢壽、湖北、皂市、四川、璧山、潼南、溫江等縣，進行鄉村服務工作。「浙滬浸禮會」之於上虞，「金陵神學」之於淳化鎮，「金大農學院」之於烏江，皆有農村服務的實驗工作。華南方面，如福州「協和大學」的「農村服務委員會」，新寧、女青年會的服務鄉村，廣東協會在人和、墟提倡農村基督教化。華西方面，四川教會對於農村工作亦發生興趣，重慶、成都皆有農村服務工作。江西基督教在黎川縣舉辦農村實驗區，定縣有平教運動，凡此皆基督教對於農村運動的情形。最初在一九一四年有「義農會」的組織，及一九三二年農村合作的推行，全國成立「合作社」有八十餘所。這些都是基督教對於社會服務的大概情形，因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詳述，略舉其綱要而已。

第廿二章 結論

從上述的各種情形觀之，則知基督教在中國的活動，已有千三百年的經過；然而在中國社會上發生影響，却為三百五十年來的事。其間得西差會的慷慨捐輸，終費經營；西教士的歷盡艱苦，為道犧牲；奠定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基礎，豐工偉績，實有足多者。其對於中國所有的貢獻，固非片言所能盡述，而比較顯著的幾點，則莫如：（一）介紹西洋科學，（二）改良社會風俗，（三）推行慈善事業，（四）提倡新教育；小之，影響於個人生活的改造，大之，影響於國家制度的變革。其在道德方面的主張，如提倡男女平等，糾正重男輕女的積習；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掃除納妾蓄婢的惡俗；尤其是積極奮鬥的精神，使安常習故的生活發生變動；犧牲博愛的主義，使自私利己的心理受着刺激；獨一真神的崇拜，使多神偶像的迷信有所打擊。諸如此類，不獨在信奉基督教的三百五十萬信徒，咸能遵守，即一般社會人士，亦多受其影響。是則基督教的有助於我國近數十年的革新運動，實為不容否認的事實。

然而基督教亦自有其無庸諱飾的缺點，即其傳佈的背景，不幸與不平等條約發生關係，這雖在當時情勢有不得不爾的苦衷，非一般抱犧牲主義的教士們的素願，究竟是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上不易洗滌去的污點。是以有不少明達的西教士，曾經電呈各本國政府，願意脫離傳教條約的保護，與積極的提倡本色教會。平心而論，謂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則可以，謂基督教甘心作帝國主義的虎伥，未免有點冤枉。不過

爲基督教本身計，今後應加倍努力於本色教會的完成，使教會的形式精神，得與中國固有的文化與習慣打成一片。儘可能的範圍，減少西教士的派遣與經濟上的津貼，在行政上經濟上完全讓中國人去負責，像佛教一樣。佛教自印度輸入，自漢迄唐，固有不少西來高僧，負創造領導之責，然而降及今日，誰復有認爲外國教呢？所以我希望基督教的中國化，能夠早日實現，可以減少許多不必有的困難。

其次是宗派的紛歧，實在予人以莫大詬病。這在西方固有其分門別戶的背景，而在中國實不必要有這種奴主之見。近數十年來大多數教會不無相當的覺悟，力謀聯合與統一，然而仍不乏固執成見是已非人的現象。例如浸禮洗禮的爭執，新教舊教的水火，尤爲習見的事。天主教書籍中，往往痛詆路得爲叛逆，更正教爲誓反；即更正教中亦有自以爲屬靈派斥他會爲屬世。這種情形，我以爲有亟謀改進的必要，不但希望更正教中的宗派主義漸臻消滅，更希望天主教與更正教間不應再有歧視。

再次是基督徒程度的低下，不能引起社會人士的尊重。初期基督教爲求數量的增加，不問其對於基督教了解的程度如何，便貿然收容，使一般抱有他項目的的人，混跡其間，其行爲，其智識，反給社會以不良印象，甚至引起許多社會的不幸。而今教友的程度雖已提高，大多數傳教士多受過相當教育，普通教友亦沒有藉教行私的人，然欲使基督徒負起領導社會的責任，非有很高尚的道德與豐富的智識不可。平心而論，普通基督徒的智識程度，原較一般民衆的水準爲高，就識字一端言，基督徒中的文盲，不到十分之四，可以證明過去基督教訓練的一斑。但是時代是在不息的進展，所以基督徒更應站在時代的最前綫，爲一

般社會的領導此後基督教的佈道界教育界著作界當如何加緊這一方面的努力。

末了，要說到社會福音的問題，基督教雖注意於個人生活的改造，但決不是獨善其身的小乘宗教。要知道靈性生活的培養，目的是在增加精神力，來負擔改造社會的責任。所以一方面應十分注重到靈修工作，一方面更應激發教友的服務精神，決不能偏於一面，置國家社會於不顧。過去基督教不無此種偏枯，雖近年來對於社會福音的提倡，固已大見進步，然而猶有一部分基督徒只知自求受用，理亂不聞。要知道基督教所重的『得救』道理，『不能自救，決不能救人，不能救人，亦決不能自救』，其中有因果關係存焉。此後基督教如果不能努力於社會福音的提倡，以應付社會新潮流，恐將與佛教同樣要成爲新社會的疣。因爲此次戰事結束以後，中國社會必有很大的改變，這是今後基督教極應注意的問題。

上述區區，不過表示我個人在編完本書後的一點意見，本來是一種畫蛇添足的贅語，因爲歷史是重在事實的敘述，不貴有理論的發表，所以就結束了。

本書參考書

書 名

基督教史綱

聖教史略

基督教概論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景教碑考

景教碑頌正證

也里可溫考

元代白話碑

開封一賜樂業考

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中國歷史的上帝觀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

著 者

賈立言

蕭若瑟

袁定安

張煊

馮承鈞

陽瑪諾

陳 垣

馮承鈞

陳 垣

王治心

王治心

徐宗澤

費賴之

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

裴化行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蕭若瑟

耶穌會士精神與模範

狄神父

利瑪竇行蹟

艾儒略

聖方濟各沙勿略傳

俞惟幾

康熙硃批天主教上諭

故宮博物院影印

不得已

楊光先

中國基督教四大危急時期

董健吾譯

徐文定公集

墨井集

拳禍記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德禮賢

庚子教會受難記

季理斐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柴蓮馥

馬理遜傳

國外佈道集

- | | |
|-------------|-------|
| 楊格非傳 | 同上 |
| 李提摩太傳 | 同上 |
| 戴公行述 | 鮑康寧 |
| 戴氏遺範 | 同上 |
| 中國最早的佈道者梁發 | 麥沾恩 |
| 路得改教紀略 | 林樂知 |
| 浸會在華佈道百年略史 | 魏司道 |
| 約老會簡史 | 金陵神學誌 |
| 中華基督教歷史上下集 | 張欽士 |
| 中華美以美會史略 | 張亦鏡 |
| 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 | |
| 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 | |
| 文社月刊 | |
| 金陵神學誌 | |
| 真光雜誌 | |

基督教全國大會報告書

中華基督教會年鑑

中華歸主月刊

中華歸主統計

教育季刊

青年會年鑑

明史

清代通史

中國史

中國文化史

太平天國叢書

蕭一山

王桐齡

柳詒徵

蕭一山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K. S. Lotourett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American Mission, Shanghai

Christian Progress in China, A. Foster

A Century of Missions in China, D. Macgillivray

所

版

種六第集二第書叢年青

綱史教督基國中

有

權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出版

著者 王治心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每册實洋一元五角 (郵費另加)

YOUTH LIBRARY SERIES II

No 6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By

Wang Chih-hsin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 1.50

Postage Extra

March,

1940

261
101033
2



字 4567
價 40元